序

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池州历史》第二卷（1949—1978）正式出版。这是我市党史研究工作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果，也是我市党的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史工作都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党史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准确地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池州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实事求是、求实存真的原则，客观记述了从1949年至1978年池州地（专）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史实，记载了池州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壮大的光辉历史，总结了池州地（专）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热情讴歌了池州人民不畏困难、矢志不渝、满怀信心干事业的崇高精神，生动再现了我们党攻坚克难、勇立潮头、引领时代的珍贵历史场景，具有历史厚重感，地方特色十分鲜明，资政功能比较突出，是一部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

作,也是一部资政育人的好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池州历史》第二卷(1949—1978)的出版,将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为广大干部群众全面了解池州这一时期的奋斗历程提供难得的资料参考。希望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该书作为党的历史教育的必读教材,重温党的奋斗历程,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聚焦“四个伟大”,增强“四个意识”,激发创业热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提升绿色池州创新池州幸福池州建设现代化水平、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池州篇章,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是为序。

中共池州市委书记:王岩

2017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编
池州解放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1949 年 10 月—1956 年 8 月)

第一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 3
第一节　池州全境的解放 …… 3
第二节　建立军管委员会开展接管工作 …… 5
第三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与接受工作 …… 6

第二章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 10
第一节　剿匪反霸斗争 …… 10
第二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 17
第三节　抗美援朝运动 …… 20
第四节　“三反”、“五反”运动 …… 23

第三章　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30
第一节　土地改革 …… 30
第二节　各项民主改革 …… 38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41
第四节　农工商的恢复与发展 …… 47

第五节　治理整顿经济秩序…… 51

第四章　执政初期党的自身建设和人民团体的建立…… 57
第一节　党在执政初期的自身建设…… 57
第二节　人民团体组织的建立与工作开展情况…… 65

第五章　初步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72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72
第二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79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3
第四节　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 87
第五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90

第六章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 93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 93
第二节　文化事业的发展…… 95
第三节　卫生事业的发展…… 98

第七章　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党的建设 …… 102
第一节　重视并逐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 103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建设 …… 110

第二编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 年 9 月—1966 年 4 月）

第八章　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 …… 121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良好开端 …… 121
第二节　传达学习党的八大精神 …… 122
第三节　贯彻落实党的八大精神 …… 124

第九章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 127
第一节　整风运动 …… 127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 …… 131

第十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 134
第一节　宣传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 134
第二节　大规模兴修水利 …… 135
第三节　“大跃进”运动及其影响 …… 139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 144

第十一章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 151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疫情与严重危害 …… 151
第二节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 152
第三节　兴建围垦灭螺的水利综合治理工程 …… 156
第四节　查治血吸虫病 …… 159

第十二章　落实党的全面调整政策 …… 162
第一节　整风整社,纠正“五风” …… 162
第二节　农村“责任田”的试点、推行与改正 …… 165
第三节　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 …… 171
第四节　继续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 173
第五节　中共池州地委重新建立 …… 176

第十三章　党的建设与理论学习活动的兴起 …… 179
第一节　加强党的建设 …… 179
第二节　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 …… 182
第三节　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 …… 184

第十四章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186
第一节　“四清”运动的开始 …… 187
第二节　“四清”运动的发展 …… 189
第三节　各地运动试点情况 …… 191

第十五章　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 199
第一节　工业建设成就可观 …… 199
第二节　农业较快恢复并有所发展 …… 202
第三节　基本建设成绩显著 …… 203
第四节　社会事业有很大发展 …… 206
第五节　老一辈革命家对池州的亲切关怀 …… 209

第三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池州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内乱局面的形成 …… 213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池州的展开 …… 213
第二节 内乱升级与控制内乱的努力 …… 222

第十七章 “斗、批、改”运动和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 232
第一节 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 232
第二节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 235
第三节 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 263

第十八章 国民经济建设的进展 …… 268
第一节 开展小三线建设 …… 268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 …… 271
第三节 工业学大庆运动 …… 277

第十九章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 281
第一节 “批陈整风”运动 …… 281
第二节 “批林整风”运动 …… 283
第三节 “批林批孔”运动 …… 286

第二十章 1975年的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 289
第一节 全面整顿的开展 …… 289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 294

第二十一章　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池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发展 …… 298
第一节　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 298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池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发展 …… 302

第四编
进行拨乱反正　迎接伟大转折
（1976年11月—1978年12月）

第二十二章　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 309
第一节　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 …… 309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 315

第二十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 320
第一节　农村改革初起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 320
第二节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 336

结束语 …… 341
大事索引 …… 344
后　记 …… 390

第 一 编

池州解放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1949 年 10 月—1956 年 8 月）

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池州全境先后解放,地、县两级人民民主政权相继建立。池州解放后,池州地方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展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进行生产救灾,恢复发展生产。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封建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经济制度,还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各项民主改革,铲除反动政权的社会政治基础,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由于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从而实现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深刻变化;继而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从而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促进了池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

第一章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随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打响和推进,池州境内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江防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池州全境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在各县城建立起军管会,实行一段时期的军事管制,并从组织上、干部上准备人民民主政权的组建,各级党政机构的有效运转,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接收工作,从而使社会秩序得到稳定,社会治理逐步步入正常轨道。

第一节　池州全境的解放

1949 年新年伊始,国民党政府一面玩弄“和平谈判”阴谋,一面抓紧军事部署其长江防线,将 70 万兵力布置在长江以南江西湖口至上海之间的 800 公里的地段上。池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的依山濒江之地。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所辖第八兵团刘汝明部 3 个军 8 个师约 4 万余人布置在湖口至铜陵段。其间,在池州段的驻军有:六十八军军部驻至德,3 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五十五军军部驻贵池,1 个师分布在乌沙至贵池段,2 个师分布在铜陵、青阳段;九十六军军部驻殷家汇,2 个师在大渡口至乌沙硖重兵把守。

针对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中共中央在同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时,号召全党全军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

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积极做好渡江作战的准备。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与地方武装共 100 万人,集结于长江北岸西至湖口、东至江阴长约 500 公里的长江线上,准备渡江作战。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平谈判宣告破裂。21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各渡江集团,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打响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岸发起强大的攻击。

4 月 20 日晚 8 时,中路大军以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第七兵团第二十四、第二十一军为第一梯队,首先在无为至枞阳段起渡,数千只战船乘着夜色,在滔滔长江之中,迎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争先,冲向对岸,迅速突破安庆、芜湖一线。短短一夜之间,渡过了 3 个军 10 个师的兵力,占领了繁昌、铜陵、芜湖等地后,迅速向敌人纵深突袭 50 公里,歼灭国民党第八十八军大部及第二十军一部,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江防拦腰斩断。

4 月 21 日下午 5 时,人民解放军“继续于贵池以西至马当间全线横渡长江”。至 22 日晨,“已占领贵池以西乌沙闸附近和东流以北黄石矶附近的阵地”。当天 22 时,“西路军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于 4 月 21 日晚分别突破贵池上、下江口国民党军队阵地。十一军所部于 22 日清晨解放贵池县城。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五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分别突破香口、茅林洲、东流和阜康圩、黄石矶、清节洲一带国民党长江防线,十五军所部战士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战旗分别插上香山、黄山之巅。22 日,东流县城解放。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迅速向南挺进,不断扩大南渡阵地,十五军于 4 月 23 日解放至德县城,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以三十五师为前卫,以三十四、三十六师

①引自 1949 年 4 月新华社新闻稿。

为梯队,以每天急行军 50 公里的速度,昼夜追赶国民党残军,于 4 月 23 日解放青阳县城。第三兵团某部进逼石埭县城下,国民党石埭县长冯启元率县自卫队及部分军政人员投诚,4 月 24 日,石埭县城和平解放。至此,池州全境获得解放。

第二节　建立军管会开展接管工作

在渡江战役胜利推进的形势下,池州的国民党守军和上层官员纷纷南逃。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迅速占领城镇,并在县城建立起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了一段时期的军事管制。

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制定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攻城部队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人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成池州市的军管会。军管会是过渡性政权,是城市(县城或集镇)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军管会的基本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肃清反动武装的残余势力,恢复并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一切正当的权利,建立革命政权,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执行,有秩序地进行各种接管工作,把工人、职员、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

池州全境解放后,贵池、东流、青阳、至德、石埭等县先后建立起军管会作为过渡性政权,在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等方面,承担起各项工作。如青阳县军管会民主县政府在 1949 年 4 月发布第一号布告中,告示“保护各阶层人民财产,民主自由”、“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各业商铺照常营业”;饬令“国民党、三青团及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着令即日解散,停止任何活动”,并严令国民党军政人员向人民政府登记,交出一切反动证件、武器、弹药及军用物品,严禁一切破坏活动。贵池、东流、至德、石埭等县也先后发布类似内容的布告。军管会从恢复和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肃清反动武装残余势力和旧政权的影响等方面,实现特殊时期的军事管制与社会治理,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权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

第三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与接收工作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江淮大地,池州城乡万众欢腾,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扬眉吐气。当天,中共池州地委、池州行政专署暨各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庆祝大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欢庆的军民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游行放鞭炮,歌声、口号声响彻大街小巷,人们欢天喜地地庆祝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强盛的新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池州各地实行军管不久,紧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一批南下干部奉组织派遣赴池州各县,为建立新政权提前做好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早在 1949 年 1 月于河北省正定县组成的南下干部第四支队的干部南下后,与在皖南坚持斗争的中共皖浙赣工委、沿江工委一些领导干部在池州会师。4 月 27 日,第四支队 126 名干部到达贵池县城。来自河北灵寿县、获鹿县的 130 余名南下干部分别被派往东流、至德两县。第七大队 50 名干部奉调到达石埭县。4 月 26 日,一批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会师于青阳县。

两地干部会师后,为迅速开展工作,中共皖南区委于 5 月 13 日通知成立中共池州地方委员会。杨明任书记,张斌任副书记,刘廉民、戈华、金行生、柴书林、张亮、齐维礼、李淑仪、许章法、陈爱曦为委员。1950 年后,增补程自立、康志杰、陈作霖为委员。同时,成立池州专员公署,齐维礼任专员,许章法为副专员。成立池州军分区军政委员会,杨明兼书记,金行生任副书记,委员会由杨明、金行生、柴书林、张斌、张亮等人组成。地委、专署机关设在贵池。地委始建时设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主要领导干部均由皖南区委任命。稍后,建立了秘书处、党校,以后又增设了研究室、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完成突击性、专门性的任务,成立了财委会、工委会、妇委会、青委会、学委会等,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均由地委领导人兼任。池州地委、专署和

军分区隶属皖南区委、行署和军区领导。池州地区辖贵池、东流、至德、铜陵、青阳、石埭、太平7县。7月,增设大通市。

1950年5月,增繁昌县,同年撤销大通市。

中共池州地委、池州专员公署成立之后,各县委、县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1949年10月,贵池县委成立,书记姚鸿杰;东流县委成立,书记范振国;至德县委成立,书记刘宝恩;青阳县委成立,书记尹彬;石埭县委成立,代理书记甄尚义。

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各县又相继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49年9月25日、11月19日、12月14日、12月23日、12月25日,贵池、东流、石埭、青阳、至德等县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级行政机构成立时,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各界代表人士的参加,特别是吸收一批热爱新中国又有政治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参加,他们代表各界人民群众利益,行使政府职能。这样做既显示了共产党人的虚怀若谷,使新政府组成人员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也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弥补了各级政权建立初期人才和管理的不足,团结带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各级党政机关的成立和进驻城镇,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历史性转变。巩固新政权、恢复和发展以经济为中心的工作,已经历史地摆在池州地区各级党组织面前。

与此同时,普遍建立基层民主政权。12月14日,皖南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改造和废除伪保甲政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几点意见》。自此,各地实行基层区划改造,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权的建设,全区建立起区、乡、村级人民政权,下设闾,彻底废除了保甲制。到1951年9月,池州8县共建立54个区、1057个村民主政权。

全区各级党、政、军机构的建立和正常有效运转,使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为接下来接收、建设繁重紧张的工作提供了有序有力的保证。

各级政权建立起来后,便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系统全面

的接收工作。首先是成立接收委员会,对全面的接收工作做出具体分工。如石埭县于5月4日成立了接收委员会,分党部、财经、文档、文教、交通、武装、司法等小组,分工负责接收工作,其他各县也对分工做了安排。其次是区别不同对象,针对不同情况分类做好接收工作。如在接收反动政府机构时,根据上级先接后管、接与管并举的指示,在实行军管、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全面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机构以替代。宣布取缔国民党、三青团等一切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全面接管各级国民党政府部门、警察系统、司法系统、金融系统、邮电系统等有关单位。责成有关人员交出全部档案,没收其所有财产。而在接收官僚资本工厂时,则采取不同的方法,吸收职工代表及厂内原主管人员参加接管委员会,办理交接事宜,维持正常生产。接收学校时,亦非摧毁之,而是废除旧的教育教学制度,如反动的训导制和校长包办制,取消国民党反动的教学内容,如取消国民党党义、公民、军训、童子军等反动课程,设立新的政治课。三是接收和清理资金财产。各地政府召开了各行各业居民群众代表会议,阐明党的接收政策和法令,号召群众报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遗留下来的一切资金和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藏匿点,让敌人劫持下来的一切资财回归人民。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9月18日,各地清理接收的粮食数量是:贵池县115万斤、青阳县62.6万斤、至德县13万余斤、石埭县15万斤。[①] 石埭县还接收大、小炮26门,枪468支。各地对接收资金、财产进行清查、整理、登记,并予以妥善处理。四是留用旧政府机构中的人员。除反动骨干分子和劣迹昭著并为百姓所十分痛恨者一律不用外,其余一般予以留用。有关部门及时组织他们学习,改造旧思想、旧作风,并将其中的一些人员送进军政干校学习,有的被遣散或资助他们回乡。此外,各地还发布了关于遣送散兵游勇的布告,并分别情况对这些人做了适当处理。

新政权建立初期,池州地委还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从1949年年底开始,地委根据皖南区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加强机

①引自池州专署编印《工作通讯》第七期。

关支部建设、整顿农村支部、健全党委制等。同时按照上级党委统一部署,开展了整风整党。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自 1950 年 4 月起,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地委党校校长,通过党校和各种训练班、短训班培训干部,充实各级组织机构。这期间,根据皖南区委关于干部培养、提拔问题的一系列指示,选调、提拔了大量干部,改变了干部紧缺状况,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这一阶段政治任务的完成。1952 年 1 月,池州专区被撤销,所辖太平县、石埭县划归徽州专区;繁昌县划归芜湖地区;贵池县、东流县、至德县、铜陵县、青阳县划归安庆专区。

第二章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解放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池州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针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破坏活动,进行坚决打击与镇压。特别是以美国为首外部敌对势力悍然出兵朝鲜,严重威胁新中国安全,池州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万众一心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为支援朝鲜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三反”、“五反”运动,稳定了政治经济形势,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一节　剿匪反霸斗争

解放之初,安顿社会秩序,保证人民安居乐业,扫除威胁新生政权的隐患是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从 1949 年起,池州地委围绕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这一中心任务,展开了剿匪反霸、打击反动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匪患猖獗,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随着渡江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向内地派遣大批武装特务,勾结当地潜留的惯匪、反动会道门、散兵游勇和地主恶霸,组织

反革命土匪武装,妄图以山区为基地,建立游击根据地,开辟“敌后第二战场”,为他们将来反攻大陆做内应。

驻扎在池州境内的国民党军队被渡江大军击溃后,在潜逃时仍留下一批残余武装人员充当土匪,当时活动在本地的群匪有十几股,人数不等,多则千人以上,少则十几人。主要有以洪国顺(绰号洪张飞)为首的“中国人民自济军池徽边区游击指挥部”、以丁培鑫和杨勋为首的“中国人民铲共自卫军第十一军”以及吴一飞的刀匪、刘笃轩(又名刘德宣)的股匪,以及流窜在贵池沿江一带的刘东勋(又名刘小腊,绰号刘小拉子)残匪等。他们以游击的形式向人民政权反扑,组织暴乱,袭击基层人民政权,残杀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气焰嚣张。一时,匪患猖獗,严重扰乱了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9 年 4 月,由国民党军统特务朱鹏(即朱穆宗)率国民党残部 90 余人,经贵池到青阳西馆,与青阳匪首姜保良等汇合,组织“国防部皖南人民抗敌自卫军司令部”,下设 2 个独立团。原为国民党军官的贵池县刘街的地主恶霸吴一飞,在青阳县西馆村建立大刀会土匪武装,充当“国防部皖南人民抗敌自卫军”第五团团长。朱鹏、吴一飞、刘作波、姜保良于 1949 年 5 月 25 日晚率 500 余名匪徒暴乱,包围了驻贵池县双溪殷村姚的解放军山东随军南下民兵团,致使 22 名战士牺牲、8 人被俘,刘街乡政府被袭。

曾被国民党封为“贵池县第四区署联防大队长”的洪国顺及以其为首的土匪武装是皖南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洪国顺是贵池县四区莘田乡岩石嘴(现石台县莘田乡东庄村)人,是一个有 10 多年历史的惯匪、“青帮”头子。1947 年至解放前夕,曾任国民党中队副、贵池七区(现石台县丁香镇)联防区署副主任等职。洪匪解放前大肆发展“青帮”组织,培植自己的势力,尤其在丁香、占大等地势力较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作威作福,祸害人民。1949 年 5 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假装投降,但乘人民解放军追歼南下残敌之际,于同年 6 月网罗匪徒,纠集匪众千余人组成所谓“人民自济军贵至东祁石边区游击指挥部”,自封总指挥。主要匪首还有陈鼎彝、郝斯龙等。他们盘踞在

贵池县境南部,在以丁香树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四处窜扰,十分猖獗。6月30日晚上,洪国顺等一伙匪徒攻打至德县二区(葛公)区公所。当时二区干部都赴县开会,只有区武装部部长王平留守。在土匪的围攻下,王平腹背受敌不幸牺牲。土匪撤退时,抢走机枪1挺、手枪1支、步枪8支,还有子弹、炮弹、电话机等。

7月8日,这伙土匪打听到小河区政府干部到贵池县城开会,只有6位同志留守区政府的消息后,调动大批武装匪徒攻打小河区政府。当时留守的6人只有4人能参加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同志们仍能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土匪强攻与火攻并用,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区队长黄小毛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留守人员乘着夜幕突围。土匪进镇后恼羞成怒,开枪打死未来得及撤退的电话员、通讯员3人,杀害群众1人,捕走老干部1人,抢去子弹13箱、手榴弹100枚、公粮800余石,及军衣、毛毯、食盐等物资。

7月29日,洪匪第七大队长黄国隆亲自率领全队匪徒攻打吴田乡公所,枪杀剿匪部队战士1人,捕走队员1人、保长1人,抢劫公粮800余斤、步枪2支。8月初,洪匪150余人偷袭横渡乡公所,捕走机枪手杨金水等4位同志,抢去机枪1挺、步枪5支,并于次日将杨金水杀害。8月14日,洪匪又强迫民夫抢走公粮120石。当月,洪匪还先后枪杀了公安局刘街乡干部吴建中和在灌口乡工作的南下干部赵俊莲等同志。是月,以洪国顺为首的土匪武装改为"中国人民自济军池徽边区游击指挥部",组建13个大队、6个直属中队、1个独立分队,网罗匪徒2000余人,其中武装匪徒800多人,活动于贵池、至德、东流、石埭、祁门等县交界处,侵占20余乡、170保,东流、至德县城一度发生危机。

7月时,曾任国民党至德县长、屯溪市警备司令的汪汉收罗千余名土匪武装,成立"中国人民自救军皖赣边区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公开叫嚣拿下至德县城。这些土匪在至德张溪区骚扰,抢劫昭潭粮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此外,吴天赐、吴文虎、盛成功、刘东雄、丁长春等人各自纠集残匪在池州境内猖狂活动。

土匪的暴乱给山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短短的4个月,贵池的杨坑、丁香、灌口,至德的葛公,石埭的小河、横渡等区、乡公所均遭

土匪袭击,枪支、粮食被抢,干部群众惨遭杀害 20 余人。刚刚解放的山区笼罩在群匪暴乱的恐怖之中,人民还未来得及品尝翻身解放的喜悦,就面临着土匪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威胁。

二、开展剿匪斗争

针对土匪武装威胁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池州地委、专署根据皖南全区剿匪工作会议精神,对剿匪工作十分重视,把彻底肃清土匪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决心消灭土匪,根绝匪患。确定了“军事扑灭,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而以政治为主”的剿匪工作方针。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进驻皖南的部队与地方武装组成剿匪兵团,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紧密配合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剿匪行动。

首先集中兵力打击气焰嚣张的有较强实力的股匪。1949 年 5 月 27 日,剿匪部队展开对盘踞青阳西馆股匪刀匪武装清剿行动。部队从贵池出发经过小九华开进杜村乡畈村罗家,半夜时分,部队进入战斗阵地港浜弄,占据有利地形。天将亮时,向股匪发起进攻,给匪徒以迎头痛击。这次战斗毙、俘刀匪 300 多人,缴获各种武器千余件,匪首刘作波、刘作模当场被击毙,至此,猖獗一时、横行乡里的刀匪宣告覆灭。

9 月,华东军区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第二二一团,和池州独立团、民兵等地方武装与地方政权干部组成的一支剿匪队伍,在成立的统一剿匪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围剿洪国顺股匪的斗争。

先是总攻洪匪大本营。9 月 1 日,二二一团与独立团分成两路出发,奔袭洪匪老巢丁香树。一路经殷家汇,奔灌口、牌楼,部队先头连在牌楼街头遭到土匪的埋伏,经过一场激战,剿匪部队牺牲了 1 名指导员和 3 名战士,但迅速将陈鼎彝指挥的匪四、六大队击溃,进而向小河口突击,歼灭匪挺进支队、八大队各一部,直逼丁香树。剿匪部队另一路经青阳,向高坦、留田、横渡合击。池州军分区所属团县武装,由至德向项家街、丁香树方向清剿,堵匪逃窜。面对神速推进的围剿部队,洪国顺调集其六、九、十大队,由副官主任汪湘涛率领,在胡村阻击

顽抗。土匪在去胡村必经的大石桥边,集中轻重武器,以猛烈火力封锁石桥。两路剿匪部队会师后,集中力量打桥头顽匪,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剿匪部队强攻打过去 1 个班后,占领有利地形,掩护大部队过桥,后续部队迅速过桥,以压倒优势占领胡村。被击溃的土匪乱了阵脚,无抵抗之力,纷纷向龙泉、库柏山一带逃窜。

其次是搜剿散匪。土匪溃逃后,部队进入丁香树,设立剿匪指挥部。部队化整为零,进山搜剿散匪,力求除恶务尽。剿匪部队每个班分成几个战斗小组,不分昼夜在深山密林中追剿散匪。这样做取得显著效果,大多数散匪和小股匪徒都被战斗小组歼灭。

最后是追击匪首。洪匪队伍被歼灭后,匪首洪国顺成了惊弓之鸟,到处逃窜。昼伏夜行于丁香地区,活动在山岭、茅棚、坑洞里,让亲信送饭。追剿部队曾连续追捕过 20 余处均落空。为防止被中途伏击,洪国顺一天转移数处,最后潜回雷打岭亲戚家后门的阴沟。追剿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得知洪匪逃到雷打岭后,立即派出 20 余人,于 10 月 28 日夜 9 时,将其包围击毙。

洪匪从 1949 年 6 月 30 日暴乱至 10 月 28 日即被剿匪部队全部剿灭,匪首洪国顺被击毙,其所属 11 个大队大队长、六大处(室)主任,除第十大队长孙干逃到江北被打伤外,均全部落网。在进剿中,向剿匪部队投降和被俘的土匪有 119 名,包括“上校参谋长”郝斯龙、“上校顾问”陈鼎彝、“高级参议”徐斌;挖出潜伏的匪特人员 110 人;镇压罪大恶极分子 136 人,判刑 179 人,管制 68 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和大量物资。至此,这股土匪全部被歼灭,为方圆 240 余里、20 余乡、12 万人民根除一大匪患。

与此同时,9 月初,徽州、池州两军分区剿匪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展开对盘踞祁门、贵池、至德等县山区的汪汉、仇照田股匪的全面清剿。驻贵池的野战军某部在马坑一带作战中,活捉该匪部“参谋长”任培坚及代理“大队长”陈民富等 30 余人,缴枪 34 支。同时,池州地方武装在贵祁交界处活捉匪首仇照田,徽州军分区部队先后捕获该匪部“大队长”李守政及陈纪良,致使该匪部瓦解,匪众分散逃窜。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追剿,给该股土匪以歼灭性的打击。

1950 年 2 月，皖南行署公安处制定《关于农村城镇户口及特种营业暂行管理办法》，各级人民政府部署户口登记工作。以户口登记材料为基础，逐村核对户口，查出一大批反革命残余分子和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员。

在 9 月 2 日至 10 月 3 日剿匪作战中，共歼灭股匪 539 人，活捉洪国顺匪部和汪汉匪部土匪共计 116 人。投诚的有 423 人，毙、伤匪 14 人，缴获重机枪 3 挺、六〇炮 3 门、轻机枪 18 挺、手枪 252 支、冲锋枪 9 支、各种弹药 26 万余发、电台 1 部、收音机 2 部、电话总机单机各 6 部。历时两个多月的剿匪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结束了池州千百年来匪患不断的历史。

池州剿匪斗争受到了皖南区委、皖南军区的充分肯定，并为此总结了以下几条成功经验：

一是以压倒优势兵力，以军事扑灭为主，展开猛烈的军事清剿。军事清剿首先确定进攻重点，打击主要股匪，然后逐点推进，全歼一切股匪。从洪国顺股匪下手分进合击，先摧毁其指挥系统，再派精干部队跟踪追击，继而派地方武装配合部分兵力进山搜剿，使股匪无喘息休整机会，促使其内部动摇分化弃械投诚。以军事清剿的高压态势，为展开政治攻势创造先决条件。

二是大力宣传剿匪政策，借土匪恐慌混乱之时，开展政治攻势。一方面广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动员一切社会关系及社会力量，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土匪家属座谈会，规劝投诚自新，立功赎罪。另一方面在交通便道张贴标语，从而动摇其思想、瓦解其斗志，促其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三是军事清剿、政治攻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争取群众对剿匪斗争的支持。军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同时主动帮助群众干农活，密切军民关系，清除其思想顾虑。通过接近群众、了解匪情，争取群众对剿匪斗争的帮助支持，组织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剿匪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清剿、政治攻势，股匪得到部分清剿，减轻匪害侵扰，满足群众的剿匪愿望。加上地方上建立起人民政权，群众除匪保家的阶级觉悟有所提高，群众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组织纠查队，为剿匪站岗放哨、传

递情报、捕捉逃匪,剿匪工作得到群众支持与参与。

三、开展反霸斗争

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在剿匪斗争的同时,池州各县开展了民主反霸斗争。根据皖南区委发出的《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反霸斗争的方针政策和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各地均成立了反霸工作委员会,举办反霸培训班,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召开农代会、妇女工作会议,布置清查恶霸的斗争;组织群众诉苦,开展说理斗争,揭露恶霸罪行,研究斗争对象;抽调公安干部深入重点区、乡,配合反霸工作。为此,池州地委于9月8日专门召开了全区妇女工作会议,讨论妇女参加剿匪反霸斗争问题。之后,全区贵池、青阳、铜陵、东流4县共有4693名妇女参加剿匪反霸斗争。其中贵池县在反霸斗争中的主要做法是:第一,有重点地开展清查恶霸斗争,即先从影响恶劣、剥削手段残酷的大恶霸入手,擒贼先擒王。由于各级党政组织积极领导和农民代表的努力,全县共有16个乡、53个村、1.4万多农民投身反霸斗争的洪流。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揪出恶霸37人,其中一区9人、二区7人、三区3人、四区5人、五区4人、六区4人、七区4人。第二,在清查恶霸斗争中,注意总结经验,纠正偏向。第三,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带战役性的联村反霸斗争。宣传“天下农民是一家,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通过召开规模较大的联村斗争大会,让群众上台诉苦,效果显著。第四,在反霸斗争中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夺回被地主恶霸剥夺的农民物资,还给农民相当利益,调动农民反霸斗争积极性。到1949年年底,全县共收回稻谷58.6万多担,还收回了一部分房屋、田地等。其中一部分分给农民,一部分作为征收的公粮。在房子、田地、稻谷分配上,各区都制定了分配原则和分配方法,如一区的分配原则是照顾苦主和受害最深的诉苦人,根据家庭贫、中、富的不同情况,贫农多、中农少、富农无;照顾反霸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农协会会员和军烈属。第五,把反霸斗争与减租减息、征收公粮几个环节结合起来抓,在反霸斗争的同时保证后两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事实证明,凡是燃起了反霸怒火的村庄,征粮和减租减息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贵池县反霸做法收效明显,在全区得到不同程度推广,全区反霸斗争达到预期的目的。后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人民政权又进一步没收地主恶霸非法所得财产,并对他们的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

第二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于反革命活动和组织必须给以严厉地及时地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任其猖獗。接着,皖南区委也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共池州地委根据皖南区委的部署和有关政策规定,从 1950 年冬开始领导全区人民,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重点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 5 个方面反革命分子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

一、反革命残余势力相互勾结,进行系列的破坏活动

池州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斗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政治形势基本稳定,但是残存的反革命势力仍然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主要表现在:境内土匪武装虽在组织上经严厉打击已土崩瓦解,然而未公开进行暴乱的小股土匪及零星土匪仍未肃清,他们在暗中窥测,伺机反扑,如所谓的“华山独立大队”、“建设大队”、“孝子队”、“沿江独立团”、“青年反共救国军沿江支队”等;一些流窜的政治土匪和盗匪绑架群众、抢劫财物,制造混乱;一些地方匪特相互勾结,秘密建立暗杀组织,残害革命干部、民兵和群众积极分子;特务分子也在进行潜伏活动和公开破坏活动。解放前夕,国民党中统贵池县调查室在池州筹划潜伏活动。国民党军统局设计委员少将副主任刘启瑞和军统“大同通讯社”通讯员黎炯珠到贵池进行潜伏部署。在他们指派下,一批军统、中统特务分别混入县人民政府、基层政权和知识分子训练班,搜集情报,散发反动传单,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些军统、中统特务会合一批老牌特务,策划组织“游击队”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有些特务在青阳、贵池等地还发展组织,收买拉拢地方与军队的干部、战士,进行公

开的破坏活动,放火烧毁军用物资、破坏通信设施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也未受到清理和打击。如活跃在许多乡、村的“同善社”、“一贯道”、“大刀会”、“乩坛”、“先天道”、“无为道”、“仙姑道”、“无极道”等。仅贵池县就有道首 532 人、道众 6321 人。至德县西班牙籍的总木堂、葛上达勾结国际间谍黎达显、梅耿光,于 1950 年六七月间组织反动“圣母军”,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反动谣言、制造恐怖活动。国民党反动军政人员贼心不死,密谋暴乱。有的混入人民政权内部,伺机反扑,不少乡、村政权被坏人控制,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残余的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说“志愿军退到上海了,伤员运到芜湖了,美国兵舰开到山东了”,叫嚣要“变天”。1950 年 10 月,原国民党反动军官谢国祥与原国民党青阳县参议员陈浩如勾结,收罗散兵游勇数百人密谋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地主分子激烈反抗土改的事件,他们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反攻倒算。1950 年冬,贵池元四、佘溪两村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携带武器逃至六峰山,开会密谋策划暴乱。以上情况,充分表明池州境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气焰嚣张、活动猖獗。

二、严明政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中共池州地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纠正过去一段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

这次运动的过程大致分为 3 个阶段,即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5 月为第一阶段,运动由宣传发动到进入高潮;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7 月为第二阶段,即巩固镇反运动成果,进一步开展镇反运动;1952 年 8 月至 1953 年 11 月为第三阶段,即深入扩大运动成果,直至取得镇反运动的基本胜利。

镇反运动的基本做法是:首先是成立组织,加强对镇反运动的领导。在全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一支以公安、司法机

关为主,从相关单位抽调精干人员组成镇反工作队。由于池州的土改运动与镇反运动同步进行,镇反工作队也是土改工作队,他们负有双重责任。1950 年下半年后,各地工作队人数扩大,县成立工作总队,区成立工作中队,每个中队由开始的 30 人扩充为 100 人左右,地委、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二是广泛宣传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控诉和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与方法,使镇反运动对敌斗争有了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池州各地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广泛宣传镇压反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拥护《条例》,大造舆论声势,推动了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接着,通过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组织群众诉苦、控诉;展览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罪证,激发更多群众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首领进行揭发和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区召开的有数千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诉苦大会、斗争大会、示威游行达 3000 余次,仅贵池县殷汇区就有 103 次。该区在 1950 年 12 月 25 日公审当地恶霸地主、军统特务纪振之时,闻讯参加的群众就有 4000 余人,他们争相控诉,义愤填膺,群情激奋。三是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收缩方针,清理积案。池州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条例》,严格执行这一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研究案情、审查镇压对象。各地通过召开各类代表会议,广泛征求意见,认真审查案情。根据中央“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从 1951 年 6 月起,除现行犯外,一律停止捕人,集中处理积案。在办案中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而又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方针。到 1952 年 7 月,各地先后完成了一、二阶段镇反任务,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打击了一大批各类反革命分子,并镇压了那些大恶霸、武装特务首要分子、血债累累的日伪汉奸。仅至德县即查出“五类”反革命骨干分子 1755 人,其中依法惩处 1439 人。东流县对 700 多反革命分子分别给予判刑和管制,一部分经教育予以释放。两县还取缔了“先天

道”等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除对300多名道首进行依法处理外,其余2万多一般成员均办理退道登记手续。青阳县查出“五类”反革命骨干1232人,其中予以惩处的有1013人。四是巩固扩大镇反成果,彻查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根据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进一步发动群众,防止部分地区镇反运动的不彻底,池州各地从审查管制人员入手,调查摸底、搜集罪证,检查镇反运动的彻底程度,清查漏网的反革命分子。11月初,对全区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各地结合划乡建政,还整顿并建立健全了农村治安组织,这对巩固镇反成果、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镇反运动是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历时3年多通过3个阶段的大规模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池州境内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使全区社会秩序得到空前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从而保障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节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海军第七航队侵入台湾海峡,并派空军多次轰炸中国边境城市与乡村。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外部敌对势力的严重威胁。

美国的侵略行径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对。应朝鲜政府一再出兵援助的请求,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做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决定。由此,国内掀起一场规模空前、万众一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帝斗争的继续,这场运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激励人民,也极大地鼓舞起池州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池州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运动。

一、成立组织,宣传形势,开展爱国公约和平签名运动

1950 年 11 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皖南分会(后改为皖南抗美援朝分会)成立。池州全区各县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迅速成立。到 1951 年 3 月,先后改为抗美援朝分会。各区、乡、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各级抗美援朝组织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正确宣传朝鲜形势,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并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普及宣传抗美援朝和准备“五一”全国示威游行的通知》精神,池州全区从 1951 年 3 月开始,各县都组织起宣传队。县委向各区、村派出工作组,进乡驻村。通过召开会议,出黑板报、墙报,漫画、戏曲和扭秧歌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以抗美援朝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同时,各地中小学也在各科教学中增加对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学内容,使他们提高对抗美援朝伟大意义的认识;懂得保家与卫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明白只有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国土,才能维护国家安宁、保卫世界和平,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的道理。

从 1950 年 5 月至 10 月,全区开展签订爱国公约和平签名、游行示威活动,声援抗美援朝运动。为响应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和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发出“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号召,池州的和平签名运动旋即开展起来。青阳县于 1951 年 3 月召开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全县人民爱国公约》。石埭县于 1951 年 8 月召开的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做出中心议案:“广泛深入贯彻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修订爱国公约,做好优抚工作及武装保卫秋收,按时缴纳公粮,做好秋耕秋种。”全区各级团组织也发动全体团员签订爱国公约,如贵池县团组织做出 1 个团员动员 20 名群众签名的决定。全区在整个抗美援朝运动期间,有 40 万群众参加了控诉美帝侵略朝鲜、武装日本罪恶阴谋,参与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武装日本的签名运动,并举行游行示威,声援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抗美援朝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掀起参军参战、捐献与增产节约热潮，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一是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广大适龄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听从祖国召唤，踊跃报名参军。他们纷纷立下报国志，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把美帝国主义从朝鲜国土上赶出去。据统计，贵池县有 1.3 万名青年报名参军，4460 人加入了志愿军。贵池中学、池州师范学校第一批学生 10 人于 1950 年 12 月赴朝作战，池州人民敲锣打鼓欢送。父母送子参军，兄弟共同上战场，气氛热烈，场面感人。1951 年 1 月、7 月，欢送第二批、第三批学生骨干参军入伍。石埭县、青阳县也先后有 366 名、2170 名青年参加了志愿军。东流、至德两县共有 2000 多名青年参军。

二是开展捐款捐物慰问活动。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两次发出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救济朝鲜难民的号召，全区掀起捐赠慰劳品、救济品、飞机大炮和写慰问信的热潮。仅 1951 年 3 月至 5 月，东流、至德两县各捐钱购飞机一架，贵池县于同年 11 月捐钱 19.2 亿元（旧币），完成了“贵池号”战斗机捐献计划。石埭县、青阳县各捐献钱款 1.7 亿元（旧币）、1.18 亿元（旧币），另外还捐赠其他物资，向朝鲜战场寄慰问信数万封，慰勉志愿军伤残病员。

三是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保证物资供应。1951 年秋，中共池州地委根据皖南区委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抗美援朝，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教育与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全区各条战线工人、农民、工商界人士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支持抗美援朝。全区各乡、村、户纷纷订立增产计划，开展生产竞赛活动。当年，全区农业生产普遍增产，人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同时从物质上有力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

四是做好拥军优属的优抚工作。为帮助志愿军将士解除后顾之忧，全区人民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做好志愿军家属的优抚工作。除了上门慰问军烈属，送去慰问金、慰问品外，还重视帮助解决烈军属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发动群众帮助烈军属包耕、代耕土地，让烈军属深

受感动,他们纷纷写信鼓励亲人安心打仗,保家卫国。

第四节 “三反”、“五反”运动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10 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恢复国民经济、支援朝鲜战争和国家重点建设,围绕增产节约,保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廉洁,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而交织进行的一场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

195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级党政机关内部暴露出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要求“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开展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强调各级领导要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同时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迅速开展这场斗争。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利用正常手段获得一般利润。因而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采取一些对抗措施,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暴露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与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关,因此,要铲除“三害”就必须反对“五毒”。为此,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

一、“三反”运动

池州的“三反”运动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从1951年12月开始到1952年7月底基本结束，历时7个多月。运动分为学习动员、民主检查、“打虎”和建设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1年年底至1952年1月初，为学习动员阶段。运动一开始，专、县两级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下设办公室。同时各地还成立了“打虎”、侦查、“搜山”专业组，分工负责抓思想政治工作、查账、远途侦查、搜集材料等任务。

做好组织准备后，专、县两级先后召开了思想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华东局和省委、地委有关会议精神，学习了华东局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讲话材料，着重阐述了开展“三反”运动和厉行增产节约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意义；宣布了运动的组织领导及其办事机构与工作职责；布置了运动开展的方法和步骤。会后，各部门还召开了小型座谈会，举办学习班，通过学习讨论，加深对上级会议精神的理解，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消除顾虑，同时还要求各地各部门迅速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群众。经过层层发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运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在学习讨论中，有的县还对运动步骤与方法做出具体安排，如贵池县提出“三先三后”的做法，即先党内后党外、先坦白后检举、先热烈后深入，七天一总结，发现问题及时请示汇报。

第二阶段：从1952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为民主检查（坦白检举）阶段。在专、县两级机关和国营工矿企业中开展民主检查，首先从领导干部自查开始。根据中央《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专、县负责人逐级带头在群众大会上做自我批评，并号召群众要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坚决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做斗争，由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检查运动。一方面领导干部主动向组织和群众做深刻检讨，贪污分子主动向组织坦白交代；另一方面鼓励群众检举揭发。为把运动引向纵深，有的县还设立坦白反省

室,如贵池县在县检察署设立临时坦白反省室,对有重大问题而又拒不坦白者,送入坦白室进行谈话教育,敦促其坦白交代、立功赎罪。专、县两级还设有举报信箱,接受群众的检举。针对有些人对贪污定义不明、界限不清的问题,各地各单位组织学习地委文件,统一政策界线标准。当时把贪污旧币值1亿元的叫“大老虎”,把贪污旧币值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者叫“小老虎”,把既有历史问题又有贪污行为者叫“双老虎”,把团体贪污叫作“集团虎”等。民主检查中,各地都发现有程度不同的贪污现象,有的数额较大。如贵池县在坦白检举阶段,初步揭发出有贪污行为的共856人,贪污数额为357432万元(旧币),其中贪污旧币值1亿元以上的7人,贪污旧币值5000万元至1亿元的9人,贪污旧币值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111人,贪污旧币值1000万元以下的729人。

第三阶段:从1952年2月上旬至6月上旬,为“打虎”阶段。这一阶段“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因此打击贪污犯称为打“老虎”。2月初,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打虎”指挥部,对全区“打虎”工作进行了部署,还组织了各种专门的“打虎队”。“打虎”阶段共分3个战役,第一战役是召开系列动员会,总结前一阶段运动情况,批判满足现状的右倾麻痹思想,听取各部门的“打虎”计划和任务落实分工情况。第二战役是批判错误思想认识,扫除思想障碍。加强对落后部门的领导,深挖重剿“虎窝”,再次掀起“打虎”高潮。但在“打虎”过程中,也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犯有急躁冒进错误,有的单位为了完成“打虎”任务,虚报“老虎”数字,有的单位盲目蛮干甚至刑讯逼供。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省委、地委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指示和文件,要求各地检查前一阶段工作,克服急躁冒进思想,规范“打虎”行为,讲究方式方法,从而有力地指导了运动的发展。第三战役是定案追赃。对于坦白和揭露出来的大、小“老虎”,各县均成立专案组办理,依据本人表现和家庭经济来源收支情况,摸底核实、逐一梳理、归类排队,再对照政策,分清界限,提出初审意见。然后报“三反”案件处理委员会,根据退赃情况量刑定案。有些重大案件,还报经省“三反”案件处理委员会审定。由于定案处理工作坚持了

“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方针,定案掌握“三定”步骤,即先定型(依案情难易分类型),后定量、定质(贪污数量与情节)。定案后的大、小“老虎”及贪污数额较前一阶段大为减少。如贵池县原定贪污款92570万元,经核实后的贪污款为21088万元,贪污人数也由原来的842人降为472人。追赃工作也按照“应缴者缴之,应减者减之,应免者免之”的原则进行了控制。由于案件处理工作严格按规定执行,保证了“打虎”阶段运动比较平稳和健康。

第四阶段:从1952年6月初开始至运动结束,为建设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教育,建立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首先是思想建设方面,主要是弄通思想,提高认识。在经过慎重的追赃定案后,对揭露出来犯有一般经济问题错误的人,给予个人鉴定,根据“不追、不逼、自觉、愉快”的原则,先由个人做出书面反省交代,再由本单位小组讨论通过,填写鉴定表。在组织建设方面,整顿内部组织,对犯错误的党员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对机关工作人员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对犯有严重经济错误的“大老虎”给予刑事处分。对于贪污旧币制百万元上下的人员,则以教育为主,摘除贪污分子帽子,免于处分。而对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骨干分子,分别吸收他们入团入党和提干。在制度建设方面,建立健全了党内生活制度和机关单位学习、生活、财经管理等制度。通过相关制度建立与执行,堵塞贪污、浪费的漏洞,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池州专区的“三反”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确实起到了惩治贪污分子、克服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作用。其主要成效如下:一是在政治思想上,教育了干部,整顿了队伍。这场运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本质,划清了思想界限,树立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时刻牢记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二是在工作态度上,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克服了机关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三是在干部问题上,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清除了内部一批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的肌体,教育挽救了一批干部。对经得起审查考验的干部,从中选拔培养了一批优秀积极分子。整肃了党风党纪,

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四是在制度建设上,严格财经纪律,加强对财务工作规范化管理,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促进经济工作有序健康发展。通过运动整肃,加强了党和国家机关的建设,树立起党政机关廉洁朴素的形象,增强了人民对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信任。

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运动一度出现严重偏差,特别是在"打虎"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政策界限,单纯追求人数、钱数,少数单位出现扩大化现象,甚至出现逼供信、严重体罚,误伤了一些好同志,造成不良影响。后因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纠正偏向,从严把握政策界限,正确引导不断高涨的群众热情,逐步把运动引上健康轨道。

二、"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开展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在全国城市中展开。1952 年 2 月,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中小城市开展"五反"运动问题的指示》,先在合肥市开始典型试验,后扩展到蚌埠、芜湖、淮南(田家庵)、屯溪、阜阳等城镇。池州专区于 1952 年 2 月 6 日至 3 月 15 日开展了为期 39 天的"五反"运动。

针对"五反"运动的特点,专、县两级党委、政府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厂入店,依靠团结工人职员,加强对运动的指导。整个运动分 4 步进行:一是宣传动员,摸清情况。通过会议、广播、黑板报等形式,大张旗鼓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工人职工广泛参与同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同时以城区为重点,摸清城区工商界的概况,列出私营工商业者不守法的重点户、一般户、较轻户 3 种类型,分类做工作。二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宣传舆论攻势下,群众动员起来后,纷纷检举揭发、揭露资本家的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短短几天,仅贵池县城关镇就收到检举信 558 封。三是排出重点,坦白交代。在工作组与检查小组的政策宣讲和职员群众揭发举报下,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感到内有职员检举、外有群众监视,无法逃避,遂主动交代问题,坦白自己经营中不法行为,城关镇一次挖出重点户 52 户。四是调查核实,组织处理。对

群众检举与资本家个人坦白交代的问题,按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搜集材料、清查账目、深入调查、核实准确。区别对待守法者、基本守法者、严重违法者等 3 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对问题严重者送司法部门惩办;一般者限期坦白交代;轻者当众宣布免于处分,令其补交税款。这样处理达到了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的目的。

经过“五反”斗争,贵池城区工商界 27 种行业、622 户中共查出有重大罪行的 35 户、偷税漏税的 169 户,经上级批准,均及时做出处理。贵池县城关镇的“五反”经验促进了全区“五反”工作的开展。青阳县“五反”运动是穿插在“三反”运动中进行的。县委结合“三反”动员,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广泛揭发的基础上集中目标,把斗争锋芒指向大贪污盗窃分子。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会员揭发资方的不法行为,使一些偷税漏税的经营者补税,一些囤积粮食的资方被检举出来;另一方面,县政府专门抽调人员进驻私营厂店,对重点户进行检查。同时,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通过对 711 个工商户的清查,发现严重违法的 27 户、一般违法的 131 户、半违法的 128 户,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罚款和处理。罚款总额为 189576 元,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5 月 26 日,省委下发《关于三反、五反等问题的指示》,要求开展“五反”的 6 个城镇尽快结束“五反”工作,未开展“五反”的城镇不再开展,也不再进行“五反”的典型试验。但由于运动时间短,且与“三反”运动穿插进行,人手少、任务重,加上经验不足,对资本家打击面过宽,退赃补税没有考虑他们承受能力;劳资见面斗争方式生硬,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影响资本家生产经营积极性。在团结工人、争取职员支援支持方面做得不够,致使运动不够深入彻底,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运动之后,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扩大了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增加贷款投放,使私营工商业主生产情绪有了很大转变,池州的私营工商业继续有了新发展。

总之,这场“五反”运动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了一次广泛而生动的爱国守法教育,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加强了对资本家的监督,团结稳定了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通过“五反”运动,

挫败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新生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基础,为以后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第三章

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池州全境解放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摆在各级党政领导面前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遵循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总任务,池州地委带领全区人民紧紧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艰苦创业、顽强奋斗,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抗击特大洪涝等自然灾害,修筑长江大河水利与道路等基础设施,创办了一批国营集体企业,扶持促进商贸发展,使国民经济结构有了明显变化,在短短3年内使全区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较好水平。

第一节　土地改革

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根基。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1950年6月上旬,中央七届三中全会阐明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范围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便轰轰烈烈展开了。

一、土地改革的背景

解放之初,池州专区农业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对土地占有的多寡,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农民对土地占有严重不足。据统计,池州全区约占 30%的地主富农阶层却占有 65%以上的土地,约占人口 25%的中农占有 20%左右的土地,近 60%的农民仅占有 10%左右的土地,地主富农人均占地 10 亩以上,贫苦农民只有 2 分多地,有的则根本没有土地。如贵池县杏花村 28 户、112 人,青阳县杨田村 43 户、140 人均无土地。而位置好、质量优的土地则多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贫下中农的土地比较贫瘠偏远,如石埭县三民村共有畈田 226.65 亩,其中 173.5 亩被富农占有,138 户贫下中农只占 53 亩。失去土地占有权的广大农民被迫沦为地主的佃农,遭受地主地租、高利贷的剥削,而当时的地租普遍偏高,有的占到收成的五成到七成甚至以上。农民终年劳累,交完地租所剩无几,难以养家糊口,遇到灾年被迫离乡背井,以乞讨为生。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是导致农民贫穷和农业落后的根源,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解放促进农村发展的生产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题中之义,也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做法

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是对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颠覆性的革命,涉及农村阶级利益关系的重大变革与调整。池州地委、专署按照中央和上级党委指示,认真贯彻《土地改革法》,紧紧围绕“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服务服从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坚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实施方法,推动土地改革的进行。整个土地改革分为准备、实施和总结巩固 3 个阶段。

准备阶段。第一,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1950 年 8 月底,池州地委根据中共皖南区委书记马天水在皖南地区人

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为完成皖南区土地改革而奋斗》的报告,确定1950年秋冬在全区进行土地改革,要求把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号召全区迅速掀起学习《土地改革法》和《华东土地改革实施细则》的热潮,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城乡联动的方法,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受到一次土地改革政策的教育。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土地改革运动的认识,各县还先后召开了区、乡干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议,号召群众踊跃参加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来,并能按照政策办事。宣传强调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注意做到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的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政策,起到了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改运动的阻力、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

第二,整顿基层组织,训练农村党员和干部。从1950年6月开始,全区各县就开始整顿农村组织,培训农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土改做好组织上、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池州解放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起县政府机构,对区、乡政府进行撤建改造,农村基层政权得到整顿和巩固。加上各地建立起民兵组织、农会组织,会员遍及乡、村,在各项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年多来,各级党委、政府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抗美援朝、生产救灾等项活动,培养训练了机关党员干部,群众普遍发动起来,觉悟不断提高,干部与群众关系也日益密切,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各县还专门为土改运动举办了多期农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培训班。这一切为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清理土地,对土地财产摸底登记。各地把查清土地、资产作为土地改革的重要环节。1950年8月开始,各县召开土地清理、评产工作会议。会后迅速组织工作小组,进村入户进行查田评产,经过近2个月的艰苦细致调查摸底工作,对各村农户的土地进行造册登记,为下一步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地主财物、分配土地提供主要依据。

第四,成立土地改革领导机构,加强对土改运动的领导。1950 年 10 月以后,各县抽调大批机关干部组建土改工作队,下设中队、小队、工作组,分区分片指导并参与土改工作,随着土地改革运动普遍推开,工作队人员不断增多、队伍不断扩大。

组织实施阶段。第一,动员引导群众。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运动过程中,党既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到运动中来,又要引导群众按照党的政策行事,把发动组织群众与用政策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反对不发动群众,以行政命令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也不赞成对群众运动不加引导,不用政策武装群众,放任自流。因此,土改工作队深入乡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动员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农民对土改运动的认识、政治觉悟,增强农民与地主阶级做斗争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农民主人翁意识、参与土改的责任感。各级党委要求土改工作队必须做到 4 点,即思想上要充分发动、政治上要坚决斗争、经济上要坚决维护农民权益、组织上要彻底整顿。这一时期,各地土改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进行、互相配合,有力地支持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开展。

第二,划分阶级成分。划定阶级成分是土改关键环节,事关农村政治上敌我矛盾的界定、经济上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全区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依据。各县阶级成分的划定主要有下述 5 种做法:一是“讲”,向群众反复讲解政策,让他们理解政策、会用政策;二是“报”,对照政策,让群众先行自报成分;三是“评”,由群众进行评议;四是“审”,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进行审查;五是“批”,由党的核心组批准后予以公布。为防止成分划分时出现政策偏差,各地也先行搞了实验,拟定部分地主富农成分和几户农民成分,对照政策让群众评议、农民代表会议审查,经过评议,让群众明确政策界限。但由于缺乏经验,有些地方干部群众对政策理解不准确、精神没有吃透,在划分成分时出现了形式主义,有的成分报得不适当,有的评审时不民主、审查时不严格,出现成分划定不准确现象。对出现的问题各地及时予以复查纠正。

第三,没收地主土地等大宗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按照《土地改

革法》的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耕畜、农具、粮食等大宗财产,分配给无地及缺乏生产生活资料的农民,使土地等生产资料真正回到农民手中,彻底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对于富裕中农、富农调剂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浮财要统一分配,除留少量的机动田外,所有的果实必须全部分给农民,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或截留。同时,也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分配和其他农民同样的土地,使其自食其力。所有没收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负责,经填表造册后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分配时,要求干部要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教育农民要团结互助。根据"自抽公议,自要公议"的原则,尽量满足贫雇农,适当照顾军烈属、鳏寡孤独,保证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生活资料,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复查总结阶段。第一,复查纠偏,整籍发证。到 1951 年 11 月,全区各地为全面结束土改工作,在整籍发证前进行复查纠偏。复查围绕 4 个方面进行,一是同封建势力斗争是否彻底,案犯处理是否得当,地主是否有反攻倒算行为,农民是否充分发动起来;二是阶级成分是否有错划的;三是没收征收土地财产是否正确,分配是否做到公平合理;四是农村基层组织是否纯洁。在复查纠偏中,对查实尚未分配的黑田、黑地进行了重新分配,退还错征富农、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错划、漏划的阶级成分予以纠正;处理诸如山场、林场、茶山、草场、芦苇场、湖泊权属等遗留问题,还对少数作风不良、贪污腐化、立场不稳的犯错误干部,根据情节轻重做了相应的处理,整顿纯洁了基层农村组织。

第二,召开总结庆功大会,鼓励发展生产。池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认真总结这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指导思想、组织准备、政策落实、具体实施到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也如实指出存在的不足。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坚决彻底地废除了几千年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发展农业生产、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旧面貌铺平了广阔的道路。

三、土地改革的过程

池州的土地改革从1950年开始，在地委的领导下，按照中央“既稳、且快、又好”的要求，经历典型试点、逐步推广、全面展开3个时期进行。第一期土改，各县都选择了一部分乡村进行试点。如至德县1950年3月24日在花园里乡祠村进行试点，10月中旬结束。4月，贵池县在元四、晓村等地进行试点。8月，青阳县于庙前区华源村进行试点。8月6日，东流县在檀村区岭塘村（现东至县胜利镇彭岭）开展试点，并于当年12月6日结束。8月上旬，石埭县在南屏区三民村、三高村和二区夏村开展试点。第二期土改，各地在总结试点地区土地改革典型经验后，认真检查存在的不足与教训，纠正不良现象，在系统分析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50年年底开始逐步推广。如贵池县在3个试点村的基础上，于10月采取点面结合，开展了13个村的土改，继之于11月在50个村进行逐步推开，后于12月采取“推、跳、带”结合的方式，在93个村开展了第三期土改。其他县也在总结试点村做法的基础上逐步推开。第三期土改，是指从1951年起，土改运动在全区全面展开。贵池县于年初在96个村进行第三期土改，4月间又在65个村进行了最后一期土改。致此，全县除6个街道、馒头山工人村及万兴、黄溢渔民村因情况特殊而暂未启动外，胜利结束了土地改革运动。至德、石埭、青阳、东流县均于1950年11月后全面推开，先后于1951年秋冬季胜利结束。

土地改革运动整个进程始终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运动初期，由于放手发动群众不够，干部普遍存在包办代替问题；由打击封建势力不够彻底，对不法地主的破坏活动不敢严厉镇压，致使一些地主分子造谣惑众、转移财产，破坏土改。有的图谋反攻倒算，威胁群众，杀害干部；有些干部思想上怕乱、怕犯错误，领导运动束手束脚；有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做得不够，存在“和平分田”现象；有些地方农民心存疑惑，怕土改工作队一走地主把分出来的房子又要回去，因此对分得的田地、房屋不敢要。

针对这些现象，池州地委坚决贯彻华东局第二次土改典型实验会

议精神,认真检查存在的不足和教训,根据《华东惩治不法地主条例》,把发动群众与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注重发挥农代会、妇代会的作用,用政策武装群众,政府和工作队为群众撑腰,把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分子。如贵池县土改试点村晓村,在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基础上,通过召开诉苦会,提高群众觉悟,一次镇压了狮口张村 6 名地主恶霸,改变了“和平分田”现象,挫败了地主嚣张气焰,保证了土改顺利进行。

当运动进入了逐步推广阶段,在克服试点阶段一些工作中的不足时,又出现了群众发动起来后存在乱打、乱捕、乱罚等现象,少数地方出现“有斗必打”、“提高成分”、不注意团结中农等现象。为纠正这些不良现象,1951 年春节时,全区各级党组织集中训练了一批土改工作队干部,组织他们认真学习土改政策法规,要求克服和纠正上述几种不良倾向。各级还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土改,形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清洗和处理了作风不纯的干部、整顿了组织,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进入全面展开阶段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土地改革的成效

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从制度上结束了池州地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历史,掀开了农民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新的一页,整个社会面貌与社会风尚也随之焕然一新。

首先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全区 55 万农村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没收和征收一批土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没收和分配了地主多余的粮食、房屋、农具、耕畜。贵池县没收、征收土地 29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4.7%,使 5.2 万户无地农民和 25 万的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同时,也给地主分配了人均 1.34 亩的土地,将没收、征收地主多余的 260 万余斤粮食、1.1 万间房屋、2500 头耕畜、4 万多件农具分配给了贫苦农民。此外,还将地主转移被追回的生产生活资料折合粮食 600 多万斤分配给农民。青阳县将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的 16.74 万亩土地与征收的公堂,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将没收的地主多余的

房屋 1.2 万间、粮食 8446 担、大型农具 17638 件、耕牛 1160 头也分给了贫苦农民。东流县土改后，地主占有的土地由土改前的 19.22% 下降到 2.96%，而贫雇农占有土地则由土改前的 15.16% 上升到 52.08%。石埭县没收征收土地 54746 亩，使全县 8433 户无地和 24955 名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另外还将没收的粮食 963312 公斤、房屋 17172 间、大耕畜 442 头、农具 18958 件等生活生产资料分给了农民。从此，广大农民从经济上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广大农村水利兴修、植树造林、筑堤修路，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粮食产量等各项经济指标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土地改革从政治上摧毁了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封建统治，使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土改中，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控诉、审判、惩处一批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一雪多年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深仇大恨。广大农民政治热情高涨，思想觉悟也得到迅速提高，他们积极参加农会、民兵、青年团、妇联等群众组织，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群众推举为乡村干部，有的成为农村领导骨干，农村中的党团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乡村的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得到发展壮大，农民代表大会、妇女大会威信大增，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广大农民切身感受到自己成为了土地真正的主人。

土地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农民对文化的需求。随着生产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热情高涨。到 1952 年，全区小学生为土改前的两倍多，并办起了 400 所冬学，有 2 万多农民参加冬学学习。土地改革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恢复和文化建设的兴起。

土地改革不仅使广大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社会地位明显提升，也带动了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整个社会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好学上进、团结互助、扶弱济困的新道德、新风尚开始形成，并逐步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

第二节　各项民主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池州各地紧跟全国反封建斗争的步伐，在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还领导人民开展其他各方面民主改革，根除旧社会旧制度遗留的旧俗陋习。

一、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

池州的国营工矿交通企业是在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的管理制度在接收时有些就遗留下来，因而，这些工矿交通企业迫切需要进行民主改革。

为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1949 年年底，池州地委、专署对接收的工矿交通企业进行民主改革，选派干部到企业任领导职务，从企业提拔新的管理人员，废除旧社会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厂矿企业先后建立起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对企业的管理。1949 年 10 月，皖南区工会工作会议召开；年底，池州专区工会办事处成立。随后，全区共建立基层工会组织 151 个，所属职工 9928 人、会员 7437 人。

码头搬运工人深受把头、恶霸的压迫，工作劳累，生活艰辛。根据 1950 年政务院《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的封建把头制度的决定》，池州专区工会筹委会发动工人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决定打击水上恶霸，对水上运输业进行民主改革。1952 年 8 月，全省国营厂矿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按照全省第二次工业会议要求，专区提出工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劳动竞赛，进行生产改革。到 8 月底，国营厂矿企业基本上完成民主改革。随着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营企业和产业工人群体中呈现一派比工作、赛劳动，比学习、赛文化，强素质的新气象。

二、宣传贯彻《婚姻法》

封建婚姻制度是束缚和剥夺男女婚姻自由的桎梏，在男尊女卑的

旧社会,以夫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广大妇女成为被压迫被奴役的牺牲品,它以压抑摧残人性、蔑视践踏人权为特征,酿成许多人间悲剧。解放前的池州地区,尤其是农村,婚姻都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联姻的方式多以他人包办买卖、近亲结亲换亲、收养童养媳、门当户对结娃娃亲,甚至抢亲、有钱有势一妻多妾,广大妇女权益毫无保障,封建"三从四德"的"贞节观"是禁锢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从一而终"是众多年轻寡妇无法改变的人生选择。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一部深入反封建的法律,它冲破了几千年传统封建婚姻观念与习俗,使人们获得了婚姻自由,尤其是广大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支持拥护。各地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婚姻法》、贯彻执行《婚姻法》的热潮。

1951 年 8 月,根据皖南区委做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宣传《婚姻法》和认真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全区各县结合中心工作,利用各种会议和场合,以广播、图片、黑板报、扭秧歌、文艺演出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妇联组织利用各种场合组织妇女学习《婚姻法》。通过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法》,人民群众深受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民主和睦的新的婚姻家庭道德观念深入人心。过去城乡封建强迫包办、买卖婚姻、收养童养媳、重婚纳妾、寡妇不再婚等婚姻观念得到彻底改变,广大妇女思想获得解放,她们破除陈规陋习,勇敢地实现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仅青阳县到 1953 年就解除不合理婚约 4829 起。随着男女同工同酬政策的实施,广大妇女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真正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三、禁毒、禁娼和禁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贩毒吸毒、卖淫嫖娼、聚众赌

博等恶习,仍在社会上流行,败坏社会风气,毒化人们心灵。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决心消灭这些封建社会遗留的丑恶现象,净化风气,这种带有反封建性质的民主改革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解放前,池州各县贩卖吸食鸦片现象较为普遍,仅东流、至德两县就设有烟馆 10 多家,为客人提供烟具、毒品,方便贩毒、吸食者。1950 年 2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全国各地严禁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对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号召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团体,动员人民一起行动起来,广泛进行禁毒宣传,开展一场群众性的肃毒运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通令,池州各地按照省公安厅制订的禁毒计划,开展了禁毒行动。1949 年年底,东流、至德两县即查禁 11 家烟馆,教育 400 名吸毒人员限期戒毒。1950 年 2 月,两县人民政府颁布了《严禁鸦片烟烟毒及其他毒品的九项办法》,将未停业的烟馆全部查封。两县还采取了设立戒烟所、打击贩毒集团、收缴烟土和安置吸毒、贩毒人员就业等措施。1951 年 6 月 15 日,贵池县人民政府通令严禁烟毒及偷食鸦片。其他各县也采取有力措施禁毒,使吸毒贩毒现象到 1952 年基本绝迹。

娼妓现象由来已久,在旧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妓院娼馆是反动统治者封建邪恶势力寻欢作乐的淫乱场所,也是底层妓女违心欢笑的地狱,又是偷盗行骗、敲诈勒索、拐卖人口等犯罪活动的藏污纳垢之地。解放前,池州地区各县都设有大小不等的妓院娼馆,尤以工商业发达港口交通要地的商埠为盛,这是旧时代城镇畸形繁华、社会病态的集中体现。

解放后,池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取缔妓院及卖淫活动,改造娼妓。对妓院老鸨收容审查,对妓女集中起来教育改造,为她们治疗性病,帮助她们弃恶从良重新做人,对无家可归者帮助另谋职业。1950 年到 1951 年,东流、至德两县多次取缔娼妓,并为妓女进行性病治疗,或送她们回原籍劳动,或安排她们在当地就业,使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他各县对卖淫嫖娼活动也都采取了坚决取缔与严厉打击的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一绵延数千年的社

会丑恶现象基本绝迹。

解放前,池州各地赌风盛行,城镇街头巷尾赌场随处可见。1949年5月,皖南区人民政府颁发布告,指出赌博是严重的社会公害,必须立即制止。各地发布通告取缔赌场,禁止在一切场合赌博,对赌徒、赌棍予以收审改造,对屡教不改者依法处理。6月,皖南行署公安局发出禁赌指示,池州各县也迅速行动,关闭赌场、逮捕赌徒赌棍、组织冬防巡更,限制惯赌分子行动,巩固禁赌成果。由于禁赌措施有力、行动果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刹住了旧社会盛行且难以禁绝的赌风。

第三节　生产救灾

从1949年到1954年,池州境内洪涝灾害不断,特别是沿江一带圩、堤、塘、坝、堰,由于长期受战争破坏,加上年久失修,致使灾情非常严重,成灾面积和受灾人口尤以1949年和1954年最重。

一、解放以来两次严重的洪涝灾害

1949年汛期较常年来得早,持续时间长。6月下旬至7月上旬,全区普降大到暴雨,山洪暴发、江河水位陡涨;6月30日,长江水位即与上年最高洪峰(15.01米)持平;7月3日,超过历史(1931年)最高水位0.27米;7月19日,池口水位达当年最高水位15.83米。沿江沿河圩堤在长江历时70天高水位的冲压和暴雨洪流的夹击下,大部分溃破,全市溃破大小堤防65处。仅东流县从6月11日至7月2日就先后有裕丰、永庄、义城、有庆等12座圩口溃破,塘、坝、堰冲毁91处,倒塌房屋476间,损失粮食12989吨,受灾人口15821人,成灾面积10.61万亩,全区洪涝成灾面积29.88万亩,灾民达18.8万人,其中有少量是从江北逃荒过来的。灾情最严重时,贵池县乌沙硖约有6000人采观音土掺糠而食。

1954年,长江全流域普降暴雨,池州境内再次遭受历史上特大水灾。此次雨情汛情的特征是,暴雨来势猛、雨量集中、时间长,致使长

江水位涨速快,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面积大,灾情重。

进入汛期,5 月至 7 月的 3 个月时间连降大雨暴雨,其中强暴雨出现 9 次,各县降雨量大于常年同期 1—2 倍。贵池城关 3 个月降雨量达 1533.4 毫米,占当年总雨量的 68%,是 1952 年同期雨量的 3 倍多。秋浦河上游的高坦地区自 5 月 9 日始,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超过 4 米的洪水陡涨 4 次,其中最大一次洪峰达 6.36 米。池口长江水位 6 月下旬上涨至 15.75 米,超过危险水位;8 月 1 日达到 17.22 米,为当年最高水位,超 1949 年最高水位 1.59 米。贵池全县 12 个区所有乡村非洪即涝,均不同程度遭受水灾,城内老街水深丈余,行舟代步。据资料记载,全县受灾 33607 户、136336 人,冲淹田地 29 万亩,溺死 280 人,损失牲畜 796 头,倒塌房屋 62453 间,漂没粮食 16 吨,冲走家具、农具、衣被 3 万余件,冲毁水利工程 3404 处,溃决大小圩口 35 个。

东流县入春后,5 月至 7 月气候反常,暴雨不断,先后出现强暴雨 9 次。3 个月降雨量达 1411.9 毫米,比历史同期值多 757.2 毫米。广丰圩 6 月 24 日一天降雨量达 232.7 毫米,超常年的降雨量,导致山洪暴发,江河水位猛涨,长江水位春汛未退伏汛又至。8 月 1 日,东流长江水位达到 18.74 米,超警戒水位持续 115 天。全县 12 口大圩、72 口小圩全部溃破,2196 处塘、堰、坝被冲毁,淹没农田 20.3 万亩,许多村庄被淹,倒房 29807 间。

青阳县 5 月至 7 月间连续下了 70 多天暴雨,五六月雨量集中,5 月份几天内降雨 497.7 毫米,6 月份几天内降雨 423.7 毫米,先后发生了 3 次大洪水,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同期,长江水位暴涨,形成洪潮夹击之势,内河水位陡涨,一些乡镇如木镇长江最高水位 16.81 米,街上水深 1.8—2.8 米。青通河、七星河两岸的分桥圩、丁圩、马圩、江家圩等圩口全部溃破,全县最大圩口合心圩,经全力抢救仍告破。这次洪灾造成全县农田受灾 4.65 万亩、被淹 4150 户,灾民达 15.7 万户,因灾死亡 170 余人,冲毁房屋 2.85 万间、山塘 52 口、堰坝 68 座,造成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损失。

在雨势强度大、汛情水位高、时间延续长的情况下,池口长江段超警戒水位 14.5 米长达 120 天之久。全区灾情险情不断,长江主要干

堤和内河堤防全部溃破,境内溃破大小圩口 134 个,山丘区塘、坝、堰几乎全遭冲毁,许多村庄淹没水中,贵池、东流、至德县城成泽国水市,行舟数月。全区成灾面积 48.87 万亩,受灾人口 255.52 万,冲倒房屋 76607 间,死亡 467 人,农具、家具损失不计其数。

二、全力防汛抢险

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为稳定大局,配合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池州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畏艰险,众志成城,以顽强拼搏的精神,积极投入抗洪抢险的战斗中,谱写出敢于与洪水搏斗、勇于战胜洪魔的壮丽篇章。在防汛抢险的斗争中,党、政、军、民齐上阵,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大批干部民工投入抗洪救灾斗争。不惜一切抢救人民生命财产,采取一切措施保护灾区免遭毁灭性破坏,维护灾后恢复生产的条件。

贵池县委、县政府及时动员组织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抗洪抢险战斗。1954 年 5 月,县委抽调 15 名县委委员率领 200 名干部,分赴全县各圩口指导抗洪抢险。成立县防汛排涝总队部,建立 5 个区大队部、11 个指挥所、29 个乡中队,抽调 2372 名技术民工组织防护巡逻。县委领导统揽全盘、分片负责,县委书记许骥、县长宋毓秀全面巡防督查,查险工险患、查防汛器材、查涵闸斗门、查组织情况,确保人、财、物等防汛物资到位,重要防守工段和节点不出问题。进入 6 月,县委一面继续组织抢修子堤、挑堆土台,紧急调动器材上堤;一面深入现场调研,确定重点防守圩口,如同乐、民生、三万等 8 个圩口以及同义圩、大同圩为县重点防守区。制订险工险段防守计划、可能出现险情的应急处置预案,包括江、河圩堤坍塌,紧急调运民工突击挑土、打桩、加下外障等紧急抢救措施,集中人力,多方支援,排险加固。

贵池各级党组织及防汛指挥部门,在突击抗洪抢险的同时,还有计划地转移疏散各圩口老幼及粮食物资。圩堤溃破时,又及时组织干群冒险抢救。地、县、区干部身先士卒,把抢救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先后抢救并转移灾民 65719 人,抢出粮食 179 万斤、耕牛 2338 头,抢救其他物资价值约 389 亿元(旧币)。

在防汛抢险期间,全县共投入干群 11 万多人,其中参与的各级干部 686 人、外调民工 6000 人、驻地部队和医疗队近万人。先后投入大小船只 1000 余条,使用防浪桩 14 万多根,铅丝 6285 公斤,麻、草袋 4.3 万条,芦席 2 万张等,政府共拨防汛抗洪经费 6.68 亿元(旧币),银行贷款 1.68 亿元(旧币),各地自筹资金 8.87 亿元(旧币)。

石埭县政府也迅速组织县直机关干部和工人 1178 人、军人 35 人、医务人员 35 人投入抗洪抢险。抢救和转运粮食 100 吨、木材 1 万根、耕牛 40 头、油菜饼 35 吨等物资。

洪灾发生后,东流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斗争。5 月份,成立了县排涝防汛总队,县长张英杰任总指挥,从县直机关抽调 69 名干部,由县委 5 名常委带队,分赴重点乡指导防汛排涝。全县共组织民工 8891 人、水车 670 部、抽水机 12 台,新开疏通沟渠 680 条,排出受涝耕地 2900 亩。6 月上旬,江水猛涨,汛情发展,县委、县政府调整部署,明确以防汛为中心,县防汛总队分区组建 4 个防汛大队、14 个防汛指挥所、30 个乡中队、178 个分队,领导全县人民开展防汛斗争。当发现各圩口相继出现裂缝、渗漏等严重险情后,县委书记刘宏、副县长康祝亮及其他 7 名县领导,带领县直机关干部 384 人赶赴各圩口,坐镇指挥防汛抢险。组织当地民工与后山支援的民工 12250 人一起抢修圩堤,加高筑固子堤、打防浪桩,排除险情。6 月 17 日,裕丰圩溃破,安庆地委副书记许少林、东流县委书记刘宏带领地、县直机关干部,调来轮船 1 艘、木船 100 条,火速赶到裕丰圩,连夜抢出灾民 1200 人。7 月 4 日,广丰圩溃破,地委领导范振国、军分区司令员李昆带领地直干部和 3 艘轮船及时赶到,和县领导及机关干部一起,经过五天五夜的抢救,抢救出灾民 1.5 万人,拨款 1.8 亿万元(旧币)安顿灾民。安排医疗人员巡回圩堤给灾民看病治病。另外,还向安庆、贵池和东流县姜坝、胜利高地安置转移部分灾民,使全圩口 3.2 万余人得到妥善安置,使灾民有饭吃、有地方住、有病得到及时治疗。

青阳县委、县政府为抗御这场洪灾,及时成立防汛抗洪指挥部,由县长周厚民任指挥长,指挥部设在全县防汛重点圩口合心圩紫竹林,

现场指挥调度防汛抗洪工作。县直单位抽调数百名人员上堤分段把守,实行责任到人,昼夜看守。

在防汛救灾中,池州各地涌现不少抗灾英雄,他们有的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东至县长江下游工程局“建江 3 号”轮职工在赶往防汛抢险途中,不幸在广丰圩破口处翻船,其中 19 人受伤、12 人遇难。石台县政府通讯员、共青团员陈叔宝在抢险中,跳入河水救出妇女儿童 2 人、黄牛 2 头,自己被水冲走。

三、开展生产救灾工作

汛期过后,池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生产自救、灾后重建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来抓。各级政府根据“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方针,组织生产救灾。

一是开展生产自救。贵池县委及时号召全县人民开荒生产,提出“以农业为主,增种一季,生产粮食,度过灾荒”。自 8 月上旬开始,全县以行政区、乡为单位,以互助合作为基础,普遍建立开荒大队、中队、分队部,以高坦为基地设立开荒总队部,指挥开荒生产自救工作。乌沙、城厢、殷汇、观前、牌楼 5 个区、29 个乡的圩区灾民 10327 人集中到山丘开荒生产。清溪、罗城、牌楼、城厢、乌沙、殷汇、观前 7 个区的丘陵地带灾民 19833 人就地开荒。同时,县里还开展了“灾区生产自救,非灾区增产支援”运动。发动非灾区群众 3 万余人帮助灾区从事增产运动,除在丘陵地带排涝补种 4115 亩晚秋作物外,还在山区丘陵地套种、增种 9.4 万亩,增养再生水稻 8.8 万亩。全县共开垦荒地 15 万余亩,全部种上晚秋作物。东流县发动灾区人民开荒 5000 余亩,从外地调来种子抢种晚玉米、马铃薯、荞麦及蔬菜等。青阳县组织灾区人民大抓晚秋作物生产,圩区争取水退到哪里晚秋作物就种到哪里,退一块补种一块。开垦坡度在 25 度以下荒山坡地,全县当年种下 13 万亩晚秋作物,为全县灾区人民度过春荒奠定了基础。

二是支持发展副业生产。向灾区贷粮、贷款、贷物,支持发展副业生产,推动灾区恢复生产。如扶持茶农增加茶叶生产,组织灾民上山打柴、挖药材、打草鞋、编竹器等副业生产,扶助捕鱼合作社打鱼换米,

扶助贸易小组送货下乡换粮食加强土产推销等。

三是动员社会救助。首先是发放救济款,如东流县一次发放 10.3 亿万元(旧币),贵池县从 5 月到 12 月发放各类救济款 26.4 亿元(旧币),先后救济 31272 户、102482 人。政府从有限的财政资金中抽出 3.55 亿元(旧币),为灾民赶制御冬的棉衣棉被、修建房屋。政府还从外地调拨粮食分济灾民,贵池县从四川省紧急调拨粮食 5198 万斤。其次是银行投放生活贷款,解决灾民急需。再次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发动,在全区开展人人支援灾区、向灾民伸出同情之手的活动,号召机关干部每天节约一两米,取消干部中灶待遇。同时,政府拨出大米救济烈军属和困难户,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给予急赈,对外地江北流入区境的 1.3 万灾民给予安置。

四、迅速掀起以堵口复堤为主的兴修水利热潮

为减少灾后损失,使受灾群众早日重返家园,全区各县迅速掀起以堵口复堤、重建家园为中心的兴修水利热潮。1954 年,池州长江干支堤防由大小 36 个圩口组成,其中长江干堤有 120 余公里长,汛期大小圩口全都被淹或决口溃破。9 月以后,全区各县动员组织民工上堤修复被洪水冲垮的长江大堤和各圩口的圩堤。县里主要领导亲自上阵指挥,各地都先后成立以县委书记或县长任总队长的堵口复堤总队部,下设办公室,从县直有关单位抽调干部参加这项工作。堵口复堤的做法是先堵溃口挡住江水,后再复堤。沿江各县采取先堵江堤溃口、后堵圩堤溃口,先浅后深、先易后难,争分夺秒会战。经过一个冬季的奋战,堵口工作初战告捷,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到了第二年春季,各县先后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各地堵口任务按期结束,布置复堤兴修任务。各县增抽机关干部加强领导,相关区、乡也成立兴修水利指挥机构,抽调大批民工上堤。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 10 万以上民工战斗在兴修水利工地上。由于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大兵团会战,保证了复堤任务的如期完成。在堵口复堤的同时,各县对圩口进行了重新规划,11 月 16 日,贵池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把秋浦河西岸三万、大农、建国、民生、同乐等大小 8 个圩口

连成一个秋江大圩,并增高增厚了堤防。堤防由秋江圩江堤和秋浦河堤组成,总长48.74公里,保护耕地20.25万亩、人口14万。同时把原大同一圩、二圩、三圩连接成一个大同圩。大同圩堤防由九华河堤、大同圩江堤和青通河河堤三部分组成,总长27.50公里,保护耕地7.72万亩、人口3.34万。在兴修加固圩堤过程中,各县响应行署号召,发扬互助协作精神,铜陵、青阳两县人民支援贵池县修复大同圩,青阳县也抽调民工支援铜陵县堵口复堤工作。各县政府在水利兴修中实行以工代赈,为赈济失业工人和无业灾民,政府拨出一定数量的粮食和现金,组织他们兴修水利,以计时或计件付酬。参与以工代赈的灾民有数万人,政府每月拨付大米100万斤,解决了灾民过冬缺衣少食问题。通过以上措施,使全区大灾之年没有外出逃荒要饭,没有饿死、冻死人现象的发生,灾民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也为兴修水利、堵口复堤提供了人力保障。

解放后,连续几年的特大洪涝灾害给池州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但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对防汛救灾、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工作应对有方、措施得力,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救灾、赈灾工作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建设家乡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第四节　农工商的恢复与发展

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解放初,池州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法陈旧。长期以来是靠天吃饭,农作物产量很低,粮食平均亩产不足100公斤,加上多年的战争破坏和频繁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农村经济的衰退,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因此,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成为当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从1949年9月开始,池州地委、专署决定把农村工作重点放在开

展生产救灾、组织防汛抢险、抗旱排涝、灭虫保收、爱国丰产竞赛和土地改革、合作互助运动等一系列工作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村广大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掀起“挖山垦荒、围湖造田”的热潮，粮食播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有较大提高，到 1949 年，粮食播种面积 131.88 万亩，总产量达到 11.92 万吨，粮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增长。

1951 年 1 月，中共华东局颁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皖南区委和行署认真贯彻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同时还制定了扶持农业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增加投资和物资供应、兴修水利、开荒垦地、提高农产品的比价等。1952 年 2 月底，省委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与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指示》，把农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竞赛，争取农业丰产丰收，超额完成农业生产计划，作为当时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从 1951 年开始，池州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引导农民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个体农民的劳动互助，从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入手，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池州地区第一批互助组——贵池县枫岭罗光明互助组、青阳县木镇伍明树互助组、至德县樟树乡栗树下村王大元互助组、石埭县龙岩新里村查鸿安互助组、东流县胜利村袁善择互助组等先后成立。到 1951 年冬，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池州大地上。据 1952 年统计，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民约占总户数的 50%左右，有常年性互助组 9344 个。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增强了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到 1952 年年底，经广大农民积极拓荒开垦，池州农田面积达到 153.32 万亩，比 1950 年增加 12.07 万亩。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动员群众兴修水利，到 1952 年，全区沿江圩堤均加高增厚，少数地方开始运用机械抽水。此外，各级政府还从减轻赋税、发放农业贷款、推广农业技术、奖励丰产、疏导供销等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51 年，池州粮食总产 175300 吨，比 1949 年增长 47%；棉花产量 1539 吨，茶叶产量 734 吨，分别比 1950 年增长 82.9%、17%。青阳县生产的“青阳白麻”陈列于北京农业展览馆，与

新疆棉花、广西黄麻同誉“全国棉麻三大代表”。1952 年建立起来的贵池茶厂,成为专门加工出口红茶的基地。同年,东流县被列入全省水产重点县。农业科学技术在全区推广并为农民所接受,如南大 2419 等小麦高产良种在池州开始推广。3 年间,全区还发动 40 万人参加灭蝗战斗,仅 1952 年 5 月至德县就发动 13 万人灭蝗,减少了蝗虫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

二、工业交通业的恢复与发展

解放前夕,池州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仅有为数不多的私营小工厂、小作坊,主要从事生活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工,如碾米、磨粉、榨油、竹木器与铁器的生产和传统服装加工。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不到 1 万元。解放后,池州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有计划有领导发展手工业”的生产方针,从资金、原料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东流、至德两县供销部门加强对个体手工业的指导,采取合伙经营,实行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联产联销等方式,促进了手工业的较快发展,并于 1952 年开始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贵池县为锅炉、铁铺 8 个重点行业贷款数万元发展生产。1950 年,贵池县新华米厂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实现了加工用电和照明用电;1951 年,创办了贵池人民印刷厂,使全县印刷业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1952 年 10 月,地质部 321 地质队在贵池县首次进行矿产普查。到 1952 年年底,全区主要工业、手工业的产值均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份,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

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重视交通与通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解放前,池州地区的交通主要以水路为主,公路交通很少,区内各县之间不通汽车,铁路、航空是空白。解放后,全区各级政府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治河建桥、修路筑港,提高运输能力。到 1952 年时,大通至木镇,青阳至岩寺青阳段公路,青阳至贵池、贵池至铜山公路以及东流、至德、石埭过境公路均修复通车,公路总长度达千余公里。至德尧渡公路大桥、石埭永济桥以及全区公路沿线数十座桥梁均修复竣工。青阳汽车营业所、贵池汽车客运站启动开业,全区各县之间公路基本做到

晴雨天通车;全区内河航运里程为1949年的2倍多。各县县城及主要集镇通了电话,全区邮路发展到2000公里。

三、商业的恢复与繁荣

1949年4月,池州解放之初,物价飞涨、秩序混乱,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全区4479户私营工商户到1950年上半年出现许多困难和问题,资金缺乏、产品滞销,商店歇业,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紧张。池州地委、专署遵照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对公私关系进行了适当调整。坚持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其消极作用,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保护和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投机资本。正确处理国营商业、供销社与私营商业之间的关系,促使私营商业逐步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在私营商业者守法经营的情况下,对其经营范围、价格政策、税收征集、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政策,做出有利于他们的适当调整。如在处理劳资关系中,支持他们建立劳资协商会,订立劳资集体合同,消除资方的思想顾虑,加强工人的纪律教育,实行民主管理。另外,还组织私营工商业者参加土特产品交流大会和下乡收购推销土特产品,结合生产救灾,促进城乡物资交流;银行为私商收购土特产提供贷款支持等,以上这些措施帮助了私营商业渡过难关,使他们经营状况逐步好转,经济也很快得以恢复。

组建供销合作社,促进商业流通。供销合作社是农民集资入股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组织,担负着计划产品的购销任务,为农民推销农产品、供应生产生活资料。1949年6月,皖南供销合作总社成立,池州全区自上而下地也先后建立起区、县、乡供销合作社。到1951年年底,全区基层供销社基本上达到一乡一社。

召开物资交流会,组织物资交流。通过发展国营商业公司,如粮食公司、百货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司、花纱布公司和组建供销合作社,打破私营商业控制商贸的局面,规范市场交易规则,取缔封建陋规。与省内外城市召开土产交流会,促进商贸物资流通。

第五节　治理整顿经济秩序

池州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初期，政治上、军事上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长期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以及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凋敝、民生维艰，市场上物资奇缺、价格飞涨，币种繁杂、金融混乱，财政资金收支与重要物资集中调度管理失序，经济秩序亟待治理整顿。

一、统一货币，稳定金融

解放初期，皖南区包括池州地区的币种繁杂，人民币、银圆，加上原各解放区发行的地方币，如华中币、北海币、中州币等，还有各种流通券，包括金圆券。因此，统一货币成为当时治理经济秩序的首要任务。皖南行署于1949年5月起，委托中国人民银行皖南分行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一律以人民币挂牌限期收兑各种货币，包括收兑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明令禁止金条、银圆、外币等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对此，池州各级人民政权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废止金圆券，确立人民币本值。根据华东局政策，规定所有完粮、纳税以及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票据、债务契约等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同时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责成人民银行允许金圆券、各种地方币兑换人民币。石埭县人民银行对流通于县内的老解放区的华中币、北海币，分别以100元兑换旧人民币1万元，使人民币开始进入市场。二是完成本辖区旧官僚金融资本的接管工作，即原国民政府在本地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都被新的人民政权所接收。三是取缔银圆投机活动，巩固人民币本值。人民政府宣布严禁以银圆计价流通，人民银行办理银圆贩登记，并指定场所交易。对罔顾政府法令，继续扰乱金融市场的不法投机商，进行严厉打击。广泛宣传、教育人民拒用银圆，并由银行提高收兑价格适时收兑，如石埭人民银行以旧人民币1万元兑换银圆142枚，1951年，石埭县人民银行收兑黄金619斤、白银102斤，银圆1.2万枚。同时加强对各地银楼业务的管理。各地国营贸易公司

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出售日用品一律以人民币结算,广泛地开展了人民币存、贷款业务。通过以上措施,击退了金融投机势力的进攻,市场银圆流通趋于萎缩,金、银最终被逐出流通领域,割断了与物价的联系,人民币使用阵地不断扩大、信用日益提高,逐渐取得了本位币的地位。

二、平抑物价,安定民生

全国解放初期,由于支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开支很大,而财政供给的全国脱产人员也有近千万,造成为疗治战争创伤、支持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资金缺口很大。财政困难重重,只能靠超量发行货币解燃眉之急,造成货币贬值。加上原来的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惯性和不法商人投机资本炒作,导致全国性物价大幅度上涨。

当时,池州地方政府财政供给需支付薪金的脱产人员,包括旧政府留下的军政公教人员约有 800 多人,加上支援战争、抢险救灾、恢复生产和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尚无正规的税收制度,所以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国家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法商人开始以投机资本炒作,金银黑市猖獗,政府对金融投机以禁止打击后,他们不甘心失败,转而把投机活动重点转到囤积粮食、食盐、油料、棉花、棉布等主要生活物资上,导致物价上涨之风在全区接连掀起。

针对全国物价普遍暴涨的严重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组织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物资,迅速平抑物价。各地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组织生产生活主要物资,选择合适时机集中大量抛售,或采取一致行动停止收购,使得物价迅速下跌。同时,银行紧缩银根,税务依法统一集中征税,收缴公债款,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池州各级人民政府遵照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达的平抑物价的指示,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如严禁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的非法行为;对职工、教师、寄宿生实行低价配售;加强市场管理;人民银行抓紧收缩通货,停放公私贷款,缓发机关经费;税务部门限制税款入库,减少通货流量等。1949 年下半年

起,政府要求贵池县贸易公司、贵池新华米厂、贵池茶厂、供销门市部等一批国营企业,在市场上大量供应平价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回笼的货币为收购粮食及土特产品提供资金保障。全区大力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充分发挥国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集中行动平抑物价,安定民心。中国人民银行池州办事处还大力推行人民币下乡占领农村市场,人民币在乡镇得以广泛流通,信用不断提高,基本实现了人民币在境内流通全覆盖的法定货币地位。到 1950 年上半年,池州市场主要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民生问题有了保障。

三、统一财经,加强管理

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的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并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配套政策与办法。这是实现财经工作统一领导与管理,保证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两个基本平衡,从根本上稳定物价的重大举措。

全国各地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财经管理的有关规定,狠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整顿收入,加强征粮工作和税收工作,努力完成征收任务。二是统一收支现金管理,所有公粮、税收全部上缴国库,不准动支,机关部队、公营企业经费大部分存入人民银行,建立铁道、邮电、贸易等公营企业金库,确保企业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三是节约支出,落实机关人员全国统编方案,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四是清理、估价库存物资,逐级上报,接受中央统一调度。五是统一管理国营贸易部门,各地政府不得挪用贸易公司的资金和物资。另外,各地还根据地方具体情况调整税赋,酌量减轻人民负担,等等。

在狠抓统一财经工作的同时,通过银行、贸易、财政等主管部门统一部署,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物价。一是规定货币管理办法,加强现金管理,控制货币投放量,疏导物价;二是发挥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引导物价;三是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扩大市场供给,稳定物价;四是运用行政手段,加强市场监管,微调物价。

池州地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政务院的指示,在统一财经管理方面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在平衡财政收支方面,财税部门贯彻执行国家新税制,加强税收工作,明确货币管理办法,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积极吸收社会游资,大力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增加财政收入。1950 年,池州各地人民银行均代理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规定公债募集和还本利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在物资调度方面,强化物资管理机构,集中掌握重要物资,以求物资供需平衡。把影响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全部掌握在国营贸易部门手中,增强稳定市场物价的实力,掌握控制市场物价的主动权。在现金管理方面,统一现金管理,集中调度使用现金,不准动支国库收入,杜绝挪借透支。如石埭县从1950 年起,实行货币管理和建立财政金库,使货币投放额和回笼走上正轨。全区各地人民银行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现金收支基本采用银行转账结算的方式,各单位持有的现金均有限额,除保证日常开支外,其余必须存入银行。银行现金主要投放支付工资和农副产品收购及贷款等,现金回笼渠道主要是企业销售款和税款收入及吸纳储蓄、回收贷款等。在推销商品方面,国营贸易部门和供销社通过清理、估价库存物资,开展大规模商品推销活动,在农村组织流动组,供应农民所需商品,这样既回笼了货币又丰富了市场、稳定了物价。在加强市场管理方面,工商部门打击、取缔投机资本囤积居奇、伪造牌号、哄抬物价的扰乱市场的违法经营活动,同时发挥国营贸易部门的市场主导作用,与私营经商者联手进行联营、联购、联销,防止盲目竞争造成对市场物价的冲击。

上述一系列统一财经管理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使池州的经济秩序得到明显好转,结束了国民党统治造成的长期物价飞涨的局面,稳定了金融,稳定了物价,也稳定了人心。让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同国民党较量取得胜利,也能在解放初期经济领域第一个战役中初战告捷,巩固了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综上所述,池州地区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利完成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全面接管旧政权,建立起人民新政权的重大任务,

取得了生产救灾和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及稳定金融、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管理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各级军事管理委员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特殊作用。渡江战役胜利后,在新解放的池州建立起来临时管理机构——军事管制委员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由于它具有高度权威性,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等方面,为全面接管和建立池州各级人民政权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二是从老解放区抽调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的南下干部。早在渡江战役打响前的 1949 年 1 月,根据中央部署,即在河北省抽调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赴池州及各县负责接管工作,这批在老解放区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干部,具有在复杂形势下长期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组织协调能力,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有顾全大局的党性观念,来池州负责接管工作后,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牢牢掌握政治斗争主动权,因而在建立新的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三是解放前夕战斗在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中的一批干部,发挥了长期在池州境内坚持游击战争,熟悉池州社情、地情的优势,他们为策应大军渡江、解放池州做出了重要贡献。池州解放后,他们又受组织派遣来池州工作,有的还担任了池州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和群团组织负责人,在池州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四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可靠保证。池州刚解放时,新政权基础不牢,但全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工、农、兵、学、商齐心协力,积极投身对敌斗争和各项政治活动与生产建设之中,以新社会主人翁的姿态,用实际行动拥护党的领导,为支持巩固新政权而做出了不懈努力。五是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吸纳各界民主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出谋献策。解放前夕,中共地下组织争取一批民主人士,在扩厂、扩校,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部分人的影响下,大批民主人士积极向党和政府靠拢,新组建的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中不仅有来自军队干部、老解放区抽调的干部,也有新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其中的领导干部在以共产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上,民主人士的代表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参与讨论和决定人民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和事关社会全局的重大应兴应革事项,为地方政权的巩固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广纳善言、广谋良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全新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也是池州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政权,它体现了共产党人宽广包容的博大胸怀和为新政权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

第四章

执政初期党的自身建设和人民团体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池州各级党组织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同时，深入开展在执政条件下的党的自身建设。开展整党整风，纯洁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先后建立起的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节　党在执政初期的自身建设

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斗，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成为执政党，如何适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新环境和所处的地位，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严峻考验。从党员队伍整体上来看，执政初期绝大多数党员和党员干部能够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牢记党的宗旨，艰苦奋斗、一心为公、遵纪守法，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各项运动和经济建设中，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也有一些党员和部分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的考验，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争名誉争地位的个人主义，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对待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简单粗暴的官僚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还有极少数腐化堕落、违法乱纪分子，损害了党的形象和人民政

府的威信。另一方面,解放初期的两年里,党员发展过快,没有及时进行教育培训,混入一些认为入党有利可图从而千方百计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造成党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现象。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党领导、团结人民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影响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巩固。为了保持党在新形势下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党内开展了执政后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整顿党组织的运动。

一、开展整风运动,改进思想作风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整顿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作风运动,整风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皖南区委也先后发出了《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执行中央和华东局整风整党工作的补充计划》。中共池州地委按照上级的指示,对全区开展整风整党运动进行了研究部署。1950 年 7 月,各县委紧密结合当时的工作任务进行整风。贵池县委召开整党整风扩干会,着重对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委自身查找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东流、至德、青阳、石埭等县县委也召开了会议,对整风运动进行动员布置。各县在整风中,始终围绕一个主要任务,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整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解决党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整风的重点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整风的以传达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为主,结合学习相关文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工作任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情况、检查工作、找出问题,最后确定改进办法、制定相关制度。整个运动大体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动员。各地都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区、乡的党团员干部和部分非党干部。会议强调运动要遵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干部自觉检讨、相

互批评,对领导批评时,要求不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避免过急行为;不做组织处理,力求思想稳定。在党员领导干部启发性报告的带动下,党内外干部纷纷发言,从工作上、思想上、作风上系统地剖析领导与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现场给参会领导干部进行一次生动而实际的教育,也让他们掌握、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分析总结工作得失,明辨是非。

第二阶段学习和整顿。这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查摆问题,提出整改办法。整风动员会议之后,各县都成立了以县委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的学习委员会,下属单位也组建学委会学习相关文件,主要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关于群众路线问题》等。通过学习文件,结合工作实际检查分析情况,以自我批评为主,开展相互批评,查找存在的缺点、不足与错误,各级干部在检查存在的问题时各有侧重,领导干部以检查官僚主义为主,一般干部以检查命令作风为主,结合“三反”,经济部门的干部以检查贪污浪费为主。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改进的办法与制度。

第三阶段总结提高。到 1950 年年底前,整风运动按预定时间结束。各县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在召开的总结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做总结报告,充分肯定这次整风运动取得的主要成绩,也如实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少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隐瞒错误和重犯错误的人和事进行了批评,对极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给予了组织处理。

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在全党普遍开展的大规模思想教育运动,由于运动解决问题重点突出、步骤稳妥、方式方法得当、不搞过火斗争,运动进展整体上是健康的,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党员干部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较大的转变,群众观念增强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意识也有显著增强,功臣自居情绪、贪图享受的习气、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都得到了克服。通过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各级党员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认识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与不足的自觉性也有所增强。这次整风运动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及各项社会变革提供思想与组织上的保证。一定程度上,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由于这次整风运动时间较短,只是初步解决了党员干部的领导作风、工作作风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为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议,决定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

二、开展整党工作,加强组织建设

195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会议决定“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准备用 3 年的时间,完成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1952 年 11 月,省委结合“三反”运动,制定《安徽省整党建党工作计划》,部署了全省整党工作。皖南区委在整风的基础上,对党员普遍进行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制定了《整党工作计划》,并开始训练整党骨干,做好整党试点等准备工作。

1951 年 9 月,中共池州专署委员会根据中央和中共皖南区委部署和要求,在全区开展了整党工作。以思想整顿为主,同时进行组织整顿和作风整顿。

专区的党员和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遇到了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员数量的快速增长而未能及时培训与有效的教育。1949 年 4 月,池州各地解放时,境内仅有 75 名党员。解放之后,党员有了很快的发展,据同年 7 月统计,已有党员 1515 名,建立了 101 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 47 个、党员 692 人。到 1950 年时,全区党员发展到 2563 人。至 1953 年,党员达 3341 人,比 1949 年 7 月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其中有近 2000 名党员是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发展的,而当时各级党组织工作任务异常繁

重,对新加入的党员未能进行党的性质、宗旨、权利、义务等基础知识的系统培训和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教育,致使他们中一部分人党员意识淡薄、思想作风不纯。二是党处于执政地位后,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以功臣自居。甘当公仆的意识,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保持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吃苦耐劳、不计名利的精神与作风都有所淡化,在各自岗位上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特别是一些领导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着党和群众的关系。

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用 3 年时间完成整党,按照中央的计划,池州各级党组织从 1951 年的 9 月份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进行了整党。整党工作分准备阶段和组织整顿阶段进行。准备阶段主要抓 3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干部的准备。慎重地挑选一批经过考验、对党忠诚、作风正派而又有整党和建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进行训练,然后派到基层组织去进行整党。二是思想准备。通过党校和办短训班等多种形式,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教育的内容是根据第一次全国组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共产党员必备条件,使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明白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三是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通过试验取得典型经验,再全面推行。各县县委都进行了典型试点,取得了整党工作的经验,也帮助点上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准备阶段做好以上三方面工作之后,即进入组织整顿阶段。这个阶段是分批进行的,一般按照 3 个程序展开:首先是进行党员登记,要求每个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照党员的条件与标准,考虑是否愿意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并自行选择登记,过期不登记视为自动退党。接着,组织对登记的党员进行审查与鉴定,根据每个党员历史与现实表现、存在的优点与缺点,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最后做出组织处理。当时通过审查把党员分成 4 种情况,即具备条件的党员、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党员、不具备条件的党员、混入党内的各类分子,并分别做出不同的处理。这次整党工作结合当时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工作任务,分部门各有侧重地进行整顿。因此,各自收到较好的效果。

机关整党。根据省委要求,从1952年7月起,地委、县委直属机关结合“三反”运动、总结工作、整顿队伍、干部鉴定等工作进行整党,着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揭发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行为,侧重抓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查处少数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通过集中教育培训,在普遍提高党员觉悟的基础上,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改正党员中存在的错误与缺点。并结合工作任务分析情况,检查总结工作,找准问题制订改进办法。全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县级以上国营厂矿企业)整党工作按计划分步骤有序进行。大部分机关以支部为单位,对照党员八项标准进行自学,自我检查,写好检查笔记。经党小组讨论和支部通过后,提出意见交党委审查处理。少数领导干部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工作以及年终鉴定进行。由于这次机关整党方法正确、步骤稳妥、重点突出,收效明显,达到了进一步纯洁党组织、提高党员素质的目的,着重解决了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问题,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党性党纪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党员干部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得到克服,个别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行为受到批判,严重的受到了纪律处分。

农村整党。工作重点是集中对党员进行八项标准的教育,结合宣传贯彻总路线、统购统销政策,弄清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划清与富农的思想界限,批判党员中雇工、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的行为;克服强迫命令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树立民主作风。同时肃清农村封建地主残余势力的影响,妥善处理消极落后分子,清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对现有的党员严肃而慎重地审查清楚后,整顿纯洁地方基层组织,有计划地采取慎重的方针发展新党员,尤其是在基础薄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发展新党员、吸收新鲜血液,提高党员质量,壮大农村党员队伍。具体做法是,先派整党工作队下乡调研、搜集情况,然后分级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培训整党建党的领导骨干。地委负责训练县委组宣干事,区委组宣委员,区级农、青、妇负责人,时间为一个半月;再由县委分批集训区、乡脱产干部,包括乡村中小学教员,时间为一个月;再以

县为单位分批分期集训农村党员,时间为 20 天。最后再按程序进行党员登记、审查、处理等工作。整个农村整党从 1952 年 12 月开始到 1954 年 12 月底历时两年,各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整顿基本结束。

企业整党。此项工作主要是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对党员职工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划清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开展生产竞赛,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企业中表现积极的职工店员,在认真了解其思想、历史等情况后,对其中符合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其方法主要是利用工人夜校、业余学校集中教育培训,再分别情况进行党员集中或分散登记、审查和处理。各县因农村整党建党任务重,一般是先农村整党再进行企业整党。

历时 3 年的整党运动,是一次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党员思想教育运动和党组织整顿运动。这次整党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他们党性观念,也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通过整党,清理了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吸收一批优秀分子成为新党员,党的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党组织经整顿后更为纯洁坚强,凝聚力、战斗力也不断增强,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及各项事业领导核心与中流砥柱。通过整党,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但是这次整党及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时,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如农村党员农忙时雇短工帮忙、农闲时搞副业增加收入被当作剥削行为加以反对,不参加互助组或表现不积极被看作不够党员条件而要摘掉党员帽子等作法,影响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助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过激过快“左”倾行为。

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面临各种诱惑与考验。为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增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拒腐防

变的能力,必须经常地对党员加强党纪教育,不失时机地对党的干部与党员加强党纪监督,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及时地对违纪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检查与组织处理。为此,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 年 1 月,皖南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1950 年 4 月,池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由地委书记杨明兼纪检委书记,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刘廉民兼任副书记。中央纪检委对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规定的职责是,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纪,执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执行党的纪律,检查地直各部门及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和审查有关党组织及党员的违纪案件,并决定对其进行处分和取消其处分。

1952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员会。10 月,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1953 年 1 月与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后改为省监察厅)合署办公。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1956 年 4 月,中共贵池县委、东流县委、至德县委、青阳县委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分别选举产生了县监察委员会,取代了之前的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东流县委、至德县委监察委员会因区划变更于 1958 年 11 月结束工作,至 1959 年 9 月更名为中共东至县委监察委员会。1956 年 6 月,中共石埭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监察委员会。

池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之后成立的各县监察委员会分别紧密结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切实履行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职责,这对于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的贯彻执行。

在土地改革中,在“三反”运动结合整党工作中,在 1953 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际,以及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党的各级纪检机关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党员干部丧失立场、违法乱纪比较严重的情况,认真开展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检查,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如青阳县领导机关侵占果实的案件等,保证了各个时期政治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二节　人民团体组织的建立与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会组织的建立与工作情况

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工会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组织形式是成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凡是在中国境内的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工资收入为其主要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之体力与脑力的雇佣劳动者及无固定雇主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之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新中国工会组织的性质、作用、地位和职责。《工会法》颁布后，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都组织了认真学习，并结合本地实际努力贯彻执行。通过学习贯彻《工会法》，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组织有了普遍的了解，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在崭新的社会制度下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将要发挥作用充满期待和信心，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工会的组建和工会工作的开展。

1949 年 10 月 5 日，皖南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芜湖成立。至年底，皖南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池州专区工会办事处成立，所属贵池、东流、至德、石埭、太平、青阳、铜陵等 7 县工会组织直属专区工会。办事处设贵池县池阳镇，1950 年增辖繁昌县工会组织，上述 8 县先后成立县工会筹备委员会。1950 年至 1951 年，除至德县仍为工会筹委会外，其他 7 县分别召开县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县工会代表会议，正式选举成立县工会委员会。

专区、县工会组织成立起来后，首先是抓基础工作，认真贯彻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精神，宣传《工会法》，对工人群众进行工会组织的性质、任务、作用的教育。开展调研活动，到工人中走访，调查伪工会情况，取缔伪工会，选举产生各业工人代表，正式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先后成立了搬运、成衣等行业工会。据统计，到 1951 年，全区组建基层工

会151个、会员人数7437人,所属职工人数达12260人。

全区工会组织围绕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全区工会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在职工中广泛开展时事政策教育,各县城搬运、手工业等行业工会办职工夜校,组织职工学文化、学习时事政策。教育职工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出力,为尽快疗治战争创伤做贡献,其间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贵池县电话工人钱济、赵道辉配合剿匪部队做好通讯工作,拒绝土匪利诱,被打得头破血流。东流电话工人鲁纪娣为保护电话机,被土匪威逼毒打,宁死不屈,光荣殉职。贵池修械厂和米厂搬运工人努力生产,保证后勤物资供应,支援剿匪斗争。贵池馒头山煤矿工人为恢复生产,在"工厂是我家"口号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把日产煤由30吨提高到45吨。

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各级工会召开工人大会,组织工人参加各界人民的示威游行,其中8092名职工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10497名工人投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拥护世界和平。抗美援朝运动中,工会动员各业工人订立爱国公约,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全区捐款141812844元(旧币),350多名优秀工人子弟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62名工人报名参加地方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工会组织工人参加座谈会、报告会和小型演出活动,以诉苦、访谈形式对职工进行阶级、形势、政策的教育,让职工支持、参与运动。全区工人检举和协助政府捕获反革命分子100多人。码头工会组织1232名搬运工人,开展反封建把头斗争,清除混入码头的地主、把头、兵痞、流氓、特务等不法分子27人。"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积极投入运动中,检举揭发不法资方行贿、偷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罪行为40多起。

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区各级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参与企业资产清点、接收、机器设备抢修、复工复业。在组织恢复生产的同时,学习贯彻中央、全国总工会有关指示精神,在工矿企业推行民主改革,实行工人参加企业生产管理的

制度。1950 年,贵池馒头山煤矿成立管理委员会,推选工人代表参加管委会,矿方逐月报告收支情况,重大问题由管委会讨论决定。1951 年,各县城相继成立搬运工会,搬运业务管理、运价、劳力调配、运费收支均由搬运工会承担。搬运收入除上缴国家税收、提取各项事业费外,还为工人办理劳动保险、福利待遇、文化教育各项开支。1957 年 4 月,中共中央《关于有关工人阶级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中,对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做出规定,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把现行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小企业为全体职工大会制),作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构,这标志具有一定权力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解放初期,皖南区工会要求把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同时开展起来,并且建立了由工会领导的群众生产委员会和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开展征集、评议、采纳和奖励工作。池州专区各级工会积极响应皖南区总工会的号召,动员、组织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劳动竞赛。通过提合理化建议,解决了生产中许多管理与技术上的问题,通过劳动竞赛与技术革新,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产品和优质服务,如贵池机米厂工人开展生产竞赛,日加工大米由 2 万斤增加到 2. 5 万斤。

关心职工生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一项基本职责,也是工会工作的优良传统。1949 年,战争刚刚结束,市场萧条,民生维艰。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停业观望,甚至解雇工人,失业的工人生活困难。各级工会组织在党领导下,一方面主动协助政府,组织职工恢复发展生产,开展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号召工人互助互济,全区工会号召在职职工捐献一日工资,救济灾民和失业工人,全区共捐款 223750 元(旧币),皖南区工会拨款 800 万元(旧币),救济工人。另外,各级工会贯彻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方针,组织职工开展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文娱演出活动,同时寓教于乐,对职工群众进行政治形势、文化技术的教育。

二、共青团组织建立与工作情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1949 年 6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池州地方工作委员会成立。年底,贵池、东流、至德、铜陵、青阳、石埭、太平各县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1950 年,增辖繁昌县团工委。到 1951 年年底,全区共有团支部 518 个、团员 6384 人。1952 年 1 月,因行政区划变更,团池州工委被撤销,各县团工委的隶属关系也随之变更。1953 年后,贵池、东流、至德、青阳、石埭等县相继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1957 年 5 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各团县委名称也随之改变。

1954 年 4 月 1 日至 9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大会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动员组织团员青年,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池州地区各地团组织响应团省委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继承和发扬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一方面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做贡献;一方面坚持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努力把他们培养锻炼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池州各级团组织团结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为配合抗美援朝,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号召团员青年以实际行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中。一是动员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为国捐躯不惜身。贵池县有 1.3 万名青年报名应征,其中 4460 人参加了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贵池中学、池州师范学校第一批骨干学生于 1950 年 12 月赴朝作战,第二批、第三批骨干学生分别于 1951 年 1 月、7 月入伍出征,受到池州各界人民热烈欢送。石埭县、青阳县分别组织了 360 名、2170 名青年参加志愿军,东流县、至德县共动员 2000 多名青年入伍赴朝参战。二是组织青年捐

款捐物,捐献飞机大炮。广大青年团员纷纷积极捐献。从 1950 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池州拉开帷幕,但由于时间紧、人手少、任务重,急需大批土改工作队干部进村入乡,全区团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各级党校举办的土改训练班,其中 516 名专、兼职团干参训后多数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各级各地青年参加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实践中得到了培养锻炼。

1954 年,池州长江沿岸遭受特大洪涝灾害,团组织动员带领数万名团员青年战斗在抗洪抢险一线。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流血流汗,甚至不惜牺牲年轻生命。洪水退后,他们又投入长江大圩的堵口复堤工程。团组织还在工作中带领他们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争当先进生产者活动,重建家园,让青春绽放光彩。

在培养教育青少年方面,各级团组织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提出要把培养青年共产主义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结合各项实际工作稳步深入开展下去。组织团员青年参加模范人物报告会,以身边真实生动的先进人物事迹,从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好转、婚姻上自主的新旧社会回忆对比,教育启发青年。让团员青年在参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工作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同时结合青年特点,重点开展文化科技知识教育,鼓励青年学习技术和各种先进经验,并身体力行大胆推广,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全区团组织在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提高文化技术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打下了良好基础,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妇女联合会组织建立与工作情况

池州专区妇女联合会是全区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1949 年 4 月下旬,池州解放,贵池、东流、至德、铜陵、太平、石埭各县设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6 月,池州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胡克修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池州专区各级妇女组织逐步建立与健全。1949 年 10 月,专区及各县普遍建立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0 年 4 月,池州专区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同年,各县也先后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51 年下半年,县以下各区也建立起妇女联合会,设专职妇女干部,各地建立起妇代会。1952 年 1 月,因池州专区行政区划变更,专区妇联被撤销,各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分属安庆、徽州地区。1957 年 9 月,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民主妇女联合会改为妇女联合会。

池州各级妇联组织成立后,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根据妇女工作方针组织活动、开展各项工作。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各级妇联组织围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抗洪抢险、兴修水利、生产自救等项任务开展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在 1949 年的剿匪斗争中,池州各县都开展了民主反霸斗争。专区妇联主任胡克修在《皖南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池州地委于 9 月 8 日召开的全区妇女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发动妇女参加剿匪反霸斗争问题”,要求“组织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农会和剿匪反霸斗争”。其中贵池、青阳、铜陵、东流 4 个县 4393 名农村妇女参加了自己的组织,贵池城关区两三百名妇女参加了反恶霸斗争。抗美援朝期间,全区有 9996 名妇女送夫送子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数百名妇女的丈夫、爱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表现了作为妻子母亲为保家卫国大义大爱的家国情怀和令人感佩的崇高风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全区广大妇女走上防汛抗洪、兴修水利、生产自救一线,跟男同志一样搏风击浪奋战在堵口复堤的抢险中、披星戴月战斗在修圩筑堤重建家园中,她们之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贵池县乌沙区龙冬花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龙冬花出身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当过童养媳。全国解放后,龙冬花积极参加民主反霸、土改和互助合作等运动,很快成为当地的积极分子。1952 年长江洪水猛涨时,她所在的柳城乡北闸江堤决口,她奋不顾身地带领群众用身体堵住缺口,保住了大堤,使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损失。1954 年长江大水时,北闸江堤溃破、村庄被淹,在咆哮的洪水中,她不顾个人安危独驾孤舟,在激流中救起 7 名遇险乡亲。

龙冬花勇于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被广为宣传后，感动了无数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龙冬花先后 18 次进京参加全国性会议，13 次见到毛主席，特别是 1956 年 2 月她以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身份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主席敬酒的大幅照片刊登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后，她的事迹也传遍千家万户。这是全区广大妇女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对广大妇女的鼓励和鞭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妇联配合有关部门大抓妇女扫盲教育。池州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根据皖南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发出的关于开展冬学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妇联协助人民政府发动妇女参加冬学运动。据统计，全区办起 400 所冬学，有 2 万多名农民参加了冬学学习，其中有近一半的妇女参加了扫盲学习。1953 年 1 月，全区各县妇联按照省民主妇联提出的有计划地加强妇女文化教育、提高妇女觉悟，发动妇女参加各种讲座和技术培训班，80% 的青壮年妇女参加冬学、民校、识字班、读报组及各种教育活动，为就业做好准备，以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全区各级妇联努力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始终维护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而进入新社会，她们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使她们切身体验到翻身得解放的主人翁幸福感。在土地改革中，农村妇女分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土地与财产，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城镇中妇女也获得了与男子一样的就业机会。特别是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使众多妇女解除了包办的婚姻关系，废除了童养媳习俗，许多寡妇获得了再婚的自由，青年妇女可以自由恋爱、自主择偶，不再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终身大事。在政治上也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她们与男性公民一样，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各级人大、政协都安排了一定比例的女代表、女委员，在党政机关中，也安排一些女同志担任领导职务。她们的勤政廉洁，忠于职守，受到组织的信赖和群众的支持与肯定。这一切与各级妇联组织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其功不可没。

第五章

初步开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开展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确方针指引下,从1953年到1955年上半年,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总体上是沿着正确轨道稳步健康地推进,并逐步实现。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池州地区各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背景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在全国各地有领导地大力发展劳动互助组,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并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要求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按照国家帮助、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种大事去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强调要根据农民的自愿,反对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反对以简单的号召或强迫命令的办法来推行合作化。

从1953年起,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经过一年多的试行并做了若干修改后,正式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0月下旬,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互助运动的发展计划。12月16日,《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通过。《决议》把农业增产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合作化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确认了"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它标志着全国互助合作运动的重心开始由巩固发展互助合作转变为有计划地全面发展初级社。

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的农民满怀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希望尽快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生产热情高涨。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经营,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生产整体形势较好。但经过几年的生产实践,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部分生产条件好、经济能力较强的中农、富农和少数下中农,除了在分配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外,还拓荒扩种,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人数众多的贫雇农经济基础薄弱,一时无钱置办农具。由于缺乏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牛、大型农具,如有的地方4户仅有一头耕牛,农作物不能适时播种,收成明显不如前者,生产条件制约他们不能再增加投入、垦荒扩地,相当一部分农民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也维持不了,更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造成部分农户经济拮据。还有少数农户因家庭缺少劳力甚至弃耕。特别是一些农户在频繁的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借债度日,有的甚至靠出卖土地和劳力替人打短工来维持生计。这种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两极分化,一些地方重新出现"穷的穷"、"富的富",更有甚者沦为赤贫的境地。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了各级政府注意而短期又无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纷纷要求组织生产互助,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一些在剿匪反霸、土改等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受到党的

培养、组织表彰、思想先进的农民更是产生“要想发展农业生产需要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有些人带头兴办起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当年就获得丰产,粮食产量比单干多出几倍。这种典型示范效应,不仅引起了农民的兴趣,更引起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由此催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过程

自土地改革完成到 1955 年春,池州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稳步推进到健康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临时(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由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整个运动发展过程大体分为 3 个阶段。

互助组发展阶段。土地改革完成后,池州农村存在着与全国各地农村相似的情况,个体经济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不少困难。池州农民人均耕地不足 1 亩,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缺乏,资金严重不足,别说增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就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很艰难。两极分化趋向明显,且也难以满足工业和城市发展对粮食和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农民便试办起农业互助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应运而生。1951 年 2 月,贵池县枫岭乡罗光明兴办起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9 月,全区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农村农业生产互助组开始迅速建立起来,到年底,全区成立季节性的互助组 8522 个,入组农户 11915 户、入组耕地 259384 亩。到 1952 年,全区创办的各类互助组近万个,其中常年性互助组 9344 个、初级农业社 8 个,参加的互助合作农户占总农户的 50%以上。其中贵池县创办的季节(临时)性互助组 3588 个、常年互助组 310 个、初级农业社 2 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56%。1953 年,青阳县互助组发展到 2396 个,参加的农户 20217 户,占总农户的 60%以上。互助合作生产增强了农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粮食产量。1951 年,池州粮食总产 175300 吨,比 1949 年 119200 吨增长 47%;棉花产量 1539 吨,比 1950 年 841 吨增长 82.9%;

茶叶产量734吨，比1950年624吨增长17.6%。

互助组虽然仍实行土地私有制，只是共同劳动，换工互助，耕牛、农具相互调剂使用，协商计划，但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已初具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典型示范带动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尤其是互助组的建立，不仅克服了个体农户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更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各地创办互助组的第一年，一般粮食都增产15%～20%。实践证明，互助组比较适合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也容易被农民接受，它是迈向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农业生产初级社的发展阶段。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指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土地等生产资料分红为辅，较互助组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1953年年底，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导下，池州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全区农村开始出现了试办和发展初级社的热潮。1952年3月，东流县胜利乡胜利村袁善择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了池州最早的一个农业生产初级社，入社农户15户、耕地93.5亩。4月，贵池县第一个初级社——枫岭乡罗光明生产互助组兴办，入社农户25户、耕地191.1亩。罗光明因此被评为劳动模范，光荣赴京出席全国劳模大会。12月，青阳县木镇乡农民伍明树、朱胜才两个互助组合办起农业生产初级社，入社农户11户、耕地90.2亩、耕牛2头、大中型农具12件。这一年，青阳县919个临时互助组和1158个常年互助组先后转社。石埭县于1953年春由吕吉平、张泉水试办起两个农业初级社，入社农户25户。到1955年春，互助组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初级社已组建698个，入社农户13846户，占全区总农户70%以上，入社土地90522亩。

在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省委1952年10月28日发出《关于今冬明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指出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贯彻“有领导、有重点、稳步前进”的方针，既不好大喜功，也不能落后于群众。《指示》对办社方法也进行了详细规定，特别强调办社

过程就是思想教育过程,既不能急躁从事,又不允许包办、代替,必须耐心地进行教育。对不愿入社的,应允许退社,不许讽刺打击。这说明当时在试办合作社的指导思想上是稳妥、谨慎的,充分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到1955年上半年,池州各地根据中央提出"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的方针,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划分为一、二、三类,进行分类整顿,从而保持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稳步前进势头。

农业生产高级社发展阶段。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次会议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把党内对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这次会议在反对"小脚女人"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改变了以前稳步前进和自愿互利的做法,对合作化运动重新进行了部署,农业合作化进入空前发展阶段。

1955年11月,安徽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的主要特点是,取消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红报酬,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充公,全面按劳分配,按劳动工分统一分配收入,实现男女同工同酬。高级社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更高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合作组织。池州农村一批先进的一类初级社开始转为高级社。年底,全区80%的农户已经加入农业合作社,其中加入高级社农户占总数的4%。其中贵池创办高级社10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5.3%;石埭县创办高级社12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30%;青阳县打破乡界,发展了一批高级社,当年创办的木镇高级农业社已经是一个千户万亩大社。1956年春,池州出现了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的高潮。到年底,全区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70%以上。其中贵池县农户加入高级社的占总农户的79.5%;东流、至德两县高级社分别发展到298个、305个,各占农业社总数的78%、75.9%;青阳县高级社发展到191个;石埭县高级社发展到125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69.4%。

1957年2月,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省

委、省人委发出的《迅速做好整社工作的指示》,各县开展了3次整社,同时结合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在于提高初级社和高级社管理水平、经营效益和增加社员收入。主要做法是:总结经验,全面推行季节、小段、常年包工,制定劳动定额和报酬,搞好年终收益分配等。在整社过程中,还进行农业社扩并工作,将全部的初级社升为高级社。4月底,东流县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8.8%,至德县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5.2%。这两个县还把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逐步并入农业合作社之中,实行"五社"合一。同年,青阳县高级社发展到238个,入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9.5%;石埭县高级社发展到60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5%。全区各地初级社基本上转为高级社,标志着池州全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

通过入社整社,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池州粮食总产量23.93万吨,比1953年23.38万吨增长2.3%;棉花产量2119吨,比1953年1140吨增长85.9%;茶叶产量1781吨,比1953年1048吨增长70%;猪、牛、羊肉产量4217吨,比1953年2446吨增长72.4%。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做法与成效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农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运动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成功,是由于池州各级党委、政府努力贯彻党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能结合本地的实际,运用正确方针指导、推动运动开展的结果,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积极稳妥的指导思想,是合作化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土地改革后,农民中由于经济基础与经营能力的差异,导致农村两极分化趋势加剧,少数地方思想先进的农民带头兴办起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之后顺势升级建社,并取得丰产丰收的成效,周边群众竞相仿效。对于农民群众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热情和尽快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地方党组织既充分肯定其方向正确,热情引导;又坚持贯彻党的自愿

互利政策,防止“左”的急躁行事、不顾部分群众主客观因素、追求高级形式、强迫入社、一哄而起。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成熟一批发展一批,既照顾满足部分群众的热情与愿望,又尊重有些群众的选择,帮助其消除思想顾虑后再动员加入。这种积极、谨慎、稳妥的做法,保证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不出大的偏差,不走弯路、回头路,从而稳步健康地发展。

第二,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是合作化运动顺利推进的首要前提。实事求是既是党的思想路线,又是工作方法。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党领导的把几千年来农村个体、分散小农经济组织起来走共同发展道路的伟大创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从互助组织发展为初级社,从初级社升为高级社,曾出现速度过快、追求高级形式等脱离农村实际情况的现象。各级党委领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纠正。如针对当时初级社发展过快,对已成立的初级社,根据生产经营和管理情况分为一、二、三类,进行分类整顿,采取适当收缩的办法,以求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对初级社升为高级社出现的速度过快、内部管理不顺等问题,各县则组织开展 3 次整社,从而使合作化运动保持稳步扎实发展好势头。

第三,注重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是合作化运动加快推进的有效举措。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从组建互助组到试办初级社、高级社,各地注重树立典型、总结成功经验,再以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在面上逐步推开。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得到了广大群众认可与支持。如贵池县枫岭乡罗光明兴办的第一个互助组,东流县胜利乡胜利村袁善择在互助组基础上组建的第一个初级社和青阳县木镇镇创办的千户万亩高级社,都具有典型示范效应。典型示范带动一片,各地通过对这些典型的宣传,使广大农民看到互助组比单干强,初级社又比互助组更能增产增收,一家富不如共同富,于是农民情愿入组加社,从而推动合作化运动由点到面、由初级向高级顺利展开。

第四,选准时机,区别不同情况,使整顿巩固与发展壮大交替推进,是合作化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不同的时段、不同地区,经

济条件与群众思想基础是千差万别的,合作化运动建组办社,必须选择适当时机,区别各地不同情况,统筹安排,使得整顿巩固与发展壮大交叉推进。如1953年春针对农村出现试办发展初级社热潮,急躁冒进倾向明显,全区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巩固提高上来,有些地方适当地收缩整顿,有些地方在总结巩固中继续发展。1955年秋季,全区合作化运动进入迅速发展期;1956年春,出现了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高潮后,全区各地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一段时间把整社作为工作重点,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提高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使全区合作化运动在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中交替健康推进。

综上所述,池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尽管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运动中有些地方也曾出现过要求过急、追求高级形式,或形式上简单划一的缺点与偏差,但仍然顺利完成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历史表明,这对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创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满足了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后尽快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二,农业合作化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势,向农民展示出走集体化道路、共同致富的前景,克服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缺陷与不足,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第三,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出现和迅速增长,使变革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立进行了成功的探索。第四,合作化运动让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人,不仅改变了他们分散、单独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与习惯,也改变了他们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互敬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蔚然成风。

第二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从事的服务业和小规模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在工业生产乃至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

比重。它服务的范围广泛(包括吃、穿、住、行),所从事的农具家具的生产维修,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支援工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手工业者既是劳动者也是小私有者,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必须逐步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自愿互利、积极引导、逐步发展”的方针,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

1953 年 11 月至 12 月,全国第三次手工业合作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政策,即“在方针上,应当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在组织形式上,应当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方法上,应当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应当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

手工业生产小组是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级形式。它不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小组成员仍然独立生产、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生产资料仍属私有,只是负责统一安排原料采购、产品推销和统一接洽加工订货等业务。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是中级形式,是在生产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是由若干个个体手工业者或供销小组联合组成,这种形式适应分散、面广的个体劳动者要求。社员仍分散生产,特点是从供销业务入手,先是从有计划地供应手工业者所必需的原料、大力收购和推销其产品,然后再过渡到生产的合作,而不是以开设工厂的方式,但合作社必须有合理的积累。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以人为单位入社,缴纳股金、参加劳动,是集体生产的合作企业。它把手工业劳动者的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实行统一经营、统负盈亏、按劳分配,逐步增加公共积累,以努力改善生产条件。

以上 3 种形式大体上形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发展的一般过程。这种循序渐进地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做法,逐渐地培养了社员适应集体生产的习惯,也使领导干部从中逐步摸索积累了集中经营、管理的经验,达到了把手工业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分散的个体生产变为有分工协作

的集体生产的目的,推动了合作化的健康发展。

一、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

池州的手工业有着悠久历史,在自给自足的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里,手工业者主要靠手艺独立分散经营谋生。资本的有机构成比较低,生产组织大都沿用师徒制,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在农村或上门做点工或穿村走户巡卖,在集镇则大都是前店后坊、工商合一的经营模式。解放初,池州手工业行业类别众多,经营灵活。主要有理发、缝纫、砖瓦活、土陶、食品油脂、铁器、铜器、银器、竹器、皮革、油漆加工和五金白铁、钟表修理、建筑营造、文具制作等,据统计,全区个体手工业者约 7000 户,从业人员上万人。

1949 年 6 月,皖南区委发出《关于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对城乡手工业予以适当扶持,并逐步经过合作方式组织起来"。之后,各地手工业者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扶持下,开始成立带有互助性质的手工业供销小组和供销生产小组,从供销环节入手,对手工业进行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时期,池州各县均成立了县、区供销社,加强对手工业的指导,针对各行业不同特点,对他们采取或合伙经营或实行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联产联销的方式,帮助手工业者克服供销方面的困难,受到了手工业者的欢迎,促进了全区手工业的发展。

1952 年 9 月,各地供销合作社按照"重点组织、稳步发展"的原则,普遍选择重点行业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池州各县也着手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如贵池试办城厢铁业合作小组,青阳蓉城镇办起两个铁器生产小组,东流也办起了张溪铁器合作小组。之后在合作小组基础上建立起铁业、铁器生产合作社。

1953 年,池州各地按照党的总路线提出的"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逐步实行对手工业的改造。到 1955 年年底,仅东流、至德两县就试办手工业合作社(组)38 个,入社(组)的手工业者达 859 人。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广泛开展劳动竞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逐步端正经营思想、改进经营方式,并初步实行民主办社,健全民主管理。这

批试办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由个体生产走向集体生产,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个体生产经营中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无法克服的困难,不仅增加了产品产量,也提高了产品质量,使社员有了稳定收入保证,让广大社员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的优越性,也为全体手工业者指明了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方向。

二、手工业合作化任务基本完成

1956 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兴起,也加快了池州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各县先后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这是手工业系统脱离供销社领导的独立管理机构,也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以人为单位缴纳股金入社,参加劳动,是集体生产的合作企业。筹委会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变以往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为手工业企业全系统一起合作化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到 1956 年 2 月,贵池县有 1296 户、1907 人被批准加入了 33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生产组织,占原有手工业 1813 户的 71.5%,占全县手工业从业人员 2010 人的 94.8%。同年,青阳县也组织成立了 44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从业人员 1389 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 98%。到 1957 年,东流、至德两县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 45 个,从业人员 2167 人,占手工业从业总人数的 88.6%。至此,池州各县生产资料私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个体经营改为集体经营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池州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抢险救灾等,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完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地方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东流、至德两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手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39.8%,利润年均递增 45%。通过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原来一批小作坊式的生产个体户,培育成有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集体企业。一大批组织起来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为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他们发扬主人翁精神,刻苦钻研技术,涌现出一批为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能手、先进模范人物。但手工业合作化也存在过急、统得过死的明显不足之处,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后来,工作中一度也曾要求经营形式单一、统得过死的行业与地方要“退够”。但在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指导下,难以付诸实施,直到落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使相关问题得到解决。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在积极稳步推进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经历了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先把私营企业纳入各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再发展到公私合营,最后完成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创造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有利形势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地党委、政府贯彻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积极扶植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财产不受侵犯;对私营工商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困难,给予发放贷款、供应原料、委托加工、代购代销等方式扶助;对劳资关系紧张的企业,帮助协调解决;加强工商行政管理,办理工商户营业登记和发证;同时对一些不法工商业者的违法活动予以打击取缔;围绕稳定物价开展了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给投机者以沉重打击。

自 1951 年年底至 1952 年年初,在城市中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特别是通过“五反”斗争,揭发一些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打击了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对私营工商业者是一次生动、广泛的爱国守法教育,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五反”运动后,加强了对资本家的监督,确立了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资本家的权利受到限制,为之后进一步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发展国家资

本主义,奠定了坚定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国营经济的发展,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生产发展迅速,利润明显增加,让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特别是合作化运动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自行发展道路已被堵死。接受改造虽然说在经营上受到限制,但总比无代价没收资产要好得多。尤其是在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公私矛盾、劳资矛盾等愈加突出。大势所趋,权衡利弊之下,资本家主动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愈来愈多。

二、对私营工商业的逐步改造

1949 年 11 月,池州全区私营工商业有 4479 户,从业人员约有 5000 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价值约 80 万元,占有城乡近乎全部市场,主要分布于 5 个县城的城关镇即池阳、东流、尧渡、蓉城、广阳及贵池县所属殷汇、乌沙、观前,东流县所属大渡口、张溪、葛公、洋湖、五垅,至德县所属香隅、官港、昭潭,青阳县所属庙前、木镇、陵阳、杨田、江村、乔木和石埭县所属七里、七都等乡村集镇。私营商业多数是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

在 3 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池州地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建立国营商业、扶持供销商业的同时,对私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帮助私营商业划分行业、组织联营、开辟市场。1953 年始,贯彻落实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及派购收购后,私营工商业者为形势所迫,要求改造日益增多,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

中央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其方式有 3 种:一是公私合营;二是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三是私营商业向国营商业进货按牌价出售。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池州地区逐步开展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地采取由从低级到高级、从个别行业到全行业、从城关到农村

集镇,通过“和平赎买”的政策,使私营工商业者先由“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逐步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即社会主义的公有成分同资本主义的私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经营,公方控有相当股权,在企业内占据领导地位。其具体做法,大体上是先经过资本家申请并确定为公私合营的对象后,即派工作组入厂进店,做好合营前的准备工作,即深入群众,了解生产经营方面的有关情况,主要是企业资产、历年盈亏、分息分红、产供销、财务、设备、技术、管理和劳资关系等方面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向资本家宣传党的公私合营的政策,以稳定情绪,做好配合思想工作,对企业清产定股、资方债务处理与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并协助建立相关可行的一系列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教育职工搞好生产经营。等各方面条件成熟,由资方申请,报政府批准后宣布合营。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职工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潜力得到较好的发挥,不仅产品质量上去了,成本也减低了不少,利润明显增加。初步显示了企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也形成了在面上推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

但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并非一帆风顺,资方对党的政策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其对待改造的态度存在明显不同。有的是极力拥护,有的是顺应历史潮流,有的则持消极无所谓的心态;还有的大中商户因顾虑重重,而抱着“店倒关门”、“弃商改行”的想法;更有极少数商户则持对抗抵制的态度。在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有一些干部与群众对党的政策界限认识模糊、把握不准,把私营经商者一概视为奸商而不加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针对以上情况,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对私营工商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工商业者正确认识形势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强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逐渐地消除其对改造的抵触对抗情绪,指出并纠正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抽逃资金、吃光弃商等违法不良行为,为推动工商业的进一步改造创造舆论环境、加大政策攻势。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池州资本主义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步伐从1956年开始迅速加快。1955年12月10日至19日,池州全区各县乡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省委召开的传达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会议,并很快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计划与措施。各县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再分步有序推开。贵池县委、县政府即在池阳镇试点。按先是主要行业,后是一般行业;先是资本较多的行业,后是一般小本经营的行业,经过20多天有计划、有步骤的细致工作,于1956年1月26日圆满地完成了试点工作。之后,参加该镇试点工作队分赴全县各集镇全面铺开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采取的形式大体分为直接纳入国营、实行公私合营、组织合作化和经销、代销、代购等。合营的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大代小、以先进带落后,先私私合营、后公私合营等办法,为中小型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合营后调动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对企业内部进行改组、改革,搞好公私共事,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教育与改造,充分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使之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到2月8日基本上完成了对1522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

1956年年初,至德县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全县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中373户加入合作店(组),占全县私营商业总户数的83.8%,从业人员416人,占从业总人数的90%。全县共组织合作商店13个、合作小组7个、代销店5个、公私合营企业1个。10月,东流县建立合作商店(组)11个、代销店10个、经销店8个。东流、至德两县经过改造的私营工商业为889户,从业人员960人,之后,其中有一部分人过渡到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年底,两县的私营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1956年元月开始,青阳县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同时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促使私营工商业者争先恐后地提出申请,要求实行公私合营。到2月中旬,全县1219户工商业者中1033户、1621人,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占工商总户数的97.8%,粮食全行业被批为国营公私门市部。同年,石埭县314户私营工商业者、405名从业人员大都纳入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组织。到1956年年底,全地区纳

入合作商店(组)的私营工商户 4670 户、从业人员 6047 人、资金 759393 元,组成各种合作商店(组)224 个、公私合营商店 8 个,转为国营、公私合营商业职工有 300 多人(主要为店员),其余人员核准为经销、代销、联购分销和农村供销社等形式,至此,池州境内私营商业已基本完成改造。

池州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是健康的,进展也比较顺利。这主要得益于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各县党政领导高度重视、齐抓共管,统筹规划、抓点带面,依靠群众、指导及时,把宣传发动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保证私营工商业改造顺应大势,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界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即工商业的个体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甚至国有经济;使私营工商业各类人员得以统筹安排,各得其所,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造后的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经营效益显著提升。随着私营工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池州初步确立。

第四节　实行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全面铺开。城镇、工厂、矿区人员激增,商品粮的需求量也急剧上升。同时,工业的发展也使为其提供原料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与地区增多,加上农民粮食自给性消费增加,而私营粮商乘机从农民手中大量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农民余粮户待价惜售。由此,粮食市场出现紧张形势。面对全国粮食供求紧张情况,为平息市场混乱状况,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1953 年 10 月,中央做出《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11 月,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一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二是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三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户进行严

格管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是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为保证这项政策在农村顺利实行,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把这项工作作为重要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切实担当起来。

安徽的情况同全国各地一样,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紧张。根据中央的指示,省里于10月上旬至11月上旬召开了有各专、县党政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布置全省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省政府于11月26日颁布《安徽省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实施办法》、《安徽省农村和集镇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与《安徽省城市及工矿区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并从即日起在全省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池州各县按照省里要求,为了集中力量做好粮食征购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群众做思想动员工作,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明多卖余粮给国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实行统购统销的好处,动员农民把余量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各地还采取措施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理,并以区为单位成立收购站,负责统一收购粮食。

为进一步做好统购统销工作,各地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安徽省1954年秋季粮食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办法》,规定对农村粮食实行"四定"政策。"四定"政策是按照种多少田地、产多少粮食的原则,核定产量;按照吃用实际需要的原则,核定实用量;按照多余多购、不余不购的原则,核定应销量;按照多缺多供应、少缺少供应的原则,核定供应量,实行归户计算。"四定"工作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是衡量能否做好统购统销工作的重要标志。到1955年8月,国务院颁发《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农村粮食统购统销由"四定"改为"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在正常年景下粮食定产三年不变;统购任务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对缺粮的供应逐年评定。"三定"政策的实施,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消除了农民购销无底、增产无益的顾虑。在3年内使余粮户知道该交多少、缺粮户知道一年能供应多少。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农民政治觉悟有

了较大提高,认识到实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各地出现成批农户争先恐后出售余量的可喜局面,粮食统购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出现大的偏差。1953 年至 1955 年 3 年间,全区平价收购的粮食分别是 68660 吨、52156 吨、59080 吨,提前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征购任务。

在做好粮食统购工作的同时,各县还积极做好粮食的统销工作。根据国务院《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主要执行以人定量,即按不同的劳动强度和不同的年龄档次确定供应标准,归户计算,凭证供应,凡婚嫁、出生、死亡、分居、并居等均应办理增减或转移手续。城镇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分类核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是:特种体力劳动者 46 斤、48 斤、50 斤、55 斤不等;一般重体力劳动者 36 斤、38 斤、40 斤、42 斤、44 斤不等;轻体力劳动者 32 斤、34 斤;职工与脑力劳动者 30 斤、32 斤;大中学生 32 斤、34 斤、36 斤、45 斤;10 周岁以上居民 27 斤;10 周岁以下的儿童按年龄档次分 25 斤、22 斤、19 斤、12 斤。各县粮食定量供应标准经过不断修订日趋合理,供应指标从未突破并略有节余。

城镇粮食销售除非农业人口口粮外,还有以下几项供应:一是军队供给,凭专用粮票直接付粮,粮款由国家粮食部门与解放军总后勤部定期结算;二是军队价购,粮店凭专用凭证售粮,但需付粮款;三是行业用粮,食品、工业等行业所需粮食计划,首先由用粮单位提出申请,各县粮食局根据各单位生产指标,在上级核定的用粮指标内签发支拨书或粮油供应证,粮店按其品种、数量、价格收款出售。对农业销售的粮食包括返回农村的统销粮(回销粮)和对缺粮农民的返销粮、种子、民工补贴和奖售粮 4 项。粮食统购统销后,根据中央有计划的经济需要,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 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从 1956 年起,实行粮油的供应销售票证发放、使用和管理。各县执行《市镇定量供应凭证印刷使用暂行办法》,实行“三证”、“三票”。“三证”是城镇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城镇粮食供应转移证(粮油关系),“三票”是全国流通粮票、安徽省粮票、安徽省油票。到 1985 年,各县使用票证的种类增至“五证”、“七票”。“五证”除原

来“三证”外,增加市镇饲料供应证和军用粮油供应证(卡);“七票”除原“三票”外,增加侨汇粮票、侨汇油票、军用供给粮票和军用价购粮票。1993 年,粮票停止流通。

经过粮、油、棉的统购统销工作,各地基本上取缔了自由市场,对各类投机倒把活动予以打击,抑制以至基本消除了粮油棉系统中资本主义成分,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了粮、油、棉的统购统销制度。

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是在工业化初创阶段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我国农业经济比较落后情况下,实现计划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初步缓解了粮、油、棉供应紧张的矛盾,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经济生活中的吃、穿问题,安定了人心,也基本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对粮食、棉花等大宗原料的需求。但统购统销政策把农业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切断了私营工商业同农村、农业的联系,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但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制度安排。

第五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1952 年 12 月,中央发出《关于编制 1953 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根据《指示》精神,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编制并不断讨论修改,同时一边贯彻执行。党中央制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编制的,也是实施总路线的阶段性规划。“一五”计划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且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化、工业生产合作化,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同时,中央也向各地布置了编制地方长期计划的任务。

从 1952 年开始,安徽省组织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安徽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是: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大力发展农业

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化;积极发展地方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事业;加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池州全区经过1949年到1952年3年的时间,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各项事业也有明显进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2年1月,池州地区因行政区划的调整,贵池、青阳、铜陵、东流、至德等5县划属安庆专署。1952年4月,安庆专署拟定《五年建设计划初步意见》,其基本内容包括农林业、工业、商业、文教等共22条,其中工业计划产值按每年20%的速度增长。1956年年底,安庆专署颁发《安庆专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安徽省和安庆专区"一五"计划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池州各县在实施计划的同时,于1954年开始编制各县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3—1957)。各县的经济工作由开始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改为"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了收支、主要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并对计划开始实行全面管理,逐步形成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即对主要产品和国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其他产品和企业采取间接计划的市场调整。

经过全区各县人民的共同努,"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并且有许多指标都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经济指标,刷新了历史纪录。而这些成就是在抗御1954年特大洪涝灾害、1956年较大涝灾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属不易。

"一五"末期,全区城乡基本完成三大改造,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农村在全面进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兴修水利、推行半机械化工具、发展农业机械及单季改双季的耕作制度等改革。一批工业企业开始建设,工业企业总数达98家,其中国营38家,如1953年创建国营木镇第一米厂,东流、至德两县于1957年将印刷厂改为国营企业。到1957年年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13361万元,比1949年增长1.6倍,比1952年增长42.9%。其中工业产值为3923万元,比1949年增长2倍,超计划

43.2%。农业总产值增长28.9%,粮食总产量34.4万吨,比1949年增长1.9倍,人均粮食拥有量由1949年的171公斤增至422公斤,其中水稻、油菜籽、棉花分别完成“一五”计划的97.2%、43.7%和45.6%,农业综合实力和抗灾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200%。当年,财政收入954万元,收支相抵结余497万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191万元,人民生活初步改善,国民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详见附表:

“一五”计划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7年实际	1957年实际完成计划(%)
水稻(万吨)	18.95	20.8	22.6	24.3	25.2	24.5	97.2
棉花(万吨)	0.5	0.6	0.7	0.7	0.8	0.4	43.7
油菜籽(万吨)	0.6	0.7	0.9	0.9	1.0	0.4	45.6
工业产值(万元)	1340	1610	1930	2280	2740	3923	143.2
说　明	油菜籽不包括石埭县,水稻1957年实际产量为粮食产量代替						

总之,“一五”计划期间,池州的经济建设有了显著发展,文、教、卫等各项事业也有明显改观,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其间有成功经验,也有一些失误的教训,有些计划指标完成得不是很好,除自然灾害原因外,也有工作方面的原因,如林业、畜牧业、渔业发展速度不快,文教、卫生、体育事业在全国、全省仍处于滞后的位置。

第六章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

池州各级党组织在过渡时期和“一五”期间,在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促进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发展的同时,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全区教育事业贯彻执行“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不仅在数量上稳步增长,质量也有所提高,文化事业也在调整巩固中得到繁荣发展。各地都十分重视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卫生事业,先后组建卫生管理机构和城乡卫生机构,改善了人民的医疗条件。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

解放前,池州的基础教育十分落后,设施简陋,师资不足,教学内容与方法陈旧,入学率极低。新中国成立后,池州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首先是改善了教师的政治生活待遇,将教师列入国家干部系列,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其次是增加对教育投入,从1951年起,全区公办学校办学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每年拨出专款改善教育设施。三是加强对教育的管理,从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入手,建立各项规章制度,革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实行新的教学计划,教育战线面貌焕然一新。

幼儿园教育。1937年,池州始有小学附设幼儿班(园),到1949

年,包括陵阳师范附属小学附设的幼儿班(园)在内才有 4 个。到 1952 年,城镇中心小学附设幼儿班增至 11 个。1958 年,池州农村小学普遍附设幼儿班。

小学教育。1948 年,区内共有乡(镇)国民学校(中心小学)80 所、保国民学校(小学)278 所,在校学生 14570 人。管理体制实行政教合一,乡、保长兼任校长。1949 年,区内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 15%。解放后,各县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接管乡(镇)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并分别改为公办的县立完全小学(设一至六年级)、民办的村办初级小学(设一至四年级)。1952 年,乡村民办小学全部改为公办。1953 年,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使用统一教材。教学方法学习苏联的经验,运用 5 个教学环节组织课堂教学,并实行 5 分制计分法。适龄儿童入学率普遍上升,有的地方达 50%以上。

中学教育。解放前,区内中学只有 8 所,其中省立完全中学 1 所、县立初级中学 2 所、私立初级中学 5 所,在校学生 745 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学教育发展迅速。1949 年,人民政权接管全区公、私立中学,各校办学主体未变。根据“恢复整顿,逐步改造”的方针,对原有的公立、私立中学进行适当调整和整顿。其中,将贵池县初级中学并入省立贵池中学,更名为“皖南区贵池中学”,改为公办学校;将东流县私立天柱中学和私立大光中学合并成立天大中学,对私立中学采取“维持、扶植”的办法。同时,各地认真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放宽入学年龄,帮助经济困难的工农子女入学。到 1952 年年底,区内有完全中学 1 所、初级中学 4 所,在校学生 1339 人。根据安徽省 1956 年首次文教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成绩,提高质量,在人力、财力许可范围内积极发展文教事业”指导思想,全区各中学普遍扩规增班,贵池县新建杏花村中学,之后青阳县初级中学和石埭县初级中学分别增设高中部。青阳县庙前初级中学和贵池县殷汇初级中学开始招生上课。此外,不少区、乡创办民办中学,时称“农中”。中学招生人数大幅上升,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培养、输送了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

成人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继承老解放区传统,注重

对农民的教育,开展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学习政治和文化,以政治教育为主,结合进行文化教育。土改完成后,翻身农民对文化要求日益迫切。1952 年 9 月,各县、区、乡根据省政府发出的《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分别成立扫盲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成立扫盲工作队,协助各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先教语音符号和拼音,后加注汉字课)。1956 年,根据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县、区均配备扫盲专职人员。各级党委均成立扫盲领导小组,建立工作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业务管理,确定分管科局长与做具体工作的专职干部。社、队也明确专人主要负责领导办学、动员入学、筹措经费、制定学习计划和帮助协调解决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困难。到 1957 年,仅东流、至德两县就有常年民校 469 所、识字组 1479 个,其他形式的扫盲班 596 个,学员总数达 45385 人,占当年青壮年文盲总数 47.65%。这一切为以后农村扫盲工作开了个好头。

在抓好农民扫盲工作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加强对职工的业余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初,为提高在职干部、职工政治文化水平,于 1950 年至 1953 年开始创办干部、职工业余学校,学制为初小二年、高小一年、初中一年半。1950 年,青阳县、石埭县各办干部业余学校 1 所,其中青阳县县长兼任青阳县干部业余学校校长。1956 年,贵池县办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 1 所,石埭县增加机关业余学校 1 所,青阳县蓉城、木镇、陵阳、庙前等镇均设立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教育对象是厂矿、企业、机关、团体职工和待业人员。业余文化教育主要是扫盲和脱盲后的继续教育,着重是政治启蒙教育,结合进行文化教育,学习生产知识与科学常识。1954 年至 1956 年,青阳县办职工业余学校 7 所,学员 735 人。1952 年,石埭县办职工夜校,学员达 232 人。贵池县在城关、殷汇、乌沙办职工业余学校 3 所,学员 200 多人。东至县于 1956 年办职工业余学校 1 所,学员 77 人。

第二节　文化事业的发展

解放初期,池州专区领导对文化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与支持。

1949 年至 1950 年,各县政府在接收民众教育馆的基础上,成立人民教育馆,隶属专署教育科。1950 年年底,改名为文化馆,其职能是负责对城乡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其中贵池县文化馆即为池州专区文化馆。1952 年年初,因区划调整,专区文化馆与安庆地区中心文化馆合并,称安庆地区中心文化馆,指导全地区 13 个县文化馆的工作。这一时期,贵池城区每逢重大节庆,均由中心文化馆组织文艺晚会,各学校、工厂均有歌咏、舞蹈、戏剧等节目演出。1956 年 1 月,安庆地区中心文化馆由贵池县迁往桐城县,贵池县文化馆恢复原建制。1950 年年初,石埭县文化馆因撤县并入太平县文化馆。1959 年 5 月,东流、至德两县文化馆合并为东至文化馆。文化馆作为专业的文化事业机构,在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对指导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发挥了历史作用。

50 年代初期,群众性文化活动异常活跃。翻身做主人的广大群众为表达内心喜悦之情,讴歌伟大时代,同时为配合各项运动宣传需要,自发组织各种业余演出团体,开展自娱自乐的文艺演出活动。1949 年至 1956 年,贵池中学、池州师范等学校曾先后演出过话剧、歌剧《苦尽甘来》、《王秀鸾》、《思想问题》、《教师之家》等。1950 年,贵池城内各街道纷纷成立业余剧团,市心街业余剧团曾演出过歌剧《白毛女》。1951 年,楼山街业余剧团还演出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京剧《战长津》,受到好评。1952 年至 1956 年,贵池城内 8 个街道都成立了业余剧团,以演黄梅戏为主,后来县专业黄梅剧团成立后,业余剧团才慢慢先后停止演出。其间,县内农村以演黄梅戏为主的业余剧团也纷纷兴起。

1950 年,石埭县成立了半职业性的业余剧团,演职人员 30 余人,演出剧目有京剧《九件衣》、黄梅戏《打猪草》、歌剧《兄妹开荒》、话剧《两兄弟》等 30 多个。同时还自编自演一些小演唱、快板、曲艺、鼓词等。1953 年,石埭县区、乡建立业余剧团 20 个,演职人员 450 余人。1956 年,先后举办 3 次农村文艺会演,演出剧目既有传统黄梅戏《闹花灯》、《打猪草》,京剧《王堂春》、《四进士》等,也有现代戏《合作化好》、《父女进城》、《婚姻自由》、《抗美援朝》等。同一时期,东流、青阳县也先后组建起黄梅剧团,为新时代讴歌、为工农大众演出,成为当时

业余、专业文艺团体演唱的主旋律，充分展示了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财政经费异常紧张，即便如此，各级政府仍挤出经费投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建立图书馆。解放前，“安徽省第八图书馆”隶属原省第八政府督察专员公署，馆藏图书因受抗日战争破坏，损失殆尽。1949 年 9 月，贵池县建立图书室，隶属县文化馆。1955 年 4 月，室、馆分治，图书室更名为“贵池县图书馆”，隶属县文化局。池州专署文教科将原馆藏仅存的少量图书转交县图书馆收藏。二是建立电影院。解放初，电影是深受人们群众欢迎、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1951 年 4 月，政府在贵池牌坊街建立占地 666 平方米的池州电影院，初称人民电影院。观众人数日盛，放映的影片和场次也迅速增加。三是成立新华书店。1949 年 5 月，成立新华书店池州中心店，地址在市心街，隶属池州地委宣传部；1950 年 3 月，改属皖南区分店；1952 年 4 月，随着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池州中心支店，成立贵池县分店；1958 年 9 月，更名为“贵池县新华书店”。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兴起，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各地党委宣传部门十分重视从事宣传报道的新闻事业，全区各县先后办起县委机关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各地新人新事新成就，传播新道德新风尚。1955 年 4 月，中共至德县委宣传部和农工部联合创办《至德报》，后由县委宣传部主办。1956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东流县委机关报《东流报》创刊。1958 年，由于东流、至德两县行政区域合并，《东流报》、《至德报》于同年 11 月 12 日合刊，后于 1959 年 5 月 15 日创刊《东至报》，为中共东至县委机关报。1956 年 4 月，中共青阳县委机关报《青阳报》创刊。1956 年 10 月 1 日，中共贵池县委在 1954 年创刊的县办《生产小报》的基础上创办《贵池日报》，1960 年改为《贵池报》。

广播是解放后兴起的新闻事业。而有线广播是广播的一种初始形式。有线广播信号传输手段经历了电话线代传、专线传输和调频信号传输 3 个发展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池州广播事业从 20 世

纪50年代初开始,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信号传输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当时党和政府的重要宣传工具。

收音站是广播台(站)发展的前身和基础。1950年11月,贵池县收音站正式成立,它是池州地区创办最早的广播收音站,配有一台五管直接收音机,负责接收上级台节目内容。从1951年1月起,该收音站创办《收音小报》,到1957年年底共出版780期。之后,区内青阳、石埭、东流、至德等各县先后建立起收音站,后来逐步发展改建为广播站。开始还不能正常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要是播放自己采编的内容。平时播音工作以放唱片为主。在当时交通闭塞的山区县城,人们能通过广播听到播音员悦耳的播音和音乐戏曲,无疑为他们打开了感受外部世界的一扇新鲜窗户,给他们带来未曾体验过的精神乐趣,也为大家日常生活增添了蓬勃向上的生机。

第三节　卫生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全区各县只有一所公办卫生院,规模小、设备简陋,无病床设施,且药品匮乏,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现象。解放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十分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医疗卫生事业从城镇到乡村不断普及、逐步提高,造福百姓。

1949年10月,池州专员公署成立卫生科,设立皖南池州中心卫生院、专署机关医务室。各县也相继组建卫生管理部门和城乡卫生机构,负责本地卫生工作和医疗事务。从1949年至1951年,各县先后接管国民政府办的5所卫生院和8所天主教会诊疗所,共接收医疗卫生技术人员98人,在此基础上创办县医院。从1952年起,各县先后建立起县医院、卫生防疫站、血防站、妇幼保健站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卫生事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卫生机构相继建立和卫生队伍迅速发展。1951年1月,经皖南行署卫生局批准,建立皖南池州区中心卫生院,其前身是贵池县卫生院,隶属池州专署,并接受皖南行署卫生局业务指导,主要担负池州专区

疾病防治任务,兼负所在县的医疗卫生业务。医院有职工 50 人、简易病床 50 张,配备内、外科医师各 1 人。1951 年下半年,卫生院兴建门诊小楼,每日平均诊量 100 人左右。1950 年春,原至德县卫生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至德县人民卫生院”,有医务人员 6 人,设床位 6 张,用房面积 80 平方米。1955 年开始,设内、外、妇科,职工增至 18 人。1959 年 4 月,东流、至德两县合并,卫生院改名为“东至县人民医院”。1949 年 4 月,原东流县卫生诊所由人民政府接收,成立东流县卫生院,有民房数间、医务人员 6 人、简易病床 10 张。两县合并后,原东流县人民卫生院改称为“东至县医院双塔分院”。1956 年,东流镇 3 家中药店和 5 名中医组合成集体性质的东流镇城关中医联合诊所,工作人员 10 人。1949 年 4 月,青阳县人民政府成立治疗所;11 月,更名为“青阳县人民卫生院”,仅有工作人员 5 人;1952 年,迁址后有 2 幢 8 间平房,设简易病床 8 张,开始接收住院病人;1954 年,开始接收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生和部队转业的医务人员,设内、外、中医科,建起检验室,病床增至 30 张。内科能处理常见病,外科能处理部分腹部手术。1950 年 4 月,石埭县人民医院成立,设病床 10 张;1958 年,病床增至 30 张,有医务人员 25 人,设有内、外、中医、妇产、针灸等科。到 1957 年,全区卫生机构由 1949 年的 50 个发展到 170 个,病床由 1949 年的 16 张增加到 1538 张,卫生技术人员增加到 780 人。

1951 年至 1956 年,全区各县还相继建立区、乡卫生所 49 个,一般各配备医务人员 4—5 人,其业务主要以门诊为主,部分区、乡卫生所还设有 3—5 张观察床位。1957 年,贵池县区、乡卫生所病床达 373 张。1954 年开始,东流、至德县接收新中国培养的中专生到区、乡卫生所工作。与此同时,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开始设有医疗机构。1951 年,专署设立医务室,贵池城关 4 所中小学均建立医务室;1952 年,青阳中学设立医务室。1953 年至 1957 年,东流中学、至德中学、池州农校、贵池茶厂、贵池建材公司、青阳铅锌厂等校、厂也先后建起医务室。另外,全区普遍推行联合诊所。1953 年至 1958 年,各县行医人员通过自愿结合,组成各类联合诊所 28 个。1956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社会医生纷纷集资办医,走集体化道路。

卫生防疫工作广泛开展。解放初期,全区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均由专区、县、区卫生院防疫股承担。1952 年起,各县相继成立防疫委员会,同时成立防疫大队,区、乡、镇也分别成立防疫分会,农村以选区为单位成立防疫组。从 1956 年起,各县先后成立县卫生防疫站,加强预防传染病的宣传教育,严格疫情报告制度,积极开展防治传染病和地方病工作。通过不懈的努力,全区各类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有所下降,并得到初步控制或基本消灭。1952 年,天花在池州境内绝迹。经过预防接种,白喉、百日咳、麻疹、脊髓灰质炎以及流行性脑脊髓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许多传染病都有明显下降。

积极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0 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浙江省嘉兴、江苏省无锡和安徽省歙县建立血吸虫病防治所(简称血防所),并于 1951 年 12 月 9 日发出《关于大力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1952 年,新组建的安徽省人民政府便立即在屯溪、安庆成立了安徽省第一、第二血防所,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区各县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是各县成立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负责的县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领导机构,重点流行的区、乡也建立起相应领导机构,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

其次是由专区卫生科派贵池县血防站工作人员到各县调查。通过发现钉螺并进行粪检,发现有血吸虫卵的地区与人群,正式确定血吸虫病流行区。通过调查,发现并确定沿江的青阳、贵池、东流、至德、铜陵及石埭等县均属血吸虫病流行区。其中铜陵县 10 个区、88 个乡镇、132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 62 个乡、101 个农业社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流行区总户数 45760、14960 人,占全县人口 70%以上,经几年的检查,患有血吸虫病者 3 万多人。石埭县 10 多个乡(镇)就有 5 个乡、20 个农业合作社、95 个生产队流行血吸虫病,患病 14158 人。青阳县经查发现有血吸虫病的乡(镇)占全县乡镇的 67.7%。贵池、东流、至德等县比列更高,由此引起各县高度重视。

三是在县、区、乡设立血防站、中心组,开始查治血吸虫病。在省、

地派来的治疗组的支援帮助下,分村设点动员群众应检。对查出的病人当即送至血防组治疗,对其中中晚期兼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则送至县血防站住院治疗。青阳县当年检查 14806 人次就查出并收治 1447 例。

四是开展消灭血吸虫传染源的查螺灭螺工作。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查螺灭螺大会战,采取人工捕捞,清沟,开新沟、填旧沟,火烧,药物杀灭等方法。通过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使人畜感染血吸虫病的祸根有螺地域大面积减少,使地方流传已久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初见成效。

解放前,全市妇幼保健工作事业近于空白。从 1952 年起,全区各县先后成立妇幼保健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工作是改造旧产婆,培训接生员,逐步推广和普及新法接生,使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新生儿破伤风率下降到 10 万分之 50,产妇死亡率下降为 10 万分之 60。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号召,全区掀起声势浩大的以反对美帝细菌战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各县防疫机构举办反对细菌战培训班,提高民众对反细菌战的认识,掌握灭菌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之后,各地又大张旗鼓地掀起以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县广泛动员,不断把运动引入高潮。通过订立爱国卫生公约,结合生产劳动搞好城乡卫生,极大地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

第七章

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党的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全区经济基础日益巩固与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在巩固中得以建设与发展——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人民团体组织相继成立与发展。

首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省、市、县、乡(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人民通过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选出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并参与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的决策,标志着民主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新纪元的开创,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其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在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政治制度。

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各级党组织在组织开展过渡时期的各项工作中,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多措并举加强基层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整顿党的组织,以此作为抓党建的关键,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第一节　重视并逐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议事行政合一,常设机关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正式称呼为“人民委员会”),首长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工作。

池州各县自 1954 年起,通过直接普选产生乡人民代表,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乡人民委员会,即乡人民政府,由乡长、副乡长、委员若干人(规定 9—12 人,多数不驻会)组成,是人大的执行机构,每年召开若干次会议,研究决定重大政务事宜,在人大闭会期间,行使人大权力。同时负有选举各乡镇的县人大代表的职能。县人大选举产生的县人委,由县长、副县长、委员若干人(规定 9—21 人)组成。根据 1978 年《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的规定,各县人大常委会与县人民政府分开设立,依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行使职权,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全国各地投入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共安徽省委认为,全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成熟,要求各级政府应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作为重要工作来抓。1953 年 3 月 1 日,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遍民主选举。为此,安徽省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各专、

市、县也相继成立选举委员会，进行具体组织和指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普选，也是全省人民自己选举管理国家大事的代表，一种从未有过的真正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洋溢于人们心头。

池州各县对这次普选工作十分重视。这次普选，选民十分广泛，各县参加选举的选民达选民总数的80%以上。各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均于此次普选中建立起来。这次普选，体现了选举制度的普遍性和平等性，这是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它不仅增强了全体人民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也体现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和支持。各县经过精心的组织准备，相继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东流县于1954年4月21日至25日在东流镇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至德县于1954年7月10日至13日在尧渡镇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石埭县、青阳县均于1954年7月分别在广阳镇、蓉城镇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贵池县于1954年11月16日在池阳镇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均由乡（镇）人代会选举产生，他们肩负着全县人民的委托，欢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代表们对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选出了出席安徽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各县的县长、副县长、县人民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会议还对各地当时的工作与今后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讨论与研究。

各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标志着地方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自建立起，在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能，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地方人民政治生活中显示出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统一战线组织的设立与工作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池州地委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团结各界人士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1949 年 4 月,中共池州地委宣告成立,内设社会部,统战工作归社会部负责。为建立新政权,号召和争取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解放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全区各县普遍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从 1949 年 11 月至 1953 年 7 月,各县先后召开 8—11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有各界人士参加,共商县政大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组织形式建起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1950 年,池州专区各县委均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组织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组建新政权中,领导干部以共产党员为主体,也吸纳一定数量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县政府中就有担任副县长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既有来自人民解放军和老解放区的干部,也有从旧政权中过来的民主人士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1954 年,池州各县均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既有机关团体干部、企业工人、农村农民代表,也安排了工商界、文教界、医务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社会知名人士的代表。体现了代表具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也体现了党的统战工作广泛吸纳各界人士参政议政、协商民主的精神。

池州地、县两级统一战线组织和工作机构始终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争取各界民主人士在历次运动与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正式成立前,池州建立起各级政权并迅速开展接管接收工作,中共地下组织争取一批民主人士,在护厂护校、反对敌人的破坏、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危及新中国新生政权。10 月,在地委的领导和动员号召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发表声明,讨论通过爱国公约、决议案,谴责美帝的侵略行径。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热情和高涨的劳动热情。池州各界人士响应地委号召,积极参加签订爱国公约活动,投入增加生产、捐款捐物的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热潮中。1950 年下半年开始,全区农村开展了历时两年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各级党委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广泛宣传发动的同时,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

和青年学生参加土改,这样既增加了土改的人力,弥补了技术力量的不足,也通过运动团结、教育、改造了他们,形成了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1950 年冬,地委领导全区人民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各地多次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对案件进行专门申议、讨论定性,特别是对一些大案要案的审定,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1951 年年底至 1952 年,全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政策,做私营业主的过细思想工作,严格劳动纪律,调整公私关系与劳资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利用、限制、改造”中又能有所发展。

全区各级统战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开展了一系列团结、教育、改造党外民主人士工作。一是加强思想改造,促进世界观的转变。如组织各界党外人士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形势教育,采取举办学习班、形势报告会、工商界人士“神仙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他们世界观的转变,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二是做好政治安排,支持参政议政。安排党外人士参加地、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推动党外人士担任人大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府及部门的领导职务等,让他们有较多的参政议政机会,增强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荣誉感、使命感,增进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同心同德、建言献策的自觉性。三是在生活上适当照顾,改善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党外民主人士给予适当生活照顾,在副食品供应上对社会知名民主人士给予照顾;保证民主人士不下放,工商界人士下放劳动工资照发,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三、政协组织的建立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涉及全局性重大问题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广泛吸纳社会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

要形式——协商民主。

1954 年 12 月,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政协今后的任务有 5 项,即协商国际问题,对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及政协各级组织的人选进行协商;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层相互关系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协商和处理政协内各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确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以此作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遵守的准则。

1959 年 5 月,政协贵池县委员会由县委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协商筹备,并于 1959 年 7 月 5 日正式成立。政协贵池县第一届委员会(1959 年 5 月至 1963 年 11 月)设委员 79 名,内设学习委员会、工商工作组、文教工作组、卫生工作组、文史资料工作组。在召开的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到会委员听取并讨论了县委书记张德衍所做的政治报告,选举产生了常委 17 人、主席 1 人、副主席 2 人。1960 年 1 月 19 日至 23 日,政协青阳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委领导下经协商筹备胜利召开。参会的 73 名委员认真听取和讨论县委书记李秀之所做的政治报告,选举产生了常委 14 人、主席(李秀之)1 人、副主席 2 人(副县长杨文武、王其刚)。政协青阳县第一届(1960 年 1 月至 1963 年 4 月)和第二届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宗教界人士、少数民族人士等都占有一定比例,体现了各级政协组织是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协商议事的组织,为他们参政议政、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计出力提供了重要舞台。

各地政协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代表人士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导下,就本地政治生活、经济建设、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如涉及县政府组成人员人事安排,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人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进行充分协商。政协还在团结、教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党外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兄弟民族、爱国民主人士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参观、视察等,宣传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激励他们拥护、支持、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为地方发展重大决策建言献策。通过协商、民主,充分发挥了政协委员的重要作用。

四、工商联组织的建立与工作开展

解放初期,全区各县、镇原有的商会组织,由当地人民政府接收下来。遵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当地政府工商部门领导和管理下,利用原商会组织和人员把私营工商业组织起来,以县、镇为单位建立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商筹会),各县商筹会都是在城关和较大集镇各自建立,没有全县性的统一组织,在当地政府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如贵池县于1949年6月到1950年上半年,先后在工商户较为集中的城关、殷汇、乌沙、观前等集镇相继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1949年下半年,成立了城关工商业联合会,还相继成立了23个同业公会,分酱菜、豆腐、烟酒、铜铁、粉坊、手工杂业、国药、棉布、行商、摊贩、成衣、屠宰、牙行、百货、山货、茶点、理发、南货、粮食、文具纸张、旅栈、工业、竹器等行业。各同业公会设主任委员1人、委员2—6人。

1950年5月,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为团结教育私营工商业者,贯彻《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把组织工商业联合会作为团结教育私营工商业者的纽带,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由于当时国家尚未颁布工商业联合会组织法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等还不十分明确,因此,全省及各行署、县均未建立工商联统一组织。

1952年6月,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实施《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明确规定了工商业联合会的性质、组织原则和基本任务,为各级工商业联合会的建立和

整顿提供了法规依据,使已成立或正在筹备成立的各地工商业联合会的建立和整顿,以及对工商业联合会基层组织与同业公会的建立与调整,明确了方向。工商联组织是具有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由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解放初期,工商联主要会员是私营和公私合营工商企业以及私营工商业者和参加公私合营的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之后一些国营工商企业及其主营机构、合作社也参加了工商联,从而达到了公有制经济领导、帮助和引导私营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

经过 3 个月的筹备,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委统战部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于 1952 年 11 月 8 日胜利召开。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首要工作就是推动整顿和建立各市、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为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奠定组织基础。

1952 年 1 月 25 日,经政务院批准,池州专区与安庆专区合并。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专区未成立工商联组织,工商联工作主要是由地委统战部负责指导。1953 年 8 月至 1955 年 5 月,池州各县先后成立了县工商联组织。1953 年 8 月,石埭县工商联成立。1954 年 2 月,青阳县工商联合会首次代表大会召开,县工商联成立,后庙前、木镇先后建立起分会,陵阳镇设立了办事处;杨田、江村、乔木设立了工商小组。1954 年 4 月,东流、至德两县工商联相继成立。1955 年 1 月,贵池县第一届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召开。

池州各县工商联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教育广大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协助完成税收、公债等任务,动员和组织会员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项政治运动,推动工商业者爱国守法,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协调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在团结、教育、改造工商业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在抗美援朝期间动员工商户订立爱国公约,发动他们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宣传国家税收政策,协助税务机关督促工商户交纳税款或集体纳税;协调劳资关系,调解劳资纠纷;进行守法教育,评定遵纪守法工商户;开展物价大检查,依法处理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行为;组织工商户积极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等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工商联成立了工商业登记委员会,对全体工商户经营范围进行了登记,将各类工商户纳入适当的改造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纳入各类改造形式的工商户3783户、从业人员5100人。通过组织团结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较好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的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共事和贯彻赎买政策任务。在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后,工商联举办各种学习班、训练班,组织政治学习,帮助工商业者端正思想认识、改造世界观,开展服务竞赛,在参加社会主义公益事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中党的建设

一、基层党员的发展与党组织的整顿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推进计划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安徽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在领导开展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加强基层党员的发展、整顿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深入分析研究前几年党员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形势和经济文化建设任务,1955年5月,省委制定下发了《中央安徽省委五年建党计划》,提出企业的建党对象主要是具备入党条件的基层单位管理人员、劳动模范、技术革新者、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农村应着重在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农中去发展,其对象主要是乡村干部、互助合作骨干、劳动模范、有组织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特别是生产能手;学校建党对象主要是青年教师和优秀团员学生。这一时期,池州各县根据中央“积极慎重”建党方针,按照省委关于建党计划要求,在建党中既克服和防止保守思想和急躁情绪,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分别制定了建党计划。如青阳县委于1955年3月制定下达了《关于1955年的建党计划》,明确提出建党的对象要求:一是注重填补空白。比如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和建筑工人队伍,按2%~3%比例发展。二是突出经

济重要地位。像交通、运输、邮政、电信系统,按5%~7%比例发展;财经系统按3.5%~5%比例发展。并强调优先考虑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劳动模范及单位负责人等。当年,发展党员450人,至年底全县党员增至1419人,其中农村党员1118人,县直机关党员301人。农村41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党员的社达326个,占77.9%。同时,党员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1954年至1956年,全区发展新党员的数量逐年增多。发展的新党员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时期和肃反、审干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农村中发展的党员60%以上是合作社的骨干。党员不仅数量迅速增加,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社会职业上看,工人、农民的比重不断增加;从文化程度上看,接受小学以上文化教育的党员人数不断攀升;从这一时期党员队伍情况看,符合条件或基本符合条件占95%以上,绝大多数党员能够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己奉公、遵纪守法、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肃反、审干等运动中表现积极,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但由于一些地方把建党计划订得过大,建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存在降低党员条件、发展过快的现象;有些地方重发展、轻提高,对预备党员教育、考察、转正把关不严,因而党员队伍中存在着革命意志衰退,争名誉、闹地位的个人主义私欲严重。有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盛行,对待群众态度粗暴、方法简单,更有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对此,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训,各县委在1950年建立的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先后成立起党训班,后来又建起了党校,加强对党员思想理论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党纲党纪,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与论自我批评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讲话和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的决定。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专人报告、分组讨论、个人总结的方式进行。通过教育培训,增强了党员的理想信念,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纠正了党员干部中“功劳自居”、“革命到头”的思想,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

作方法。为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加强对党员教育的同时,各县还重视对党组织的整顿,以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1955 年,全区通过整顿党支部,检查和批判了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1956 年 6 月,全区对农村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党员受到了整党教育。据 1956 年 7 月统计,全区 80%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农村中有 70%的党员担任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委员、生产队长和会计等职务,有 60%以上的党员被评为劳动模范,他们在农村各项工作中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路人。

二、“新三反”运动

1953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指示)。这场“新三反”运动,是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后,针对干部队伍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苗头而发起的。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工作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有些领导干部滋生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尤其是少数农村乡、村干部违法乱纪、侵占农民利益现象比较严重。

2 月 3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全省各市、省直各部委等发出了《关于执行和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的指示(草案)》,要求全省各级领导机关在 1953 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开展“新三反”运动,对干部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开展坚决的斗争。

4 月,地委布置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内容的“新三反”运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开展坚决的斗争。检查首先是从领导机关开始,除通过会议领导做个人自我批评外,还着重派干部下乡“面向生产,面向工作”进行检查。5 月下旬开始,在青阳、东流、至德等县各做了一个乡

的调查。主要是结合当时的工作抓住关键问题进行检查,并着重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处理重大案件等。

“新三反”运动的实质是通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为了使运动健康有序地进行,全区各县、区、乡先后召开干部大会,领导带头检查。广大干部联系自身或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等问题,进行揭发、检讨或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发动群众开展自下而上的揭发与批评。按照“边整、边反、边改、边建”的方针,与群众一起研究改进方法。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派出检查组查处大案、要案。各县在检查处理“新三反”重要案件的同时,还选择各种不同性质的重大典型案件,在报纸上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以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起到了发动群众、教育警醒干部的作用。运动后期,各级党委还树立了一批遵纪守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干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到1953年夏,“新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使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党性党风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工作作风与方法有了明显好转。运动中,通过处理少数违法乱纪干部,增强了干部、党员的纪律和法制观念。

三、审查干部和肃反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对干部在数量与素质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池州当时只有少量的南下干部和部分地方干部,难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的需要。于是,从外地调入了不少干部,为矿山建设与恢复做准备。同时,从留用人员和各种训练班、学校等方面也选拔了一批干部。干部队伍的迅速扩大,成分也比较复杂,这些干部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和其政治思想素质与在工作中的表现都有较大的差异与区别,甚至还有反坏分子仍混在革命队伍中,这些人员经历了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组织上对他们也进行了调查了解与处理,但有些人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一批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干部尚未进行细致的审查。因此,为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

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有必要对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审查。为此,195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在两三年内对全国干部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以便进一步了解干部,保证国家各项建设的顺利进行。并对干部审查的方针、政策和范围、步骤、方法都做出规定,决定审查分 3 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摸底排队,第二阶段是调整研究,第三阶段是结论与处理。

1954 年 9 月 1 日,省委制定并下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审查干部工作计划》。《计划》在分析全省干部队伍状况时指出,虽然大多数干部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基本上是纯洁的,但根据当时的政治标准,各级党政机关不同程度地都存在不纯的情况,尤其财粮和文教系统较为严重。因此,“必须遵照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县以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在两三年内对全体干部进行审查,以便更好地培养和使用干部,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

根据中央的决定和省委的计划,池州各县的审干工作按照团结爱护、严肃慎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政策和原则,从 1955 年 1 月开始,前后历经 5 年时间,对干部进行逐个、细致的审查。列入这次审查范围的是区以上机关的各级干部,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审查,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目的,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堕落分子,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同时又从多方面了解、熟悉干部的思想品质与工作才能,以保证正确地使用干部。由于各级党委正确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审干的方针政策,因而审干工作进行是平稳的,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1955 年,党内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7 月,池州各县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布置肃反工作。各县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先后分 5 批开展肃反运动。各级纪(监)委投入大部分时间和力量,结合肃反开展纪检工作,查清了一批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据统计,肃反运动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 1.2%。通过肃反,将一批混入革命队伍的反、坏分子清查出来,消除了隐患,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进一步纯洁了党组织和革命干部队伍。

四、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

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为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系统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并结合中国具体条件正确利用苏联的经验。全党干部要健全学习生活,提高学习理论的兴趣,为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做好准备。

安徽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掀起学习理论的热潮。池州各县当时部分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学习理论有困难,被组织起来先学文化后学理论。全区各地、各系统举办文化培训班,使文化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于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从而能够有效地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

在教育培训党员干部过程中,各级党校充分发挥了作用。地、县两级党校除培训县区干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过渡时期总路线、党史知识和社会主义经济知识外,还普遍附设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即文化补习学校)。速成初校设有毕业班、高小班及扫盲班,多数工农干部通过文化补习后,再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

1955年7月,省委下发《关于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指示》,要求地(市)委、县委、区委必须订出加强农村党支部经常教育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要求全省所有农村支部在年底前都应争取建立和健全定期的党课制度。并强调要重视党课教员的配备及教学工作的指导。1956年,全区各县农村80%的总支和支部都建立起党课教育制度,基本做到每个支部配备一名党课教员,各地党组织特别注意通过培训党课教员和加强备课来提高党课教育质量。在党课教育中,对党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党的方针、政策、任务的教育,还结合整党建党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中共八大召开以后,立即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八大文件。

五、干部的培养选拔与监督管理工作

党的事业迅速发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承担重任。因而,培养选拔干部成为各级党委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省委要求选拔政治可靠、有高度政治热情、上进心强、业务能力好、有培养前途的领导干部,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

1954 年,根据大胆大量提拔干部精神,全区提拔了一批县、区、乡干部,按照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原则,坚持搞“五湖四海”,选拔的干部既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军转干部,也有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既有党内干部,也有党外民主人士;既有本地干部,也有外地干部。所提拔的干部经工作实践考验,基本上符合“德才兼备”的标准,使各级领导班子结构趋于合理,基本上解决了各方面工作发展的需求。1955 年,肃反运动中的干部选拔使用工作主要是巩固提高,只选拔了少量的县、区级干部。当年,干部配备工作强调贯彻“层层下放,加强农村”方针,各县抽调了数百名干部组成办社工作队,分配到大社、高级社担任领导骨干;还配备了一批办社指导员,加强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发展。1956 年,提拔干部原则上就地取材。首先物色好人选,然后按照调查了解、摸底排队、考察培养程序选拔任用。当年各地调整、提拔干部 200 多人。

在培养选拔干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加强和改进对干部使用、领导班子配备的管理监督。1953 年 8 月 3 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干部管理的情况及改进意见》,决定缩小省管干部的范围和改进管理方式。1954 年 3 月,在第三次全省组工会议上,省委决定逐步实行干部分管工作。根据省委文件精神,各地干部管理制度均实行干部分部门分级管理。从 1954 年开始,区级干部由过去地委管理改由县委管理。1955 年,宣传、农业、工业部门的干部归口管理,财贸、党群部门干部由组织部管理,政法干部由人事科兼管。1956 年,农工部、财贸部、工交部、宣传部、组织部均设干部管理科,管理本系统干部。

各级党组织在任免干部时,按照省委在 1956 年 10 月制定下发的《干部任免工作暂行细则》要求,在任免干部职务时,对干部的政治品

质和业务能力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然后再办理呈报手续,逐栏认真填写《干部任免呈报表》,按照各级党委各自分管范围,以党委和党组名义办理呈报手续。各级党的纪检监察委员会根据自身职能,在开展党的纪检监察工作时,对干部任免工作也加强督查,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保证组织人事部门在任免使用干部时真正做到选贤任能、公道正派。

第 二 编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 年 9 月—1966 年 4 月）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池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中。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 10 年,经过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挫折后两次调整和后来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间栉风沐雨、历经挫折,全区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艰辛的努力,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积累丰富的经验,但也承受了很大困难、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五风”盛行导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经过 5 年艰苦调整,到 1965 年,全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达到或超过 1957 年的水平,工业建设成就明显,农业恢复较快并有所发展,水利等基本建设成绩显著,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恢复并有所提高,经济建设开始走上正轨。这一切都是在探索中取得的,值得历史铭记。

第八章

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当时的主要任务,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党的八大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池州地区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的热潮,并全力投入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之中。

第一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良好开端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工作和“一五”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到1955年年底,池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均取得新的发展与进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良好开端的新局面。

政治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安宁。随着剿匪、镇反和机关内部的肃反工作取得预期的成效,各级政权建设不断加强巩固,一些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得到任用,担任领导职务或技术职务,用其所长调动了他们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呈现人心思稳、人心思上的良好政治局面。这一切为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出现新高潮创造了难得的环境与氛围。

经济建设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工农业生产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占据了主导优势。农业方面,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组织起来的农民入社比例占到90%以上。加上全区范围的水利基础设施不断改进,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1955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27.6万吨,较1949年增长1.5倍;经济作物棉花、茶叶、油料增幅较高,渔业、林业、畜牧业也取得大幅增长。工业方面,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后,企业的产值与效益均得到较快增长。到1955年,全区工业总产值1950万元,比1949年增长1.2倍。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取得明显进展。到1956年上半年,全区中学、小学、在校生较解放初快速增长,教育质量也取得显著提升。农村文化事业日渐活跃,卫生事业也一改解放初期落后面貌,全区各县除县办医院外,还相继在各区建起卫生所,配备医务人员4—5人,有效开展了卫生防疫工作,特别是血吸虫病等地方病防治工作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开展全面有效的治理。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工农业生产形势的好转,社会商品也日渐丰富,市场物价稳定,随着城乡人民收入稳步增加,居民购买力也在逐年增长。

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在思想建设上,全区各地结合整党和各项中心工作,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班,使多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受到培训。同时加大对违法违纪干部的处理力度,收到了教育党员、整肃组织、纯洁思想的目的。在组织建设上,到1956年年底,全区党员发展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也明显提升,党员队伍不仅得到发展壮大,党组织团结也不断增强,干部队伍也得到锻炼提高。

第二节　传达学习党的八大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成为执政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国

内外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总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经验,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的决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如实地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的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并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大会制定的政策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之旅,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下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八大闭幕以后,池州各县根据省委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迅速传达大会精神,结合各地的实际,认真贯彻八大会议精神,凝心聚力地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各地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认真、系统地学习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的基本精神,以八大精神统一党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集中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各县委及时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认真宣传和贯彻八大精神的通知》,强调不仅班子成员要带头学习,还要掌握全盘学习的情况;要求各区、乡、社和县直单位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布置学习任务,区、乡党委、总支及时向所属支部布置学习任务,以支部为单位组织讲课,课后分组讨论。这种方法既能抓住重点,又能领会精神实质,学习效

果较好。有的乡还组织学习组制定学习公约,坚持每天集中 2 小时学习。各地还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传达宣传八大精神,除利用报刊、广播等进行宣传外,还派干部下基层工厂、农村、学校向群众宣讲八大精神。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传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从 1956 年 10 月中旬到 1957 年 2 月上旬,通过几个月的传达学习宣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断加深对党的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精神的了解与领会,对八大所分析的国内外主要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和会议确立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会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充满了信心,满怀豪情地投身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

第三节　贯彻落实党的八大精神

在党的领导下,池州人民在基本完成“一化三改造”的任务后,热情高涨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中。

1956 年上半年,东流、至德、青阳、石埭、贵池等县各级党组织开展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草案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上来。

党的八大强调指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根据大会的精神,池州人民在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前提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经济计划和经济关系做出适度的调整。各县修订了 1957 年全面生产计划,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高指标。同时按照八大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

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方针调整经济关系。池州城乡自由市场开始有所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少数地方还出现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二是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调整有了初步进展。在生产方面,实行了“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在产品分配方面,实行了“少扣多分”;在管理方面,努力做到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许多地方还增加了社员的自留地。1957 年是池州各地农业初级合作社普遍升为高级社的一年,一些地方新建的初级社立足未稳便立即并社、扩社。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3 个指示,安徽省着手整顿合作社,池州各县对社队的规模进行了调整和压缩。如青阳县从县、乡机关抽调 119 人组成整社工作组,历时两个月对 242 个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从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分类整顿。整顿后,农业社实行包工制和包工包产制,全面推行季节包工、小段包工和常年包工制;农业社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费用)一奖”(超产奖励)责任制,推行劳动定额、按件计酬、提高收益分配,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出工一条线、办事一窝蜂”的做法,有效地提高了劳动出勤率与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全区各县围绕建立先进工业的要求,开始提高干群对新兴工业的认识,积极兴办和发展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从县直单位抽调懂经济的干部深入基层,利用当地资源新建起矿厂、农产品加工厂、畜牧厂和造纸厂、卷烟厂等,多数厂当年投产当年收效。这些举措既改变了池州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局面,也为日后发展工业培养经营管理人才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1956 年前后,各地开展的关于农村经济管理模式的初步探索,是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党的八大精神取得的成果,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 1957 年年底,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为 13361 万元,比 1952

年增长 42.9%。其中工业总产值 3923 万元,超计划 43.2%,工业企业总数达 98 家。农业总产值增长 28.9%,水稻、油菜籽、棉花分别完成五年计划的 97.2%、43.7%和 45.6%。农业综合实力和抗灾水平显著提高,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 200%。人民生活初步改善,国民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第九章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后,大量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成为党治国理政亟待解决的新课题。1957 年 2 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之后,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少数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的复杂局面。随之,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迅猛开展起来,并出现严重扩大化的趋势。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反击和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使社会主义建设良好开端遭受挫折,教训深刻。池州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第一节　整风运动

一、整风运动的背景

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1956 年 4 月 28 日和 5 月 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深受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与响应,人们思想日趋

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发表各种意见和见解,人们思想解放、争相“鸣放”,尤以思想文化领域争议更为激烈,这为随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创造了舆论氛围。

1956 年,已经基本完成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村,农民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得到发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上了一批新项目,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就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出现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农业高级社过急过快的发展,引起管理混乱、社员的不满,特别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造成部分农民生活困难,加上经济建设铺摊子、上项目过急过多,财政支出加大、物资紧张,城市副食品出现短缺,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导致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一时间人民内部矛盾突发多发。

1956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开展党内思想教育运动,以克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严重缺点。11 月,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以东欧波兰、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为鉴戒,毛泽东号召采取整风方法解决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决定第二年开展全党整风。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重点是论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3 月,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一切跟随共产党奋斗的人们勇敢地负起责任,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毛泽东讲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引起强烈反响。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阐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这次整风学习和检查的主题。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做法。要求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召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鼓励各界人士本

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各级领导干部所犯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随即,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二、开展整风运动

1957 年 2 月至 3 月,全区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知识界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组织讨论这两次讲话,着手排查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开始为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做思想上的准备。4 月至 5 月,池州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草案)》,及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要求,组织部署本地区的整风运动。5 月下旬,至德县委召开有 300 余人参加的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贵池、东流、青阳、石埭等县也相继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文件,研究布置全县的整风运动,宣布各自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制定整风运动计划,对整风运动提出要求、方法和步骤。各县整风的总体要求是,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整风主题的基础上,批评和纠正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整风的方法是,在学习领会上级关于整风运动文件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规定的检查重点,结合本部门具体实际,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步骤分为 3 个阶段,即整风学习阶段、整风检查阶段和整风总结阶段。

根据全区整风计划安排,决定分两批进行整风,第一批是县级以上的党组织,从 6 月全面启动,到 12 月底结束;第二批是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中结合整社开展整风学习,从 11 月起到 1958 年 3 月底结束。全区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直属机关于 6 月分党群、农村、文卫、财贸、政法、工交等系统,以半天整风半天工作的方式进行整风。各单位党组织召开各种形式会议,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同时,组织区、乡干部参加县直机关的整风,为下一步基层整风培训骨

干。在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运动转入开门整风,首先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接着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小组会,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听取党内外群众发言,围绕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征询意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工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水利、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让大家畅所欲言,对党和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其目的是解决干部、党员思想作风上的"三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五气"(官气、暮气、娇气、骄气、阔气)。总的来看,所提意见比较中肯,少数意见虽然比较尖锐,但也富有建设性。如青阳县经统计的文卫系统 2015 条意见中,正确的占 78.2%;工商界 253 条意见中,正确的占 88.3%,这无疑对改正缺点错误是有帮助的。

1957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化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批判富农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为此,从 8 月开始,各县在开展县直机关整风运动的同时,又组织工作组到乡、社,由点到面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在这场教育运动中,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社员开展提意见提问题的"鸣、放"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辩论"。各地通过"鸣、放"拟出辩论题,青阳县拟出 12 个辩论题交大家辩论,有"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等大是大非问题,也有"统购统销、生产改革、肥料价格、财务分配制度、干部作风"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辩论,澄清是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并着手整改,之后制定本社发展规划。

这场整风运动随着 1958 年夏季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宣告结束。在整风运动中,由于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热忱帮党整风、改进工作,提出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大部分人其目的是善意的、正确的,有利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干部作风。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全局性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由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借机向党和社会主义恶意攻击,导致反右扩大化的负面效应,其教训值得记取。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

一、反右派斗争的经过

在全党整风运动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包括知识界、工商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本着向党交心的良好愿望，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许多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开创社会主义民主局面的良好开端。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在“鸣、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社会上激烈批评意见迅速升温，火药味极浓。这些意见中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批评外，有些意见异常尖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疯狂攻击，叫嚣要“轮流执政”，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此，中央决定坚决反击。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随即，一场全国性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反右派斗争猛烈开展起来。

1957 年 7 月初，池州各县根据中央指示和省委印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八条标准》，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贵池、青阳、东流、至德、石埭等各县分别在中共安庆地委和芜湖地委的领导下，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

8 月 15 日至 9 月 6 日，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围绕粮食问题、合作化问题、生产改革问题、城乡问题、政法问题进行讨论，并以“鸣、放”方式讨论了整风、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会议要求继续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并决定在文教界、工矿企业和农村普遍开展“大鸣大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池州各县的整风反右运动均在试点的基础上，先后于 9 月至 11 月分两批进行，首先在县直机关，然后在区、乡机关以及小学教师和工商界进行，小学教师和工商界人士都集中到县城，先是学习动员，然后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

大字报”的方式进行。

在农村,整风反右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省委宣传部部署,在农村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农业生产改革、工农关系等问题进行大辩论,批判党内和干部中的所谓右倾思想。随后,各地成立工作组,通过先行试点后,再推行到乡、社组织开展运动。8月至9月,贵池县委在马衙乡大路农业社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即整风反右斗争的试点,根据“鸣、放”出来的意见,按标准划分“左、中、右”三种类型的人。一些社员因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对粮食统购统销、合作社分配等政策不理解遭到批判,有些基层干部也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他各县也选择了一些社队进行类似试点。

文教界的整风反右运动,各地根据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在中等学校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意见报告》和《关于在小学中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意见》,全区中小学卷入反右派斗争。从暑假开始,东流、至德、青阳、贵池4县的中学教职员工全部集中到安庆,由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反右派运动。一些对教育教学有不同意见、不同见解的教师,甚至过去曾给领导提过意见的教职工遭到批判,有的被划为右派分子。

工商界是整风反右斗争的重点领域,工商界的整风反右围绕“反对右派,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主题进行。一些工商界骨干分子由于一时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出于对党的信任提出一些繁荣工商业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而遭到批判打击。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定为右派分子,蒙受长期的打压和委屈。

池州各县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在1958年冬结束,共划右派1000余人,其中贵池县划右派分子517人,分别占参加运动的党员、干部总数的15%和11%。东流、至德两县共划出右派分子468名,其中党员有130名。石埭县划出右派分子3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03人、坏分子235人。青阳县划出右派分子138人,其中县级干部2人、区干5人、一般干部21人。贵池、至德等县一些县级党政领导干部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

池州各县反右派斗争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开展的。在反右派斗争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此,组织及时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加上对运动迅猛发展过程未能谨慎把控,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

当时,各地在反右派斗争中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加上省委补充的2条标准,即把"丑化党团员、积极分子"和"挑拨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反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三改'"等都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种在中央制定的标准外另加2条标准,实际划分时很难把握。当时"许多人只是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①] 致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压抑、工作上受排挤,对他们个人乃至整个党和国家事业都是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逐渐趋向"左"倾,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造成非常不幸的后果。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359页。

第十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党中央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内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人民群众也热切希望经济建设取得更快地发展,尽早过上富裕美满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池州广大干部群众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投身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中,积极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决心大干快上,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条件,一味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大刮“五风”,致使经济发展出现严重挫折。尽管各地对“左”的错误进行了纠正,但对克服当时经济困难、扭转经济下滑的形势收效不大。

第一节　宣传贯彻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 15 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

精神。他还批评了部分人不同意高指标的意见。总路线的制定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但它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忽视了经济建设应遵循的客观规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规模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958 年 6 月 2 日,省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要求“这次宣传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要比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更大,宣传的要更深更透;动员和组织的宣传力量要比以往任何一次宣传运动更多;宣传的形式和方法要比以往任何一次宣传运动更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大大发挥群众在宣传运动中的创造力”。随后,全省各地召开了贯彻总路线广播大会,层层进行动员。池州各县立即行动,组织人员,运用多种形式,掀起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热潮。6 月 9 日至 20 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省委委员、专(市)、县党政负责人等 1400 多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强调宣传贯彻总路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7 月至 9 月,池州各县先后召开县级党员代表大会,着重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讨论,对 1956 年的反冒进予以批评。9 月,各县又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要求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在省委公布全省新的生产“跃进”计划指标的激励下,各地也纷纷提出超越实际可能的发展目标,一再缩短实现发展目标的时间。一场以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大跃进”运动在池州大地兴起。

第二节　大规模兴修水利

池州地处长江南岸的濒江地区,北部为濒江平原,南部为山区,中间是丘陵地带,地形呈南高北低。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流经 162 公里,境内 10 条主要河流横跨三大水系,有两个中型湖泊、6 个小型湖泊以及众多的小湖泊密布其中。每年降水集中在六七月份的梅雨季节,其时容易引发山洪暴发、江河湖泊水位暴涨。而入夏进伏之后,受北来

高压控制,则常发生秋季伏旱,严重时山区丘陵地区人畜饮水都会发生困难。作为以农为主的地区,遇上洪涝旱灾,防汛抗洪、抗旱救灾任务十分艰巨。因而大规模兴修水利是防汛抗旱、防灾降灾的必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增加,池州沿江各县开始对沿江滩涂和沿湖及河滩进行大规模的围垦并疏通水系。同时,丘陵与山区大力兴建蓄水灌溉工程。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高潮的到来,水利建设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在"治涝防旱和防洪保堤并重"的方针下开展了洪、涝、旱的综合治理工程。特别是1958年贯彻总路线精神,"大跃进"运动促进了水利建设的空前跃进。人民公社化后,由于社大、力量大,水力资源得到通盘规划和合理布局,治理规模也由过去零星小型治理发展到综合治理。水利建设取得空前的成就。

一、新修与加固防洪堤防

解放初,由于受人力与施工条件制约,所建工程堤顶低、堤身单薄,遇上长江丰水年份江潮或山洪的冲击,就容易溃破成灾。解放后,沿江地区各级党委、政府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民生福祉出发,把兴修水利作为根除水患、兴利除害施政的重中之重治本之策,数十年如一日带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手挖肩挑地筑起系于民生安澜的千里长堤。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运动以后,水利兴修项目一再加码,工程土石量一再增加。沿江一带广大干群上下一心、不畏艰险,充分发挥集体力量,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组织大兵团会战,采取分段包工,定指标定任务到生产大队、生产队、生产组。每年冬春两季男女老少齐上阵,顶风沐雨、披星戴月,有时吃住在工棚里,人人一把铁锹、一副箩筐,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连续作战的作风,发扬愚公移山一代接着一代干的誓死改造河山的大无畏精神,年复一年,久久为功。硬是筑起保护沿江一带几十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千秋基业,建起惠及子孙后代彪炳史册的德政工程。

到20世纪70年代,池州地区共建大小圩口200多处,其中10万亩以上的圩口2处(秋江、广丰圩),1—10万亩的圩口8处(有庆、香口、七里湖、广阜、万兴、东南湖、同义、大同圩)。池州长江干支堤防由12座圩口组成,其中东至7座、贵池4座、城区1座,干支堤防总长182.5公里,其中长江干堤109.2公里,与干堤成圈的河湖堤防长73.4公里,合计保护耕地60.31万亩、人口63.43万。池州内河湖1万亩以上的圩口有6处,其中东至县有东湖、新胜圩2处,贵池区有联丰、双丰圩2处,青阳县有童埠、木镇圩2处,堤防总长44.5公里,保护耕地6.09万亩、人口3.43万。1000亩至1万亩圩口63处,堤防总长246.4公里,保护耕地15.08万亩、人口16.72万。据统计,全区保护100亩以上的堤防171处,堤防总长570公里,保护耕地86万亩、人口85.5万,其中万亩以上圩口15处、千亩至万亩圩口63处、百亩至千亩以上圩口93处。池州最大圩口秋江圩,保护人口15.4万、耕地20万亩。

经有关部门初步测算,池州地区江河湖边围垦的圩口总长570公里中70%以上是解放后新建与加高增厚的。无论是圩口数量还是堤防长度与宽度、高度,都大幅增长,工程土石方总量是惊人的。

二、大力修建蓄水灌溉工程

由于全区山丘面积占总面积的81.4%,70%以上的耕地分布于丘陵地带。山区抗旱灌溉均以山塘、水库蓄水浇灌为主。因此,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兴建水库成为当务之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区各县迅速掀起修建水库的热潮。

1955年春季,石台县和平乡(今属黄山区)动员群众兴建凤凰山水库,施工选择了口子小、肚子大、土料丰富的山冲为坝址。由于土坝工程量小,运用滑道运土提高了工效,该水库仅用一春就建成,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受益。这座水库的兴建,标志着全区水库兴建进入新阶段。1956年冬,至德县新岗乡(今建新乡)首选在龙岗村梅岭兴建周山水库,总库容117.7万立方米,由此拉开了全县兴建水库的序幕。坐落在东至县东胜乡的大板水库,属鄱阳湖水系龙泉河流域大板

河,水库工程始建于1959年冬,经过了数十年的兴建,是目前池州地区最大的一座水库,总库容为1870万立方米,设计标准一百年一遇,库区集水面积45平方公里,是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养鱼等综合效益的水利工程,建有坝台式水电站一座,安装3台325千瓦功率发电机。水库至80年代工程全部竣工,其中国家投资293.26万元,共计用工137.5万个工作日,完成土石方135.25万立方米,其中开石方25.24万立方米。库区搬迁3个村、10个生产队、100户人家,淹没耕地1573.8亩。这项标志性水库建设工程体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心血与汗水,惠及了一方百姓。从20世纪50年代到1966年,东至县先后陆续兴建起跃进、中湾、愚公、红星、前进、青山、铁炉等20座水库,初步解决了山区"雨来成灾,雨走即旱"的问题。

贵池县于1957年相继兴建的四岭水库与马衙水库,均坐落在马衙乡,属九华河支流马衙河。其中四岭水库为马衙河梯级水库的第一级蓄水工程,总库容734万立方米,兴利库容550万立方米,大坝坝顶高程174米,为土石混合坝,心墙为刚性浆砌块石,心墙下游为堆石体,溢洪道宽30米,最大泄洪量每秒195立方米。是一座兼灌溉、防洪、养殖、发电等的综合利用工程,建有两座水电站,总装机4台750万千瓦。马衙水库于1957年开始兴建、1961年竣工,集水面积16.8平方公里,总库容128万立方米,土坝净高22.2米,属黏土心墙坝,溢洪道最大泄洪量为每秒351立方米。两个水库均兴建于"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奋力拼搏、艰苦创业,按预定计划完成土石方工程,建成后收到预期综合效益。

青阳县、石台县也在此期间先后建起广德口、石湖、东红、石壁、向阳、泉水二中、东风、张田、石岭、庆丰等水库,之后经过不断修整、培厚加高,达到设计标准,发挥了综合效益。

三、建设机电排灌设施

池州境内的堤防上共建涵闸146座,其中长江干支堤防涵闸58座(大型1座,东流新闸;中型2座,黄湓闸、下清溪闸;小型55座),其

他堤防上建有 88 座。境内共建机电排灌站 943 处,装机 1517 台 82618 千瓦,排灌面积 106 万亩。建于长江干支堤防上的机电排灌站 34 处,装机 260 台 42155 千瓦。有效排灌面积达 80%。解放前,无动力机具,排灌水靠木制水车,人力驱动。20 世纪 60 年代,池州山区大兴水轮泵站,以水轮泵为动力,提水灌溉,随着电力的发展,电机水泵逐渐取代水轮泵。

另外,池州境内河川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14.33 万千瓦,可开发利用 6.28 万千瓦,目前已建水电站 52 处,装机 114 台 35735 千瓦,占可开发利用水能资源的 56.9%,年均发电量 1 亿千瓦时。

兴修水利运动中,建成了一批造福民生的水利工程,圩区新建了一批千亩、万亩以上的圩口,加固了圩堤,提高了防洪减灾能力。山区兴修了众多的水库,发挥了灌溉、发电、养殖综合效益,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水利建设贪多求大,过多的围湖、造田,不考虑泄洪蓄洪能力,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有些水库兴建由于工程布局不当,留下隐患,还有一些工程设计把关不严,如沿江内湖涵闸,造成险情不断,影响正常运行。

第三节　“大跃进”运动及其影响

1958 年 3 月 1 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布置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强调首先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跃进”,彻底改造精神面貌,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保守思想和暮气统统反掉,从而在思想上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胜利实现。此后,在党内急于求成“左”倾思想的迅速扩散、蔓延与推动下,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指标纷纷出台,且指标还不断提高。池州各县、各条战线随即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一、农业“大跃进”的兴起

片面追求生产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

标,是各地“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的主要标志。当时,农业上中央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至德县在《1958年至1962年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规划(草案)》中提出:“粮食亩产由1957年的455斤提高到1800斤,红茶3—5年内由1957年的1.5万担提高到20万担”;“兴建大小工业厂矿337项,其中颗粒肥料厂1777个”,并提出苦战五年,两年突击、三年实现、四年超额,达到“十二化”目标。即“生产大部分机械化、村村电器化、肥料化学化、灌溉自流化、水土保持化、交通近代化、科学教育普及化、户户卫生化、身体健康化、城乡繁荣化、山村风景化、生活富裕化”。1958年6月20日,至德县委在讨论各类农业作物高额丰产指标时,提出“双季稻亩产1万斤,中稻和单季晚稻亩产8000斤,玉米亩产8000—10000斤、山芋亩产10万斤”;1959年春,又提出“油菜亩产500斤”、“实现小麦亩产千斤县”的口号。至德县为追求“高速度”而提出的“高指标”,各县竞相效仿,如有的县提出了“没有先进的指标就没有先进的产量”的口号;有的县生产计划从“千担肥料千斤粮”提升到“每亩两千担,实现千斤县”。

为了保证农作物高产,实现高额丰产田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各地普遍推广深耕、密植、多施肥的方法,认为深耕越深越好,要求午季丰产田深耕1.5尺、“卫星”田深耕5尺;密植越密越好,要求高额丰产田每亩插秧10万株,早稻实行2×5寸密植,有的田块甚至出现1×3寸、1×4寸、2×2寸、1×1寸密植的怪现象。山芋每亩一般8000棵,最高2万棵;小麦下种量每亩500余斤。生产时节,乡村干部下田头督查密植情况,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则命令毁掉重来。这种明显违反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生产上的瞎指挥,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造成大面积减产,当然不可能实现“高指标”。

为了凸显“大跃进”运动的成果,实现不可能达到的丰产高产指标,各地干部采取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的手法谎报高产,以重复过秤、并田移栽等手段玩造假游戏,邀功摆绩。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放高产“卫星”的高潮。如池州有的地方小麦亩产虚报到3000斤、10000斤这种惊人的数字。这种浮夸风到处蔓延,且愈演

愈烈。各地跟风攀比,虚报浮夸的高产数字充斥报刊、广播,到处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唯意志论的宣传鼓噪遍及城乡,使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发热、利令智昏,各种不可想象的“高指标”,头一天刚惊爆眼球,第二天又刷新纪录。如 1958 年 8 月上旬,安庆专区宣布全区 250 万亩早稻平均亩产 1230 斤。这种现象在当时屡见不鲜,且还受到上级的祝贺、赞赏、鼓励。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在“大跃进”年代的盛行以及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令人痛心也令人反思。

二、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以钢为纲”成为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钢产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大力发展钢铁是工业建设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指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为此,中央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1958 年 1 月,国家经委即建议全国当年钢产量指标为 620 万吨。安徽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全国钢铁计划制定了安徽钢铁发展指标,这个指标几经修改不断加码后,确定当年生产铁 120 万吨、钢 35 万吨。显然,这一指标远远超出了安徽当时的生产能力。为完成钢铁生产任务,按照中央部署,各地掀起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大跃进”群众运动。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中,池州各县从 1958 年 7 月下旬开始,提出一年生产数万吨至几十万吨钢铁的指标。有的地方提出“队队办厂、户户投资、人人献计、个个动手”、“日产千斤铁”等口号。7 月至 9 月,各县先后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学习总路线,对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再修改,不断加码。青阳县在 9 月 3 日做出的《关于继续贯彻总路线,开展大搞工业宣传运动》的指示中,提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日产 500 吨钢铁”的口号。

为了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8 月起,贵池、青阳、东流、至德、石埭等县先后成立冶金指挥部,各级党委书记挂帅,动员几十万群众上山

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成千上万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上马炼铁炼钢,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贵池县发动8万人组成5个炼铁兵团,分赴碧山、潘桥、杜湖、杨桥、池口5个炼铁基地安营扎寨,土法炼铁。青阳县发动全县15—55岁男子投入炼铁运动。石埭县组成万人"钢铁师",大办钢铁。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各地想方设法解决原材料缺乏问题。如缺少耐火材料,就用碳素材料替代;矿石不足,就到群众家中搜集生活铁器和铁制农具;坩埚来不及赶制,就献出家中的油桶、铁壶、铜器、汤罐等取而代之;煤焦缺乏,就伐木烧炭,致使深山大片森林树木被砍伐,造成后来水土严重流失,生态长期难以修复。很多机关干部、学生、农民对冶炼技术一无所知,只能请教铁匠、铜匠,边干边学。至德县1958年11月上报的数字为:生产铁55.6万吨、钢9.6万吨。各地上报的炼铁炼钢数字不仅虚报浮夸,而且所炼钢铁大多或基本上是似铁非铁的半成品,大炼钢铁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

在"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同时,按照省委的要求,各地还要加速其他工业的发展,缓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比重",随之全省掀起一个发展地方工业的热潮。池州各县各行业也掀起发展地方工业的"大跃进"。在纺织工业方面,青阳县利用当地资源,办起县丝绸厂和缫丝厂、青阳县棉织厂;至德县建起红旗针织厂,东流县成立东流棉针织厂,后两县联合筹建东流纱厂。食品工业方面,贵池县兴办起杏花村酒厂,其他各县也先后办起自己的酒厂、食品加工厂等。建材工业方面,贵池县建起贵池县水泥厂、贵池县水利局水泥厂,用土法生产水泥,因技术质量问题,工厂次年下马。电力工业方面,至德县五一发电厂与东流城关电灯厂合并,建起东至县五一发电厂。冶金采矿业方面,池州铅锌冶炼厂建成投产,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在贵池县铜山筹建铜山矿区,青阳县杨田乡建起安徽省第一家国营铅锌矿,贵池县桃坡乡创办前排山潘桥铁矿(1959年3月划归省政法钢厂)。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不辞辛苦全身心投入,有的群众为了大办工业的需要,以朴素感情摘下耳朵上金耳环、脖子上银项链,集资

办厂。全区自“大跃进”始,虽然地方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种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有些厂矿后来因为资金技术难以支撑、资源管理跟不上先后关停并转。

三、教育及其他行业的“大跃进”

在“全民大办”、“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不仅对工农业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林业、交通、水利、文教等行业也相继提出高指标,争相放“卫星”。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 12 年实现绿化,而有的县提出“苦战三十天,实现绿化县”;《纲要》提出 10 年内扫除文盲,而有的县提出“苦战一个月,实现无文盲县”,等等。教育事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与错误倾向,对中小学教育管理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较多的改革。如各地掀起普及小学教育的“大跃进”,队队办小学,并开办各种形式的教学点,民办小学急剧增加。各地还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即“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双轨制,小学管理体制也随之变动,除城镇完小归教育局主管外,其他小学全下放给社队管理。全区办起 13 所普通中学、3 所完中,各中学普遍增班扩规,在校学生增加到 7747 人。此外,不少地方还创办民办中学,时称“农中”。师范教育除池州师范学校、青阳师范学校外,1958 年,东流、至德两县创办起 2 所初级师范。1959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全区、县、公社和部分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了安徽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万人大会,听取了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会后,各地即根据会议精神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大炼钢铁开始“下马”,对“大跃进”指标和生产计划做出一定的调整。各地领导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增产节约,为完成各项指标而奋斗;另一方面开始调低有些“跃进”指标,让一部分劳力回归农业,恢复发展小商品生产等,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回升,农村的困难局面有了短暂改观。但各种矛盾和困难依然存在。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会议主题由开始的纠“左”因党内领导人的不同意见而变为反右。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池州一大批党员、干

部,包括党内干部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经济战线上的纠“左”工作,使“左”倾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长时期延续,“高指标”又开始出现。青阳县在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基础上,又在1960年提出“特大跃进”的指标,其他各县也是如此。“大跃进”在池州的3年,导致了池州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回落,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中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与浮夸风,一些人由此认定,生产关系越向高级形式过渡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农业合作社生产组织形式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在谈到办人民公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随着毛泽东办人民公社的思路日渐清晰,《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社,从而构成一个中国基本单位的思想。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对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以及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问题做了规定。9月26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就建立人民公社做出全面规划,要求全省农村年底前实现人民公社化。

省委电话会议后,全省各地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层层动员和部署,争先恐后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池州各地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办人民公社的高潮。经过宣传,广大农户对加入人民

公社热情高涨,成千上万群众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向党和政府递交申请书、决心书。人们扎起彩带扭起秧歌,庆祝人民公社的诞生,其场面不逊于当年庆祝共和国诞生、人民翻身解放的盛况。

池州各级党政领导对创办人民公社高度重视。9 月 14 日,青阳县庙前、柯村、九华、五溪等乡镇 44 个高级社合并建立九华人民公社,成为该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全社有社员 38348 人、耕地 84682 亩。当月,东流县将胜利、桃源、临湖、广惠、姜坝等 5 个乡、31 个高级社合并组建成胜利人民公社,全社有社员 41712 人、耕地 7. 56 万亩。至德县将梅城、樟树、历山、建东、城关 4 个乡、1 个镇、30 个高级社合并组建成尧渡人民公社,入社 5372 户、20802 人,耕地 23300 亩。贵池县在全县 767 个高级社基础上按自然经济区域组建 9 个人民公社,后调整为 13 个人民公社。石埭县将广阳、龙田、银溪、七井、七都、小溪、河口 7 个管理区组建为上游人民公社。一个月时间内,贵池县 767 个高级社、青阳县 242 个高级社、至德县 265 个高级社、东流县 128 个高级社分别组建为 12 个、10 个、10 个、5 个人民公社。各地入社农户占全区总户数的 98%以上。各公社下辖生产大队、生产队。至此,各县基本上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针指引下,农村人民公社的快速发展与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形势发展紧密相关,而被调动起来的群众积极性与当时宣传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密切相连。

从池州各县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看,被称为人民公社的优势即特点的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从体制、职能与组织规模上做出规定: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体制,构成集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于一体的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由一个乡或是几个乡、几千户甚至万余户的社员组成一个公社。所谓“公”,就是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制与分配制度等做出规定,把几十个、上万个甚至一两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成一个公社,其财产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全部上缴公社,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收归社队,归公社所有。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推广供给制,初期实行部分供给制。各县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及家庭副业都被作

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有的地方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个别地方甚至宣布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推行这种供给制,造成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后改为大队、小队)之间、社员家庭与家庭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不少公社在推广供给制时,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当时人民公社还经常无偿调用生产队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由此可见,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穷富拉平)二调(无偿调拨物资和劳力)”。这种以供给制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共产风”在池州大地上越来越盛行。

池州各地人民公社一度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管理机构和生产劳动组织编成团、营、连、排建制。如石埭县全县组成 4 个团(以人民公社为单位)、28 个营(以大队为单位)、128 个连(以生产队为单位)、475 个排(以小队为单位)、1642 班(以生产组为单位)。生产时劳动力统一调配,实行大兵团作战。为完成生产任务,特别是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经常夜以继日地连续作战,大打疲劳战。以上情况表明,各地初期的人民公社不仅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而且还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人民公社在实行部分供给制时,各地还兴起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从 1958 年秋季开始,各县为适应劳动组织的军事化、大兵团作战,兴办起公共食堂。贵池县在马衙公社建立“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试点,提出“敞开肚子皮吃饭”。到 1960 年春,贵池县办起食堂 2405 个,有 61909 户在食堂就餐,占总农户的 99.7%。青阳县于 1958 年年底办起食堂 1226 个,有 40527 户入伙,占总农户的 99.7%。其他各县也都办起“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各地还普遍做出硬性规定,不允许私人家里烟囱冒烟,不愿到食堂吃饭的社员被认为思想保守、觉悟不高。有的地方干脆把社员家里的锅碗瓢盆没收充公、锅台拆毁,强迫社员入伙。

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房都是占用社员住房,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或会计负责,炊事员由干部家属或生产队抽调劳动力担任,所需粮食由公社、大队按指标分配,蔬菜由生产队自产。农村食堂一般以一个自

然村或一个生产队建 1—2 个,条件十分简陋,多数没有固定饭厅,大都围在地上用餐,秩序混乱、公共卫生状况较差,有的连开水供应也不能保证。针对这些问题,1958 年 11 月 21 日,安徽省委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应当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体社员中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开展评比竞赛,推动食堂工作不断前进。到 1959 年年底,公共食堂发展到鼎盛时期,有 90%以上农户在食堂吃饭。后因管理混乱,社员越来越不满意。特别是到了 1960 年春季,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粮食饥荒日益严重,食堂多以菜叶野草煮熟烧热让社员充饥,很多地方食堂大都揭不开锅,只好陆续停办。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引起的混乱现象,引起党中央的注意、毛泽东的觉察。从 1958 年 11 月起,中央召开 4 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两次中央全会,着手解决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问题。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着重提出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中共安徽省委分别于 1958 年 12 月下旬、1959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和六级干部会议,对中央《决议》进行贯彻部署。省委发出《关于做好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多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和分配问题做出规定,为纠正当时“左”的做法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省委在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出决定,全力整顿好人民公社。

池州各县县级干部和部分基层干部参加了省委召开的两次会议,根据省委的部署,从 1959 年开始整顿、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工作。各地组织干部学习中央《决议》和省委发出的几个文件,在生产上开始实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检查评比、达标验收的生产管理和责任制度。同时,各地还着手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各县人民公社开始实行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的体制,

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合理差别,生产小组也有了经营副业等部分经营权。各地还对人民公社以往平调生产队与社员个人的部分财产予以归还。通过以上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升,农村困难局面有所改观。

三、“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后果

195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运动,由于受党内“左”的思想影响,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盛行,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盲目蛮干,不仅造成严重不良后果,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政治上,“大跃进”运动使党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得以蔓延与发展,给党的威望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消极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取得的胜利,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认识不足,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情绪,在认识上出现主观主义的偏差,只看到所有制改造胜利后生产大发展的必要性,而对“一穷二白”国情家底实际困难估计不足;只强调政治上高速度发展的需要,而不从经济上分析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只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不考虑主观能动性必须同客观规律相结合,解放思想与尊重科学相结合,致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指导方针上产生严重错误。

在经济上,“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下降,经济效益低下。农业上,由于各行各业全力以赴大办钢铁,特别是要广大农民弃农炼铁,致使农村劳力不足,有些农活无人干。1958 年秋季,池州山区、丘陵因干旱歉收,而沿江圩区庄稼成熟后却无法及时收割,造成粮食减产。农副产品产量也逐年减少。据东至县[①]统计资料显示,1958 年至 1960 年 3 年粮食总产平均为 15561 万斤,比 1956 年、1957 年粮食总产分别减少 24.1%和 18.8%;棉花 3 年总产量平均为 34085 担,比 1956 年、1957 年棉花总产量分别减少 4.7%和 33.7%;油

①东流、至德县于 1958 年 11 月合并为东至县。

料3年总产平均为414万斤,比1956年、1957年油料总产量分别减少28.6%和27%。整个“二五”时期(1958—1962)农业生产总值递减4.4%。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一些大项目上马远超过财力、人力和物力及技术等方面的条件允许,不少工程半途而废,留下许多后遗症。工业上,一味强调大办钢铁,对纺织、食品、轻工等工业生产形成冲击,致使生活资料和副食品供应趋于紧张,甚至缺货断供,造成轻工业、农业与重工业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受到影响。为完成炼铁炼钢任务,各地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产品质量低甚至根本就不合格,经济效益低下,损失巨大。为炼铁炼钢,滥采乱伐矿产森林资源,使有些地方山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致使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且长期难以修复。

在生活上,“大跃进”运动中,地方领导的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肆意盛行,对农作物产量高估虚夸,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一平二调”。由于粮食产出数字严重虚假,致使征购任务过重,导致农村严重缺粮。如贵池县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1.95亿斤,而估产高达4.6亿斤,造成当年征购1.0077亿斤,为当年产量的一半还多,农民口粮因此大大减少。因高估产带来高征购任务完不成的地方,还大搞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反瞒产斗争,为此只好将国库仅存的粮食搬出来,甚至拿出种子粮来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不足,副产品、植物油与肉类也同样缺乏,人民生活困苦异常。加上当时农村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人民公社不再分配粮食给农民,这种“吃饭不要钱”的状况难以维持,公共食堂便从“人均月原粮一二十斤”降低到后来“瓜菜代”,再到无米可炊。致使春荒期间人民生活发生极度困难,不少地方农民因缺少必要的营养,出现的了低糖、低蛋白引发的水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很多地方出现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人口外流现象,其境况令人触目惊心。全区总人口在1959年到1961年间呈现负增长状态。如东至县1959年总人口比1958年减少1856人,下降0.69%。贵池县1961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7745人。为此,195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派人到贵池了解农村中饿病及非正常死亡问题。之后,贵池县委派出大批干部下乡调查水肿病,并在各公社设治疗点,调拨一定

数量的红糖、黄豆,为患者补充营养。

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在池州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沉痛一页。1961 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经济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大跃进”运动宣告结束。

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1959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绩时出现分歧,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致使会议的主题发生逆转,从纠“左”变成“反右倾”。随后便发动全党“反右倾”,纠“左”进程被迫终止,一些积极纠“左”的干部受到打击。特别是一些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无情打击,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使党内民主和党风遭到很大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给党造成了无穷的后患。随之,“左”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各地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压了下去。新一轮“大跃进”热潮再起,被初步遏制的“共产风”、浮夸风重新蔓延,1959 年春季,被解散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迅速恢复,“一平二调”之风再度抬头。农业生产又陷混乱,农民生活更加困难。

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池州各地采取措施贯彻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普遍取消了供给制,撤销了公共食堂,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平均主义问题,并开始着手“整风整社”。

第十一章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血吸虫病俗称“膨胀病”、“大肚子病”,是池州流行时间最长、区域范围最广、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地方病。池州所辖贵池、东流、至德、铜陵、青阳、石埭等县均有血吸虫病流行,其中贵池、东流、至德等县流行范围最广,危害程度尤烈。患血吸虫病人数占全省总数的四分之一。为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央血防办公室把贵池县列为全国 10 个血吸虫病流行重点县之一。因而,根治血吸虫病这一地方病成为全区上下共同努力的心愿。

第一节　血吸虫病的疫情与严重危害

池州疫区依据地形特点可分为以江、洲、湖滩为主的湖沼型流行区,以山丘为主的山丘型流行区,以河、沟、水田为主的水网型流行区。据 20 世纪 60 年代统计,全区有钉螺面积 1.9 亿平方米(约 29 万亩)。以贵池县居多,湖滩有螺面积 8195 万多平方米,其次是东至县,湖滩有螺面积 3753 万平方米。全区山丘型有螺面积为 3000 多万平方米,水网型有螺面积为 1000 万平方米。钉螺分布的密度一般地区每平方尺 600 只左右,最高达每平方尺 1000 只,山丘型钉螺分布的特点是沿河、沟、渠水系多呈点块线状分布,血吸虫病感染率与钉螺分布密度和人们下水频率密切相关,一般湖滩型流行区比山丘型流行区高。

在旧中国,血吸虫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瘟神”,严重危害人民的生产、生活。许多人因之丧失劳动能力、贫病交加,不少地方出现“寡妇村”、“罗汉村”、“无人村”。据史料记载,1927 年至 1931 年,贵池县因血吸虫病死亡 9000 余人,千幢房屋倒塌、万亩良田荒芜。1952 年,贵池县棠溪乡有 57 个育龄妇女因患血吸虫病丧失生育能力,251 个青壮年因患病不能下地劳动。该乡曹村的碾子下村原有 120 余户人家,到 1949 年只剩 1 户 4 人,其中 3 人还是血吸虫病患者。只有曹雨金一人因是理发匠平时很少下水劳动,才幸免于难。贵池县梅村乡汪家村百年前是百户鼎盛之村,因瘟疫所致,到 1949 年只剩下 20 人,其中 16 人为寡妇,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妇村”。贵池县解放乡白洋村的双河、中河、新河 3 个自然村,解放前有 118 户、522 人,到解放时只剩下姚国正 1 户 5 人。东至县在解放前 30 多年中,约有 1 万多人死于血吸虫病,毁灭村庄 120 个,荒芜田地 3 万余亩。其中建东乡江窑、甄窑两村,到 1949 年幸存的 31 户中有 18 户是寡妇。石埭县秋浦河畔的珂田乡珂田村,1910 年前后有 145 户、730 余人,到 1949 年死于血吸虫病者 500 多人,剩下 71 户、216 人中大都是妇女,且人人患有血吸虫病,其中晚期病人有 87 人。青阳县丁桥乡朱家村在百年前拥有 170 多户、700 多人,因水陆交通便捷,兴盛一时。但解放前因疫情蔓延只剩下 34 户、93 人,其中有 24 户还是外地迁入之户。疫区内悲惨凄凉场景正如毛泽东主席在《送瘟神二首》中所描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句话也高度概括了疫情流行区内历史的悲剧。

第二节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1955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九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国的血防工作。中央血防工作领导小组做出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相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规划,并把消灭血吸虫病列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1957 年 4 月 20 日,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提到:“安徽省贵池县棠溪乡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 120 户,现在只有曹雨金一户 4 口人,其中有 3 人仍患血吸虫病。”1955 年 3 月 24 日,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徽州、安庆、芜湖 3 个专区的 32 个县(市)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当作长期的经常任务来抓,确定宣城、歙县、贵池为血防重点县。全区各县人民,尤其是疫区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坚决打响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

一、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

池州地区各县于 1956 年先后成立以县委或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或分管领导负责的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机构,以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区、乡或重点流行区、乡也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协助开展工作。1956 年 9 月,中共石埭县委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县委五人血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57 年 4 月,调整五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全县防治工作。1955 年 5 月,贵池县成立血防委员会,由县长高燮明任主任、县有关单位 23 人组成;1956 年 1 月,中共贵池县委成立五人血防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为组长,下设血防办公室,配备 3 名干部。区、乡也相应成立血防委员会或血防领导小组,负责血防工作。1955 年,东至县成立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1956 年中共东至县委成立血防小组,王德锦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配备主任或副主任,并有专职秘书和办事人员,各区、乡也层层建立血防领导小组或血防小组,逐级负责,层层加强对全县血防工作领导与协调。1956 年 2 月,中共青阳县委血防五人领导小组成立,钱翎青任组长,同时成立青阳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由相关单位 13 人组成,下设办公室;木镇、城关、九华、陵阳等区也同时成立相应领导机构,负责全县和相关区域的防治工作。

二、建立血吸虫病防治站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

指示要求,全区各县迅速行动、采取措施,开展对疫区血吸虫病防疫工作和病人的医疗救治。先后成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区、乡血防中心组,收治病人。

1952 年 5 月,贵池县殷汇镇建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下设殷汇、高阳(今高坦)两个中心组,配有医疗人员 54 人、显微镜 4 台。1953 年 7 月,站址迁入县城,设医疗、护理、化验、药房及防治股,有病床 30 张,职工增至 67 人,可收治慢性早期血吸虫病人。之后,防治站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力量不断充实加强,到 20 世纪 60 年代,病床增至 150 张,医疗技术人员及职工 131 人,能收治早期和急性血吸虫病人和少数晚期及杂症病人。此外,还在池城、观前、乌沙、殷汇、梅街等镇、区设立了 5 个血防组,收治当地病人。

1953 年 5 月,东流县在县城建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有职工 5 人,次年增加到 22 人,病床 30 张。1956 年 4 月,至德县在山东医疗队的帮助下,在县城建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有职工 18 人、病床 20 张。1959 年两县合并时,血防站也合并设于东流镇。内设人事、防治股及住院站,有医疗人员及职工 110 人、病床 100 张,负责收治晚期及急性血吸虫病人。区、镇设有 12 个血防组,配有专职干部 112 人。之后,这支专业队伍不断扩大、技术力量不断加强,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专业人员发展到 190 多人,下设 7 个中心血防组、1 个机耕灭螺队,站内设防治、行政股及血防专科医院,医院能开展脾切除和脾腔、脾肾静脉吻合术等手术。

1956 年 3 月,青阳县以山东省赴皖救灾医疗队 30 多人为主体,在城关镇借用民房成立县血防站。1956 年下半年,由安庆专署卫生局拨款新建县血防站办公室、病房和宿舍。站内设有办公室、防治股、后勤股 3 个职能科室,下设 9 个血防组。

1953 年 3 月,石埭县在西门外交堰办旧祠堂内建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由副县长王典明兼任站长,设病床 30 张,有职工 256 人,因石埭县时属徽州地区,到 1955 年县血防站改属屯溪市血吸虫病防治所,下设龙岩、焦村、美溪、横渡中心血防组,站组病床增至 180 张,定编 53 人,之后不断增加医疗技术力量,负责山区血防工作。

三、开展查螺、灭螺的工作

血吸虫病防治的关键是控制传染源。人畜感染血吸虫病的祸根是钉螺。因此,消灭血吸虫病传染源是查螺灭螺。池州的钉螺面积占全省有螺面积的三分之一,在防治初期有 3.8 亿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三滩”(江滩、洲滩、湖滩)。“三滩”有螺面积占全市有螺面积的 83.9%,其中江滩占 15%、洲滩占 20.8%、湖滩占 48.1%,山丘面积占 16.1%。“三滩”水位时高时低难以控制,山区环境复杂,致使钉螺难查难灭,久灭不净。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全区各县每年组织春季查螺灭螺大会战,通过组织全体专业人员与发动人民群众相结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展查螺灭螺工作。灭螺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围垦滩地、土埋、开新沟填老沟、水田改旱地、火烧和药物灭螺等。灭螺的步骤是先近后远,先灭村庄附近人畜常到的、接触频繁易感染区域的钉螺;先上游后下游,沿水系和灌溉渠道灭螺,防止钉螺自上而下扩散;区域覆盖,按照钉螺分布单元,成片覆盖有螺区域。县、区根据本地钉螺分布特点与环境情况全面规划,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特别是 1958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吹响了全国血防工作的总动员号角,全国掀起消灭血吸虫病人民战争的高潮,“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是各地战天斗地送瘟神的真实写照。这一年,贵池县召开向血吸虫病进军的誓师大会,全县共发动 235 万人次,开展两次灭螺突击活动,灭螺面积达 4838.8 万平方米。青阳县组织灭螺大会战,一次投工 10.82 万个,共消灭有螺面积 17.2 万平方米,基本消灭有螺面积 494.3 万平方米,比原有螺面积下降 61.9%。1957 年至 1958 年,石埭县从流行区与非流行乡(镇)抽调 5410 人组织 10 个常年灭螺队,开展灭螺大会战,消灭钉螺面积 17.2 万平方米,基本消灭钉螺面积 494.3 万平方米,比原有螺面积下降 61.9%。

各地不断总结消灭钉螺经验,按照灭螺总体规划,运用科学方法因地施策,采取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环境综合治理防治血吸虫病措施,如修建区内大型水利工程,如全面推行改水改厕、以机代牛、封洲

禁牧等控制措施,而对阳性螺环境、人畜常到地方和内陆山区仍用药物灭螺和小环境改造办法灭螺,效果十分明显。

第三节　兴建围垦灭螺的水利综合治理工程

一、东南湖围垦灭螺与水利综合治理工程

东南湖位于贵池县城南部,三面环山、北邻长江,全湖面积 38.8 平方公里。湖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由于无防洪堤坝设施,每年汛期内有白洋河山洪侵入、外有江水倒灌托顶,形成一片汪洋。加上上游泥沙流入,河道淤塞,致使湖床逐渐抬高,杂草丛生、钉螺密布,十里平湖成为血吸虫滋生的病源区。

据 1956 年血防部门调查,湖内有螺面积 4.5 万亩,占全湖面积 77.3%。1959 年,中国科学院再次对湖区调查,发现湖内最密处每平方尺有 29 个活钉螺。1964 年冬季,县里为围垦规划勘察时,发现湖内有钉螺达每平方尺 440 多个,阳性率为 35.9%,居民驻点阳性率达 53%,比 1959 年扩大 15 倍。沿湖一带农民因生产、生活接触湖水大批感染血吸虫病,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感染也日益增多,急性患病死亡率不断升高。经对里山公社联盟大队徐家墩调查,解放前这里原有 12 户人家 96 口人,患血吸虫病死亡的就有 73 人。东南湖血吸虫病的严重流行,不仅致当地人畜大量死亡、耕地抛荒,也使周边乡村随湖田地近万亩无法耕种,遇上洪涝灾害更是颗粒无收。

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日益严重的血吸虫病的危害,县委、县政府经长期酝酿勘察,并报上级批准,决心实施东南湖围垦灭螺兼顾治水的综合治理重大工程,从源头切断病源,同时造就数万亩良田,使百姓摆脱病魔的侵扰,安居乐业。

这项工程的总体规划设计是:杏花村切岗,让白洋河改道与秋浦河汇合,经池口入江。新建下清溪江堤、白沙湖堤和白洋河堤,围成一个东南湖圩。防洪标准按二十年一遇洪水设计,计划工程土方 381.5 万立方米、石方 8740 立方米、混凝土 1320 立方米。全部工程计划 3 年完工,5 年配套。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整个工程历时 10 年才得

以完工。

1965 年,县委、县政府成立东南湖围垦灭螺工程指挥部,宣布这项重大工程正式打响。整个工程分 3 期。1965 年冬至 1967 年春实施的第一期工程为主体工程。包括以下 7 项工程:一是杏花村切岗,这是整个东南湖围垦关键工程,全长 2555.5 米(包括上下游引河),其中切岗断长 932 米,最大切深 15 米,新开河底宽 70 米,土质一般在 6 级以上,开挖施工难度大;二是兴建下清溪江堤,从池口到下清溪堤长 2950 米,堤顶高程 19.3 米、顶宽 6 米,工程主要靠民工肩挑手挖,当年组织民工 3740 人,完成土方 26.2 万立方米;三是兴建云子畈白洋河堤,由东山嘴至老河口,堤长 2750 米,该工程当年上堤民工 1810 人,完成土方 12.6 万立方米;四是新建杏花村大桥,由省交通厅设计为 7 孔圬工拱桥,单孔宽 20 米,载荷汽拖 60 吨,桥长 161.9 米、全宽 10 米,于 1966 年年底建成通车;五是兴建白沙湖堤,堤长 4030 米、顶宽 3 米,堤顶高程 14.5 米,外坡 1∶3,内坡 1∶2.5,南段 2000 米堤外坡用块石护坡,内有 8 米平台,工程土方 27 万立方米;六是退建民生圩,由于白洋河改道经秋浦河入江,为不影响秋浦河泄洪,须退建民生圩堤,退建堤长 1500 米,土方 27.3 万立方米;七是建下清溪闸,设计为 5 孔拱涵,单孔净宽 3 米、高 3 米,其中 3 孔排白沙湖水、2 孔排东湖水,闸基坚实耐久。第一期工程总共动用民工 20225 人。

随着东南湖灭螺围垦工程主体工程相继开工,作为配套工程的第二、三期工程也陆续开工。二期工程含兴建下清溪排灌站、加高齐山大埂;三期工程包括兴修白洋河堤与杏花村闸、电力排灌站。这些系统配套工程,分年投资、分期实施,基本如期完工。

东南湖围垦灭螺与水利综合系统工程,是贵池历史上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共有大小项目 28 项,历时 10 年,总投资 746.9 万元,是国家与地方共同出资、群众投工投劳完成的。工程先后组织民工 70225 人,完成土方 525.8 万立方米、石方 1.82 万立方米。工程的胜利完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一,确保了城区汛期安全和扩大了耕地的稳产增产。东南湖圩是维系池州市区汛期安全的圩口,它的成功建成确保了池州城区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居民及周边

乡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 318 国道线的畅通;也使区域内 5.5 万亩耕地稳产增产。第二,取得了围垦灭螺的显著成效。工程竣工后,由于有条件坚持反复采用药物灭螺,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扩大巩固了灭螺的效果。通过努力查螺灭螺,湖区内有螺面积大幅减少,钉螺密度和粪检阳性率明显下降,基本控制了急性和新感染病人,血吸虫病危害大为减轻,达到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目的。

二、七里湖围垦灭螺与水利综合治理工程

东至县七里湖区过去是一个水患频仍、杂草丛生、钉螺密布的血吸虫病疫源区。区内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洪涝灾害多发。据统计,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成灾面积达 22.6 万亩,平均每年有 25% 的耕地受灾。1949 年、1954 年长江水位分别达到 18.52 米、19.9 米时,江河圩堤全部溃破,受灾面积分别为 2.2 万亩、4 万亩。县城尧渡街上水深 2—3 米,且持续被淹近 4 个月,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中断,直接影响广大居民生产经营与日常生活。

20 世纪 60 年代初,区内有螺面积约 3200 万平方米,占全县有螺面积的 40%,且钉螺密度高,每平方尺高达 150 只,一般均在 105 只以上。人口感染率达 70%。当时,这一区域近 5 万人口中就有 15100 多人感染血吸虫病,其中晚期病人约 500 人,耕牛也有 2220 多头染病,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面对这样一个洪涝灾害频发的血吸虫病病源滋生地区,东至县委、县政府决心动员全县力量,组织治涝灭螺大会战。先后于 1960 年、1966 年、1974 年多次组织人员进行勘察、规划、设计,经反复研究提出综合治理方案。1974 年,省革委会批准了尧渡河中下游防洪围垦灭螺规划。当年县里即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的尧渡河中下游防洪围垦灭螺指挥部,这项综合治理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整个工程按地形、水系特点分 3 片组织实施:第一片七里湖区 81 平方公里围垦灭螺,第二片 13.2 平方公里重点以治洪为主,第三片香隅河 43.1 平方公里以治理洪涝灾害与围垦灭螺相结合。主体工程有河流改道、切岗开河、穿湖挖河筑堤、开挖撇洪沟和公路改线、兴建干

线桥梁等,配套工程有兴建涵闸、排灌站与输变电设施等。涉及单项工程有香隅河等 3 条河流改道;汪公包、板壁章、顺风嘴、东流、荣叶山、红岭、梅山、韩家山、佛宝山、乌石矶等 10 处山岭切岗开河、穿湖筑堤修河,3 处公路改线,3 处开挖洪沟;兴建东流节制闸、船闸和七里湖、老虎岗、赤头排灌站及输变电所,尧渡、孔岭、乌石叽干线公路桥梁等枢纽工程建设等。

七里湖区防洪围垦灭螺综合治理工程,是东至县水利工程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取得综合效益最好的一项工程。经过全县上下同心协力,20 万民工奋战 3 个春秋,基本上实现了送走“瘟神”、防洪保收的奋斗目标。全部工程国家投资 1272.9 万元,东至县投工 2000 多万个,完成土方 1467.5 万立方米、石方 68.91 万立方米、混凝土 3.73 万立方米,劈岗开河 37.4 公里,建造大小涵闸 16 座、桥梁 16 座以及涵洞枢纽建筑工程 100 处,新垦农田 5 万亩,扩大防汛保收面积 9 万亩,新增排涝面积 6.65 万亩,消灭有螺面积 2850 平方米,建成的七里湖区成为东至县粮、油、棉稳产高产基地。昔日的十年九灾疫情蔓延的钉螺窝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第四节　查治血吸虫病

查治血吸虫病是综合性防治措施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关心民众疾苦,减轻病人疾患,恢复人民身体健康和劳动能力,支援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为切断传染源,控制血吸虫病传播的需要。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查病、确诊血吸虫病人,均以病源诊断为主,而各种免疫试验只作为综合查病的辅助诊断和考核防治效果的参考。防治工作初期,主要以粪便检查为主。检查的方法有涂片、镜检虫卵和沉淀加孵化,采取“三送三检”或“一送三检”,对少数无治疗史而多次粪检找不到虫卵、免疫诊断不能确定仍疑有血吸虫病的人,则采取直肠活组织检查法。到 60 年代,各县血防站先后开展皮内反应、环卵试验和尾蚴膜试验,但仍以粪检沉淀、孵化法为主,免疫诊断为辅。之后,经科学研究,检查方法不断改进,采取血清学方法和病原学方法查诊,对不同类

型疫区、不同人群提出不同频次的查病要求,能更加及时、准确地诊断患病人群。据全区统计,在 1969 年之前实有血吸虫病人 10 万多,其中晚期病人 566 人。

20 世纪 50 年代初,对血吸虫病的治疗主要采用酒石酸锑钾(锑钾)长程治疗方法为主,其疗效在 70%左右。不久,采用锑钾短程疗法(3 天或 7 天疗程)。到 60 年代中期,该疗法因安全和疗效不理想而基本停用。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患者的痛苦,不断加大科学攻关,推出医疗新药,60 年代初,呋喃丙胺新药问世,贵池县使用该药治疗急性血吸虫病,证实有特异性退热作用,有效率达 89%,较少引起严重反应。60 年代中期,新药血防 846 问世,东至县在东流镇菊江、大渡口开展治疗试点,用该药治疗 6094 人,占治疗总人数的 74%。

对晚期血吸虫病人的治疗,主要是针对并发症和杂症,施以病源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临床症状以巨脾型常见,约占 70%,而住院治疗的以腹水型病人较多。对其治疗主要是消灭病源,改善肝细胞功能、降低门脉压力,消除症状,恢复体质。根据病情,采取中西医结合、内外科结合、症状治疗和杀虫治疗结合等多种疗法,疗效显著。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各地采取以中医为主,后发展为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晚期血吸虫病人,并施以外科治疗。贵池、东至等县吸收多名老中医参加治疗救助工作,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1957 年,东至县在重点流行区组织 5 个联合诊所的老中医突击治疗晚期血吸虫病人 11996 人,其中中医中药治疗 591 人。贵池县血防站中医组采用中药半边莲、三甲消痞丸治疗晚期血吸虫病人,后采用“先补后攻、攻补兼施”的中医疗法治疗病人,为此,安庆专署还派人参与该法治疗的临床实践与研究。1959 年 10 月,贵池县医院实施首例脾切除手术成功。青阳县在解放军医疗队的帮助下,充分发挥中草药的作用,采取土法上马,自制肝抗原、热藏肝肾、胎盘等组织液,疗效较好,迅速在全区推广。随着新药不断推出,医疗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医疗技术不断改进创新,全区的患者都得到及时救治和程度不同的康复。

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全区各县广大干群和医护工作者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池州作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患病人数

逐年减少,多数乡村血吸虫病已经根除。祸害一方百姓,使无数家破人亡的“瘟神”,在人民群众燃起纸船明烛中灰飞烟灭。过去疫情最严重、被称为“寡妇村”、“光汉村”的贵池县棠溪乡曹村、梅村乡汪家村,石台县珂田乡珂田村,东至县建东乡江窑村等,都变为“幸福村”、“小康村”。

第十二章

落实党的全面调整政策

党中央为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标志党在这个历史阶段工作指导方针的转变。池州各地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贯彻落实中央实施全面调整的重大决策,着手整风整社,纠正“五风”,开展“责任田”的试点与推行,对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也采取有力举措,为克服经济困难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取得明显成效。

第一节　整风整社,纠正“五风”

整风整社是农业和农村工作调整的重点,农村的政策调整首先从纠正“五风”开始。1960 年 10 月,中央《紧急指示信》郑重地、系统地提出“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任务,其核心就是要求全党必须用最大努力来纠正“共产风”。安徽省委及时做出部署,迅速开展了以纠正“五风”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

省委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规定》中,明确了整风整社的内容、时间、方法,步骤,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加强政策观念,改进

工作作风,纯洁干部队伍,健全公社管理制度,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性。

为推动整风整社运动的顺利进行,各地普遍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和四级干部会议,县委领导首先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各级党委纷纷组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讲《紧急指示信》,帮助基层干部纠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五风"错误。贵池、东至、青阳县委动员各级领导和干部深入农村,和基层干部群众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形势而努力。1961 年年初,各县委还从县直机关抽调了一批政治可靠、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东至县委抽调 18 名与家乡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机关干部,于 1961 年 1 月 13 日至 16 日,深入全县 9 个公社、17 个大队的 20 个食堂进行暗访,了解群众的疾苦与干部作风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在 1 月至 9 月召开 4 次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帮助县委纠正"五风"。在 11 月的会议上,就收到与会同志提出的各种意见 5000 余条,其中"共产风"1405 条、浮夸风 1477 条、命令风 643 条、特殊化风 579 条、生产瞎指挥风 1350 条。贵池县委分别召开了多次四级干部会和扩干会,对涉及的"五风"问题提出了强烈批评。青阳县揭发出来的"五风"问题涉及干部 900 多人。

1961 年 1 月中旬,省委召开了整风整社汇报会,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和教训,对后一阶段整风整社中需解决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揭盖子;对所有干部进行排队;坚决退赔"一平二调"的财物;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队"(即问题严重的落后社队)、兼顾全面等。

池州各县十分重视整顿"三类社队"工作。"三类社队"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内部肃反不彻底,社会镇反不彻底,反革命复辟势力在残害人民";二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五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三类社队"整风整社的做法是把领导权夺过来。2 月,东至县共抽调 940 多名干部进驻"三类社队"和边缘地区开展整风整社。在"三类社队"和小队中分别建立社员代表委员会、社员代表小组,夺回党、政、兵、生产、吃饭"五权",清理"一平二

调”的账目,坚决退赔平调财物;整顿党、团组织和干部队伍,选配干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制订生产计划,落实“四固定”、“四包”(包产、包公、包费用、包统购)工作,实行超产奖励的办法。各地在整风整社中,对一、二类社队重点揭发批判“五风”错误,一般依靠原有组织开展工作,但对个别错误严重,甚至是坏人掌权的社队,也采取“夺回领导权”的办法。

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通过对“三类社队”的分类施策,“五风”问题基本得到纠正。但群众对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退赔工作仍有不少意见。对此,各级领导十分重视,认为开展退赔是整风整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平息群众情绪、取信于民的重要举措。省委领导明确指示要下狠心坚决退赔,要倾家荡产做好群众的退赔工作。之后退赔工作在全省广泛开展,各地成立退赔委员会,制定了相关政策。本着“谁平调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就退赔给哪里的原则”,以实物退赔为主,确无实物退赔者,进行折价退赔。据统计,贵池县 1961 年 8 月前即退赔平调款 388.9 万元,占全县清算的总平调款的 82.24%。东至县在 1961 年 10 月前就对全县平调的 400 多万元财物退赔了 96.3%。其他县也采取有力措施狠抓了退赔工作。退赔工作让干部认识到刮“共产风”的危害,也让群众恢复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于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

1961 年 3 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对克服“五风”、退赔、自留地、社队规模、食堂等问题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池州各地结合整风整社,深入宣传贯彻“农业六十条”,普遍取消了供给制,撤销了公共食堂,各地实行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内部及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与社员家庭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也是广大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规模过大既给组织生产带来不便,也容易在分配上产生平均主义,影响生产发展。从 1961 年到 1962 年,各地调整了人民公社规模。东至县将 10 个公社、216 个大队、941 个生产队重划为 52 个公社、380 个大队、2873 个生产队。这期间,各地还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如贵

池县以耕地面积的5%~10%划给社员做自留地。与此同时,对“大跃进”制定的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也不再继续维持,生产基建规模下调,特别是对粮食收购过高、调出过头进行压缩,有力地遏制了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各地借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部署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以整风整社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首要解决吃饭问题。总之,整风整社使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党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改善了干群关系,遏制了农村“五风”的蔓延。但由于对形势认识不足及方法过“左”,整风整社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如退赔不彻底、社队内部的平均主义仍很严重等,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

第二节　农村“责任田”的试点、推行与改正

一、“责任田”试行的背景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人民处在饥荒边缘,促使省委寻求解决渡过难关的有效途径与办法。高级社时期,省里对芜湖、阜阳等地实行包工包产(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推动生产发展的经验进行过总结,对工业生产中按件计酬(实行必要的责任制)、超产奖励的办法进行了研究,同时对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发展农业生产的资料进行了分析。综合以上的经验和做法,使省委意识到,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温饱问题迫在眉睫,而做法必须改弦易辙,实行必要的责任制。没有责任制,生产难以搞上去。

1961年2月6日,省委在蚌埠召开部分农村负责人会议,总结通报了宿县褚兰公社光华大队60多岁农民刘庆兰开展生产自救的经验。经济困难促使农民群众寻找自救途径,刘庆兰不满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带着儿子跑到附近山里开荒种地,从1958年到1961年,共开荒52亩,收获粮食10584斤,另外还有棉花60多斤、芝麻17斤及蔬菜,共交给社队粮食4616斤。而附近一个有210人、80

个劳力的生产队,种地 500 亩,一年上交 2100 斤的粮食任务都不能完成。相比之下,形成极大反差。当地农民纷纷要求仿照刘庆兰父子包田耕种。省委主要领导肯定刘庆兰包产到户的做法值得推广。

接着,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会议研究决定推行适合全省农村生产力状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正式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责任制。不久,全椒县占河镇几位老农向前来调研的华东局主要领导要求包田耕种。全省的经济形势、刘庆兰的事迹和全椒县几位农民的强烈愿望,促使省委下决心探索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先在小范围试点。

二、“责任田”的试点

1961 年 2 月,省委选定在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冈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田”的试点。包产责任制方案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当年,全队粮食由原来的 8.7 万斤增加到 10.7 万斤,增长了 23%。1961 年 3 月 6 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南新庄试点经验,决定扩大“责任田”试点范围,并以省委名义下发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的文件和推行“责任田”的一封信。

池州农村同全省各地一样,自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五风”严重泛滥,人民公社集中经营、集中管理、统一分配的制度,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挫伤了农民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信心,导致全区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济出现罕见的困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出现饿、病、逃、荒、死现象。省委推行“责任田”的文件和一封信传达后,很快得到池州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与赞成。3 月上旬,贵池县召开了县委常委和各公社书记碰头会,传达了县委第一书记在合肥开会期间电话传达的省委推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会议精神,研究了试行“责任田”的步骤、方法。按照会议的布置,各公社书记立即回社召开一个有代表性的座谈会,于次日向县委汇报座谈会情况,会上反应热烈,大家积极支持。在此基础上,县委决定在池州公社的杏村大队、马衙公社的马衙大队、丁香公社的柏山大队(今属石

台县）、殷汇公社的七一大队、乌沙公社的乌沙大队试点。3月1日至12日，又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了省委关于推行“责任田”的文件和一封信，强调了推行“责任田”的必要性。会后，试点工作迅速推开。东至县委也选择了在金塔、香山、合阜、河东、茅林、新建、樟树、木塔、北城、花园等28个大队进行“责任田”的试点工作。3月上旬，青阳县也选择部分大队进行试点，并认真总结经验，以备全面推广。

三、“责任田”的推广与改正

1961年6月25日至7月19日，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反思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左”整风，同时总结试行“责任田”的经验，讨论进一步完善“责任田”的办法。会议形成了《关于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认为这个办法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符合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农业生产的特点。会议期间的7月8日，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赴南方视察到达蚌埠的毛泽东详细汇报推行“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听后表示：“如果责任田确实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随后，省委向出席三干会议的地（市）委、县委书记传达了毛泽东“可以普遍推广责任田的指示，并进行了具体部署”，从此，“责任田”在全省普遍推广。池州各地推广“责任田”的速度迅速加快。青阳县在全县141个大队、1170个生产队全面推开。到4月上旬，贵池县3081个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99%。到11月3日，东至县有98.1%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

1962年2月3日，省委召开各地委、市委、县委负责人电话会议，肯定“责任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增加了粮食总产量”，提出凡是已经实行“责任田”的地方，应当在抓好“五统一”的前提下继续推行。各县根据省委指示，分别召开了全委扩大会、三级干部会，进一步强调在推广“责任田”的过程中要执行“生产计划统一、分配统一、用水统一、抗灾统一、不便分散的农活统一”的“五统一”。从总体上说，推广“责任田”合乎民心，绝大多数群众看到“责任田”带来大幅增产、明显

改善自己的生活,支持拥护这个办法,要求继续搞下去。但也有少数人态度不积极,甚至持反对意见,这部分人大都是因为家中缺少强劳动力,或是对农活不精通,担心“做事要请人,吃不到‘超产粮’”;此外,也有极个别懒汉反对。干部中大体存在赞成、反对或认为可作权宜之计的3种态度。持赞成态度的人认为,“责任田”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增产粮食,应该肯定。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责任田”把一家一户变成生产单位,违背了农业集体化方向和共同富裕的要求,易于出现农村两极分化,是“后退”、“走单干的回头路”,靠这种办法刺激农民干劲,只会拉大贫富差距,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根本矛盾,因此,他们谨小慎微、缩手缩脚。视作权宜之计的人认为,“责任田”虽然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增产,但同时会滋长社员的私有观念,扩大贫富差距,影响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从而削弱社会主义因素,只能作为摆脱当前生产生活困境的临时举措,待农村形势好转后,应该停止执行,而不能做长久之计。由此可见,“责任田”从试点到推行,在干群中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分歧,焦点是“责任田”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实质是人民公社与“责任田”在体制上的尖锐对立。

针对上述的纷争,池州各级党组织根据省委的意见加以引导,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多次强调这个办法是和“农业六十条”所说的实行严格的责任制是完全一致的,不要误解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强调要贯彻好“五统一”,防止走样子。同时有计划地保留部分社队不实行“责任田”,明确要求对不实行“责任田”的社队不要批评指责、不要勉强。由此可见,池州实行“责任田”的办法,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比较艰难复杂的环境下推行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700人参加的扩大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期间和会后,安徽大组会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对安徽省委特别是主要领导曾希圣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盖子与严肃批评,同时把“责任田”定为犯有方向性的错误。调整后

新组建的省委在3月上旬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3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从3月底开始,池州各县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本着积极谨慎的方针,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责任田”的改正工作。在改正“责任田”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此持有不同态度,一种认为“责任田适应当前生产力水平、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粮食增产,利国利民,不能全盘否定”,有人甚至说“要‘改正’责任田,就给中央写信”;另一种虽然对改正“责任田”做法不赞成,但“认为这是大势所趋,非改不可,只有顺从上面办”;还有一种表现主要是干部思想上左右为难,行动上进退不是。从面上看,由于“责任田”深得人心,所以改正工作进展缓慢。

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安徽的“责任田”被当作“单干风”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点批判。10月,省委决定加快改正“责任田”的步伐。不久,省委举办3万余名区、社干部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由此,池州各县县委也分别召开了各种会议,举办多次训练班,加快改正“责任田”工作。东至县委于11月底召开了四级干部会,会议主题是“巩固集体经济,‘改正’责任田”。接着,又举办训练班,培训生产队以上干部7276人、其他人员4775人,并从区、社抽出大批干部深入生产队做工作。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63年年底,东至县有2465个生产队改正了“责任田”。与此同时,贵池县也有3359个生产队改正了“责任田”,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99.8%。青阳县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也基本上改正过来。

四、“责任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同全省各地一样,池州推广“责任田”虽只经历3年风风雨雨的短暂历程,但仍显示了它不可扼杀的生命力,其发挥的历史作用与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一是实行“责任田”迅速扭转了池州农村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池州农村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及其灾

难性的后果,令人感到前景黯淡难以逆转。人们甚至悲观地认为“农村元气大伤,农村经济恢复将是遥遥无期”。然而,“责任田”的出现,使池州农村面貌迅速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干部情绪高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土地抛荒现象很快消失,田边地头的庄稼都生长旺盛,农村处处呈现一派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景象。1961 年即改变了前几年粮食急剧减产情况。1962 年、1963 年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以东至县为例,1962 年在遭受水灾的情况下,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 16452 万斤,比 1961 年增产 21.5%;1963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19625 万斤、油料总产 483 万斤、棉花总产 58677 担,分别比 1962 年增产 19.3%、45.5%、134.4%。1962 年至 1963 年,池州各县粮、油、棉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大牲畜、生猪、家禽也有了成倍的增长。粮食除了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农民人均口粮由过去两三百斤增加到六七百斤,有的地方达到八九百斤,户均养猪一头,还有家禽鸡鸭等,多数生产队还有储备粮,农村经济很快好转,农民生活明显改善。饿、病、逃、荒现象基本根绝。因此,广大农民由衷地称“责任田”为“救命田”。农村的经济发展,也使城镇居民生活随之改善,从 1962 年冬开始,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予以提高,城乡市场开始活跃。由此可见,“责任田”确实起到改变当时农村经济困境乃至扭转全区整个经济形势的重大历史作用。

二是“责任田”实践是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探索。实际上“责任田”是在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把农民的物质利益直接与集体生产结合起来,从而既发挥了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又巩固发展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如 1961 年 3 月贵池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报告中所说,“责任田是在集体领导下实行个人负责,用集体包产去实行责任到人,让大家都为集体负责,是在原来‘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点”。因为实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并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同时可以更好地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贵池县殷汇公社七一大队对“责任田”总结出“七多”、“三高”、“两少”,概括了当时实行“责任田”的优越性,很能说明问题。

“七多”即增产门路多、动脑筋想办法的人多、出勤的人多、家庭副业多、修理和添置小农具的人多、家肥用到集体田地多、外流人口回归的多;“三高”即工效高、工作质量高、干劲高;“两少”即农具丢失的少、损耗少,人们窝工、混工的少。各地实践证明,“责任田”既不同于土地改革完成后单纯农村个人单干发展经济的道路,又不同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发展经济的道路,而是一种新型的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它是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一个创新。

三是“责任田”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先期成功的尝试。尽管“责任田”在当时“左”倾思想占支配地位时被迫取消,使这一尝试很快夭折,但是由于它广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更重要的是适合当时中国农村以畜牧耕种、手工操作为主的生产力状况,虽屡遭禁止,但一有机会又重新出现,如压在磐石下的竹笋,顽强地向世人展现其生机,这是一种带有体制机制的创新。因而在全国不少农村地区仿效安徽的做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甚至不少地方在极左的高压下仍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也说明“责任田”的成效与影响植根于中国的农村大地与广大农民心中,这也是为什么20年后农村经济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于安徽而迅速在全国推广的最好诠释,正是由于当年实行的“责任田”为之后轰动全国的农村改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

第三节　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

1957年至1961年,在党内外的历次运动中,有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政治上一系列的批判斗争造成党内关系紧张和党群关系的严重不正常。

为理顺党员干部的情绪,更广泛地调动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而奋斗,中共中央在反思和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对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消极影响重新审视和实行经济调整的同时,开始下决心调整党内外的政治关系。1961

年5月至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安徽省委于7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做好甄别平反工作的会议精神,总结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9月8日,省委批准省委组织部和省委监委提出的《关于认真做好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明确甄别范围一般是1957年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全省各地根据省委的要求开始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由于一些人认识不清,这一阶段的甄别平反工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甄别平反工作进展缓慢。

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省委立即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并在6月18日召开的地委、市委监委书记会议上,进一步研究部署甄别平反工作。

池州各级党组织为贯彻中央文件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平反。这项工作从1961年6月份开始,但由于各地部分人思想认识不一致,工作进展不平衡。直到中共中央1962年10月下发《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后,甄别平反工作才引起各地的重视。通过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清甄别工作的目的是弄清是非、增强团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进一步发扬党内外民主,造成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认识统一以后,甄别平反工作在各地迅速全面推开。各县县委都设立了甄别平反办公室。1962年3月,安庆地委宣布:为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贵池县县长高燮明、1959年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共贵池县委副书记徐世达平反,并恢复两人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待遇。到1963年年底,贵池县甄别结案22237人,占应甄别总数

的99.83%。各县按照中央通知精神,“来个一揽子解决”,即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一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一般不留“尾巴”。到1963年5月,东至县对1957年以来受批判和处分的6800多名干部和群众,本着“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甄别。青阳县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7238名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其中全部平反和部分平反的占处分的84.4%。各县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全部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对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群众也给予了纠正。各级党委向被错误批判、处分的人员道歉,做自我批评。甄别工作消除了“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有效地调整了党内政治关系、党与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群众的关系。

二是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摘掉切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上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为贯彻中央的决定,安徽省委成立了摘右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必须具备的3条标准,在经过原单位群众评议,党委审查后上报审批。先后分批摘掉一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帽子,特别是在1960年9月全国第一次改造右派工作会议之后,各地加大了对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工作的力度,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平反工作。尽管摘去帽子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并未从根本上澄清是非、解决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环境。

第四节　继续调整农村经济政策

1962年以后,在各方面初步调整的基础上,池州各县按照省委发出的《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继续贯彻中央关于调整的精神,着手加强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围绕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着力在加大支农惠农力度,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

条件,进一步巩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方面下功夫。

一、压缩工业基本建设规模

围绕农业的调整,工业也进行了调整。要求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加强农业发展。放缓重工业的生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增加轻工业的生产,尽可能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确保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按比例协调发展。池州对一些厂(场)矿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同时大力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充实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大炼钢铁、大办工业,造成了城镇人口急剧增长,相应的城镇口粮供应压力增大,超出农业的负担,也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按照中央下决心压缩城市人口的部署,从 1961 年起,根据省委下达的任务,全区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几万人,重点是把来自农村尤其是 1958 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精减回乡,以加强农业第一线。当年,贵池、东至县精减下放人员分别为 5212 人、6812 人。到 1962 年,贵池又精减职工 1970 人,占全县职工总数 22%。各地的社队企业也精减了一批职工。采取这些应急措施,使 80%的劳动力投入农业,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村劳动力尽可能地归农、归田,这对恢复农村生产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也减小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压缩了社会购买力、缓和了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应当肯定,广大干部、职工、居民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顾全大局、服从安排,为共渡难关做出了无私奉献。

二、增加对农业的投资

财政部门通过加强对财政资金统一管理,在合理使用国家资金、控制财政支出、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前提下,通过坚决压缩行政事业经费(按照中央要求一般压缩 20%~30%),支援农业和农村穷社、穷队,改善生产条件;减少社会集团购买力,停建楼堂馆所、停购非生产性设备;要求银行增加对农业的信贷,发放长期无息贷款,用以购买小型排灌机械、农具、耕畜、种子和修建水库。大力缩短缩小农村

基建战线和规模,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到重点水利工程上,如贵池县双丰圩与黄湓闸等一批水利重点工程,都是这时期兴建起来的。

三、组织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根据省委继续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的要求,池州各行各业在制定年度计划和工作任务时,都坚持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发展放在第一位,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商业、供销体系。1962 年春耕时节,物资部门召开物资交流会,把急需的物质调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支援春耕大生产。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系统安排当年的工作时,把为农业生产提供大批所需的生产资料确定为工作重点。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加大了对农业生产化肥与电力的供应。1963 年之后,全区各行各业为农业提供的主要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排灌动力机械、水利启闭机械等,都比上一年有很大的增加,有效地提高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

四、整顿社队,巩固集体经济

由于推行“责任田”被错误地认为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责任田”被迫取消。因而,农村的生产关系出现混乱,集体经济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从 1963 年开始,省委、省人委提出各地要认真贯彻“农业六十条”,大力整顿社队,理顺农村的生产关系,着重抓了 5 个方面工作:一是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坚持少扣多分,做好收益分配工作;二是积极推行各种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合理组织和使用劳动力,逐步制定各种定额,认真改进评工计分方法;三是培训会计人员,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四是在保证完成农业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集体副业,增加生产队和社员收入;五是按期民主选举队委会,把那些成分好、劳动好、农业生产经验丰富、遇事同群众商量、办事公道的人选为生产队干部,切实树立老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上述措施的落实,对于稳定、加强社队领导,改善社队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五、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成效

调整农村经济政策，保证了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相应地减少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增加对农业物资、技术的支持，一些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优良品种的推广、兴修的水利工程相继发挥效益，较大地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加上当时农村开展“比、学、赶、帮、超”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池州社会经济很快地扭转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倒退、停滞局面，使 1961 年至 1965 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

首先是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随着粮食品种不断优化，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均有大幅提升，从 1962 年到 1965 年，4 年平均递增 10%左右，这不仅起到了稳定人心、粮食足天下安的效果，也带动了其他农副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其次是农业总产值不断增长。这 4 年是经济政策调整的特殊时期，对发展农业的政策倾斜，使农业得到优先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池州农村经济发展最快时期。不仅稳住了国民经济基础，也能基本满足工业结构调整后城市轻工、食品加工企业对原料的需求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缓解了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局面，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三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粮食稳步增长，也带动了农村畜牧业和经济作物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大跃进”时期相比，农民不仅吃粮有所保证，副业收入也有所增加，生活状况大为改善，社会呈现祥和安宁的景象。

第五节　中共池州地委重新建立

1965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池州专区，辖贵池、青阳、铜陵、东至 4 县，池州专署机关设在贵池县。7 月 19 日，国务院第一百五十七次会议批准设立安徽省石台县，归属池州专区。

根据省委的决定，7 月，中共池州地方委员会重新建立，直属安徽省委领导，7 月 16 日在贵池县池州镇正式开始办公，同时启用省委颁

发的“中国共产党池州地方委员会”印章。8月1日,省委下达了经省委常委会第一百七十七次会议批准的地委组成人员的通知。胡坦任代理书记(11月起任书记),康兆郁、方振华任副书记,委员有胡坦、张伟群、方振华、康兆郁、丁仁一、陈光泽、石坚、周殿荣、谢永胜。

地委建立时,即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省委监委驻地委监察组、工业交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直属机关党委等,配备了主要负责干部。之后,又陆续增设了党校等部门。同时,还设立了一些临时机构,如地委人民武装委员会;9月以后设立了保密委员会、血防领导小组、无线电台管理领导小组;1966年2月以后设立了半农半读教育领导小组、科学技术委员会等。

1965年7月,池州专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池州分院相继成立。与此同时设立了行政、军事系统党组织。8月,设立池州专员公署党组,中共池州地委领导专员公署党的工作。专员公署党组书记方振华,副书记丁仁一、谢光辉,成员有郭鉴、潘洛、盖云月、韩鸣宇、方涵、马维一、张受益等。

8月,第二次组建池州军分区。经安徽省军区党委批准,组织池州军分区临时党委。谢永胜任书记,林少武任副书记,常委有王至诚、郭长深、查捷等。1966年3月14日至17日,池州军分区在池州镇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经大会选举并经安徽省军区党委批准,成立了池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胡坦,第二书记谢永胜,副书记林少武,常委王至诚、郭长深、查捷。

中共池州地委下辖贵池县委(书记张成钧)、东至县委(书记赵新民)、青阳县委(书记王克东)、石台县[①]委(副书记王春芳主持工作)、铜陵县委(书记宋毓秀)。

中共池州地委成立后,根据池州的特点,努力抓生产和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规定,认真贯彻省委二届五次

①石埭县于1959年4月被撤销。1965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石台县。

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近千人组成的“四清”工作团(含省委机关、军队系统抽调的人员),深入基层组织开展了“四清”运动,按照省委1965年12月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的要求,分批分期对全区党组织、党员普遍进行一次登记。到1965年年底,全区基层党支部由1949年的107个发展到1620个;党员从1949年年底的1515人发展到23662人;国家干部总数7899人。“四清”运动对于解决当时农村干部作风和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一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

这一时期,地委根据省委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工作的指示,为逐步实现全区各级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展开了积极有效的工作。

第十三章

党的建设与理论学习活动的兴起

从1958年到1965年,池州各县党组织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在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以此作为加强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兴起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活动,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雄模范人物为楷模,继承光荣革命传统,争当时代标兵,激起整个社会强烈反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共鸣与精神向往,从而树立了风清气正的社会新气象,成为显著的时代特色。

第一节　加强党的建设

不断加强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及制度建设,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号召力,完成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任务的组织保证。池州各地结合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大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

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壮大党员队伍,整顿调整基层党组织

1959年至1961年,各地在贯彻党的总路线过程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基层党组织从工人、农民先进模范人物中吸收

了一大批新党员,壮大了党员队伍。从1962年起,根据中组部的指示精神,为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贯彻“更加严肃慎重”的建党方针,只接收了少量的新党员,与此同时,对前几年错批判、错处理的党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工作,占需甄别党员的90%以上,从而稳定了党员队伍。从1965年开始,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各地又积极慎重地在生产一线工人、贫下中农和优秀技术人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农村减少了空白党员的社队,增加了基层党组织设置。到1965年年底地区复建后,全区党员人数有23662人,其中工业部门党员803人,农业部门和农村党员17906人,交通邮电部门党员373人,商业、生活服务行业党员932人,科研文艺卫生部门党员494人,金融部门党员373人,机关部门党员2676人,其他方面党员147人。通过几次整顿和调整,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如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对农村党支部普遍进行了整顿;1960年至1961年,在农村开展的“三反”整风运动中,对基层党组织又进行了整顿;1963年,结合“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全区基层党组织进行再次整顿。至此,党组织覆盖面更为扩大、分布更加合理。到1965年年底,全区基层党委135个,其中县委5个、区委16个,其余为公社、镇党委;基层党总支委员会45个,其中工业系统5个、农业系统9个、商业系统5个、文化教育系统2个、机关单位24个;基层党支部1620个,商业财贸金融系统98个、文教卫生及公用事业单位52个、党政群机关279个,其他17个。

二、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

1962年10月,中央组织部工作会议认为,全党大多数党员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但有15%~20%的党员不符合条件,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一部分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不够巩固。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普遍深入的教育运动,并在加强教育党员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工作。池州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省委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党员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工作。强调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组织生活制度,定期抽调党员到各级党校进行轮训,严格执行党

员登记、统计和转移组织关系等各种手续和制度。1961 年冬和 1962 年春,全区各县党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工作,教育培训的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党员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到 1962 年年底,党员受训人数达到 80% 以上。1963 年,地、县、区、公社、大队五级开办党训班,各地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开展大规模教育训练党员工作,组织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在党员中开展形势、阶级、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政策教育,使广大党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全面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1965 年年底,结合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整党工作,采取“小整风”的方法整顿基层党组织。

三、加强党的各项制度建设

通过整顿和不断完善,建立健全了党员大会制度、党课教育制度、支部委员会制度、党委负责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1956 年到 1962 年年初,基层党支部开展了经常性党课教育,对党员进行党的性质、宗旨,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现阶段任务,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的作风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教育。1957 年,全区各级党组织生活、党课教育都建立起制度,农忙时节一般也都能每月上一次党课。各县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要求,首先加强党委负责制,明确党政分工,强调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强调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组织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县委及各级党委民主生活会也按规定召开。通过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有效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增强了党委班子自身净化能力,在各项运动中发挥了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由于各级党委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党员的经常性教育管理与各项党的制度建设,使各地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党的基层组织机构更加健全,党建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有效地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节　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

1958年到1965年，池州各县党组织遵照中央与省委的部署，联系本地实际，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以此作为党员干部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多次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在1958年“大跃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各地兴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群众运动。省委对学习哲学和毛泽东著作进行部署。全区各地兴起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全党全民学哲学运动，纷纷办起基层党校、红专夜校、业余政治夜校，建立各种理论学习小组，掀起群众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如青阳县于1960年3月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广播动员大会，号召在全县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团县委根据县理论工作会议精神，召开了1万多名青年参加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誓师大会。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为反修防修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重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18日，省委二届三次会议做出决定，要求全省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经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各项工作的革命化。池州各县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把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当作“头等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提出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作为反修防修、兴无灭资，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措施，通过大学毛泽东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之后，各地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商店全面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有些地方单位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经验，把学习时间以“学习日”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每周半天时间学习，编发学习简报、介绍学习经验、举办专题学习班，等等。

这次学习活动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逐渐形成高潮。1966年2月，中共池州地委向地直和各县传达贯彻安徽省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

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越来越多,学习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学习的方式方法多样,活学活用的效果也更加明显。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空前增长。其中《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本)、《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成倍上涨。据统计,仅青阳县就发行毛泽东著作 58000 多册,干部、党员和大部分社员都做到人手一册或多册。1966 年 4 月,中共池州地委和贵池县委在县城为《毛主席语录》举行全区首发仪式,全区到处呈现一派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新气象,掀起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经常、更加扎实、更有成效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学习毛泽东著作,对不同层级干部及群众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地、市级以上干部在着重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选读若干本马、恩、列、斯的著作,以便领会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县级干部主要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4 篇哲学著作,同时结合学习报刊上发表的反修文章,要求以整风的精神学好毛泽东 4 篇哲学著作,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看待问题,克服形而上学,并提倡写心得体会;一般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本),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毛泽东语录》。1966 年 4 月,中共池州地委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着重研究县以上干部如何学习好毛泽东著作和领导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一场自上而下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在全区兴起。

为把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更好地结合起来,推进学习活动朝着更加广泛、深入、持续、有效的方向发展,各地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群团组织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广泛发现、推荐工交、农林、财贸等各条战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们现身说法介绍他们在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方面的做法、体会、经验。贵池、青阳、东至、石台等县都先后召开了 2—3 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青阳县于 1966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召开的首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有 9 个集体、14 名个人做了大会典型发言,介绍了经验,县委主要领导在

大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使学习活动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群众性的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尤其是哲学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得到一定提高,广大群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也有了普遍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学习运动进入"文革"后期,受党内别有用心人利用,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实用化的问题,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受到群众的反感和抵制。

第三节　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活动

20 世纪 60 年代,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南京路上好八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忘我工作、无私的奉献,诠释着共产党人为坚守自己的信念、实现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地追求与奋斗。他们向社会展示的人生价值不仅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工作业绩;而且是他们那种勇于牺牲、乐于助人高尚品质,一心为民、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这种精神激励教育了几代人,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风尚。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以及雷锋先进事迹报道后,省、地报刊迅速专题报道、转载雷锋先进事迹、雷锋模范事迹照片和雷锋事迹摘抄,省委、地委宣传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雷锋和好八连活动的意见》,要求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开展这一活动的重大意义,以多种形式宣传好雷锋精神,迅速掀起学习雷锋活动的热潮,使之成为推动人们思想改造和推动生产、工作的巨大动力。各地团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号召团员、青年把学习雷锋活动热烈开展起来,以雷锋精神教育广大青少年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池州各县先后召开了有机关干部、工人、学校师生等参加的动员大会,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到会发言;各公社党委也召开动员大会,全区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县区机关与学校、

工厂举办了学雷锋的座谈会、报告会、故事会，宣传文教部门还开展了写、画、唱等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宣传活动。青阳县文化馆在县城与下属公社举办雷锋英雄事迹展览周，参观人数达 2 万多人次。使雷锋事迹家喻户晓、雷锋形象深入人心、雷锋精神广为传颂，各行各业迅速掀起学雷锋见行动的热潮，涌现出无数雷锋式好人好事。良好的道德风貌成为时代亮丽底色。以雷锋为楷模，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助人为乐、关爱他人成为无数人的道德效仿与精神追求，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与热情。

1966 年 2 月 7 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全文刊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66 年 2 月 9 日，安徽省委下发《关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认真向焦裕禄学习。当月，池州全区掀起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热潮。各县县委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号召学习焦裕禄，人人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学英雄、找差距、见行动，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蔚然成风。焦裕禄的榜样力量极大地影响改变了干部的执政理念与干事创业热情。

之后，全区还先后开展了向王进喜、王杰、欧阳海、麦贤德、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学习活动。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一个追慕英雄、崇尚模范、争先向上的新道德、新风尚在池州大地蓬勃兴起。

第十四章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至1966年,全国城乡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又称“四清”[①]运动)。运动大体分为发动和试点、铺开和深入等几个阶段。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在1963年2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湖南、湖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②]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做了规定。“前十条”颁布后,

①“四清”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其主要做法就是根据中央调整农村经济的政策和“农业六十条”精神,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简称“四清”。保定“四清”的经验,得到了河北省委、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3年5月20日,中央将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随同“前十条”下发。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

②“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各地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

同年9月,中央根据试点情况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有一大批农村社队进行了“四清”,少数城市开展了“五反”的试点。

1964年五六月,毛泽东、刘少奇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进一步做了夸大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这样,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

1964年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以来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做法,但是又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到1966年春,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进行了“四清”。

第一节 “四清”运动的开始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在肯定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同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做了错误的判断。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认为,“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批判斗争。

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月18日至4月3日,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认为安徽农村实行“责任

田”“助长了各种歪风邪气的滋长蔓延,因此斗争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激烈尖锐”。会议提出要把“彻底揭露责任田的单干风”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内容,要求各地集中力量搞好试点,同时在面上进行一般教育,并在全省各地选定 91 个公社作为省、地、市、县直接掌握的运动试点公社。

从 1963 年 4 月开始,贵池、东至、青阳等县分别抽调一批干部到农村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青阳县杨田公社东溪大队、东至县马田公社、贵池县高岭公社等一批社队是首批试点社队,开展围绕 1963 年 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县城一些单位开展“五反”运动。

1963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制定的“前十条”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作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达。“前十条”重申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点,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四清”、“五反”则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根据中央精神和省委的部署,各县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准备。青阳县从县直和各公社抽调 50 人组成的工作队,在杜村公社开展试点,“揭阶级斗争盖子”,开展“四清”,帮助干部“洗手洗澡”、“主动下楼”,开展敌对斗争。

9 月,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了“后十条”,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又规定运动要依靠当地的基层党组织和干部,要团结 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等基本正确的政策。

从 11 月起,池州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一批社队陆续展开,并采取“一手抓点,一手抓面,点面结合”的方法进行,但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组织阶级队伍、不搞“四清”,主要是煞住歪风、发动群众、鼓励干部主动改正缺点和错误,号召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继续贯彻“农业六十条”,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点上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后十条”的精神进行。11 月,东至县委召开了历时一个月、有 700 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和县直机关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会议根据“双十条”的精神统一认识。会议认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也是十分惊人的”,有的干部“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因此,“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会议结束后,全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 12 月中旬展开。贵池、青阳县也在此前后召开了类似会议,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区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上在 1964 年 3 月告一段落。

第二节　“四清”运动的发展

1964 年 5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各地上报的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和总结出的一些“典型材料”,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依据这一判断,会议提出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这次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精神和一年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情况,中共中央对“后十条”做了一些重要修改,并于 9 月下发。这个修正草案与原草案相比,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了,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这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有的地区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强调放手发动群众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情绪与做法进一步发展。

根据中央提出的打歼灭战的方针和省委的布置,青阳县被确定为安徽省 7 个重点县之一。省、地、县各级及安庆地区各县共抽调 4878 人组成“四清”工作团,下辖 20 个工作队,于 1964 年 10 月 12 日至 29 日分别进驻青阳县庙前、杜村、九华、城关、木镇 5 个人民公社,其余 9 个公社进行面上社教。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安庆地委书记、安庆地委

一位负责同志(文化部原副部长)分别在庙前公社上街队、双桥大队东站队、双桥大队华西队蹲点。这一时期,青阳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工作团党委领导。

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形成了“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来在运动中的某些“左”的偏向做了纠正,如“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等,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

因此,运动前期3个多月,主要以宣讲“双十条”为主,后4个多月以宣讲“二十三条”为主,总的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这一时期运动,由于受“后十条”和“桃园经验”[①]的影响,严重估计了农村阶级斗争形势,采取“扎根串联”首先解决干部问题,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甚至混淆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1965年7月,青阳社教运动告一段落。

1965年7月,重新建立的中共池州地方委员会(辖贵池县委、东至县委、铜陵县委、青阳县委、石台县委),贯彻省委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组建了“四清”工作团,近千名工作队员(包括省委机关、军队系统抽调的人员)下基层,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开展“四清”运动。9月,省委确定贵池县为全省第二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3个重点县之一。全区各县开展的运动按照专区“四清”工作团的统一部署进行。运动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大揭各级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坚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四清”运动无形中止,工作队

①即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社教运动的经验总结。

员纷纷返回原工作单位。这一时期全区各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开展了“四清”和“五反”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领导机关革命化、企事业革命化和人的思想革命化”,开展了清理“小钱柜”、“小仓库”,也开展了增产节约和“比、学、赶、帮”。

第三节　各地运动试点情况

一、青阳县运动试点

青阳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3月开始到1966年4月结束,历时三年零两个月。这期间,省、地、县都抓了试点。

大队试点。根据省委、地委指示,青阳县于1963年3月下旬到4月下旬在杨田公社东溪大队开展了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分3个步骤进行:了解情况,安排生产,制订计划;讲、读文件,落实政策,组织阶级队伍;组织补课,动员干部洗“温水澡”,评选“六好”社员,清理财务。当时,从县委办、县委宣传部、县农业局、县妇联等单位抽人组成了工作组。工作组下队前集中学习讨论了省委、地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全面领会文件精神,明确做法、要求和目的,为下队后联系实际进行宣讲做准备。工作组下队后,即以学习宣讲中央3个文件为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时间安排上,基本是每个生产队每三天学一次,且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在方法上,主要采用“四边”办法,即边原原本本宣读文件、边联系实际进行讲解、边组织讨论、边解决具体问题。全大队组成了9个贫下中农小组,召开了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成立了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四清”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大队和生产队财务上的各项制度。

公社试点。1963年5月,中央“前十条”出台。6月,省委召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会议。根据省试点会议精神,青阳县委决定在县直和各公社抽调50人组成工作队,赴杜村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从6月20日集中训练工作队起到10月30日结束,共进行了130

天。其方法步骤一是训练干部。以公社名义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前十条”,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二是向群众进行系统教育,分段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前十条”,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成立贫下中农小组和代表会,按照“农业六十条”和“前十条”检查落实政策,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四清”;三是在做好一、二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四是整顿组织、改选干部、健全组织,开展“比、学、赶”生产竞赛,进一步掀起生产高潮。

杜村公社试点工作先后开了两次三干会(第一次 5 天,第二次 7 天)。会前做了充分准备:一是典型调查了镇华大队“四类”分子进行阶级复辟的第一手材料,利用当地活生生的阶级复辟罪行教育到会干部;二是组织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集体“洗手洗澡”,互相帮助,以便集中力量、集中精力开好三干会;三是从总结成绩入手,以当前经济、阶级斗争形势和开展这次运动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为主线,准备好动员报告;四是研究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和分班领导,保证会议期间教育、生产两不误。

三干会分 4 步进行:一是大讲当地活生生阶级斗争事例和阶级斗争形势,大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进行运动动员,以端正态度、解除顾虑;二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进行阶级教育,启发阶级感情;三是反复交代政策、领导带头,运用回忆对比,查上当、放包袱、“洗手洗澡”;四是民主讨论,划界限、定性质、处理包袱。

在杜村公社社教试点中,对 459 个“四类”分子进行了评审。评审结果为:管制 23 人,监督生产 175 人,非社员 101 人,正式社员 160 人。当时杜村公社有 15 个大队,公社干部 8 人、大队干部 111 人、生产队干部 628 人。在他们当中,共查出贪污钱款 22338. 87 元、粮食 69884 斤以及大量竹木、农具、家具等实物。运动期间,主动退赔现金 10648. 50 元、粮食 3300 斤以及一批原物,剩下的款、粮做出了分期退赔计划。

点面结合。由于“后十条”对农村形势做出更加严重的估计,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后,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为了抓住冬季农闲空隙,掀起学习“双十条”热潮,既快又好地开展农村社教运动,根据省委、地委要求,1963 年 10 月,青阳县委就社教运动做出新的安排。即全县 14 个公社除杜村试点外,剩下的 13 个公社城关、杨田、朱备为第一批系统教育的社,为点上社教,余下 10 个公社为面上社教。又以城关公社为点上的点,以丁桥公社为面上的点,同时,对点、面社教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步骤和要求。11 月,全县抽调 151 名干部组建工作队,其中用于点上的 139 名(城关 65 名、杨田 49 名、朱备 22 名),用于面上的 12 名。

此次点面结合的社教阶段,面上社教至 1964 年 3 月完成,而点上社教到 6 月方结束。

1964 年 6 月,县委确定庙前、九华为第二批系统教育公社,时间 3 个月,步骤同第一批系统教育公社。

1964 年 8 月 16 日,刘少奇提出各省的社教运动,在一个地区可首先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五反”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根据这一部署,安徽省委于 8 月 23 日对各地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草案)》,确定 7 个县(寿县、全椒、界首、砀山、繁昌、歙县、青阳)为第一批重点县,抽调 3.7 万人组成工作队,进驻 7 个县的 140 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青阳县作为全省 7 个重点县之一开展社教运动。

中央和省委指示要组织干部分期分批下去,使所有干部都能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各级党委一定要下决心,派重兵、派精兵,打好歼灭战。确定区以上行政机关干部抽调 30%,公社抽调 10%,县以上企事业单位抽调 10%,设在各县的省属单位凡是党的关系在县的按 10%抽调,县委常委抽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区委副书记、县直科局长以上领导骨干占抽调干部的 10%~15%。这样,由 4878 名工作队员组成的 1 个工作团及其下属的 20 个工作队,于 1964 年 10 月 12 日至 29 日被派到青阳开展“四清”运动。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到庙前公社庙前大队上街队蹲点,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到庙前公社双桥大队东站队蹲点,文化部原副部长、安庆地委副书记钱俊瑞到庙前公社

双桥大队华西队蹲点。当时,青阳确定庙前、九华、杜村、城关、木镇5个公社为点,其余9个公社为面,全县社教运动转由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党委领导,工作团党委书记为张恺帆,副书记为许少林、钱俊瑞。

运动大体上分两个阶段,春节前(也即"二十三条"颁布前)三个半月时间,以宣讲贯彻"双十条"为主,进行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和"四不清"盖子,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小四清",教育干部检查交代问题;春节后(也即"二十三条"颁布后)四个半月时间,以宣讲和贯彻"二十三条"为主,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地宣讲"二十三条",组织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顿和建立各种组织,全面进行"四清"的复查补课和总结验收。

1965年3月,中央、省委指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是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新高潮。这样,点上5个公社后几个月主要工作是:一抓生产;二抓清经济;三抓划阶级,先划贫下中农,后划漏划的地、富、反、坏;四抓组织建设工作,重点是把党、贫协、行政、民兵组织整顿好,健全领导核心;五抓搞好思想建设工作,深入地结合实际,活讲活用"二十三条",使干部和工作队员得到教育和提高,使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得到支持和鼓舞,同时向群众宣讲"农业六十条",具体落实各项政策。

除14个公社外,县直各口、城镇、佛教大队也都同时开展了"四清"运动。时间大体是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为期8个月。

这一阶段,上级下派工作队下队均实行"三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于1965年5月先后撤回,社教工作团于1965年7月撤销。

全县14个公社原有"四类"分子2998人、管制249人;"四清"运动后,"四类"分子为2792人,管制183人,补划118人,摘帽1133人,补划未戴帽84人,纠正错划253人,逮捕法办3人。在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10905人中,受降职以下处分44人,撤职33人,开除留用察看34人,开除公职14人,逮捕法办11人;运动后落选的1985人,占干部总数的19.8%,清洗出干部队伍58人,占干部总数的0.5%;退赔

公款 434224 元,占应退赔总数 768716 元(含挪用)的 56.5%;退赔粮食 444233 斤,占应退赔总数 917176 斤的 48.7%。1965 年年底,青阳改属恢复后的池州地区,仍列为社教运动的重点县。

1966 年年初,省委指示重点县的面上社教工作,按照“二十三条”关于“‘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的要求,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县委于 1966 年 2 月 15 日以(1966)018 号文发出《关于面上社教工作情况和安排意见的报告》,决定全县社教工作分 5 批进行,第一批抓木镇公社,作为试点,既是打仗又是练兵;第二批抓庙前、九华、杜村 3 个公社;第三批抓城郊、新河、乔木、丁桥、酉华 5 个公社;第四批抓杨田、朱备、陵阳、沙济、南阳 5 个公社;第五批抓县直机关和城关镇。当时,省、地、县共抽调干部 197 人组成青阳县面上社教工作队,并成立了工作队党委。这次重点县面上社教,既不同于一般面上社教,又不同于点上“四清”。

就在木镇公社试点工作刚结束时,“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此,青阳县“四清”运动于 1966 年 5 月也就自然而然全面结束。

二、东至县马田公社运动试点

东至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于马田公社(1992 年撤区并乡时与查桥乡合并,现为查桥乡)的试点,从 1963 年 6 月开始到 11 月底结束,历时 5 个月。参加试点工作的干部共 65 人。

马田公社共有 8 个大队、59 个生产队、5678 人。运动开展分为 5 个步骤推进:培训干部,大造声势,层层发动;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阶级教育,结合当地事例大讲阶级斗争,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揭开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发动群众,开展“四清”工作,做好干部经济退赔,处理好干群之间的矛盾;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做好“四类”分子的评审工作,健全监督改造组织;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团、妇、兵组织,制定生产发展规划,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运动的重点内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 5 个方面的工作,即全面抓好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

集体劳动。

当时,马田公社试点工作5个方面的成果得到上级肯定。认为通过试点工作,一是提高了广大干群的阶级觉悟,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初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煞住了歪风邪气。如夺回了被“四类”分子窃取的领导权,搞封建迷信的交出相书、罗盘等迷信工具等。二是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三是划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全公社交归集体的土地197亩、“黑田黑地”445亩、超过规定的“三地”(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553亩,基本纠正了副业、手工业“单干”的现象,全公社447户农民共退回归队的各种农具、用具1581件,交回偷砍的竹木1987根。四是弄清了问题,帮助干部卸下了包袱,干部通过参加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运动中,在领导的带动和启发下,有“四不清”的干部都积极主动退赔,没有现款现物退赔的也订出了退赔计划,退赔计划经群众讨论同意,由上一级组织批准、监督执行。在干部退赔之后,一些社员也积极响应,一时出现了公物还家的高潮。

三、贵池县高岭公社运动试点

贵池县委根据省委、安庆地委关于继续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在乌沙区高岭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1963年6月29日,县里抽调了60名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驻高岭公社各大队。高岭公社共有13个大队、203个生产队、5515户、22168人、36700亩田地。

这次试点大体分4步进行。第一步,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首先由县委负责同志根据中央的3个文件和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联系实际,大讲当前形势、大讲两条道路斗争和阶级斗争,启发人们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查上当,层层“洗澡”、放包袱,对照政策,划界限、处理包袱,轻装上阵。同时,派出大部分工作组成员、干部深入生产队,从抓生产入手了解情况、访贫问苦,物色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组织阶级队伍做好准

备。第二步,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以“四清”为重点,组织好阶级队伍,继续教育干部,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公社会议后,全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召开了党支部会、干部会、团支部会、贫下中农社员大会、妇女会,分片召开社员会,传达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继续揭阶级斗争盖子,教育干部“洗澡”、放包袱,组织过去苦大仇深、觉悟高的贫下中农在会上回忆对比、现身说法,向社员进行阶级教育,为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打下政治思想基础。以生产队为单位、以贫下中农小组为骨干选出“四清”小组,采取班组查账、发动群众查问题、教育干部交代问题“三结合”的办法,普遍开展“四清”。并进一步教育干部积极退赔,兑现 1963 年分配,调动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融洽干群关系。通过这一工作,着重解决了人民内部问题,把 95%以上的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做好对敌斗争的准备。第三步,对敌斗争。在内部问题处理好后,再教育和发动贫下中农,激发他们的对敌仇恨,形成广大干群要求对敌斗争的积极性。然后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一次全面排队,先分化瓦解一般活动的敌人,再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敌人,以一个生产队或几个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批判斗争。第四步,整顿组织,搞好各项建设。根据运动中揭露的问题,对党、团组织和妇女、民兵组织进行整顿,并做好重大案件的处理工作。按照“农业六十条”规定,采取有破有立的办法,搞好生产队的各项生产建设工作,进一步掀起生产新高潮。

通过发动群众、教育干部、专班查账“三结合”的办法,全公社查出“四不清”的粮食 215. 05 万斤、现款 73409 元、皮棉 579 斤、油 1080 斤、棉布 4400 尺、布匹 3023 尺、木料 308. 87 立方米,其中铺张浪费粮食 213181 斤、现款 15840 元;贪污粮食 52547 斤、现款 21333 元;盗窃现款 1200 元、粮食 52582 斤;挪用现款 20482 元、粮食 28001 斤;多吃多占现款 2005 元、粮食 111999 斤。

高岭公社“四清”试点工作总结了 4 条收获:一是整顿了干部作风,进一步增加了团结,密切了干群之间关系。二是进一步贯彻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三是通过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兑现分配,更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从事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四是对打击贪污盗

窃、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高岭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始终没有放弃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人民生产、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历时三年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一开始是针对农村干部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多吃多占、强迫命令、账目不清等不正之风和经营管理混乱等情况而展开的。通过运动,池州也和各地一样,揭露出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对扭转农村干部作风和改善农业经营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刹住了封建迷信等歪风。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把认识上或工作中的错误当成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在运动中尤其是运动中期,运用“背靠背”等方式整干部,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伤害了很大一部分干部的感情,同时也使不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把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因而不能很好执行;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秩序,这对于经济调整时期的池州城乡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不利的。由于这次运动只在部分社队开展,而且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也及时纠正过运动中的某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减轻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区各地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大的影响,社会也没有发生大的混乱。纵观池州城乡自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 3 年多时间,尽管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受到“左”倾错误影响,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经济方面。因此,全区这一时期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对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的劳动制度和全日制的教育制度;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推广和试验以及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的调整等,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尽管它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左”的错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十五章

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从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10年(1956—1966),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

10年里,池州地方党组织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工业、农业、基础建设、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第一节　工业建设成就可观

10年间,池州工业生产虽然因三年“大跃进”而带来种种破坏和浪费,但经过“二五”后两年(1961—1962)调整和三年(1963—1965)继续调整,发展顺利。

重工业方面。1956年,新中国最早恢复建立的铜工业大型采、选、炼联合企业——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在贵池县铜山筹建铜山矿区,初始设计为露天开采,因设备原因改为坑巷采掘,1964年又复改为露天开采。[①] 一批地方国营金属矿山也开始起步,在全区范围内全面采掘铁、锰、铜、铅、锌、锑、金、银、粗铅、蒸馏锌等金属矿石。如1957年11

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矿区交由企业所在的行政区划政府管辖,现在的铜陵市在今池州贵池区牛头山镇和殷汇镇之间仍设有显化、南泉两个行政村。

月安庆专区在青阳杨田乡筹建起全省第一家地方国营铅锌矿,手工开凿。同年,又建设了贵池县桃坡乡前排山潘桥(后改名为红旗)铁矿(1959 年 3 月划归省政法钢厂)。1958 年秋,在大办钢铁群众运动中,开采铁矿数十处。1957 年,池州铅锌冶炼厂兴建,1958 年 6 月建成投产。

轻工业方面。10 年间先后建立起一批针织厂、纱厂、缫丝厂、织绸厂、棉针织厂和各县酒厂以及后来发展的造纸厂等。1958 年,青阳曙光棉织社和城关针织社、弹花小组合并转为青阳县棉织厂,职工达 300 余人;东流县成立东流棉针织厂。11 月,东流、至德两县联合筹建东流纱厂,生产能力 1.5 万锭。1959 年两县正式合并后,东流棉织厂并入东流纱厂。1957 年,石埭城关成立罗绢组,l958 年并入手工联社针织厂,翌年随石埭并入太平,改为太平县针织厂。1958 年,东流县麻纺组下放为社办企业;1959 年,东流麻织厂成立,职工 103 人;1960 年麻织厂下马。解放后,池州各县都相继建立酒厂。1956 年 4 月,石台杜璞如酒厂转为公私合营企业,产品统购统销。1958 年,青阳县将蓉城白酒加工联社改为国营青阳县酒厂,以传统手工工艺酿制白酒。1956 年 10 月,至德县开办一家国营酒厂;翌年,东流酒厂成立;1960 年,两厂合并为国营双塔酒厂(东至酒厂前身)。1958 年,贵池县在城西杏花村附近的桃花山兴建贵池杏花村酒厂。

支农工业方面。在工业建设中,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兴建的贵池、至德、石埭等县农业机械厂或农业机械修配厂、池州地区农业机械厂、东至县中心机械厂、池州汽车修理厂等一批机械厂,生产出插秧机、打稻机、脱粒机、制茶机、农业泵、饲料粉碎机、轧花机、碾米机、磨粉机、山芋洗粉机等一批直接为农业服务和为农民生活服务的工业产品。

电力工业方面。各县兴办了一些柴油机发电厂和水电站。1956 年 4 月,东流县筹办地方国营东流县城关电灯厂,安装 15 马力柴油机、10 千瓦发电机各一台;1958 年,改用 90 马力柴油机、56 千瓦发电机。1957 年,至德县政府在尧渡镇筹建至德县五一发电厂,1958 年 5 月 1 日正式发电。1959 年 6 月,东流、至德两县合并为东至县,五一发

电厂和东流城关电灯厂合并,更名为“东至县五一发电厂”。1959 年年初,池州铅锌冶炼厂购回一台 38 马力锅驼机、一台 30 千瓦发电机;8 月,发电车间建成发电,此后不断扩大发电规模。1957 年 6 月,贵池县开办贵池电厂,1958 年开机发电,供城区部分动力和照明;1961 年 10 月,城区接通国家电网电源后停止发电。1958 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架设 1 条 86.3 公里的 110 千伏输电线路,向位于贵池县境内的铜山矿供电。1959 年 2 月,贵池县架设 6.6 千伏木杆配电线路 34 公里至县城、晏塘、新河坝、木闸、殷汇、万兴等地,1961 年 10 月投运,至此,县境沿江地区进入华东电网。池州境内水能资源较为丰富,小水电工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建设。1958 年,至德县香隅新岗乡(后改名建新乡)在周山水库建起新周水电站,装机 10 千瓦直流卧式发电机 1 台,水轮机是自制的木制旋桨式。同年秋至翌年春,石台县先后兴建高路亭、查上、兰关、河西 4 座小水电站,共装机 4 台,容量 47 千瓦,但未能运行发电,先后报废。贵池最早的水力发电站是建于 1959 年的马衙水库水电站,木制水轮机,发电 8 千瓦,供水库工地照明使用。

化学工业方面。池州化学工业始于贵池安子山硫铁矿。1958 年,在“大跃进”的带动下,贵池、青阳县曾新建硫酸、化肥、农药等 10 多个化工企业。化学工业全面发展起步于 1965 年专区复建后,陆续建成和开始动工兴建了化肥、农药、烧碱、硫酸等一批骨干企业,生产的化肥、农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船舶修造方面。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开始建立第一家船舶企业东流县船舶修造厂。1959 年 5 月,贵池县兴办贵池船厂,是今池州市造船厂的前身。当年,东至县船舶修造厂并入东至县水上运输合作社,改为船舶维修队。

总之,池州后来工业建设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布局的。这 10 年,全区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固定资产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东至县 1962 年全县工业企业由 1959 年的 55 个增加到 159 个,而产值只有 983 万元,经过 1963 年至 1965 年 3 年调整,全县工业企业缩至 49 个,而工业产值却回升到 1478 万元,比 1962 年猛增 50.3%。贵池县 10 年工业新增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 6.3

倍,工业总产值增长 132.5%。

第二节　农业较快恢复并有所发展

纵观 10 年,由于“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农业增长率降低了,但由于经过 1961 年至 1962 年的调整和 1963 年至 1965 年 3 年继续调整,农业仍得到恢复并有所增长。

据 1977 年池州地区革委会统计局编印的全区统计年报资料,全区粮食总面积 1960 年为 219.95 万亩,1965 年为 190.56 万亩,而总产量则从 1960 年 22.64 万吨上升到 1965 年的 34.06 万吨,比 1957 年增长 10.13 万吨;油料总产量由 1960 年的 0.23 万吨上升到 1965 年的 0.97 万吨,比 1957 年增长 0.35 万吨;1965 年,棉花、蚕茧总产量分别比 1960 年增加 7749 吨、8 吨,棉花总产量比 1957 年增加 6331 吨。

东至县 3 年继续调整时期,粮、油、棉总产逐年递增,以 1963 年至 1965 年 3 年粮、油、棉平均总产与 1957 年比较,分别增长 4.2%、20.1%和 62.1%,1965 年粮、棉总产创造东至县历史最好纪录。东至县 1963 年至 1965 年 3 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11.3%,比“一五”时期高出 7 个百分点。

池州山川秀丽,群山起伏,70%以上为中低山区,山上绿树成荫,山下溪流似带,是安徽省重点林区。1956 年,各地响应毛泽东主席“绿化祖国”和安徽省委“七年绿化安徽”号召,拉开大规模造林育林序幕。10 年中,建设了一批国营林场,还建设了一大批乡、村林场。但期间因“大跃进”、无政府主义等因素,曾出现过度砍伐、森林被毁现象。

石埭县 1959 年建设中龙山林场,场址设在现七都镇二家垄;1960 年 1 月建设仙寓山林场,场址设在现仙寓镇台山村杨村生产队。东至县 1957 年 4 月在香隅创建香口林场;1958 年 2 月建设梅城林场,场址设在县城北天台山南麓,梅城林场后来成为安徽农业大学教学实习点。青阳县 1958 年在现酉华乡田屋村马冲创建酉华林场,下设三元、盘台,乐元、潮水、留冲、草鞋岭、东山、东堡及场部 9 个营林区;1959 年

建成南阳林场,场部位于现南阳乡东河洪石岭。

乡村林场又称社队林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创办。1958年3月,东至县铁炉公社响应中央“绿化祖国”号召,率先创办了一个林茶场。1958年,石埭县在六都中龙山附近创建一个林场。贵池县同年办两个林场,观前黄梅冲林场(乡办)和里山石山林场(村办)。1966年,青阳县建立了木镇黄山林场。

池州全境土壤、光照、热量、水量适中,生长名优茶条件得天独厚。1956年,东至建成茶树良种繁殖示范场,其前身为淮委农场,属安徽省公安厅领导。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73部队撤走后移交东至县改名农林场。1958年,贵池县在铜山乡马料湖东北部建成牛头山茶场。同年,贵池县牌楼大山大队茶叶生产在遭受90多天未下透雨的恶劣条件下,仍取得茶叶大丰收,受到国务院表彰,并荣获了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国务院奖状。

第三节　基本建设成绩显著

一、农田水利建设

兴建黄湓闸。黄湓闸坐落在贵池西部铜山万兴村,为黄湓河流入长江的控制闸,工程1960年5月动工,1965年4月竣工。全闸为浆砌麻条石拱形结构。在动工兴建黄湓闸的同时,堵筑新老圩口,连成广丰万兴圩,实行江、湖分家。圩内保护耕地达16万多亩,东至、贵池两县受益人口13.5万人。

同年冬始建东南湖圩。10年间,分别对贵池县的秋江、大同、同义圩堤,东至县的有庆、香口圩堤等进行加固培厚,大大增强了抵御洪涝灾害能力。

10年间,大力兴修水库等蓄水灌溉工程。池州虽地处沿江江南,但大多为丘陵区,旱灾频繁。昔日农田主要靠塘坝工程蓄水灌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兴建小型水库成为当务之急。1955年春季,石埭县和平乡(今属黄山区)动员群众开始兴建凤凰山水库,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受益。这座水库的兴建,成为区

内水库建设的开始。1956 年冬,至德县新岗乡(今建新乡)首先在龙岗村梅岭兴建小(一)型水库——周山水库,总库容 117.7 万立方米,拉开了至德县水库建设序幕。1959 年冬,至德县又在鄱阳湖水系龙泉河流域东胜乡大板河上兴建大板水库(1980 年主体工程竣工,时为池州地区最大的水库)。贵池县于 1957 年开始先后兴建马衙水库和四岭水库。此后,全区各地由原先注意塘坝建设逐步转向水库建设,解决丘陵地区农田灌溉问题。从 1957 年到 1966 年,全区共建设小(一)型、小(二)型水库 119 座。此外还兴建了一批塌堰和一大批蓄水、提水、引水工程以及大中型涵闸排灌工程。

二、交通事业发展

1956 年 2 月,省交通厅采取“民办公助”方式,对大(渡口)石(门街)路进行全线整修,1957 年 2 月竣工通车。1957 年年底,全区所修复的 330 公里路线(大渡口—岩寺、大通—木镇、青阳—芜湖等)均铺筑 2 米宽的泥结碎石路面,路基均达 6 米以上,且修建了涵洞和半永久性桥梁,基本上达到车辆晴雨畅通无阻。

1958 年至 1965 年是池州交通史上飞速发展时期。这几年,公路建设总里程为 795 公里,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公路里程的 2.5 倍,其中包括先后修建的殷(汇)新(桥)线、毛(田)大(观桥)线、官(港)桃(墅店)线、贵(池)石(门高)线、黄(柏)马(坑)线等重要公路。但道路质量不高,有的公路还不能通车。

1963 年,全省“干线公路木桥歼灭战”打响后,全区开始了公路桥梁改造工程,兴建了杏花村、殷家汇等一批公路桥梁。

在这期间,全区建立了汽车运输中心站和各县汽车站,开通了省会合肥及省内皖南各地的班车。其中,1956 年 7 月,五溪至二圣殿公路通行,开创了池州农村公共客车运输,也是九华山旅游汽车客运之始。1964 年,东至县汽车站率先开通到合肥的直达客运班线,加强了池州与省会之间的联系。同年,贵池站开通至棠溪的农村公共班线,解决了山里人进城难的问题,为发展山区经济奠定了基础。

池州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历史悠久,曾因水陆交通区位优势雄立

江滨。其中长江航道上自香口、下抵大通,径流水深、流速平缓,水运条件优越。早在唐代,池州港就已成为漕运中转港和水驿中心。1959年冬,池州港始建外江简易铁矿石专用码头,其设施主要是2艘木质趸船、20块跳板和2座简易栈桥,该码头由安庆港务局代管。1962年,长江航务管理局投资修建候船室,码头改营客轮。1966年年初,长航池州港务局成立,从安庆港抽调一艘趸船,同时配置了栈桥,靠泊浔宁线和区间客轮,将原码头改为临时货运码头。

三、邮电发展

20世纪60年代,石埭至青阳方向邮件由步班改为自行车邮路;贵池至青阳邮件由客车代运。1965年至1980年,先后又开通了贵池至青阳、石台、铜陵、太平等地区托办汽车邮路。

1960年,贵池县至安庆长途电话增至3条,贵池县邮局调配B845单路载波电话终端机一部。至此,全区长途电话开始使用载波电路。1965年7月,增开贵池至合肥载波电路1条。翌年,原贵池至七里农村电话线路改作长话电路,并开通贵池至铜陵县电路1条。

1965年,除石埭县外,其余各县均安装莫尔斯符号人工机,用于电报传输业务。

四、城市建设

贵池县城建设有一定的进展。1958年,修筑东西向的跃进路(1982年改名为"秋浦路")。翌年,修筑了南北向的长江路,构成城内新的道路骨架。1961年,安装路灯,为全城首次。1965年后,加强了城区的市政建设和道路建设,相继兴建的主要街道有东湖路、翠微路、池口路、九华路等,街道总长8公里,其中沥青路面2.5公里。

尧渡镇、蓉城镇、七里镇、九华镇和乡村重要集镇建设也都有新的起色。尧渡镇原为至德县治梅城的南面屏障和重要集镇,1958年开始在街道安装路灯。1959年,东流、至德两县合并为东至县,县城设尧渡镇,当年建成尧渡大桥。青阳县县城蓉城镇,民国时有大小街巷30余条,大都分布在青通河两岸。新中国成立之初,街道布局零乱,20世

纪50年代起,青阳县对街道进行拓宽整治,路面整修。1956年10月,青阳电厂发电,在主要街道口安装电灯28盏。1965年,析贵池、太平部分地区重置石台县,县治设七里街,街道狭窄,长约200米,石板路面,沿街均系砖木结构的民房和店铺。当年,在木棉山(亦称马鞍山)西麓板栗岗兴建新城。1966年,县农机厂以柴油机动力发电,供工厂生产用电和县城部分单位照明。九华镇坐落于九华街化城盆地,抗日战争时,九华街市景萧条。20世纪50年代,九华街的建设有一定的发展。除此之外,一些重要的乡村集镇如殷汇、陵阳、大渡口、丁香等都有新的起色。

第四节　社会事业有很大发展

一、教育事业

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发展迅速。根据“两种教育制度”的办学思想,全区各地普遍大办耕读小学。据1965年资料记载,仅贵池县就办有耕读小学1531所。

中学教育迅速发展。根据1956年安徽省首次文教工作会议精神,1957年,全区各中学普遍增加了班数,扩大了规模,贵池县新建了杏花村中学。1958年,青阳县初级中学和石埭县初级中学分别增设了高中部,青阳县庙前初级中学和贵池县殷汇初级中学开始招生上课。此外,不少区乡创办了民办中学,时称“农中”。随着全国“大跃进”形势的迅猛发展,遵照省教育厅指示,全区各中学认真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除组织师生参加炼钢铁、支援山区“秋收”外,学校还办有农场、窑场、加工厂等。1959年6月,贵池中学被确定为省属重点中学。1961年至1962年,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农村初中和社办“农中”进行调整和压缩,控制全日制普通中学的发展。1964年,教育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至1965年,区内共有完全中学3所,在校学生802人;初级中学13所,在校学生3698人;农职业中学31所,在校学生887人。学校和在校学生都比1956年、1949年有成倍的

增长。

1956 年,池州师范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除中师外,先后办过初师班、幼师班(均招收小学毕业生)和中速班(学习期限一年),并设有函授部。学生最多时达 22 班、798 人,教职工 68 人。1963 年,池师被列为重点师范学校。1965 年,各地大办耕读小学,池师附设耕读小学师资速成班 6 个班,招收 16—22 周岁的初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力的在乡知识青年,学制一年。学生保送入学,社来社去,不包分配。

新中国成立后,区内先后有中等技术学校 12 所。1956 年,解放后接管的省立东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迁至东至县大渡口镇,改建安庆农业学校(即后来的池州农业学校),学制 3 年。

1957 年,各县、区、乡党委均建立了扫盲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必要的工作制度。至 1957 年年底,仅东流、至德两县有常年民校 469 所、识字班 1479 个,其他形式的扫盲班 596 个,学员总数达 45000 多人,占当时青壮年文盲总数的 47%左右。

二、科技事业

这一时期,许多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科学技术,在全区广大农村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一些科技成果得到承认。

1958 年 8 月,农业部在东流召开全国水牛繁殖现场会,东流县的水牛繁殖科研成果荣获国务院奖励。1963 年,经省政府批准,组建青阳县农科所和贵池县农科所。

各地气候站、水文站纷纷建立。1956 年 10 月,建立至德县气候站,1958 年改为东至县气候站。随后,石埭县气候站(后因兴建陈村水库被淹没,1966 年 3 月重建)、贵池县气候站、青阳县气候站先后建立。1957 年 1 月,黄溢闸水文站(原雁塔水文站)设立,成为皖南山区大中河流区域代表站。1958 年 6 月,在金家湖设东至水文站,观测尧渡河的水位、流量及雨量。1959 年 1 月,在陈村水库设立大河口水文站。

三、卫生事业

医疗条件大有提高,卫生面貌大有改观。到1965年,全区各地逐步建立起农村区中心卫生院,部分区社卫生院设有住院部。建立起部分农村大队“合作医疗”,拥有一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队伍。妇幼保健、地方病防治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可喜成绩。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血防办公室就将贵池县列为全国10个血吸虫病流行重点县之一。1957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文件下达后,贵池县除帮助《指示》中提到的曹雨金一家解决治病和生活方面的问题外,开始采取多种措施对血吸虫病进行全面防治。1960年,省委在贵池县曹村召开血防现场会,推行水田改旱地的灭螺措施。此后,全区各县防治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果。有的地方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垦灭螺。1965年11月破土动工的贵池县东南湖围垦灭螺便是当时最大的工程之一。这年,全区消灭有螺面积5927.4万平方米,治疗血吸虫病人17.232万人次,有力地控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一些“寡妇村”变为“幸福村”。许多昔日“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村庄,开始出现“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景象。

爱国卫生运动取得大成效。1956年,各县相继建立除害灭病指挥部,发动群众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各地大张旗鼓地掀起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1960年3月,按照中央除“四害”文件精神,以除臭虫替代打麻雀,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蚊子、苍蝇”,全区城乡广泛开展灭鼠活动。1965年12月,池州专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继续大力开展城乡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三管”(饮管、水管、粪管)、“两灭”(灭蝇、灭蚊)的口号,要求结合积肥修建粪窖,搞好预防接种,控制疫病发生。自1965年冬季开始,全区城镇和农村发动群众结合积肥铲除杂草、清除垃圾,建立和改造厕所等。

第五节　老一辈革命家对池州的亲切关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多次来贵池等地视察，勉励和支持贵池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1960年3月21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青阳视察时明确指出："农村大办食堂，有碍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撤掉，不能再办下去"；在向机关干部做报告时，胡耀邦强调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克服困难，把青阳县山河建设得更加美好。自1961年后，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多次来九华山视察，非常关注佛教名山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于1963年10月下旬陪同各国驻华使节驱车前往黄山途中在青阳蓉城镇小憩时，一再叮嘱县委书记王克东："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好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1964年5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下榻青阳县委招待所，手书毛主席《和郭沫若同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诗赠予青阳县委，并要求收集整理九华山、青阳县的文物古迹。1965年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陪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在前往黄山途中视察青阳县城。行至陵阳镇，在听过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对这里的历史和变化情况的介绍后，董老情不自禁地咏出一首五言律诗："道旁听途说，具体不烦言。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乡居皆瓦屋，聚落似林园。抗日遭蹂躏，生涯有复翻。人民新作主，扫除旧巢痕"。196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视察石台、贵池时挥毫题词，对池州的建设寄予希望。"文革"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来青阳视察时，曾与落户青阳的著名作家陈登科进行了交谈，关注青阳的建设和发展。

第 三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池州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

始于1966年5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10年。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这当中,对于重新建立不久的池州专区来说,更是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各阶层群众受到了冲击和伤害,但是,池州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使这场运动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内乱局面的形成

1965 年 11 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继后出现的“二月提纲”、“彭、罗、陆、杨”事件、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改组北京市委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日甚一日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形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以致混乱局面出现并日趋严重,继而发展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在这个过程中,池州专区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池州的展开

1966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池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始的。

一、贯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省委于 5 月 18 日印发《关于认真学习

和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和大专院校、文化部门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挂帅抓“文化大革命”，积极投入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5 月 23 日至 6 月 12 日，池州地委书记胡坦参加省委召开的省直厅局党委书记，全省地委、市委书记会议。（6 月 6 日起，会议扩大范围，全省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对照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进行了检查。会议还对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李凡夫反对林彪“顶峰论”的观点及其所著的《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一书进行了批判。会议最后确定，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放在县以上机关、学术、教育、新闻、出版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会后，“文化大革命”很快在全省发动起来。

池州“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基本上是遵照“五一六通知”精神和省委的统一部署进行的。但 5 月后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黑帮”、“毒箭”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杀伐之声，这个“非常”导向酿成了事态的“非常”发展。自 6 月 1 日起，专区地直机关及各县县直机关、团体、学校迅速掀起了贴大字报的热潮，池州师范、贵池中学、东至一中贴出的大字报数以万计（全区约 10 万张）。他们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报刊上登载的批判、评论文章作为口诛笔伐的有力武器，将斗争引向深入。短短几天里，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由最初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为控制局势，确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地委于 6 月 7 日正式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共 8 人组成。胡坦任组长，方振华、谢永胜、陈光泽、周殿荣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陈光泽、周殿荣兼任正、副主任。之后，专直机关和各县县委文化革命小组也相继成立。

7 月 18 日至 22 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专署各部、办、科、局等部门党员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

见的报告》、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和李葆华在省委召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传达和讨论了省委召开的地委、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分析了池州前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分期分批开展运动的问题。会议期间还专门安排时间学习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并研究了贯彻意见。会议在讨论“文化大革命”与工作、生产相结合的同时,检查了当前农业生产的情况,并初步地安排了今后工作。8 月 3 日,地委就这次会议还印发了题为《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会议纪要。

在地委举行这次会议之前的 6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对大、中学校开展运动做出了若干规定。几日内,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当月即向地、县各中等学校和文化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组织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人物”的斗争,一些学校的负责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区一大批教师被揭发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而遭到批判。7 月底,各县还将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参加“文化大革命”集训班,不少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运动发展到后来,由于对基层党组织的态度不同、对批斗对象认识各异,学校师生员工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保皇派”)。为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工作组提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诸如“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等。这引起了一些情绪偏激的造反学生的不满,以致发生学生轰赶工作组的现象。有些学校出现抨击工作组的大字报,青阳中学还对工作组成员进行了批斗。

7 月,中央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产生分歧,28 日,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8 月,接上级通知,地、县各中等学校工作组开始陆续撤离。工作组撤离后,由各校师生员工民主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负责领导本校的“文化大革命”。对重

点学校由各县县委派出观察员。

经过两个月的初步发动,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专区的学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部门发动了起来。但并未得到多数党政干部和广大学生、教师的理解和支持,“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也受到不同程度抵制。池州的这种情况与全国大多数地方大体相同。毛泽东觉察后,认为破除阻力使这场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需要对“文化大革命”做进一步的发动。于是,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意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纲领性文件。

为贯彻“十六条”,8 月 10 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全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六条”的高潮。

池州地委迅即召开地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贯彻,要求领导干部“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并以 49 号文发出《关于组织学习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意见》。在地直 17 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传达省三干会议精神的会上,地委书记胡坦还代表地委就前期“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做了检讨。9 月 1 日,地委与贵池县委联合召开万人大会,要求全区人民群众认真学习中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敢”字当头,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会后,各县“闻风而动”,纷纷召开会议并付诸实施。池州“文化大革命”就此全面推广开来。

二、红卫兵破“四旧”[①]和大串联

由于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一些别有用心人的煽动,被称之为“勇敢的闯将”的红卫兵,迅速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巨浪,在校园

①“四旧”:即“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内张贴大字报,批斗出身不好的教师与校领导。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后,他们又冲向社会。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运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破“四旧”,八九月间,池州红卫兵运动由专区所在地贵池迅速向各县蔓延,辖区内所有红卫兵纷纷冲出学校,走上街头、拥向社会。他们打出“造反有理”、“兴无灭资”的旗号,不分皂白,肆意妄为。只要在他们看来是所谓的“封、资、修”货色,统统都在破除、横扫之列。他们以简单、粗暴、蛮横的手段进行“打、砸、烧”,以致境内九华山的一批寺庵和佛像、青阳的宋代古塔和贵池的万罗山、齐山以及东至的陶公祠等多处文物古迹遭破坏;民间古典戏剧服装、文物、字画、善本、著作被焚烧;就连房屋、家具、衣物、器皿和装饰品上带有龙凤花鸟的图案也要剔除,足见其对传统文化艺术摧残之深。运动过程中,红卫兵还以“破旧立新”的名义,将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改为“兴无灭资”的新名称,美其名曰立“四新”①。例如:将池城的九华街改名为“东风街”,牌坊街改名为“解放街”,市心街改名为“四新街”,翠微街改名为“红光街”,郭西街改名为“红星街”,楼山街改名为“红旗街”,包公井改名为“四新井”,齐山改名为“红旗山”,池州师范的状元桥改名为“立新桥”,杏花村酒厂改名为“贵池酒厂”等。其时,各县改名之风也随之兴起,不仅改地名、街名、路名、桥名,有的甚至连人名也改了,青阳县就有 65 位干部、职工改了自己的名字。破“四旧”发展到后来,甚至妇女的头饰发型、衣着打扮都在破除之列,剪长辫子、剪烫发、剪小脚裤管、剪彩色裙子等严重违法行为屡屡发生。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为,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浩劫。红卫兵还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被查抄对象中,除地、富、反、坏、右、黑帮等六类分子外,还有台属、港属、侨属、知识分子等,红卫兵将他们揪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并勒令他们交出变天账、金银珠宝及枪支弹药,还闯进私宅任意搜查。运动发展到后来,一些被诬蔑为“牛鬼蛇神”、

①“四新”:即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黑帮”、“修正主义分子”的民主党派、民族宗教界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遭到揪斗、游街甚至殴打。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受到严重破坏。破“四旧”抄家风造成无政府思潮泛滥,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级党组织和多数干部群众的不满与抵制,但却被视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在破“四旧”的同时,红卫兵还掀起了大串联活动。9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6日,省委制发《关于组织我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赴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池州专区分配有学生代表1100名、教职工代表110名。各县按专区分配人数,由干部带队,于10月至11月间,分期分批赴北京参观、学习,接受毛泽东检阅。

10月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影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池城举行隆重首映式,随后到各县巡回放映。片中的场面使得红卫兵大串联的欲求急剧上升。11月初,辖区内尚未外出的红卫兵开始纷纷自发组织外出串联。其流向遍及全国各地,除北京外,多数去了革命圣地,如井冈山、延安等地;也有的去了历史文化名城和当时全国闻名的红旗单位大庆、大寨等地,甚至有的还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路线徒步进行串联。

当时,“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到我地进行革命串联”的横幅、标语随处可见。各地各级领导都把接待红卫兵“大串联”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11月19日,地委专门成立接待站,负责对造反派和外地串联学生的接待工作。并要求贵池县招待所停止对外营业,全力接待外地赴池串联的红卫兵。

由于“大串联”严重影响了正常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也受到直接影响。11月下旬以后,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串联。至年底,池州外出串联的学生、红卫兵陆续返回。但全国“大串联”直

至1967年二三月才逐渐停止。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场号称“大串联”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成了社会“大动乱”的前奏。

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池州各级党组织的瘫痪

在红卫兵“大串联”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10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指出:“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社论首次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日,中共中央将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要求坚决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接着,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林彪、陈伯达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讲话被大量印发,全国由此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11月9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全省展开。批判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主要领导。

此前的10月3日至6日,地委书记胡坦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委、市委书记会议。会后池州迅速传达贯彻。主要精神是号召到学生中去,欢迎“炮打司令部”,团结一切革命的左派,团结大多数,按照“十六条”规定,完成“一斗二批三改”[①]任务。“一斗二批三改”迅速升级为

①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定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

迫于当时形势,11 月 19 日,地委第四十四次会议研究增设了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此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与当时池州尚能维持工作的各级领导抑制动乱的努力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种种越轨、不法行为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都可以不受约束,而对这种行为的干预却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从而使整个社会陷于不断的动乱之中。机关被“炮打”、冲击,干部被揪斗、围攻的事件不断发生。

其实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提出之前,池州的造反派并不多。成就池州造反派发展的始作俑者是安徽“八二七”造反组织的一些人。他们在“大串联”期间,到池城“煽风点火”,追随者闻风而动,此后,“池州一一八造反队”、“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等一批造反组织相继成立。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逐步深入,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其中有学生、工人、农民、机关职工,也有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还有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受过批判处理的一些人,可谓五花八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造反的群众或义无反顾,或小心谨慎地投入运动。他们从不同目的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前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状态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

11 月初,贵池街头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8 日,地委机关门口贴出批判地委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此后的几天里,贵池中学红卫兵和地直机关、贵池县直机关群众造反组织,纷纷向地委书记胡坦、贵池县委书记张成钧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由此及彼,无限上纲。其他各县也相继效尤。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方式是写大字报。11 月 18 日以后,池城的沿街墙面几乎全被大字报所覆盖。各造反派组织纷纷亮出自己的“见解”,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由于意见相悖,进而进行反驳,

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以致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1967 年 1 月 15 日,造反派之间发生摩擦,“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捣毁了“人民赤卫队”群众组织。

1 月 21 日,青阳县杨田、朱备农民造反组织与青阳蓉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因批斗县委书记王克东发生冲突,“安徽大学八二七造反队”部分在青阳学生“煽风点火”,电邀相邻市、县支援,于是 4 万余人拥进蓉城,砸抄机关,打伤、扣押百余名干部和群众,粮食、商业及饮食服务业遭受重大损失,时称“一·二一”事件。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各地造反派都把攻击矛头指向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从专区到各县,党政机关几乎全被冲垮,领导部门陷于瘫痪、半瘫痪,党团组织也停止了活动。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当北京、陕西发生的揪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事件推向全国后,池州各地从 3 月下旬起也刮起“抓叛徒”之风,致使一些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因此蒙冤受屈,身陷囹圄。

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发的造反浪潮,不可避免地对专区工农业生产形成较大冲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本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但是 1966 年 12 月在林彪、江青直接干预下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两个文件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文件直白“允许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联”等,把运动扩大到工厂、农村。紧接着,安徽省委、省人委于 1967 年 1 月 12 日又印发了《关于欢迎和支持革命师生下乡下厂进行革命串连的通告》。这样,在工厂、农村建立群众造反组织,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厂矿、社队之间进行串联等做法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并且同学生造反浪潮相互呼应,推波助澜,导致对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也是导致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此风波及池州后,各地厂矿、社队的群众组织也纷纷起来造反,搞

“停产闹革命”。面对哄然而起的群众运动,各级管理生产的负责人仍主张生产绝对不能停,以致矛盾日趋尖锐。此后,专区各级、各部门主管生产的干部,上至地、县领导人,下到车间主任、生产队长,或遭批斗,或“靠边站”,大多受到冲击,有的甚至还被打成“三反①分子”。这样闹腾起来、泛滥开去,经济工作自然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2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下发后,3月1日,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1日至2日,召开第一次全省农业生产三级干部会议。② 会议要求全省干部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全省春耕生产新高潮。

当月,池州专区成立了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同时,各县也相应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以上机构的建立,试图对某些极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生产局面能够得到控制,对稳定经济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中,即便成立了这样的机构,也难达到预期成效。而愈演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致全面夺权,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

第二节　内乱升级与控制内乱的努力

1967年年初,以上海“一月夺权”为发端,拉开了全国范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序幕。二三月间,“全面夺权”的风暴在池州掀起,全区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被派往池州执行“三支两军”的部队和指战员,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1968年8月,地、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全区动乱的形势开始趋于缓和。

---

①“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②这次会议是“一·二六”夺权后由“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主持召开的。

一、夺权风暴

1967 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称: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进攻”。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首开由造反派组织夺取地方党政领导权的先例,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 月 26 日,“合肥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安徽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处”、“安徽省军区全体革命军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省委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部”、“省直机关革命造反兵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皖联络站”、“全国赴皖革命串联总部”等 28 个造反派组织,在省人委大院联合召开夺权大会。“夺权通告”宣称:把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统统夺过来。会上还宣读了所谓“罢官通令”,宣称“自 1967 年元月 26 日中午 12 时起,正式罢掉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桂蓬,原中共合肥市委书记杨效椿,原合肥市市长赵凯的官,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交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监督改造”。27 日,《新安徽报》发表《全面大夺权的高潮到来了》、《群众罢官好得很》两篇社论,鼓动全省造反派开展全面大夺权。

当夺权的“捷报”频频传来时,池州的造反派早已躁动不安、跃跃欲试。2 月 19 日,“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举行夺权大会,宣布自即日起“接管”中共池州地委、池州专署党、政、财、文等一切领导权。随即,地委书记胡坦、行署专员方振华及其他地级领导人被“罢官”押解上街游行。

继后,夺权之风席卷全区,所辖铜陵、贵池、青阳、东至、石台等县的县委、县人委的领导权相继落入当地的造反派组织手中。事态的发展还远不止如此,在其后的日子里,从学校到机关,从工矿企业到城镇

街道、农村社队,夺权斗争仍在继续。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争相占领党政机关,抢夺公章、扣押甚至绑架干部。多数企事业单位乃至城镇街道、农村社队干部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罢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蜂屯蚁聚”,各派之间互不相让,在夺权派同倾向于支持原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在这一派夺权组织同那一派夺权组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样就造成一种态势:许多地方在全面夺权过程中,为“争权”、“抢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层出不穷且不断升级,“打、砸、抢、抄、抓”横行,大小山头迭起、各种派别林立,从而引发内乱不已、争斗不息的无政府主义狂潮。

无法无天的造反、夺权,不仅使池州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残酷迫害,而且引发多次武斗和流血事件以及冲击驻军营地抢夺枪支、抢劫银行等恶性事件。

7月27日夜,“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与“池州八二七造反司令部”发生大规模武斗,闹了个通宵达旦。

8月19日,“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头头率众冲进池州军分区独立连驻地抢走一批枪支弹药。

9月,某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窜进贵池县百货公司仓库,劫走价值万余元的物资。

12月26日,“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头头率众由广阳进入石台县城七里,劫走石台县人民银行人民币90649.37元(后被驻军追回84864元),长、短枪各1支,子弹70发。

以上一系列严重事件表明,严重内乱的局势已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在此期间,大批党政领导直至基层干部普遍被批斗、打倒,工业、交通受到严重冲击,广大城镇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池州专区处于最混乱、最艰难时期。

二、实行“三支两军”

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武斗战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正常的生活秩序难以维持。这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这样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是毛

泽东没有料想到的。为制止武斗,维持起码的生产、社会生活秩序,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 月 19 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据此,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并且承担起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的任务。

实行“三支两军”是当时迫不得已而采取的非常措施。5 月,首批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属总参谋部 121 部队由龙安率领 30 名指战员进驻贵池、青阳“支左”。同期,部分 331 部队指战员进驻池州及所属各县“支左”。后 183 部队进驻石台县七都、兰关,121 部队先遣连被派往贵池、铜陵、东至等地。“支左”部队进驻后,与池州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联合对所在地电信、广播、气象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1968 年 10 月底,进驻池州的“支左”部队做了一些调整,由高英率 331 部队一百多名干部及 1 个连队接替 121 部队,由吕玉堂率 395 部队干部 300 余人和 1 个连队接替 331 部队。

当时,池州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正甚嚣尘上、武斗频仍。可以说,“支左”部队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由于解放军指战员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长期所受的传统教育又使他们难以理解和认同“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种种极端行为。“支左”之初,绝大多数部队干部战士倾向于支持那些党员多、老工人多、干部多、比较注意政策的群众组织,对与之相反的组织则持冷淡、消极的态度,这非但不能平息派别对抗,反而使自身也卷入派性争斗之中,更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7 月至 9 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发表谈话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还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

错误的时候。10 月 7 日,党中央转发了毛泽东视察期间的部分谈话内容。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从这时起,军队的“支左”实际改为支持两派群众组织,推动和促进各地区、各部门的“革命大联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还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中央一些报刊也配合发表文章,强调应认清派性的反动性,号召围剿派性、打倒派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种对派性大张旗鼓地批判,实际上是承认各地造反派普遍犯了错误,在肯定他们“造反”、“夺权”的前提下,对他们转而采取“批评、帮助”的态度。

一旦对极端行为、极左分子进行批评和约束,广大干部群众对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愤懑便公开表露出来。1967 年年底至 1968 年年初,池州各县先后出现“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标语,2 月,南京军区通讯总站青阳分站战士申屠龙德在县城老十字街跳上宣传车,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文化大革命!”等口号,当场被逮捕,9 月被处决。①

类似池州出现的这种公开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当时在全国各地也都频繁出现。如上海市一群众组织同期也相继贴出怀疑和批判江青、张春桥,并反对造反派极端行径的大字报。这类情况的不断发生,引起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恐慌和仇视。3 月中旬,江青在多处场合宣称:目前在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要求各地“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使一些地方脆弱的“大联合”顷刻瓦解,内战再起。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发生在广西和陕西等地的恶性事件先后发布了“七三”、“七二四”布告。8 月 12 日,池州专区革委会遂做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把领导和组织两个布告的学习、宣传、贯彻作为当前突出的中心任务,这是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表现。要以“七三”、“七二四”布告为武器,稳、准、很地打击一小撮阶级

①1980 年 4 月,原南京军区为申屠龙德彻底平反。

敌人。

这时,部队“支左”处在“右倾翻案”与反“右倾翻案”之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池州“支左”部队能够在这种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为制止武斗、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促进“革命大联合”、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1968 年 3 月,各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先后成立,由军队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

在池州地委和军分区 1972 年 1 月 12 日至 14 日召开的池州专区“三支两军”工作座谈会上,对“三支两军”工作给予了肯定。认为“三支两军”人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牢固树立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思想,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表现突出。会议重申,池州军分区三支两军办公室也就是池州地委的三支两军办公室,接受地委和军分区党委的双重领导。地委常委会和军分区党委常委会于 1971 年 12 月 30 日研究决定:地委常委、军分区副政委王明兼任三支两军办公室第一主任。座谈会还讨论了“支左”经费和“三支两军”人员的住房、食宿、医疗、生活福利和探休假问题。①

“三支两军”工作至 1972 年 8 月结束。应当肯定的是,被派往池州专区执行“三支两军”的部队指战员为稳定池州局势功不可没,他们不仅给池州专区工农业生产以大力支援,而且做了大量拥政爱民工作。他们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拉粮、运煤、送菜,保障商店、饭店、旅店和影剧院的正常营业,恢复交通,对要害部门和重要设施加强保护,从多方面减轻池州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在可能的范围也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池州造成的破坏。

三、地、县革委会的成立

经过“夺权”后持续一年多的动乱在驻池“支左”部队的努力下,池州两派武斗终于偃旗息鼓,化干戈为玉帛。各地群众组织通过“大办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池州专区两大派头头曾赴合肥参加“毛

①引自 1972 年 1 月 24 日《池州地区三支两军工作座谈会议纪要》。

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大联合”的热情逐渐高涨起来。1968 年 3 月 12 日,池州专区及贵池县两大派造反组织达成联合协议,组成池州专区暨贵池县两大派大联合委员会。其时除石台县于 1 月 17 日已实现“大联合”外,东至、铜陵、青阳县也都在 3 月相继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

7 月 21 日,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高英①,副主任荣超、林少武、武建周、龙冬花(女)。在 7 月 25 日池州专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还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② 专区革委会实行高度集中的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内设机构主要为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通常称“四大组”)。“四大组”又分设若干小组,如办事组设秘书、调研、行政、外事、政工等小组;政治工作组设秘书、组干、宣传、文教卫、群工等小组;生产指挥组设综合、经济计划、工交、财贸、农业等小组;人民保卫组设秘书、政保、治保、审判等小组。专区革委会的成立,取代了原地委和专署的职能。

专区革委会成立时,对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精简,一部分被派到农村搞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下放农村插队落户,进行劳动锻炼。

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专区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委会议,专区大联委委员列席会议。会议在传达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以及《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和《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之后,分析讨论了当时的形势。会议认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池州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已经把旧地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一个个地揪了出来。革委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地更加猛烈

①1969 年 5 月吕玉堂接任。

②1971 年 3 月 29 日,省委批准将所辖专区改为地区,从此,池州专区革委会改称池州地区革委会。

地进攻。要以革命大批判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批倒批臭。在斗争中狠抓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工作,加速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使各级革委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战斗司令部。会议还强调池州专区是全省重要的经济作物区,要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战略方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加强劳动纪律,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蚀,节约闹革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8月1日,会议通过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和《关于实现革命化的暂行规定》。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群众动员大会,点出了地委第一书记胡坦等所谓一小撮叛徒、特务、黑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号召要紧紧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打主动战,打进攻战。会议还就筹建四代会(工、红、贫、妇)和革委会机关编制(草案)等项事宜做出了决定。①

在专区革委会成立前后,全区各县也陆续成立了革委会。至8月,实现“全区一片红”。

1968年4月6日,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青阳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陈铭,这是专区最早成立的县级革委会。

4月28日,经省革委会批准,东至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冯福铭。

5月25日,经省革委会批准,贵池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刘克勤。

8月1日,经省革委会批准,石台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黄跃进。

同月,铜陵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石励。

革委会的建立以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政领导体制为前

①引自《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综合报告》和《决议》。

提,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畸形产物。尽管它被认为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举”,却不是经过群众代表选举产生的。它虽然不能不承担起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职能,但由于其仍然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这些职能也就不可能放到应有的位置;加之革委会成员的构成虽说是“军、干、群”三结合,但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他们对地方工作并不都熟悉,所以驾驭全局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特别是一些造反派骨干进入各级领导部门,他们大多既无党政领导工作的经验和能力,也没有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觉悟。所以,革委会体制上的弊端及其成分的严重不纯,也就注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成为政治体制和行政工作的一次倒退。但从当时的情况看,革委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池州的动乱局面,它也承担起了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

1967 年 12 月 2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1969 年 2 月至 1970 年 1 月间,专区暨各县党的核心小组相继建立,在专、县革委会中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

1972 年下半年,在地方党委、革委会任职的军队干部开始分批回部队。1973 年 2 月,地区及各县革委会人保组先后撤销,相继恢复人民法院、公安局建制。1976 年 1 月,“四大组”(其实只剩三大组)及其各小组撤销,改设革委会办公室和直属部、委、办、局、行等工作机构。

专区革委会成立初期,各级群团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一度被撤销,由本级革委会的政治工作组群工小组做群众工作。1968 年,各县先后建立“三代会”(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1969 年 3 月 23 日前后,池州专区建立了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委员会和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专、县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分别取代了原同级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共青团组织。1971 年,各县先后恢复共青团县委。1973 年,复建共青团池州地委。同时还逐步恢复了地、县两级工会、妇联等组织,并将贫代会改为

贫下中农协会。至此,工、青、妇、贫组织在池州建设和社会生活中重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随着各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和党组织及群团组织的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巩固胜利成果”阶段。1968 年 9 月,省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当前摆在我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由此,池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即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第十七章

“斗、批、改”运动和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九大向工、农、商、学、党、政、军、民各方面、各单位都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在这一阶段,池州专区一方面通过全面的“斗、批、改”落实政策、加强团结,恢复正常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另一方面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方针,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天下大乱”造成的破坏创巨痛深,留下的矛盾堆积如山,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斗、批、改”运动在许多方面继续制造着混乱,又使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突出出来。这期间,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同时,经过整党,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各县县委陆续复建。

第一节　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池州专区重建后不久,1966年2月,地委就曾向地直和各县传达贯彻省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示》。4月,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着重研究县以上干部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领导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地委同贵池县委联合举办

了《毛主席语录》首发式。从此,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区逐步开展起来。当时,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学以致用,团结战斗的气氛空前浓厚,这对重建后的池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党的九大提出“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号召,池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阶段。1969 年 11 月,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的指导思想和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坚决贯彻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狠抓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800 多名代表汇聚一堂,总结交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掀起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革命竞赛热潮。

1970 年 9 月 28 日,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省革委会 9 月 20 日大会,迅速在全区范围内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群众运动高潮的几点意见》。《意见》要求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 4 篇哲学著作与光辉的“老三篇”作为当时主要学习内容,每周三、五为学习日,每月至少开一次讲用会或不定期地开专题讲用会。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自觉改造世界观,提倡带着一个问题,学习一个观点,明确一个思想,学出新成果。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要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作为经常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检查、总结和部署,凡召开各种会议、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都应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

1971 年 1 月,全区召开了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

3 月,吕玉堂在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毛主席著作发行量空前增加。“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区印刷、发行毛主席著作 190 多万册,做到了人人都有红宝书。1969 年 9 月,专区下拨 10 万元用于广播基本建设投资,农村社队基本

上实现社社队队通广播,使千家万户都能及时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两年多时间,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出席公社以上“三代大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的代表共82000余人。

遵照毛泽东“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教导,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中,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重要内容。1968年3月,专区两大派头头赴合肥参加“万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后的一段时间,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为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当然选择。全区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普及城乡,越办越好。到8月止,共办了40928期,参加学习的达1565520人次。在1969年6月地、县两级中层干部参加了全省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后,根据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指示精神,于1970年11月28日成立了池州专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作为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直接领导下的常设机构,下设教学组和行政组。自1970年6月起,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分期分批组织公社党委、专直党委、支部委员会成员到大渡口专区“五七”干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办了5期,每期15—20天,参加学习的总共1500余人。同年还举办了4期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客观地说,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对于池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更全面地发展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林彪别有用心的炮制所谓的“突出政治”、“顶峰”、“最高指示”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一套“左”的做法,使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以致池州在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问题。1968年9月起,池州一度普遍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全区机关、团体、学校和农村社队,都以一定的仪式在毛泽东的标准画像前,向毛主席“早请示、晚回报”和“天天读”。规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时候要跳“忠”字舞、唱《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歌。直到1969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光辉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这类

现象才得以纠正。

1972 年 9 月 5 日,地委制发《关于进一步抓好地、县领导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意见》,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消除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负面影响,紧密联系实际,学出更新的水平。此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节 “斗、批、改”运动的全面展开

党的九大之前,毛泽东曾经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九大的部署以及省革委会的要求,池州专区在 1969 年政治工作规划中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伟大的“斗、批、改”中,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并就此开展了一系列运动,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当时的理由是为了建立一支所谓“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清理对象是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及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

在极左思潮泛滥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清队”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不仅如此,一些主持其事的人和“群众专政”组织的头头还提出“宁严勿宽,宁多勿漏”,说什么“左”一点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左”只不过误伤几个好人。右了就要漏掉坏人。以致许多人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制造出的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各地掀起“上挂下联”,把层层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本地、本系统、本单位的代理人,作为“清队”一项首要政治

任务进行部署。1968 年 9 月,池州专区革委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搞好斗、批、改,彻底揭开旧地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斗争矛头直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池州的代理人,即原地委主要领导人。10 月,原地委、专署领导人和地直大部分中层领导干部被送到东至县大渡口池州地区“五七”干校,以办学习班的方式开展“大批判”、“清队”。随后,各县根据专区革委会的统一部署,也都按套路进行。如:东至县集中县直机关近 300 名干部到“一〇四”干校(河溪农场)办学习班;贵池县集中县直机关干部到桃坡公社峡川大队办学习班;青阳、铜陵、石台 3 县也分别办了类似学习班。这些学习班如法炮制,矛头指向也都是县委的原主要领导人。当时,在学习班被揭发出“有问题”的人,统统被指责为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或被关押、审查;或被“群众专政队”实行“群众专政”。对许多领导干部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清队”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在没有法治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运动的成绩往往是按挖出的“敌人”的数量来衡量。根据省革委会人保组 1968 年 12 月 6 日提出的一个所谓“清队”标准:要搞清每个单位中每个人的政治历史面目,弄清每个单位解放后历次发生的政治事件。在这样宽泛的清理打击中,许多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青阳县南阳公社清查出的“中国社会进步同盟委员会”反革命集团组织,挖出的成员不断变换和增添,先是 23 人,后为 41 人,最后涉及 240 多人。结果经专区革委会和青阳县革委会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这个所谓反革命组织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当地群专组织屈打成招的结果。①

与“清队”相联系,全区还进行了大量的清查敌伪档案工作。从 1968 年 11 月底专区召开第一次清档工作会议到 12 月底,全区需要查对下落的各种敌伪人员多达几万人(不含外省外县),1969 年 1 月 19 日,专区革委会又召开了第二次清档工作会议。由于这项工作与“清队”紧密关联,用中发(1968)27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

①青阳县委 1979 年 2 月 5 日已予平反。

案工作的指示》中的话说,清查敌伪档案工作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所以,即便工作量再大,这项工作都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直到9月13日,专区革委会还发了《关于紧跟形势,加快步伐,继续搞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通知》。

伴随着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深入进行,池州专区遵照省党的核心小组对深挖帝蒋特务工作的指示,结合开展了深挖帝蒋特务工作。专区革委会人保组于1970年11月2日至5日召开了深挖帝蒋特务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从4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大造革命舆论,摸清底子。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深挖帝蒋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宣传党的政策,大造革命声势。同时做好层层摸底排队工作,初步掌握本地区特务组织情况和特务分子的底数。二是层层发动群众,广泛检举揭发。各级深挖帝蒋特务办公室要及时搜集整理材料,重要线索立即报告本级革委会(核心小组),组织专案力量进行侦查。三是调查核实,对号入座。按照清查出来的特务分子名单,全面查证、个个落实。四是组织处理,汇编资料。对深挖出来的特务分子,要查清罪恶,做出结论,视其罪恶大小,研究处理。查清的特务组织,分开类型汇编成册,建立好档案资料。充分利用材料对敌开展政策攻心战,促其坦白交代,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各地掌握阶级斗争主动权,将深挖帝蒋特务工作抓紧、抓细、抓深、抓到底。

这样一来,“清队”工作无形中又多出一批“阶级斗争”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为某些派性争斗、心术不正的人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

在“清队”运动中,反复强调充分发动群众、必须搞“群众运动”,由此,专直单位和各县群众专政组织普遍建立起来。由于“清队”中赋予“群众专政”组织很大权力,因此定案阶段在群众揭发、群众审查、群众批斗、群众定案、群众看管的情况下,造成乱拘乱捕、乱批乱斗的现象。

1968年年底,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省长黄岩、副省长张恺帆被省“大批判小分队”押至贵池进行巡回批斗。到1969年年初,专区机关干部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有69人,

占专区机关干部总数的19.6%。其中中层领导干部28人。1970年2月,省革委会“大批判小分队”巡回报告团到池州“传经送宝”,报告团中的马鞍山钢铁厂第一轧钢厂、南山矿机加连、濉溪县锺楼公社青杨大队东程清生产队、合肥市铜陵路百货商店等多个“大批判小分队”逐个介绍了“经验”。[①] 嗣后,池州各地纷纷效仿。石台、贵池县革委会在县公判大会后,将宣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至全县各公社巡回进行批斗。在这种氛围下,被“群众专政”的人数迅速增加,各县清出的人数以千计,就连人口最少的石台县居然也清出各类“阶级敌人”逾千人。其他各县不用说远比这个数要大得多。

因“清队”运动打击面太大,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注意掌握政策的指示。3月2日,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召集专、市革委会和“支左”部队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地对被群众专政关押的对象立即进行清理,凡不是杀人、放火、投毒等现行犯罪分子,都要坚决放掉,并迅速开展内查外调搞清问题。3月21日,省革委会在召集落实政策紧急会议之后,组织落实政策检查组到各地进行了检查。

为落实政策,池州专区革委会于4月28日至5月5日在青阳县召开了全区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会议。专、县革委会负责人,人保组组长,专案工作人员,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社队干部以及部分厂矿代表共128人参加会议。会上印发了25份书面发言材料,有12个单位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准”是关键,只有“准”才能保护群众、才能对敌人打击得“狠”,并就“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问题形成了一致认识。5月11日,专区革委会还转发了专区机关专案组《关于审理定案工作的专题报告》。《报告》被认为体现了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了无产阶级

①引自1970年2月11日《池州报》。

政治,是一个比较好的经验总结。《报告》阐述的突出做法是在最后审理结案中把握三点,即一吃、二量、三见面。“一吃”就是吃透两头。一头是吃透案情,切实搞清每一个问题的时间、地点、具体情节,看是否合情合理、有无矛盾;另一头是吃透政策,领会精神实质,掌握政策分寸,坚持按政策办事,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二量”就是心中有一把尺子。衡量能否结案,掌握的结案标准是事实清楚、“三证”俱全、性质明确、手续完备。“三见面”就是最后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

为加强对审判定案工作的领导,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和问题,更好地落实“清队”中属于敌我矛盾案件的定性和处理工作,11 月 2 日,专区革委会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专区审批定案领导小组。林少武任组长,张汝权、孙登勋任副组长,陈洪甫、张念本、童天俊、刘永安为组员。1970 年 2 月,增补孙立猷、施前进为组员。在领导小组的作用下,压缩了“清队”中膨胀的空气,修正了一些过火做法。

通过落实政策,对抑制极端化倾向、稳定局势、缓和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它并不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思想的纠正,这就决定了不仅纠正扩大化的努力不可能进行到底,只要“清队”还继续,就有出现大的反复的可能。接后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一打三反”运动

当“清队”尚在进行时,1970 年 1 月至 2 月间,中央连续发布了 3 号、5 号、6 号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3 个文件。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认真进行贯彻,部署全省“一打三反”运动按 3 批进行,第一批约占三分之一,先行在 1682 个单位开展。全省组织 3 万多人的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重点和试点单位。

其实,此前的 1 月 11 日至 21 日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就曾部署在全省范围内立即掀起一个以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为中心的群众性的“四反”运动。当时,芜湖

市率先响应,接着从安庆、铜陵、池州向各专市推进。为此,池州专区革委会连续开了4天常委扩大会议,检查了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情况,分析了全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动向,讨论部署开展以“四反”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2月2日,专区成立了7人组成的“四反”领导小组(组长江声,副组长张健邦、刘健农),下设办公室(江声兼主任,副主任施前进),并要求各县也要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尽管这个先行的“四反”运动开展时间不长,但正好为“一打三反”运动做了铺垫。

2月底,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将“四反”运动并入“一打三反”运动,并于3月1日、13日和30日印发《关于当前“一打三反”运动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斗争对象审批权限的意见》和《关于当前“四大”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运动展开后,东至县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大搞群众运动,掀起了“四大”高潮,揭发出了大量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3月1日,东至县召开18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处决了两个现行反革命犯,同时判处了9个现行反革命犯、贪污盗窃犯和其他罪犯,当场宣布逮捕12个反革命集团犯,震动很大。4月13日,专区党的核心小组批转了东至县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打好“四大”纵深战意见的报告》。

4月25日,按照省革委会统一部署,全区参与省统一行动,由各地党政主要负责人带队指挥,从当日的零时开始,全区范围内进行了连续3天的突击政治大清查。120450人的清查大军怀着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培训后的激情,浩浩荡荡地开赴城乡各地进行清查,并重点对“有问题”的1237人进行了抄家、搜查。据清查后的不完全统计,缴获的罪证和赃款赃物有:现金37193元、粮食18135斤、粮票27813斤、棉布6940尺、布票3360尺、黄金7.2两、银圆1460块、金银首饰1901件、收音机37部、反动文件(含日记、信件)1048件(本)、敌伪证件322份、变天账177本、田房契478份、伪造公章10枚、枪(含土枪)21支、子弹1960发、手榴弹11枚、雷管212个、炸药185斤、凶器151件。

5月22日至24日,专区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各县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传达了省党的核心小组关

于当前“一打三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和芜湖会议精神,检查了前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分析了形势,讨论了当前运动中的突出问题,并形成了题为《关于当前“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专、县党的核心小组和公社党委又分别召开会议,传达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通知和芜湖会议精神,重新学习中央 3 个文件,分析形势,对照检查,查认识、查姿态、查作风、查斗志,联系思想实际认真找出差距、订出有力措施。各地均表示以“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决心,把“一打三反”运动搞深、搞好、搞到底。

9 月 6 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再次吹响了“一打三反”运动的进军号,在大学习、大宣传《公报》的基础上,专、县领导开始调整思路,决定以狠抓后进地区和薄弱环节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专区对重点社队派出宣传队员 854 人(到 11 月中旬,宣传队员增至 1134 人)。9 月上旬和 10 月上旬,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先后召开了专直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和各县人保组长及“四反”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后一个会议上,专区核心小组副组长荣超做了题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的讲话。10 月中下旬,各县分别召开会议,自上而下层层布置。11 月 7 日,荣超在各县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会议上,再次强调一定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随后,“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区的点上、面上同时开花,但侧重点依然放在重点单位和后进单位。例如,石台县林业系统有职工 276 人来自全国 5 省 51 个县,有的政治面目不清,由于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运动未认真开展起来。石台县委决定将林业系统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充分发动群众,掀起“四大”高潮。运动开展起来后,基本上揭开了县林业系统阶级斗争的盖子。紧接着,专区又在石台县召开了政保工作座谈会,组织全区性的侦破战役大会战,很快就破获了 78 起政治案件,同时还破获了 12 起积案。①

1970 年 3 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①摘自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 1970 年 12 月 26 日《关于当前“一打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

的通知》,使池州自 1968 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运动再次被推向高潮。尽管这场来势凶猛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声势浩大,由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组织在池州根本就不存在,因此,蒙冤受屈的“嫌疑人”倒是抓了不少,直到 1975 年运动结束时也没查出涉案人员。1975 年 7 月 23 日,地区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在《关于我区清查“五·一六”情况的报告》中曾做如是说:“经过多年的清查工作,我区未发现有‘五·一六’分子,这个结论是符合池州地区的实际情况的,我们决不能因此怀疑或低估开展清查工作的必要性和这次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酿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在许多人心中仍留下阴影。

三、开展“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育开始,“十六条”中明确规定“斗、批、改”包括“教育改革”。正是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对教育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结果造成了对教育的严重破坏。池州在这方面同全国一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等院校停止招生,学生“停课闹革命”。在当时形势下,池州各地的幼儿教育被视为“修正主义温床”而全部停办。① 50 年代后期发展的耕读小学也都因之而解体。经过长期艰苦创业积累起来的校舍财产、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也随之损失殆尽。

“停课闹革命”一直延续到“夺权”之后。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指出:广大革命师生应当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一语破的,复的

①1970 年,又一度兴办所谓“红儿班”,不开展幼儿教育教学,只输“文化大革命”内容,不久解散。

是“毛泽东思想”的课,是“阶级斗争”的课。喊口号、写大字报成了学生所要完成的作业。

毛泽东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明确要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教育革命”首要内容是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在“教育革命”首先“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要求下,1968年8月,全区除地直和各县城中小学、文化事业单位进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外,农村学校则进驻“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从这时起,各类城镇学校普遍实行以工(军)宣队、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领导体制,农村中、小学则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组)。由宣传队领导这些学校、单位的“教育革命”、“斗、批、改”和一切工作。这就从体制上否定了校长、教师在学校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而进驻的工人、解放军、农民代表又普遍缺乏对教学工作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只能围绕“斗、批、改”搞些忆苦思甜、回忆对比等,对教学工作造成很大影响。

改革花样翻新。首先,“为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学校“下迁”农村。1968年,全区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生产大队,并在大队完小普遍设立初中班。同时,还将农村的公办中学一分为数处,名曰“分校”。

其次,教育革命的另一项内容是缩短学制。按照省革委会的部署,全区实行学制改革,小学改为五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二年制,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本来学制缩短后,学生学习的时间就少了,可偏偏还“开门办学”,“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和“学工、学农、学军”。结果全区所有完全中、小学几乎都成了“半耕半读”学校。以致群众议论说:“只见学生扛锄头、拿镰刀,不见学生背书包。”教学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小学的语文、政治教材用《毛主席语录》代替,取消美术、体育和手工课,中学取消外语和历史、地理课,数学课也进行了改版。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6月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

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把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作为第一条件，不仅“走后门”上大学成风，助长了一些干部以权谋私；而且将相当一部分优秀青年拒之校外。如此这般的所谓“教育革命”，使正常的教学无法开展，广大教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难以发挥教学专长。况且“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内容凌乱、水平低下，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滑。

尽管如此，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池州地区大多数教师还是能恪尽职守、诲人不倦，默默无闻地工作；多数学生也能努力学习。

1971 年 4 月至 7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再次给教师以沉重打击，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 8 月至 9 月贯彻这个《纪要》的过程中，全盘否定了全区 17 年来的教育工作成就。《纪要》的这“两个估计”，严重背离实际情况，长时间成为广大教师乃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此后，很多教师被打入另册，越来越多的教师被批斗甚至关押，对广大教育工作者造成严重伤害。

1973 年年底至 1974 年年初，江青一伙又抛出“一个小学生的来信与日记摘抄”和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池州地区中小学由此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活动。并发动各学校检查类似情况，教师又一次受到打击。贵池县就曾出现所谓“红旗小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事件。1974 年 3 月，《池州通讯》编辑小组带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框框，主动邀集地区教育局、贵池县教育局、里山公社组成联合调查组到贵池县里山公社红旗小学进行调查，抓住教师朱银虎在教学工作中的缺点做文章，于 3 月 25 日在《池州通讯》上发表了红旗小学 6 名学生的所谓来信和署名联合调查组的调查附记，并加了《编者的话》。在《编者的话》和报道中，完全以极左的腔调，抓辫子、戴帽子、

打棍子,大批所谓红旗小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严重回潮,教师朱银虎被斥为“师道尊严”、“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开倒车”、“走回头路”等,从而在全区造成很坏的影响。① 一时间,全区许多学校出现了校长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于是“读书无用”的思想进一步泛滥开来。

“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的这场“教育革命”,过多强调劳动实践、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极大地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造成了各方面人才的青黄不接。

四、文艺革命

文艺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灾区,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由文学艺术批判开始的。在“封闭”和“高压”背景下进行的所谓“文艺革命”,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

池州原本就有“千载诗人地”的美誉。人文积淀、钟灵毓秀,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大革命”前,在各县县委的领导和县、乡(公社)文化部门的指导下,区境农村业余剧团兴起,鼎盛时有 400 多个,演职员 6000 余人。早期的池州傩戏、傩舞、目连戏、罗城(贵池墩上)民歌在民间得以传承。加上庙会、灯会、十番锣鼓、曲艺等,群众文艺活动开展得很活跃。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县的专业剧团演出市场也很繁荣,城镇影剧院演出场场爆满;下乡演出,用布幕围场,农民也乐于买票看戏。演出的内容是经过改革、得到文化管理部门认可的剧目。1966 年 2 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使 60 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意识形态领域一系列错误的批判也由此发展以至加

①引自 1978 年 11 月 10 日《池州通讯》。

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誉为“戏曲活化石”的池州傩戏、傩舞、目连戏等被当作“四旧”扫除,连服装、道具等也被销毁。一些老艺人和演职人员受到冲击、批斗。这时的业余、专业剧团普遍为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所取代,演出大多是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以及批判所谓走资派的活报剧,再就是宣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忆苦思甜歌曲和快板、对口词、数来宝等说唱节目。到 1968 年年底,文艺战线进入“斗、批、改”阶段,各县革委会将县文教局、广播站、文化站、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管理站、剧团等合并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集中进行文化系统的“斗、批、改”。以办学习班的形式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样,一些县剧团曾经演出的剧目如《天仙配》、《李慧娘》、《谢瑶环》等被打成“大毒草”,说表现鬼魂就是宣扬封建迷信,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参加演出的演职员也受到打击批判。此外,还把一些作者在报纸和文艺刊物上发表的说故事、打谜语、杂文等文学创作统统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说成是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连民间说唱大鼓书《红岩》、《林海雪原》等也遭到批判。当时地直机关还揭发出一个所谓反动剧本《马陵道》(说是寓意骂领导)。期间,贵池县黄梅戏剧团在“斗、批、改”中还烧毁了价值 6 万元的传统戏服装道具。1971 年 3 月,各地还在《池州报》发表文章,对陈登科所著《风雷》展开了批判。

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阻碍了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健康发展,伤害了许多党内外知识分子。在日益紧张的政治氛围下,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被禁演,文艺创作更是无人触及。池州的文化领域走向式微,百花凋零,一片萧条。人民群众曾以“八亿人民八个戏”来讽刺独尊样板、戏剧稀少的状况。

1970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4 日召开的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各地都要普及、移植样板戏。很快,全省掀起了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高潮。

8 月 17 日,专区革委会决定,将贵池、东至、铜陵、青阳 4 个黄梅戏剧团和专区文工团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移植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剧

组,一面赶排样板戏,一面狠抓“斗、批、改”。10 月 1 日,《沙家浜》在东至县进行了首次公演。1971 年 3 月 7 日,池州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指出:要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抓好文艺创作和黄梅戏改革,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此后,一年又一年,电影放映的是样板戏,广播播放的是样板戏,舞台演出的仍是移植的样板戏。这种“文艺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在扫荡一切所谓“封、资、修”的“污泥浊水”之后,仅仅剩下 8 个样板戏,并在一段时间里得以持续。

五、农村合作医疗

医疗卫生革命的重要内容,是落实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医疗卫生工作切实为广大农民服务。

组织城市卫生资源支援农村,是当时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一大举措。各地纷纷将城市医疗卫生人员派遣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和普及卫生知识。池州驻军“支左”办公室、池州专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于 1968 年 6 月 5 日联合发出《池州专区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初步设想的通知》。1969 年 2 月,专区接受省直医疗机构下放人员 440 人(安置到贵池 83 人、东至 124 人、青阳 70 人、铜陵 93 人、石台 70 人)。随同下放的还有专区卫校和专区血防所的 123 人(安置到贵池 68 人、东至 55 人)。为此,专区革委会还特地制发了《对省、专下放卫生人员的分配意见》。7 月,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 27 人组成的医疗队,在青阳县陵阳、沙济等地开展巡回诊疗。不可否认,派遣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这一措施使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的,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公社,且只能轻装,不方便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因而也就很难达到长期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因此,培训一批农村社队能养得起的医生为农民看病,成为当时农村的现实需要。

1968 年 11 月,毛泽东批发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使得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成

为这一时期医疗卫生改革中最具影响的事情。

池州专区始办合作医疗最早要数贵池县。1965 年,贵池县在安徽医学院医疗队的帮助下,在部分生产大队试办卫生室。药品、器械由所在大队购置,资金从大队公益金支付,农民看病只收药品和材料成本费,诊疗、注射和小手术费全免,医务人员为半农半医。只是当时名称叫卫生室,虽名不符但实际上就是合作医疗的形式。

1968 年 7 月,东至县昭潭公社潭东大队首先创办合作医疗室。接着是青阳县陵阳公社,他们得益于南京军区总医院医疗队在 1969 年 7 月巡回诊疗时帮助他们培训了 18 名“赤脚医生”,所以八九月间,其所辖 8 个大队全都办起了合作医疗,继而成为全区的典型。这以后,举办合作医疗成了各级各地关注的焦点,各县都不甘落后。太平县委把合作医疗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并狠抓合作医疗的组织落实、资金落实、“赤脚医生”报酬落实、管理制度落实;贵池县委召开了全县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东至县委召开全县四干会议布置合作医疗、血防工作;青阳县委负责人亲自带队检查合作医疗工作等。截至 1974 年 4 月,全区合作医疗完成率达到 76. 3%,“赤脚医生”总数达 2012 名,平均每个大队有 2 名。这样,县、公社(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大多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医疗卫生网络,全区农村医疗状况也因此有所改观。

1974 年 5 月 14 日至 26 日,地区卫生局召开全区农村合作医疗检查和经验交流会议。会议采取边学、边议、边批和边看、边听的方法,到 5 个县的 11 个公社看了 20 个大队的合作医疗和 8 个区、社卫生院,并参观了石台县南源大队的“两管”、“五改”和太平县医院的中草药加工厂以及青阳县陵阳公社的社队联办合作医疗。这次会议为全区进一步推行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契机。从与会人员的反应可以看出,大家对合作医疗都表示出积极支持的态度,尤其对“赤脚医生”来说,更感觉到这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与鞭策。

同年,全区新训、复训“赤脚医生”1000 多人。到 1976 年,全区有“赤脚医生”2490 人,其中经过一个月以上复训的有 1588 人,能新法接生的有 568 人,能做简易小手术的有 428 人。基本做到小伤小病不

出村、一般疾病不出大队。

据1978年统计,全区已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986个,“赤脚医生”2539人;种植中药材924.9亩,有488个大队合作医疗室设有中药柜。实行社办的有9个公社,社队联办的有2个公社,队办的有916个大队。全区合作医疗办医形式主要有3种,即合医合药、部分合医合药、合医不合药。据东至县对全县合作医疗效果调查及广大农民反映来看,合医合药虽便于群众治病,但受到农村经济条件的限制。合医不合药,是新形势下出现的较受群众欢迎的形式,它不仅有利于群众防治病,还能解决大队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一些经济困难的大队提供了经验。

伴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普遍建立,“赤脚医生”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他们手持银针、心系人民,随叫随到,免费治疗,给社员群众以深刻影响,也塑造了那个时代的农村社会风尚。在全区“赤脚医生”队伍中,有许多事例是很值得称道的。石台县新华大队“赤脚医生”张留传,人老心红,他一个人既看病又采药、种药,用中草药治病达80%以上;贵池县联合大队3名“赤脚医生”,小伤能治,疖肿能开,刮宫、上环也能来,还会认用200多味中草药防治病;太平县[①]陈村大队药农汪金水、陈笃水,把深山老林当战场,3年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2.8万多斤;青阳县兰溪大队一次突发菌痢百余例,“赤脚医生”用单方配制中草药,两三剂后病人痊愈;分石大队“赤脚医生”用针灸疗法治愈了长期卧床不起的社员陈某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总之,“赤脚医生”凭着满腔热情和“三土”(土医、土方、土药)“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当家本领为群众服务,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群众赞颂赤脚医生“信得过、靠得住、管得着、养得起、用得上”。

尽管“赤脚医生”的医学技术水平不是很高,但他们在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行合作医疗和计划免疫、新法接生、处治小伤小病等方面较大地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但农村合作医疗和

①1974年4月,太平县从徽州地区划归池州地区。

“赤脚医生”的推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年代超常规发展,是以类似开展政治运动的形式全面铺开的。把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硬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强制推行,并将其提高到搞不搞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否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的高度,有悖于事物常态化发展。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各地不顾客观条件地一哄而起,也不可能整体上长久地解决农村医疗问题,同时许多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也被打乱。加之在“斗、批、改”阶段机构裁并(不顾业务分类,统统并入卫生事业服务站)、人员下放、规章废除,护理责任制被“医护工一条龙”、“医护协作”所取代,不少业务技术骨干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和打击。这一切给整个医疗卫生工作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可否认的。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创的农村医疗形式及其倡导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结合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农民就医的困难,同时对农村卫生环境的改善及农村疾病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农民对那个时代“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由此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遵照 12 月 22 日省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的通知》,1968 年年底,池州开始大规模组织动员和接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过在此之前,境内有两县曾接收过城市知识青年。一是 1958 年 100 名上海知识青年到石台县插队落户;二是 1964 年 11 月 10 名铜陵特区知识青年安置在青阳县陵阳公社黄石大队。当初,这些知青是响应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抱负,主动要求到农村的。而 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则是在“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重大政治意义驱使下的一场运动,因此

规模明显要大得多。当年,经过动员,池州全区首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同时还接受来自合肥、上海市的知识青年到各县农村插队落户,仅石台县就接收上海知识青年 2387 人。从这年起到 1979 年,全区农村社队累计安置下乡知青 31000 余人。

遵照毛泽东“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和省委要求,地委(党的核心小组)和专区革委会把这项工作提到了第一位。1969 年 4 月 23 日,专区革委会制发《关于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几点意见》。要求在接收安置方面做到政治上有人帮、思想上有人抓、生活上有人管、生产上有人教,下放一批巩固一批,使知识青年下去有房住、有菜吃、有活干。为上山下乡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为了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强管理,池州起初将这项工作交由各地革委会五七小组负责。1973 年 10 月 8 日,地委根据省委(1973)61 号文件精神,正式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江声任组长,孙立猷、李一本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1975 年,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建立,杨松林任主任、谢光明任副主任,要求各地也应由一位领导主管这项工作,并建立相应的办事机构,积极开展工作。1976 年 2 月 28 日,地委又充实加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成员,调整后的领导小组由 15 人组成,许步信任组长,康兆郁、孙立猷、潮改英任副组长。

为积极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专区(地区)革委会从 1968 年年底起先后召开了 5 次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现场会。即 12 月 20 日至 24 日在东至县召开的毕业生安置工作现场会,1969 年 6 月 8 日至 18 日在贵池县殷汇镇与集镇“斗、批、改”联合召开的现场会;1971 年 9 月中旬在东至县东方红公社召开的现场会;1974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在青阳县童埠公社和石台县贡溪公社分别召开的现场会;1976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在贵池县高坦公社召开的现场会。上海市学习慰问团,铜陵市、徽州地区带队干部驻各县组长以上的负责人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现场会。其中第四次现场会主要是总结交流知青安置工作经验。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召开的涡阳会议精神和湖南省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干部带队兴办知青农、茶、林场,集体安置知青的

经验。1974 年 11 月 2 日,《解放日报》对这次会议专题做了报道,其短评按语说:“要像童埠公社那样落实安置工作”。童埠公社于 1976 年 6 月在萧县郭庄召开的全省安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并出席了 1977 年 1 月召开的全省上山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

截至 1977 年,池州地区一共召开了 5 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其中 1970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地区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好榜样——程庭财烈士的母亲杨春华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69 年 2 月 4 日,下放在青阳县陵阳公社黄石大队的铜陵知青程庭财带病执行紧急外调任务,返回途中由于天黑路滑,在岔圩岭跌落雪沟,不幸遇难。事后,青阳县委追认其为中共党员。5 月,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宣传学习程庭财同志的决定》,并组织程庭财事迹报告团,在铜陵特区和池州专区巡回报告几十场次。7 月,省革委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安徽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知识青年的好榜样——程庭财》。

围绕知青工作,1970 年 5 月 26 日,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认真执行中共中央 26 号文件的通知》。1974 年 3 月 7 日,地委转发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一九七四年工作要点》。1975 年 3 月 5 日,地区革委会制发《关于贯彻执行省革委会(1975)3 号文件的意见》;4 月 21 日,又转发了地区知青办《关于认真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1970 年,专区革委会还将两报一刊社论《改造世界观》印发给知识青年插队小组。并要求各公社要采取措施,保证每个插队小组有一份《新安徽报》和《池州报》。

1971 年 9 月,地区革委会在上海市闸北区举办《上山下乡展览》。并派出 40 多名县、社干部和代表到上海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动员组织工作。12 月 22 日,地区五七办公室会同池州报社编辑部,邀请在池州插队落户的上海、合肥、铜陵特区等地的知识青年代表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上海市赴皖学习慰问团池州分团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15 位知青以他们亲身战斗经历,畅谈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切体会和丰硕成果。1972 年 1 月,地委、地区革委会给全

区上山下乡人员发出春节慰问信,并组成慰问团(吕玉堂为团长,江声、刘健农、王明、刘骏为副团长)从25日起分赴各地向贫下中农、下放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下放城镇居民进行慰问。1977年恢复高考时,池州各地不失时机地为知青复习迎考创造有利条件。

从1969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下放锻炼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经过群众评议、基层组织推荐、下放所在地的县以上机关批准,可以招工、参军、升学、提干的规定,全区在继续动员知青下放的同时,开始做下放知青的回城安置工作。截至1978年年底,通过招工、参军、升学、提干,因病、伤残、父母退休退职顶替工作照顾回城等多种途径,全区有2.5万多知青得到安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成为解决大量中学生出路问题的应急措施,而且成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尽管在这场运动中,广大知青通过与农民零距离接触,经受了锻炼,增强了意志,他们中有不少人入了党,担任了县以下各级干部和教师、会计、“赤脚医生”等,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农村工作和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出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但是,不顾具体条件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使他们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为知青安置所开支的经费,无疑加重了社、队和社员群众的负担。因组织管理问题致使知青工作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七、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下放劳动、大办“五七”干校的热潮,

省革委会于12月17日至22日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对全省干部下放劳动提出了4个去向:充实各级革委会、加强农村基层领

导班子、办“五七”干校、下工矿农村劳动锻炼。1969 年 1 月,原省委、省人委与原合肥市委、市人委直属机关首批 5000 余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又一批人员下放基层。4 月,池州专区直属机关和所属各县机关即有大批干部携家带口积极分赴农村社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截至 6 月 15 日,全区已有 14963 人下放到农村,其中知识青年 5724 人、城镇居民 8440 人、干部职工 500 人、集体所有制职工和家属 299 人。当时认为短时间内能有这样的进展,这是各级革委会和广大干部群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具体体现。说明只要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6 月 18 日,专区革委会主任吕玉堂在一次会议上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要措施。当前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真正做到“要他下去”变成“他要下去”。同时强调:为了适应今后下放工作的需要,月底前,专、县都要建立下放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的人员要相对固定下来,并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加强。做到领导重视、组织落实,在同级革委会的领导下,按职责范围将下放人员统管起来,积极开展工作。

1969 年 7 月 10 日发出的专区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纪要》指出:为了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下放高潮,实现省革委会提出的下放工作规划,会议认为必须狠抓革命舆论,运用一切宣传工具,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关于下放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切实抓好下放工作中的活思想;必须狠抓革命大批判,特别要批判“下放无好人”的错误论调,肃清刘少奇“读书做官论”、“下放惩罚论”的流毒;必须狠抓措施落实,做到政策落实,解决下放人员吃、住、看病等具体问题,做到安置落实。当月,继有省直机关和铜陵特区一批干部下放到池州农村落户,另有一批省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下放到青阳等地。紧随其后,专区及各县医院也相应将部分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为保证下放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巩固下放成果,1970 年 6 月 2 日和 9 月 5 日,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下放人员口粮安排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下放人员口粮分配和供应问题解答通知》。11 月 10 日,专区革委会还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下放人员安置落实和再教育工作的通知》。11 月 17 日,专区革委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联合下发《关于抽调下放干部当工人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区范围内有百余名干部被分配到厂矿企业单位。期间,为配合宣传教育,专区五七办公室于 1971 年 2 月还特地举办了一次图片展览。展览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反映各地干部、知识青年、医务人员、城镇居民响应毛主席号召,争相报名,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和各地党政机关、广大群众、贫下中农欢送、欢迎的情景;第二部分为《热情进行再教育》,反映农村对“五七”战士的热情接待,妥善安排,耐心教育;第三部分为《广阔天地炼红心》,反映“五七”战士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积极投身于农业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范事迹。①

参照黑龙江省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1971 年 4 月 9 日,经地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将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地区“五七”干校合并,成立安徽省池州地区“五七”干校。此后,全区有不少干部被送到该校进行“劳动改造”。

5 月 5 日至 8 日,地委、地区革委会在石台县召开了“五七”工作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公社的“五七”干部 130 余人,与会人员参观了安置和再教育工作做得较好的莘田公社来田、生田大队。会后,各地进一步改进了干部下放工作,使下放人员能够“安心”,自觉扎根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立新功、创新业。

1972 年 4 月 1 日,地委重新调整了“五七”领导小组,江声任组长,王明任副组长,孙立猷等 6 人为成员。从这年起,随着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落实有关政策,池州地区多数干部被陆续解放出来,回城安置工作。干部下放工作就此进入尾声。

---

①引自 1971 年 2 月 28 日《池州报》。

广大干部(包括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锻炼,增加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过贡献。但是,不少地方把下放劳动作为对“犯错误”干部的一种惩罚,使他们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许多干部被长时间排除在业务工作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八、农村的“斗、批、改”运动

1968 年 12 月,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认为形势虽然越来越好,但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夺权和反夺权、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少数社队领导权不在贫下中农手里,有的还被坏人操纵和把持,遂决定立即组织一支百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农村基层社队,领导农村的“斗、批、改”。广泛发动群众进行革命大批判,联系农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时“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整党建党,解决农村社队领导班子问题。

专区暨所辖各县旋即将原农村“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改为农村“斗、批、改”办公室,并配备了专职办公室主任。接着,专区组织、训练的贫宣队 32681 人(其中贫下中农 30404 人,部队干部 1174 人,革命干部 1103 人),于 1969 年 1 月浩浩荡荡地奔赴广阔农村,拉开了农村“斗、批、改”的大幕。据 1969 年 6 月 23 日专区革委会《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总结》材料反映,当时为打好农村“斗、批、改”这一仗,按照省里统一部署,各专、市、县先行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分 3 步实施:第一步,大宣传、大动员、大造革命舆论、大搞调查研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充分准备。首先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以及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任务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专区派往殷汇地区的贫宣队从阶级教育入手,普遍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促进了“斗、批、改”运动的深入。通过各社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初步摸清了公社、大队的

基本情况:在全区 135 个公社(镇)、1046 个大队中,一类社占 18%、二类社占 66%、三类社占 16%,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第二步,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开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清队”、整党建党,在此基础上按照“三结合”的革命原则,调整、充实、更新社队领导班子。对全区 104 个公社(占公社总数的 83.2%)和 879 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 84.2%)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对 21 个公社和 167 个大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经过整顿的公社、大队领导班子,保证根正苗红、贫下中农占绝对优势、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期间,全区共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87266 期,参加学习 2998701 人次。石台县建国大队把学习班搬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红军的刑场“皮燕洞”办,贫农程登科当场揭发出他伯父程某杀害过红军,学习班还揪出伪装贫农隐瞒 20 年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李奇文。各县在“清队”过程中发动群众开展“四查”(查党史,挖叛徒;查村史,挖特务、反革命;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查本地区解放前的反动组织,找敌伪人员中的首恶分子),铜陵县顺安公社通过查敌情、摆问题、理黑线,揭发出伪乡长 7 人、伪保长 34 人、特务组织中心组长 8 人。另外,在“清队”的同时,开展整党建党活动,实行了“开门整党”、“火线整党”。至 5 月 19 日,全区建立新的大队党支部 984 个、党的基层委员会 69 个,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 20512 名,占原有党员总数的 81.3%;暂缓恢复组织生活的 2286 名,占 9.06%;劝退的 355 名,占 1.4%;拟清除出党的 1679 名,占 6.2%。经过整党建党,不仅从组织上进行了“吐故纳新”,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也“吐故纳新”,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之故,纳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之新,从而使农村各级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密切了党群关系,党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三步,制定建设新农村的规划,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高社队领导班子的组织革命化和思想革命化,开展“四好”社队活动,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在这一阶段,为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便于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将全区原有的 10 个镇、135 个公社、1046 个大队,合并为 6 个镇、86 个公社、995 个大队。使三类社队普遍建立起朝气蓬勃的领

导班子,使一,二类社队领导班子补充新鲜血液达60%以上。

9月,专区革委会政工组制发《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当前几项工作的意见》,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今后工作提出安排意见,使全区正在进行的农村“斗、批、改”运动向着更实际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11月初,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村“斗、批、改”会议,确定当年冬次年春农村“斗、批、改”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抓好党的教育、党的建设,抓好领导班子革命化为中心,进一步打好农村“斗、批、改”这一仗。

专区革委会以纪要形式发出《以临战的姿态,继续革命的精神,抓紧搞好农村斗、批、改》文件,对运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决定11月开始到1970年2月的4个月时间,着重搞好农村重点社队的“斗、批、改”,同时也要抓紧集镇的“斗、批、改”。1970年3月到5月的3个月时间,重点是搞好集镇的“斗、批、改”,同时做好社队的巩固提高工作。教育、卫生、商业等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应围绕各个阶段的重点任务,紧密结合,积极开展工作。文件还对前4个月实施的方法、步骤提出了具体安排意见:

第一阶段:大张旗鼓地进行形势战备教育。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大造革命舆论、大造声势(至11月底)。这阶段的任务是:一是从上到下、从城镇到乡村,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要准备打仗”的声势,大张旗鼓地进行形势战备教育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做好征集新兵和组建基干民兵战备营、团的工作,做好防空工作。二是各县召开全委扩大会,参会人员可扩大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传达省革委会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农村“斗、批、改”会议精神,明确任务。三是组建和训练贫宣队。四是各县抓一个公社进行整党和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试点工作。五是号召广大贫下中农踊跃交售战备粮,千方百计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抓好“三秋”生产,动员民工上堤兴修水利和整修战备公路。

第二阶段:狠抓党的教育,搞好整党建党,加强党委(支部)和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同时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12月至1970年1月)。整党建党与社队革委会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结合进

行,以整党建党带动革委会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采取自上而下、先公社后大队的顺序进行。12 月,各公社以党委扩大会的形式举办整党学习班。参加对象:公社党委和革委会的全体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并吸收一定数量的党团员、民兵、贫下中农参加。时间 10—15 天。学习文件,武装思想,大批大破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学大立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公社党委、革委会从检查总结自身思想革命化入手,开门整风、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参加评论,针对存在问题制定革命化措施。1970 年 1 月,各大队召开党支部大会,吸收大队革委会委员、生产队长和一定数量的团员、民兵、贫下中农参加。时间 10 天左右,内容大体与公社相同。方法是会内会外结合、上下结合、前后方结合,及时把大队整党情况告诉革命群众,同时把群众对支部、革委会和党员的意见反馈上来。

第三阶段:赶郭庄超《纲要》,开展农业学大寨,继续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至 1970 年 2 月底)。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农业集体化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彻底批倒批臭刘少奇修正主义黑货。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讨论制定超《纲要》规划和当年生产计划。开展“四好”生产队和“五好”社员、讲评干部的评比活动,树立样板、表扬先进。召开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誓师大会,掀起春耕生产大高潮。

农村“斗、批、改”全面展开后,专区于 1970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青阳县召集了以点带面的经验交流会,传播点上经验,推动面上运动,并于 12 月 15 日至 19 日举行了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省革委会在合肥、含山召开的试点座谈会的先进经验和宋佩璋副主任对农村“斗、批、改”的指示以及潘启琦(时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报告。在运动中,各县高度重视,都把“斗、批、改”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石台县由县革委会常委、大组的正副组长到公社当“参谋”,帮助社队搞好运动。东至县于 11 月初举办了各公社的一二把手集中短期学习班,学习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重点解决对运动的认识问题和领导问题。贵池、东至、青阳将全县划成若干大片(每片

四五个公社),在片中设点,由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委率领一定数量的干部住在点上,对周围社队进行巡回检查指导,实行重点带一般。全区重点社队的“斗、批、改”于1970年春结束,面上的“斗、批、改”按专区部署也都基本如期完成。

关于集镇的“斗、批、改”,专区于1969年6月就在3个试点镇(贵池殷汇、铜陵大通、青阳城关)之一的贵池县殷汇镇召开了4天现场会。殷汇镇在会上介绍的试点经验主要是6个字,即:撤、放、并、简、组、转。“撤”是撤销不必要的单位和居民大队;“放”是下放闲散人员和部分单位;“并”是合并同类型的行业单位;“简”是精简重叠机构和多余干部职工;“组”是组织起来向生产进军;“转”是立足点转过来,变消费集镇为生产集镇。6月18日,专区革委会主任吕玉堂为这次现场会做了总结讲话。他在列举半年多来集镇“斗、批、改”取得的成绩之后,指出搞好集镇的“斗、批、改”势在必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要用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思想做指导,把集镇“斗、批、改”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吕玉堂要求各县革委会要把集镇的“斗、批、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区34个集镇(贵池9个、铜陵8个、东至7个、青阳6个、石台4个)都要做出规划、狠抓落实。既要稳一点,又不要急躁,但也不是慢慢来。会后,按照专区革委会的部署,“斗、批、改”开始在各集镇陆续进行。12月1日,专区革委会又在大通镇召开集镇“斗、批、改”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总结前段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发动。

客观地说,当时“斗、批、改”的思想政策界定对于控制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村“斗、批、改”的两项基础性运动——“清队”和整党建党却继续维系乃至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使党内矛盾、党群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一些老党员被“吐故”清除出党,而那些所谓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却被突击“纳新”,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由于农村“斗、批、改”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左”倾方针的表现,这就注定了农村“斗、批、改”既定的目标任务难以实现。

九、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一个重要内容,其指导思想是贯彻毛泽东1967年4月提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五十字建党方针以及后来提出的“吐故纳新”指示。

根据省革委会的具体部署,1968年11月,全区各县基层整党工作全面展开,具体实施过程伴随着“清队”运动由点到面逐步铺开。至1969年秋,先后对1421个党支部和95个公社党委进行了初步整顿,90%以上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此基础上,专、县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并结合基层体制变动情况,建立新的公社党委和基层党委91个,建立新的党支部1341个。

1970年6月17日,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制发《关于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年内要把全区27000名党员普遍轮训一次。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先后于6月29日至7月18日、9月5日至24日、11月6日至25日、11月30日至12月19日在专区“五七”干校连续举办了4期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对象为公社党委成员及专直党委、支部委员会成员。根据《意见》要求,从9月份开始,县负责轮训大队正副书记和县直党员骨干,公社或大队党支部负责轮训本组织党员。这项任务如期完成后,1970年冬至1971年春,为贯彻省革委会第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含山会议精神,紧密结合战备教育,地委又一次组织了对农村的党组织进行整顿。各地在做法上一般都采取学习文件、武装思想,“两忆三查”、狠批流毒,总结经验、斗私批修,健全组织、制定措施4个步骤进行。

在整党建党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左”的做法。一是实行“开门整党”。就是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都要经过群众评议。二是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大评议、大总结”。即所谓“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整

①《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968年《人明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

党”,通过群众评论、自己总结,一个个地“过关”。三是“吐故纳新”。对九大党章上规定的几种人和“走资派”要吐出去或挂起来,同时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和尚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拉进党内。经过整党建党,停止两年的党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

1971 年 12 月 13 日至 17 日,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在石台县召开清队定案、整党组织处理工作座谈会。会上听取了石台县委关于加强党对“清队”定案、整党组织处理工作的领导经验;贵池县刘街公社和东至县平原公社党委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做好对犯错误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工作的经验介绍;河口公社对“黑四论”在办案工作中流毒影响的批判和石台县卫生局落实政策的现身说法。会议期间还参观了石台县七里公社装卷立档现场。1972 年 1 月 21 日,地委批转了《全区清队定案整党组织处理工作座谈会纪要》。

全区据不完全统计,清队、整党中立案审查 9934 件,到 1971 年 12 月,结案 6035 件,占立案总数的 60%。其中:党员、干部、职工 5749 件,结案 4763 件,占 82.8%;党员暂缓恢复组织生活的 1572 人,其中已恢复或处理的 1215 人。

在整党整风、狠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阶段,各地还结合开展了整团工作。具体做法大体分这么 4 步:第一步,学习文件,进行整团动员;第二步,召开 3 个会议(团委会或支委会、团员会、团外青年座谈会),总结工作,发动团员、青年揭矛盾、找差距,帮助团委、团支部整风;第三步,改选班子,健全组织;第四步,接收新团员,做好超龄团员离团工作、犯错误团员的组织处理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据 1972 年统计,全区团支部基本建立,县、区、社和大部分厂矿也都建立了团委,有 1728 名团员光荣地入了党,有 19900 多名青年入了团。对犯有严重错误的 200 余名团员做了组织处理,办理了 12823 名超龄团员的离团手续。团的队伍得到了更新,团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这次整党运动,是在“左”倾方针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由于这次整党任务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任务的错误认识和对党的队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因而党组织、党员队伍中真正的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况且当时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

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往往成为整党时派性争斗、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以致“吐故纳新”成了“吐疏纳亲”,其结果是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一些所谓“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有的并不符合党员条件,其中有的是靠造反起家的,这就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不过,这次整党毕竟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第三节　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经过整党,全区各级党组织恢复组织生活之后,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革委会,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领导工作的需要。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重新建立和组织机构的逐步健全,已是势所必须。

一、专、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

在党的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各级革委会、群团机构的陆续建立和党组织的逐步恢复,落实政策、稳定形势等工作也初步展开。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教育、解放干部的意见,省委多次强调加强团结和落实政策问题。从 1969 年春开始,专区通过分期分批举办干部学习班的方式,将一批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至年底,全区已解放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以上干部 1040 人,占应解放干部总数的 88.4%,在已解放的干部中,有 80%安排了工作,其中已结合到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干部 511 人。

由于形势相对稳定,专直和各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从 5 月 26 日开始至 6 月 8 日结束,全区出席党员代表会议的共计 8403 人,其中:党员代表 6416 人,非党各级革委会成员、造

反派、下放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代表1987人。[①] 从当时的情况看,各个党员代表会议突出了继续革命、增强团结、落实政策3个重点,似乎使大家认清了形势、武装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但实际上,这样的党员代表会议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因为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加之各党员代表会议贯彻的又是九大的精神,所以它们的积极意义除恢复部分党员的组织生活之外也就乏善可陈。

在1969年11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之后,经批准,1970年1月,中共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由吕玉堂任组长,江声任副组长,张健邦、张汝权、余旭亚、王解民、金连德、刘健农为成员。此后,专区党的核心小组成为同级党的领导核心。随之,专区革委会的工作机构也相应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到9月,除办事组外,“四大组”在初建时设立的党支部基础上,均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政工组核心小组组长由金连德兼任,生产指挥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孙惠民,人民保卫组核心小组组长孙登勋。11月,成立了专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②] 东至、石台、铜陵、青阳、贵池县党的核心小组分别于1969年2月、2月19日、8月28日、10月15日、1970年1月7日成立。东至县组长邹尧,副组长王明;石台县组长黄跃进,副组长张朝宗、王振声;铜陵县组长邵秀山,副组长姜肇洪;青阳县组长钟也频,副组长贾学千;贵池县组长王庆德,副组长鲁令全、陈俊。

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及各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的成立,为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必要的组织条件。

二、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1971年3月7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630人,代表全区30142名党员。代表中,工人

①引自《各县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1969年6月21日),池州专区革委会文件。

②1971年4月,学习班与地区“五七”干校合并,称安徽省池州地区“五七”干校。

占17.6%,贫下中农占34.3%,部队干部占12.4%,干部占31.3%,知识分子占2.2%,其他劳动人民占2.2%。另有未参加“支左”任务的驻军和三线工厂、上海市赴安徽学习慰问团池州分团等单位的代表26人应邀列席了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57人,主席团主任吕玉堂,副主任荣超、江声、韩德忠,秘书长张健邦。3月7日,省委常委杨效椿代表中共安徽省委致贺词,吕玉堂代表池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池州地区的伟大胜利,主要表现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斗,批,改”运动不断深入,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加强了党的建设和整顿,进一步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工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报告还总结出3条体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报告最后号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夺取更大胜利: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坚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①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池州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并在一届一次全委会议上选举吕玉堂为书记,荣超、江声、韩德忠为副书记,王明、方振华、许步信、孙立猷、刘健农、李贵兴、林少武、潮改英(女)为常委。12名常委中部队干部6名,占常委总数的50%;地方干部4名,占33%;不脱产的党员2名,占17%。在43名地委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15名,占29%;地方干部16名,占31%;不脱产的党员(群众代表)20名,占40%。3月11日,会议还通过了《关于

①引自吕玉堂在中共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加强地委革命化建设的决议》。

由于这次党代会是在党的九大以后召开的,吕玉堂所做的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贯彻九大精神,高度颂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因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也是错误的。不过,这次代表大会毕竟建立起新的地委,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池州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池州地委成立后,与地区革委会合署办公,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就此结束使命。

1974 年 3 月,铜陵县划归铜陵市。4 月,太平县从徽州地区划入池州地区。这样,池州地委自成立起先后辖贵池、东至、铜陵、青阳、石台、太平 6 个县委。

1976 年 1 月,撤销地区革委会所属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等机构,这些机构的核心小组也随之不复存在。地委除保留办公室(与地区革委会办公室同一机构)外,设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等工作机构。4 月,将地直单位党委改为地直机关党委。1977 年 10 月,重新成立中共池州地委党校,自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七”干校不复存在。

三、各县县委和基层党委的重新建立

在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前后,各县也相继召开了本级党代会。为做好建立新县委的前期准备工作,1969 年 9 月 10 日,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转了专区革委会政工组组织小组《关于在县以上革委会非党成员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意见》的报告。1970 年 9 月 8 日,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统一思想,加快步伐,抓紧做好筹建县党委各项准备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专区核心小组对照两年来整党建党的情况,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专区在省核心小组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斗、批、改”,通过“清队”、“一打三反”、整党,政治形势和生产形势都很好,建立县委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因此从现在起,专、县党的

核心小组应当加快步伐,抓紧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在新年前把5个新县委建立起来。专区党的核心小组还决定先在石台县搞新县委试点,分工张建邦挂帅,各县派一名政工组负责人参加石台县试点工作,以期取得直接经验。

1970年10月21日,中共石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石台县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张朝东。①

1970年11月25日,中共东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东至县第四届委员会。书记邹尧。

1970年12月26日,中共铜陵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铜陵县第三届委员会。书记邵秀山。

1970年12月29日,中共贵池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贵池县第四届委员会。书记王庆德。

1971年2月22日,中共青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青阳县第四届委员会。书记钱平。

随后一段时间,各县基层公社党委,县直单位总支、支部及农村大队党支部组织也都先后建立起来。

①石台县1959年4月被撤销,直至1965年7月池州专员公署重新建立时才恢复。1966年3月,石台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紧接着发生“文化大革命”,故该县党代会为首届。

第十八章

国民经济建设的进展

在池州党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后,广大工人、农民迫切希望结束动乱,恢复和发展生产。根据党的九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的号召,特别是1969年年初掀起的战备高潮,以战备为主要任务的“三五”计划建设得到迅速恢复和扩大。池州地区以此为契机,在小三线建设、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方面,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经济政策,使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第一节　开展小三线建设

一、小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调整,其核心是在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当时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内地,三线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线建设的统一规划,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在安徽包建了一批军工企业。省委随即开展小三线建设的筹备工作,并于1965年4月30日发出《关于成立安徽省三线建设指挥部的通知》,并抽调人员集中办公。此后经过勘探选址,池州东南部

山区的贵池县、东至县被作为后方基地之一。从 1967 年起,上海在这两个县启动建设小三线工厂和配套设施,从事军工生产。

二、池州小三线建设概况

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池州专区的小三线建设是随着大规模搬迁开始的。1968 年,上海三线化工总厂所属的卫星、金星、红星等厂迁入东至县境的香隅,同时修筑三线专用公路 9 条,建 305 码头和龙江水厂。1969 年,上海市国防工办在贵池县梅街成立 507 指挥部,并着手筹建八五、永红、火炬、五洲、胜利、前进等三线工厂和三二五发电厂。至此,坐落在池州境内的三线工厂共有 8 个(贵池 7 个、东至 1 个)。为迅速展开小三线建设,加强战备,7 月,成立了 7 人组成的池州专区革委会、池州军分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林少武任组长,查捷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章健任主任,康祝亮任副主任。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为此,专区革委会于 12 月 14 日制发了《关于抽调民兵战备营(连)投入三线建设意见》。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纯洁了三线建设队伍,加快施工建设速度;又可以锻炼民兵干部带兵与行政管理能力,做到一旦战争打起来,即能改编为地方部队或成建制补入野战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区各县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工地,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很快掀起高潮并迅速发展。1969 年,永红机械厂(生产 57 高炮瞄准器)、五洲电器厂(生产 57 高炮配套电机)、八五钢厂(为军工企业提供配套的特殊钢材)先后建成投产。另火炬电器厂(生产 57 高炮电器装置)、前进机械厂(生产高炮炮架)、胜利机械厂(高炮总装)和三二五发电厂也先后于 1970 年建成投产。三二五发电厂安装的上海汽轮机厂生产的两台 2.5 千瓦中温中压型汽轮发电机先后于 1972 年 5 月 10 日、1974 年 3 月 10 日开始发电,形成梅街地区小三线电网。1975 年 10 月,在铜陵市 110 千伏高压线路投入运行之际,贵池小三线电网将江南、江北电网和华东电网全部沟通。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为中心转向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对国防工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从而使得上述工厂很快形成生产能力并有效运转。

1969 年,与上述小三线建设相并行,池州境内还有一处在建的国防工程,即南空后 4956(茗山)工程。根据省革委会、省军区的指示精神,青阳县组建一个 820 人的民兵营,铜陵县组建一个 680 人的民兵营,由 4956 工地领导施工。该工程历时两年多胜利完成。

当时,在“国防工业第一,三线建设第一,工程配套第一,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指导下,辖区各县被抽调参加国防工业建设的人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创业精神,战胜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修公路、建工厂、开矿山,在短短的时间内使池州境内的国防工业形成了生产能力。他们视国防为己任,全身心地投入战斗。贵池县观前民兵连为了加快建设速度,晚上瞒着带队干部到工地加夜班。一次,507 工地沙石供应不上,青阳民工主动请缨,利用每次出工时每人每天带一担石子到工地,400 多人天天坚持,不仅解决了沙石供应困难,还为国家节约了资金。此举受到工程指挥部的好评。

当然,在三线建设和三线工厂投入生产的过程中,一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和干部及其家属听从党和政府的召唤,离开熟悉的城市、离开眷恋的故乡,来到池州山区艰苦奋斗、辛勤工作,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才智、心血和年华。

三、小三线建设对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小三线建设,为池州发展提供了一次重要机遇,对池州山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是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小三线军工项目启动时,首要的基础设施是建成了一些公路干线和支线,这极大地改变了池州交通闭塞的面貌,给池州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

二是促进了池州产业结构变化。池州境内 10 余家小三线企业涉及电力能源、黑色金属冶炼、机械电器制造和化工生产等产业,门类比较齐全。这对于改善池州工业内部的布局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池州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三是促进了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小三线建设企业内迁时,落户

池州企业的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也随迁池州。由于当时小三线建设的军工项目大都选择在偏僻隐蔽的山区,其新建、迁建的一些必要的医院和学校,促进了池州科学文化发展。

四是为池州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小三线建设为池州积累了资金,后来整体移交时,固定资产净值近 2 亿元,为池州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很大帮助。

还有一点就是,参加小三线建设的广大工人、干部、科技人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创业精神献身国防的高贵品德,也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小三线建设的开展,对支持国防、对小三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为山区开发提供了契机。但是,小三线建设过分强调远离城市,“靠山、分散、进洞”,注重了战备要求,忽视了经济效益,造成不少浪费,遗留问题也很多。尽管如此,参加建设的干部员工吃大苦、耐大劳,争时间、抢速度,能够在短期内使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拔地而起、很快形成效益,其规模之大、进度之快、质量之好,仍堪称壮举。

第二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

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在 1964 年就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当时,池州地委、专员公署尚未重新建立,各县在安庆地委的领导下,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东至县种植棉花近 10 万亩,被列为全国集中产棉县,当年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棉花县工作会议。后来,由于池州地委、专员公署建立后不久即遇“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由此冷了下来,直到 1968 年 7 月专区革委会成立后,才又提上议事日程。专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会决议提出: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搞好夏防、双抢,战胜一切困难,夺取全年的更大丰收。

随后,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全区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目的在于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保收田,发展农

业、增加粮食生产和储备。广大干群怀着战天斗地、重整山河的信心和决心,向大自然开战,抓晴天,战阴天,斗雨天。遍地热火朝天的工地上,红旗招展、川流不息,到处都洋溢着勃勃生机。

1969 年 7 月 16 日,在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政治工作会议上,省革委会做出《关于以郭庄大队为榜样,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决定》,指出:“郭庄大队,是我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是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先进集体,是我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榜样。省革委会号召全省农村广大社、队,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广大干部,以郭庄大队为榜样,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发扬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省委的这个《决定》推动了池州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各地纷纷派人到郭庄参观、取经。专区也确定贵池县观前公社为全区大寨式样板。1970 年 1 月至 4 月,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连续召开了 3 个会议,会后都发了《会议纪要》。一是 1 月 8 日至 10 日在青阳县召开的全区农机生产工作会议;二是 2 月 18 日召开的生猪生产座谈会;三是 4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石台县召开的全区养猪糖化饲料工作会议。围绕农业学大寨这个主题,敦促各地做好具体工作。

在 3 月 1 日至 7 日全区学大寨、赶郭庄、夺取粮棉双丰收动员大会上,地委还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思想要“转轨定向”,要把学大寨作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干部要下去蹲点,指导帮助社、队学大寨。全区共抽出干部 2095 人,已下去 1064 人。另据东至、青阳、石台、铜陵 4 个县统计,县委、县革委会常委 53 人中下去蹲点的就有 20 多人。9 月 10 日,专区还特地组织了学大寨参观团前往大寨参观学习。

为贯彻国务院 1970 年 8 月至 10 月在大寨、北京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省革委会在 10 月中旬召开公社以上四级干部参加的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于 11 月 15 日再次发出《关于全面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抓好“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的群众运动”,“苦战二三年,使全省社队变大寨、县县变昔阳”。

当月,池州各县纷纷响应。东至县在第四次党代会上提出“高举红旗狠抓纲,学习大寨赶郭庄,大反右倾拼命干,苦战两年变昔阳”。随后又在12月中旬召开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制定了“一年超《纲要》,两年变昔阳”的目标。青阳县也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学大寨,赶郭庄,追玉屏,超《纲要》”的号召。其他县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口号和指标。随后,一个以超《纲要》、赶郭庄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增产运动在全区广泛掀起。农业生产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这一年尽管一些地方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但全区粮食总产量仍达8064287担,比1969年增产2亿多斤,增长36%,接近历史最好水平。其他如棉花131034担、麻11787担、蚕茧4257担、茶叶43132担、生猪246828头,均比上年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当年冬,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全区21万大军投入战斗,开工4000多处,完成土、石方1300多万方,增加旱涝保收面积4万多亩,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至年底,全区粮食超《纲要》的公社9个、大队166个、生产队1712个、农场1个;棉花超《纲要》的公社3个、大队43个、生产队526个;生猪超《纲要》的公社2个、大队52个、生产队436个。[①] 同年,有7个单位(大队、生产队)作为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丰产典型的代表出席了安徽省召开的淮南地区科学种田现场会。他们是:东至县卫东公社前进大队(早稻矮南一号单产1250斤)、石台县矶滩公社矶滩大队(中稻珍珠矮单产1388斤)、贵田公社东庄大队岩山小队(矮南一号单产1270斤)、九步大队九步生产队(早稻鼓浪粳单产1285斤)、莘田大队(矮南一号单产1300斤)、青阳县陵阳公社泉流生产队(早稻矮脚南特单产1250斤,中稻珍珠矮单产1300斤)、城郊公社双溪大队(吉利小麦单产520斤)。[②]

为使学大寨运动持续健康发展,地委于1971年2月召集各县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检查分析了全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

①以上引自池州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1971年5月编制的《1970年池州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荣超在全区县负责人农业学大寨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引自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丰产典型登记表。

形势,总结了经验,并就存在问题研讨了相应措施。会议指出:学大寨就是要学大寨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大树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对学得不深不透的走过场的单位,要一个个地排队,派人进驻,把盖子揭开,为学大寨排除障碍。现在已是 70 年代第二个春天,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树雄心,立壮志,把大寨经验学好、推开,让大寨红花开遍全区。座谈会后,为加大宣传力度,专区革委会机关报《池州报》就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抓好春耕生产专题发表了评论,从 2 月 21 日到 4 月 10 日,连续刊登了 12 谈:《要胸中有“数”,反对凭老经验办事》、《不失时机,掌握环节,争取主动》、《转轨定向,贵在落实》、《深入基层,抓好基层》、《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把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用革命精神抓好后进队》、《必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学大寨一定要学根本》、《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努力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

1972 年 12 月 21 日至 24 日,地区革委会举行了第九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旨在动员全区人民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会上,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江声做了题为《以路线为纲,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阶段,夺取农业生产的新胜利》的报告。①

地委、地区革委会的上述举措,加快了池州社队变大寨、县变昔阳的步伐。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干部群众学大寨的热情越来越高。老典型不断提升,新典型不断涌现。这中间,既有取得新成绩、做出新贡献的大路、玉屏、林丰大队,也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河山、全面发展的马衙公社、丁香公社;既有一年大变,两年实现粮、棉、猪三超纲的塘和大队,也有江心洲上闹革命,沙洲变绿洲,实现粮、棉、猪、林四超纲的光辉大队;既有一年改变面貌,粮食产量“翻一番,拐个弯”的三义大队,也有亩产达“双纲”的汀洲大队。1971 年,贵池县大路大队第七队晚稻超《纲要》,夺取了晚稻高产,全年粮食亩产达 1190 斤。青阳

①引自池州地区革委会(1972)97 号文件。

县玉屏大队突击半个月,砍草肥 62 万斤,晚稻产量成倍增长,全年粮食亩产达 1185 斤,结束了连续 6 年 800—900 斤的徘徊局面。贵池县刘街公社提出“大寨能治山,郭庄能改碱,刘街能改冷”的战斗口号,变“春来迟”为“春来早”,扩大双季稻面积,当年在遭受洪灾和虫灾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比 1970 年增长一成。东至县昭潭大队东风生产队采取用地养地相结合的原则,灵活利用茬口轮作,当年 25 亩油菜亩产 200 斤,总产比 1970 年增长 33 倍,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一年完成 5 年油脂任务,粮食亩产达到 1300 斤。1972 年,超《纲要》的社队远比 1971 年多得多,石台、贵池实现县超《纲要》,全区有 58 个公社超《纲要》或达《纲要》,有 9 个公社、125 个大队、1032 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千斤。全区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 8%。为鼓励先进、激励后进,专区在 1973 年 5 月全省第六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树立青阳县庙前公社玉屏大队、陵阳公社红星大队、贵池县马衙公社及马衙公社大路大队等为全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型。其中马衙公社学大寨运动一度在皖南乃至全省都有一定影响,当时曾有“北学郭庄,南学马衙”之说。

1974 年,在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0 周年之际,为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密切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地区革委会政治工作组与生产指挥组于 7 月联合举办了一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电影汇映。为学大寨提升了精神动力。

1975 年、1976 年两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建设大寨县推向了“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1975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到 1980 年全省最少要有半数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市),并要求县以上领导班子以整风的形式,解决“真学假学”的问题。

池州地委迅速召开会议,对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贯彻。地委书记江声在会上做了题为《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下决心夺取普及大寨县的新胜利》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一个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正在池州全区蓬勃兴起,各县县委都决心加快步伐建成大寨县。石台县委下定决心,坚定

信心,一年建成大寨县;省委要求东至县明年要建成大寨县,东至县委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青阳县委向全县人民响亮提出:苦战两年,建成大寨县;贵池县委决心用大寨精神重新安排河山,三年一定建成大寨县;太平县委提出:举旗抓纲学大寨,太平河山重安排,粮食、生猪超纲半,林茶各业大发展,全党全民总动员,三年建成大寨县。所有这些表明,大家通过学习、讨论,在之前学大寨的基础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报告号召全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夺取普及大寨县的新胜利。为加强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具体指导,地委于 1975 年 11 月 20 日还专门成立了普及大寨县办公室。张建民(地委常委)为主任,王子轩(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骏(地区革委会办事组第一副组长)、郭有顺(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赵臣璧为副主任。

从 1975 年起,池州地区及各县以普及大寨县为号召,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前发展。在建设大寨县过程中,全区涌现出许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个人,还有不少公社、大队建成大寨式的农业生产典型。1976 年 12 月,东至县齿轮厂的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 年,石台县茶叶公司的代表出席了全国财贸系统“双学”(学大庆、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同年,贵池县出口苎麻 1711 担,被列为全国苎麻生产基地。据年底统计,全区已建成大寨式公社 52 个(贵池 7 个、东至 23 个、石台 6 个、太平 1 个、青阳 15 个),占公社总数的 43%;建成大寨式大队 522 个(贵池 113 个、东至 239 个、石台 61 个、太平 24 个、青阳 85 个),占大队总数的 50. 8%。1977 年 4 月,全省山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东至县召开,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东至县“农业学大寨”展览》。12 月,贵池县被评为全国水产先进单位,县革委会副主任高燮民出席农林部表彰大会。

从 1964 年开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经历了近 15 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期间,池州地区总共召开了 7 次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从方向上、路线上引导社队走大寨之路、为革命种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学大寨的积极性。

客观地说,农业学大寨最初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的学先进的群众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把大寨作为农业生产典型,对于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农业学大寨的初兴阶段,学大寨运动的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一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各地纠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变,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二是广大干群节衣缩食、栉风沐雨、披星戴月,运动中所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起了保证作用;三是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既密切了干群关系,也改进了工作作风。但是,自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宣告农业学大寨进入新阶段——建设大寨县成为新目标。从而使学大寨运动不断向政治化、阶级斗争化方向发展。把“学不学大寨”说成是“方向道路”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有的甚至认为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造成思想和政策上的混乱。另外,“建设大寨县”、“普及大寨县”作为政治任务越来越具有强制性。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一个模子托到底”,这就造成各地被迫以大寨、昔阳为榜样,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搞“穷过渡”、“大概工”、并队、“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关闭农贸市场,因而形成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总之,学大寨运动后期,“学大寨、赶郭庄”成为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演变为形式主义、平均主义新模式,做出了上纲上线、人为拔高、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这不仅使树立的典型、旗帜走样,也不利于面上生产大发展,使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第三节　工业学大庆运动

池州专区重新建立后,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1969 年年初至 1970 年年初,由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战备高潮,使得一切经济工作都有了“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紧迫感。在准备“早打”、“大打”的动员令下,不惜一切财力物力建设大战略后方的任务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地方则提倡发展“小而全”的

经济体系,要求全面下放管理权限,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五小”工业。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池州地区出现了一次新的建设高潮。1970 年 1 月 27 日,由省和专区投资兴建的池州水泥厂在贵池齐山南麓建成投产;2 月,池州化肥厂建成投产;4 月 26 日,八五钢厂正式投产,并炼出第一炉钢;7 月,专区革委会号召“大打矿山之战”,贵池县兴办黄山岭、六峰山铁矿。1969 年至 1970 年,全区“五小”企业发展到 300 余个。工业主要产品如铁矿石、发电量、内燃机、机制纸等都有成倍增长,并有生铁、焦炭、化肥、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变压器等新产品批量生产。1970 年,全区基本建设完成年计划 76%,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5000 万元,比 1969 年增长 6. 6%。

工业学大庆是工业系统“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大庆人“三老四严”精神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成为了工业企业学习榜样,在发展地方工业中,池州地区广大干部、工人在当时工作、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也是以大庆人为榜样,吃大苦耐大劳、公而忘私、奋勇拼搏、默默奉献,同样表现出了像大庆石油工人那样的时代风貌,他们以实际行动学大庆、学铁人的创业精神。

在 1971 年 3 月 7 日地区第一次党代会上,针对地区“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会后即为地委书记)吕玉堂在报告中强调:要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要充分发动群众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努力增加生产;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全局观点,搞好综合平衡,在学大庆运动中,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安全生产。

为认真贯彻省委 1971 年在淮南大通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和 9 月 15 日制发的《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1972 年 2 月,地委专门召开座谈会,分析工业学大庆的形势,检查省委《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3 月,以传达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为契机,掀起以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学大庆运动。5 月,再次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检查全国计划会议精神落实

情况,在企业推行“五查”,即查路线、查政策、查质量、查纪律、查浪费,使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更加深入地进行。10 月,全区又召开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这些会议,使人们对工业学大庆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全区工业战线很快呈现出热烈、奋进、苦干、巧干的新景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得如火如荼。厂矿企业中的“四比”[①]收到明显成效。到 9 月底,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5631 万元,占年计划的 62.5%,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73 种计划内产品已有铁矿石、铅精砂、松焦油、机制纸、雨伞、茶叶加工机械、磨粉机等 7 种产品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还有农业泵、机动脱粒机、脱粒机、水泥电杆、锰矿石、肥皂等 6 种完成全年计划 90%以上。基本建设方面,国家预算内投资完成 1314.73 万元,占年计划的 85.4%,比上年同期增长 3.8%,预算外投资完成 1230.63 万元,占年计划的 90.1%,比上年同期增长 70.9%。在经济技术指标方面,据对 18 种重要产品分析,有 14 种产品的原料消耗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随着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不断深入,池州也不断有新企业产生。继 1971 年 7 月池州农药厂建成投产后,1973 年,位于贵池县境内的池州地区黄山岭铅锌矿又建成投产。1974 年 3 月,石台县还建成鞋楦厂,填补了省二轻工业的一项空白;5 月,全省鞋楦产销会在石台县召开。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解放,纷纷表示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他们造成的损失补起来。10 月,地区革委会在东至县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会议。地委副书记张建民在会上做报告指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把企业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会上,地区汽运公司第一车队党支部等 10 个单位做了典型发言。11 月 17 日,池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业学大庆办公室成立,张德衍任主任,谢在锋、王德锦任副主任。为推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深入发展、加速建设大庆式企业的步伐,当月,地区革委会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工业学大庆相互学习、相互检查活动。为此,地区成立了检查总团,丁仁一任

①“四比”:即比路线觉悟,比革命干劲,比共产主义风格,比对国家的贡献。

团长,地区工交办、计委、财办负责人任副团长,下设 7 个分团。检查先由各企业进行自查,再实施互学互查,然后各分团民主总结,最后由分团正、副团长集中到地区汇报学习、检查情况,交流经验进行总结。这次工业学大庆相互学习、相互检查活动,促进了池州工业企业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工业学大庆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区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75 年,青阳县水泥厂、贵池县水泥厂、梅埂黄沙厂、东至县轮窑厂、地区水泥厂制成车间一班等 5 个单位出席了省革委会于 4 月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1976 年 10 月,在全省财贸系统学大庆、学大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上。全区有 43 个集体、19 名个人荣获奖状,青阳县粮食局还荣获了红旗。全区出席 1977 年 2 月召开的地区财贸学大寨、学大庆先代会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有 330 多个。12 月,贵池县马衙锰矿代表陈永美出席了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同年,东至齿轮厂、青阳水泥厂、池州地区汽运公司第一车队的代表还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青阳水泥厂“球磨总班”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

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对于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树立良好的精神风貌、改善企业管理、支援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池州工业企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这项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下开展的,把工业学大庆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相联系,搞所谓“政治挂帅”,动辄上纲上线,使这项运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 1977 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仍部署开展建大庆式企业活动,但实际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运动逐渐走向低潮。

第十九章

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林整风”运动和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得以持续。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从事阴谋活动的,因此,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也就自然集中在批判极左思潮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第一节　“批陈整风”运动

1970 年 11 月 16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后,“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正式启动。起初,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这次运动的政治背景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央 1971 年 1 月 26 日和 2 月 21 日先后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和《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后,人们才逐渐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有所了解。

中央通知发出后,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开始部署县以上党的机关分批开展“批陈(修)整风”运动。

此前的一段时间,专区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贯彻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主要是以抓活学活用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为中心。为此,1970 年 9 月 28 日,专区革委会还专门制发了意见,要求进一步

贯彻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省革委会 9 月 20 日大会精神,迅速在全区范围内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群众运动新高潮。并组织贫下中农学哲学讲用团,从 10 月 20 日起到全区各地进行了演讲。1971 年 1 月上旬,专区革委会召开了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到 2 月,转到“批陈(修)整风”上来的时候,最初重点并没有放在批陈上,而是按照“批修整风”的要求,通过整风对各类关系中一些不正常的地方进行调整。

1971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专区党的核心小组以座谈会的方式召开整风会议,召集各县负责人提意见,帮助核心小组进行整风。与会人员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之后,对专区党的核心小组展开了批评,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2 月 27 日,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吕玉堂代表核心小组从 4 个方面做了初步检查:(一)在狠抓根本这个问题上,时抓时放;(二)在抓方向问题上,有时有偏;(三)在执行政策上,有时摇摆;(四)在领导班子革命化上,要求不严。

为把“批陈(修)整风”引向深入,防止批判时不得要领,地委机关报《池州报》特地开辟了《问题解答》专栏,从 1971 年 4 月 16 日起,对诸如什么是辩证唯物论,什么是历史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等逐一进行了解答。期间,地直机关先后举办了 4 期“批修整风”学习班。4 期学习班共刊出“批修整风”简报 8 期。

随着运动向基层逐步推开,5 月 30 日,地委批修整风办公室批转了贵池、青阳两县的《关于第三阶段整风学习的安排意见》。为引导县以下联系实际开展“批陈(修)整风”,6 月 12 日,地区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吕玉堂做了题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的工作报告。会后,特地让与会人员带着“批陈(修)整风”中的问题,先后到东至、贵池、石台、青阳、铜陵县的一些公社、大队、“五七”大学实地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学习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运用这些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事例,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通过分析眼前阶级斗争新动向、新特点,批判地主资产阶级

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从而使大家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随后,全区5个县都举办了基层党员骨干“批陈(修)整风”学习班,在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批倒批臭黑“四论”。以学带批、以批促学,使批判步步深入。

7月1日至6日,省委举行三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全省各地以“批陈整风”运动为纲,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带动各项工作前进。

在此之后,池州各级党组织在路线教育中,都把“批陈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紧紧掌握以批陈为重点,把“批陈(修)整风”落到实处。各地继续以举办学习班的方式进行发动,通过召开革命大批判经验交流会、抽调大批干部下基层等措施,领导和帮助基层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遵照毛泽东“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要求,各地以深揭猛批陈伯达“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派工作组”,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借起草九大报告鼓吹唯生产力论”等罪行,将运动推向深入。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池州的“批陈整风”运动很快转入了“批林整风”运动。

第二节 “批林整风”运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起初人们难以置信,议论纷纷,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的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人们对事件本身的猜测才逐渐平息。1971年10月以后,针对林彪等人的问题,中央连续下发了7个文件,“批林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省委于10月2日至6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并对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随后,在全省掀起了“批林整风”的高潮。

地委先是于10月15日至17日召开行政18级以上党员干部紧急会议进行了传达,尔后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式逐级

进行传达,到10月下旬已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在传达讨论过程中,结合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揭发批判。

1972年1月23日至2月5日,省委召开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强调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1月25日,省革委会政工组还转发了池州地区革委会政工组、贵池县革委会政工组《关于贵池县大路大队认真进行宣传改革情况的报告》,使大路大队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散播的种种谬论,改正对毛泽东宣传庸俗化的做法,如不再搞“早请示、晚汇报”,撤除“宝书台”、“忠”字墙等,得以在全省推广。

2月13日,地委制发《关于贯彻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几点意见》。主要内容为:(一)高举路线之纲,把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二)紧密结合路线教育,认真搞好各条战线的“斗、批、改”;(三)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四)深入开展“四学”运动,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按照地委的部署,“批林整风”先从培训领导骨干入手,地县两级分别举办了领导骨干学习班。全区先后共培训骨干39323人(其中地县两级培训8138人,公社培训31185人),并抓了107个试点单位(其中地县直接抓的试点单位8个,公社抓的99个)。在此基础上,于3月上旬集中火力对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进行了批判。通过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声讨、控诉、揭露和批判,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开始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在客观上为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有利条件。

8月22日,地直机关单位举行批林整风会议。结合形势教育,深入批判了林彪一伙污蔑和攻击大好形势的罪行。

12月21日,在地区革委会第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地委副书记江声在报告中指出:在运动的全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把批林斗争放在首位,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解决一两个突出问题。批林是解决敌我矛盾,必须

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整风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必须通过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用总结经验、分清是非的办法去解决。揭矛盾、论危害,找根源、肃流毒,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会议最后还通过了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认真看书学习,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

年底,地委就"批林整风"运动进行了阶段性总结,12 月 31 日,形成了关于一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

1972 年,根据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企业要整顿的任务,"批林整风"运动主要焦中表现在批判"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谬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4 月,全区贯彻省委印发的《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状况,强调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8 月 29 日,地委制发《关于进一步抓好地、县领导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意见》,规定每月不得少于 4 个学习日,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路线上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得"批林整风"运动转向较为务实的方面。

接后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全区围绕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在反复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路线问题的指示和《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的基础上,结合清查与林彪死党有牵连的人和事,掀起了"三清"①大学习、大批判高潮。地委、县委分别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进行了"三清",重点是组织上查清问题,并对揭发出来的问题逐条进行了调查核实。1974 年 12 月 10 日,地委形成了《关于清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至目前为止,从揭发材料来看,我区各级党组织成员中没有发现与林彪反党集团在组织上有牵连的人和事。

①"三清":即从政治上划清界限、组织上查清问题、思想上肃清流毒。

在揭露、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尽管江青等人的干扰使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曾一度发生逆转,一些原造反派组织的少数人又趁机浑水摸鱼,一些干部又受到批判冲击,一些工厂又停工停产,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复杂情况,但由于池州地委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始终坚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明确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一伙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强调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在不同类型的会议上几乎逢会必讲“批林整风”和反对极左思潮,统一干部认识,调整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努力使各项工作纳入正常轨道,使池州的局势趋于稳定。

第三节　“批林批孔”运动

在“批林整风”运动过程中,各个领域针对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所采取的纠“左”措施,因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忧并进而提出了要批孔子的问题。1973 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对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哲学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争发表看法,提出了批判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与批判林彪联系起来,以此论证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不仅想从思想根源上把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引向深入,而且借褒扬历史上法家的变革与批判儒家的反动保守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 年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随后,“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2 月 4 日至 12 日,省委召开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在全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地委、地区革委会紧跟形势,当月,“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区全面展开。各地各级都把“批林批孔”当作首要任务积极投身其中。青阳县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坚持举办学习班,有计划地培训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先后举办了 5 期学习班,为各条战线培训了 900 多名“批林批孔”骨干。全县各公社、大队、厂矿和县直部分单位,也层层举办学

习班、读书班,共培训了15000多名骨干。青阳铅锌矿在对本矿职工调查中了解到解放前夕的几年时间内,职工家中有108人被逼死、饿死、冻死,于是写出了《从108条人命看"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的批判文章。东至县召开"批林批孔"大会8000多场,组织大批判小分队1000多个,办"批林批孔"专栏8000多期,写大批判文章和稿件近10万篇。地区贵池铅锌矿党总支先后举办了7期骨干学习班,400多名职工人人挥戈上阵、个个口诛笔伐,有力地促进了运动的深入开展。在4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地区和各县先后培训"批林批孔"骨干61800多人。

6月18日,地委印发《关于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意见》。《意见》强调:要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批判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上智下愚"等反动观点。在农村,要打击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利用孔孟之道进行的复辟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在厂矿,要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可是,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批林批孔"已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这是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运动来巩固和扩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权势,利用批孔大做文章,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江青在多处场合借古讽今,露骨地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并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从"批林批孔"转向"评法批儒",使许多干部群众感到迷惑和忧虑。这时的"批林批孔"已经失去了批判林彪集团的实质性内容。

"批林批孔"转向"评法批儒"后,为学习理论、评法批儒,1974年6月22日,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意见》。7月中旬,省革委会又召开座谈会,对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地委随即召开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工作会议。地委常委孙立猷在会上做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认真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的报告。此后,全区工农兵理论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如地区池口铅锌矿建立了

三级(矿、车间、班组)理论队伍,建立了 12 个理论学习辅导小组,有理论辅导员 74 人。太平县有县委宣传队的 33 个大队都建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理论队伍。贵池县马衙、观前、茅坦、双桥等 16 个公社党委建立了公社一级理论学习中心组;113 个大队建立了理论学习辅导组,有成员 901 人;517 个生产队成立了理论学习小组,有成员 1512 人。观前公社新湖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建立了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理论队伍,共 38 人。石台县丁香公社培训妇女“批林批孔”骨干 310 多人,妇女参加大批判小分队的有 150 多人,成立了 21 个妇女理论学习小组,上述各地的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青阳县革委会还组织理论骨干召开了时间长达 20 天的座谈会,专题研究儒法斗争史,形成了评注法家著作简况的《天论》和批判儒家黑书《增广昔时贤文》的宣传材料,到全县各公社巡回宣讲。

“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使 1972 年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努力以及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出现混乱,使重新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追随江青等人的帮派分子重新在各地批斗领导干部,他们还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反潮流”等谬论,煽动停工停产。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下,池州经济严重滑坡。1974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 2496. 6 万元,比上年减少 233. 6 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 670. 8 万元,比上年减少 62. 5 万元;企业收入 336. 1 万元,比上年减少 309. 8 万元;财政支出 410. 1 万元,高于上年 362. 3 万元。生猪饲养量与 1973 年相比,下降 8. 6%,存栏量下降 16. 6%。公养比重由 18. 2%下降到 5. 3%,收购计划没有完成。水产品产量比 1973 年下降 271 吨,水果产量比 1973 年下降 355 吨。当年冬的农田水利建设,上工人数、完成土石方量也都低于上年同期。直到 1975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才使“批林批孔”运动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得到有效克服,才使池州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第二十章

1975 年的整顿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发动乱后,毛泽东也希望结束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逐步把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重任移交给邓小平。1975 年 2 月,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7 月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池州地区通过整顿,社会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转向回升。可是至 11 月,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导致整顿中断,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池州地区的形势又开始发生逆转。

第一节　全面整顿的开展

1975 年 3 月 11 日至 21 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工作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关于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的指示,着重讨论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

4 月,池州地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号召全区党员、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努力使中央、省委会议精神在整顿中得到贯彻执行。使池州的各项事业尽快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次会议,意味着地区全面整顿正式启动。

一、党组织的整顿

池州的整顿首先是从整党开始的。按照邓小平所说的“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于是,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一批被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尽快恢复工作,是地委在整党中采取的比较大的举动。在7月11日至15日全区组织干部工作会议上,孙立猷在题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做好组织、干部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道:对领导干部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审查,在弄清问题、提高觉悟、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先后加以解放和使用。在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现在,除极少数人待查外,原公社副社长以上的362名干部和县副部长以上192名干部,都得到了解放,能安排工作的都安排了工作,有许多干部继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发挥了老干部的骨干作用。另外,近年来全区还培养选拔了近千名新干部,其中有不少青年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班子主要工作。目前,地、县委常委中,青年干部占9.1%,社镇党委领导班子中,青年干部占17.9%,妇女干部占9.4%,有28个区、社青年干部占三分之一左右,45个区、社妇女干部占20%,有48名青年干部担任公社正副书记。

地委在这次开展党的组织和作风整顿过程中,还根据政治形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对党政机构做了相应调整,撤销了地区革委会所属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地委除保留办公室(与地区革委会办公室同一机构)外,设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等工作机构。12月,根据省革委会编制办公室革编字(1975)100号文件的批复,成立地区革委会人事局,并调整地直机关编制。地区革委会设经济计划和基本建设两个委员会以及32个局级机构。地直机关总编制为618名。其中,行政编制380名,事业、企业编制238名(含气象局,不含建设银行、外贸局)。同时,这次整党的内容还包括对一些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做了处理。

二、工业的整顿

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其他方面的整顿也陆续展开。从 1975 年 4 月份起,地区工业部门为扭转生产停滞下滑的局势,通过贯彻中央 9 号文件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收效显著,生产出现了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势头。至 9 月,全区完成工业产值 7492 万元,占年计划的 71%,比上年同期增长 20%,9 月份又比上月上升 6%。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都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到 1975 年年底,全区有矿山企业 36 家。其中:国营煤矿 2 家、铅锌矿 2 家、锰矿 1 户,社办煤矿 29 家、铁矿 6 家,开采矿种 8 个。由省轻工业厅 1971 年投资 125 万元兴建的东至纸浆厂(后改建为造纸厂)正式投产,当年实现产值 7.9 万元。这一年,池州地区农业机械厂还生产出江淮 12 型手扶拖拉机。到 1976 年 1 月,全区全民所有制企业每百元工业总产值积累水平从 1975 年的 6.66 元提高到 7.79 元。经过整顿,在短时间内使生产走上了正常轨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三、农业的整顿

与工业整顿相并行,农业部门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顿,全区把握机遇,从推广杂交稻入手,着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之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规模、速度、质量均好于往年,因此,这一年虽然灾情严重,但各地发动群众抗灾夺丰收,农业产品产量指标均按计划要求完成。1975 年是完成“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各项指标较“四五”计划的头一年都有不同幅度增产。粮食总产 44.56 万吨,比 1971 年增长 19%;棉花 8420 吨,增长 51%;油料 1.05 吨,增长 36%;油菜籽 0.80 吨,增长 38%;茶叶 2784 吨,增长 27%;蚕茧 332 吨,增长 97.6%;水产量 2787 吨,增长 100%。

四、科技、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的整顿

在工农业整顿的带动下,其他各方面的整顿也陆续展开。

为使科技事业尽快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75 年,撤销地区科技

局,重建行署科委,内设办公室、业务科。同年,地区及贵池县还成立了地震办公室负责地震测报工作,先后建立了 22 个地震测报点,有业余测报员 24 人。随着整顿的推进,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涌现出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由此受到重视。

8 月 13 日,地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抓好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工作的通知》。针对有相当数量的学校没有坚持以学为主,劳动和各项活动搞得太多的问题,提出要注意防止和纠正轻视理论、轻视读书的倾向;划清“师道尊严”同正确教育和管理学生的界限等,教育战线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整顿使池州文化领域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地区文工团渐次排演的芭蕾舞剧《沂蒙颂》、《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等。省电视台 1973 年 5 月录制的姜秀珍①、王兆乾合作编创的参加安徽省音乐舞蹈会演的罗城民歌《请你带到中南海》,也开始向海内外播放。另外,地区所辖各县集镇和公社所在地的大会堂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既可以演戏也可以放电影,成为乡(镇)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

6 月 23 日,地区革委会批转地区卫生局《关于加强区、社中心卫生院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整顿过程中,全区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建设了 26 所区、社中心卫生院,并初具规模,计有病床 715 张、人员 633 名,平均每所中心卫生院达到 27. 5 张床位、24. 3 人;充实了大中型医疗器械 136 件(其中 X 线机 24 台,各种手术器械 78 套),初步改善了医疗装备。整个卫生系统的医患矛盾也明显好转。

1975 年 4 月,《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颁布后,全区中、小学根据该《标准》和国家体委制定的《中、小学体育卫生暂行规定》,妥善安排体育课教学内容,广泛开展以“达标”为内容的体育锻炼。9 月,地区体

①姜秀珍,1935 年出生,贵池墩上许桥人。系罗城民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全国著名民歌手,第四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协常任理事,中国歌谣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第二届文联常委、作协理事、民协副主席。省第五届人大代表,贵池罗城民歌研究会终身荣誉会长。曾出席全国第三、第四、第五次文代会。

育运动委员会成立。10 月,举行首届全区农民篮球赛,东至县男篮、青阳县女篮分别夺冠,并代表池州地区出席了安徽省在南陵县奎湖公社进行的农民篮球分区赛。

池州的整顿能够取得上述成效,无疑与周恩来领导纠“左”和邓小平主持整顿有着重要关系。当然,这也是全区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同抵制动乱、坚持生产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得到党内外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支持,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整顿的实施过程中,却遭到了“四人帮”的竭力阻挠。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始于 1975 年 2 月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运动中,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等,将各项整顿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从 3 月起,江青、张春桥等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一时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等耸人听闻的言论扩散开来。针对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行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进行了批评,使“四人帮”的破坏受到遏制。可是到八九月间,他们在评《水浒》运动中,又以影射手法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全国形势进行攻击。11 月,他们又搞什么“教育革命大辩论”,提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这是“四人帮”给整顿工作设置的障碍。池州地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被要求要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清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在弄懂弄通上狠下功夫。结果是,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采取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小生产”、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的各种措施。原本很有限的商品流通范围和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进一步限制,供销合作社并入国营商业,工业部门的自销门市部除了个别的外,一律交由商业部门经营,城镇集市贸易被严加限制。许多小商小贩、手工业被取缔,或被组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地区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大小城镇日趋衰落。在农村,许多地方再次刮起“割尾巴”风,把农民的自留地、宅基地、家庭副业等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禁

止。农民的自留地被减少,家庭手工生产和经营的项目受到严格限制。受此影响,市场上农副产品严重不足,城市的猪肉、禽、乳、蛋的供应日趋紧张。日用消费品凭证限量供应的范围越来越大,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在他指导下形成下发的文件,使池州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保持社会稳定和坚持生产的重要性。因而在后期开展的评《水浒》运动和“教育革命大辩论”中,表现的不以为然,甚至产生怀疑和抵触。因为“四人帮”的行为暴露了他们宁要社会混乱、经济停滞,而无视人民渴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丑恶本质。他们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由泛论变成了实指,意欲以此将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打成“现代投降派”,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图谋。池州地区整顿的实践证明,1975 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整顿虽然未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已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被“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通过整顿的现实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是非有所醒悟,这对于党后来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起了极为重要的先导作用。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由于各方面整顿的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从而遭到“四人帮”猖狂反对,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担忧和不满。加上当时一些蓄意挑拨的情况反映,更对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1975 年 11 月下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有 130 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此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

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省委就此事于 1975 年 12 月和 1976 年 3 月先后召开了两个会议。一是 12 月 9 日至 10 日的地(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思想学习汇报座谈会的形式,向地(市)委书记“打招呼”。二是 1976 年 3 月 8 日至 15 日的省委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研究如何搞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5 日,省委还制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意见》。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省强行展开。

与省委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几乎同时,池州地委宣传部正在举办地直单位工人理论骨干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无形中成为池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早响应者。参加 3 月 6 日至 12 日地委宣传部举办的学习班的有地直厂、矿、企事业单位工人理论骨干和地直部、办、局的理论骨干计 180 余人。学习班开始和结束时,地委副书记许步信、张建民分别做了动员和总结。学习班期间,地委宣传部负责人做了 3 次辅导报告。据地委宣传部 3 月 21 日《关于地直单位工人理论骨干学习班的情况报告》称:这次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听取了中共中央(1975)23 号、25 号文件和(1976)2 号文件的传达;并结合学习了报刊上的一些重要社论和文章。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各小组都召开了批判会,斗争的锋芒直指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批判了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学习班期间,共写出大批判稿 130 余篇,有 9 人参加大会批判发言。《情况报告》还指出:要充分发挥工人理论骨干作用,切实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迅速掀起大学习、大批判新高潮,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4 月,池州地委以扩大会议的形式,部署在全区“反击右倾翻案风”。继后,各县相应召开三干会进行传达贯彻。同时也加大了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力度。但是,不断开展政治运动的观点已经很难再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加之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产生的初步安定的社会局面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效,使这场运动既有违事理又不得人心。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应冷淡,表现出明显反感和抵触。

“四人帮”大力鼓吹“反击右倾翻案风”,包藏着他们企图夺取党

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江青、张春桥等人把老干部视为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障碍,提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公式,不遗余力地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一再扬言:“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江青等人为了推动“批邓”,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说成是“三株大毒草”、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印了几千万份 3 个小册子下发到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性批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

为把深入“批邓”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重点打击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1976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省委召开省、地(市)委领导成员理论学习讨论会,旨在解决领导班子中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问题。会议还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仿效省委的做法,也要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

遵照省委要求,地委于 1976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举办了地委、县委领导成员理论学习讨论会。会议的任务和指导思想是:传达贯彻省委理论学习讨论会精神,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深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英明”论断,深刻认识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有变成“走资派”的危险;深入批判邓小平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深入学习和批判、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尤其是领导班子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思想交锋。

在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中,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正确主张结果反倒在干部群众中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使人们对邓小平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同时,也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

邓小平主持整顿的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池州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形势发生逆转。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否定,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散布“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不要为错误路线生产”口号的情况下,工农业生

产出现倒退。据统计,到 1975 年年底,地区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 7000 亩、棉花减少 2200 亩,致农业税少收 35.6 万元。水产品比上年减少 436 吨,水果产量减少 168 吨。全区有 21 个企业亏损,亏损额达 542 万元。其中有的在整顿中已扭亏为盈的企业又陷入亏损。

第二十一章

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池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发展

随着“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果的不断暴露,池州广大人民群众开始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是非有所醒悟,表达出希望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不仅使这场运动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在艰难曲折中使池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一节　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池州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

当红卫兵破“四旧”进行“打、砸、烧”时,就曾有人为保护珍贵的文物古迹,用诸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标语将其覆盖,使这些文物古迹免遭破坏。

运动初期,针对种种违反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的现象,不少人试图采取写大字报、印发传单、参与辩论等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期纠正,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目睹各级领导干部遭揪斗,许多原本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在初期被卷入运动的群众,并不赞成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为,纷纷离开造反队伍,或者成为“逍遥派”,或者反过来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

当运动波及农村时,不少社队干部就质疑:“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应当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叫什么革命?多数社队都对运动持消极态度,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绕开运动,尽可能地坚持工作和生产。

1967 年,全面夺权的风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动乱急剧蔓延,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1968 年年初,池州境内多处出现“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标语;2 月,驻青阳部队的一战士跳上宣传车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文化大革命!”等口号。这些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这实际上是人们难以理解和认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种种极端行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形成的抗议举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开展“批林整风”,一会儿批“左”、一会儿批右,致使池州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怀疑和责难的情绪愈益强烈。许多党员和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明确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不断开展政治运动的观点已经很难再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到“批林批孔”、评《水浒》后期,池州人民群众不仅不理会“批孔”、“批儒”的宣传,反而对这种舆论进行尖锐抨击。1975 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成效显著,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四人帮”却竭力阻挠整顿的进行。在此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池州大多数地区和单位对“批邓”反应冷淡,明显表现出反感和抵触。

特别是 1976 年清明节前后,池州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强烈不满,通过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抗议行动公开表现出来。在 1 月周恩来逝世时,池州人民沉痛哀悼。地区直属机关、各县直属机关、学校、团体的干部职工,自发佩戴黑纱,进行各种深切悼念活动。而“四人帮”等人却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做出种种规定压制和阻挠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除了禁止自发的悼念活

动外,还控制舆论工具不准报道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加紧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宣传。

从3月下旬起,北京、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利用清明节的祭祀习俗,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游行、集会,贴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并将标语刷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把人民群众已经起来公开斗争的信息传向四方。4月,在通过池州港的客轮上,出现了“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的标语。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尽管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抗议运动被压制下去了,且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但是,人们并没有屈服。在这次抗议运动中,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拥护以及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憎恶集中地爆发出来,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人们对于“四人帮”的行径早就义愤填膺。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有100万人口的唐山顷刻间夷为平地,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受重伤,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为历史罕见。面对这场灾难,党领导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池州地区医院先后派出两批医务人员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可是,在这百年不遇的严重灾难面前,“四人帮”竟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抓抗震救灾工作是“拿救灾压革命”、“压批邓”。在人命关天的时候,他们还念念不忘“批邓”,足见他们的狼子野心。这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看清“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

二、欢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

池州人民沉重悼念毛泽东 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农村、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举行吊唁活动。当日下午4时,池州人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

情,收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各县各单位都布置了悼念堂,人们佩戴黑纱、白花,敬献花圈,鞠躬致哀。没有尽头的吊唁人群缓慢移动,哀乐声、痛哭声在池州上空回荡,全区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8日,地区及贵池县在城北体育广场举行万人追悼大会,与首都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同时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此后多天,全区各界人士认真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重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和文章。通过学习座谈,大家纷纷表示决心继承意志、化悲痛为力量、努力生产、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悼念毛泽东。

欢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　随着“四人帮”阴谋活动更加露骨,党中央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急谋对策,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至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

10月15日,池州地委机关和各县县委机关同时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十年动乱宣告结束。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经公开,全区人民欣喜若狂,整个池州一片欢腾。20日,池城上万人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人们由衷地称颂粉碎“四人帮”是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其兴高采烈、欢呼雀跃的神情,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和渴望。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重要的是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社会

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池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发展

尽管“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池州地区才重建,然这场运动对池州所造成的危害却是全面而严重的。在长期动乱的冲击下,本就基础薄弱的池州经济倍受重创,正常的生产秩序难以维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但是,在这 10 年中,池州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池州党政领导在这场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站在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面,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忍辱负重,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冲破禁锢的藩篱,落实经济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为池州“三五”、“四五”计划的实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池州党内外干部群众在高涨的革命热情推动下,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共同为地区经济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得池州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受挫折,但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

农业方面。10 年间,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年均总产量 37.53 万吨,比 1965 年总产量 34.06 万吨增加 17.77 万吨。1970 年后的 7 年每年递增 4.4%。1976 年,粮食征购完成 2.1892 亿斤,超额完成省分配的任务,比 1975 年增长 11.8%,购销节余创历史新高。茶叶、棉花收购,生猪外调、水产收购外调任务均超额完成。其中水产收购外调全面超额,是池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工业方面。创办了池州造纸厂、池州农药厂、池州烧碱厂、池州化肥厂、青阳缫丝厂等一批国营企业;贵池县读山煤矿、黄山岭煤矿、六峰山铁矿及黄山岭铅锌矿也先后上马并建成投产。池州汽车修理厂承担起全区汽车大修任务。东至县齿轮厂发展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定点生产齿轮、花键轴的厂家。机械电子工业共生产出 30 多种产品,其中农机具及内拖配件 20 余件。石台东方红水力发电站、青阳桥庵九华山水电站等一批小电站建成发电。贵池境内的上海三二五电厂

和陵阳开关站至青阳变电所的35千伏输电线路竣工并投入运行。池州水泥厂等一批建材工业建成投产。上海市国防工办在贵池县梅街、棠溪等山区筹建的八五、永红、火炬、五洲、胜利、前进等一批军工企业也陆续投入生产。

交通邮电方面。青阳至童埠公路、石台至矶滩公路、二圣至九华街盘山公路建成通车,新建了青阳五溪公路桥、贵池杏花村公路桥、殷家汇公路桥、东至尧渡新公路桥、石台秋浦公路桥。铜陵至贵池无线定时会唔人工电报线路开通,地区至各县无线电联络开通,池州至各县长途电话线路全部直达。

基本建设方面。历时10年的贵池县白洋河改造工程、东南湖围垦灭螺工程于1975年10月竣工。尧渡河中下游治理工程和东流老闸、新河口闸以及青阳县七星河治理一期工程等一批水利工程相继竣工。

外贸方面。外贸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外贸总值达1611万元,占省分配任务的108.9%,比1975年增长13.2%。财政收入超额8.4%完成省分配的任务,比1975年增长10.5%。财政支出保持了正常水平,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城、乡储蓄比1975年分别增长6.6%和25%。

科、教、文、卫、体等方面也都有若干进展。

科技方面。1969年10月,铜陵县锺明农具社试制成功专区第一台水稻收割机。1970年,池州建成无线电厂,产品有示波器、针麻仪、超声治疗仪、整流器4种。当年,池口冶炼厂制成电动卷板机,池州造纸厂制成35克油光纸,铜陵县酒厂试制成功“920”农药,胥坝轧花厂改制成功皮辊机。1972年,东至县金寺山林场用微生物白僵菌防治松毛虫获得成功,成果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1973年,地区农科所在东至县杨桥公社成立(1976年迁贵池)。1975年,地区科技情报所作为行署科委的二级机构设立,主要以农业、工业为服务对象,开展搜集情报、调研、咨询和交流活动,与全国50多个单位建立科技情报交流关系,编印发行《池州科学实验》、《科技情报》(后改为《科技情报交流》、《池州科技动态》)等刊物。这一年,科技部门完成科技项目36

个,其中新上项目 20 个,有 7 个属省定项目。1976 年,全区科技人员发展到近千人。

教育方面。尽管受“教育革命”的影响,全区中学教育在调整的基础上仍有新发展。1969 年 1 月,安徽省芜湖卫生学校迁至贵池城北百牙山西侧,更名为“安徽省池州卫生学校”。1972 年,全区开始整顿教育秩序,加强文化课教学,恢复升学教育。当年冬,初中升高中实行统一考试。据统计,全区完全中学由 1965 年的 3 所,增加到 1976 年的 33 所;初级中学由 1965 年的 13 所,增加到 1976 年的 140 所;小学附设初中班仅贵池、青阳两县就有 267 处。1972 年至 1975 年,各县还先后创办了“五七”大学,地区 1973 年试办职业技术专修学校,至 1976 年,共有 63 所工人业余大学。

文化方面。文化工作是在与“文艺黑线专政论”抗衡中求发展,至 1973 年前后,文化馆与县剧团、电影院等单位恢复建制。各县和九华山管委会的文化馆,配置工作人员最多的有 18 名,少的也有 10 名。1970 年 6 月,以分配来池的安徽黄梅戏学校 12 名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一个“三队二组”(舞蹈队、戏剧队、乐队、声乐组,舞美组)的池州专区文工团。于 1972 年 4 月创作排演了大型现代黄梅戏《血防线上》。1973 年 5 月,创作排练了一台音乐舞蹈节目,有舞蹈《放排》、《养鹿舞》和罗城民歌等,参加安徽省音乐舞蹈会演。1974 年 10 月,创作一台歌曲、舞蹈、曲艺节目,参加本地区文艺会演。1975 年 5 月,创作小舞剧《东风化雨》参加安徽省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20 世纪 70 年代,各县城电影院开始采用 32 毫米拷贝,双机不间断放映。1976 年 7 月,成立地区新华书店,隶属地委宣传部。池州地区电视广播虽比其他地市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较快。1970 年,全区 89 个公社已建立广播放大站 47 个,广播通队率青阳县为 100%、石台县为 82%、贵池县为 75%、铜陵县为 63%、东至县为 48%。1972 年年底,地区广播网办公室建设的地区第一座电视差转台开播,为全区电视事业之始,当时,全区有黑白电视机约 10 台。1976 年,全区已拥有黑白电视机 163 台、小型电视差转台 7 座(其中 6 座为三线厂所建)。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黑白电视机成 10 倍的增长,而且开始有少量彩色电视机出现在单位和

家庭。

卫生方面。1972 年后,通过整顿,逐步恢复卫生机构,调回下放人员,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全区各项医疗卫生工作渐有起色。全区已建成农村中心卫生院 30 所,拥有正规病床 410 张、简易病床 187 张,在职职工 713 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594 人;公社卫生院 82 所,正规病床 30 张、简易病床 395 张,在职职工 798 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691 人。地区人民医院也于 1972 年建成开诊,设 8 个临床科室、5 个病区、6 个医技科室,有职工 66 人。主要医疗设备有 200 毫安 X 线诊断机 1 台、电冰箱 8 台、万能手术床 1 台、高倍显微镜 3 台、牙科治疗机 1 台。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地、县医院分设儿科、传染病科,地区医院还设立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精神病科、病理科和婴儿室,并能开展脑电图、心电图、超声波检查。

体育方面。20 世纪 60 年代,青阳县男、女篮球队曾 4 次夺得安庆专区友谊赛冠军、1 次夺得七县(市)邀请赛冠军。池州化肥厂和青阳化肥厂先后被评为省职工体育先进单位。1973 年 10 月,举办了池州地区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东至、石台县分别于 1973 年、1974 年成立业余体校。1974 年,地区体委于城北人民广场增设能容纳 4000 观众看台的灯光球场 1 个、水泥灯光球场 2 个、排球场 3 个。1976 年 10 月,贵池县选派 12 名少年武术队员参加省举办的少年武术比赛,其拳术获荣誉奖。

以上所述看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池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比以上大得多的成就。

第　四　编

进行拨乱反正　迎接伟大转折

（1976 年 11 月—1978 年 12 月）

粉碎“四人帮”虽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但是,池州各级党组织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在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时,在恢复国民经济、努力搞好生产之际,仍然遇到了严重阻碍。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使得诸如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一些必须澄清的是非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加速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表明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的历史转折。池州党组织以此为起点,从严重挫折中重新奋起,积极探索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带领全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第二十二章

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后,池州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及省委的部署,积极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和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重新振兴,池州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稳定。

第一节　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即对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做出了部署。1976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四人帮”的一切谬论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转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12 月 25 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随后,“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和材料之三《“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相继下发。

全国上下迅速形成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可是,安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由于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坚持错误立场,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反而散布“安徽特殊”论,声称“‘四人帮’没有插手安徽”,“我们是顶着‘四人帮’逆流前进的”,揭批“四人帮”及清查其帮派体系的运动在安徽“不需要大搞,也不好大搞”。采取捂盖子、压群众,把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安徽实际揭批“四人帮”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致使全省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难以深入。

受制于省委主要负责人等人的施压,池州地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同全省各地一样,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 8 个月时间里,笼罩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揭批“四人帮”第一、第二战役受到严重阻碍。虽然其间地委也召开了几次动员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会议,但“雷声大,雨点小”,除地委组织部、宣传部于 1976 年 12 月 10 日至 25 日,在地区“五七”干校举办区、社(镇)领导干部(共 184 人)学习班外,其他并无实质性进展。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仍得不到解决,拨乱反正也迟迟不能起步。

1977 年 6 月,中共中央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之后,形势迅速好转。以万里为首的新的安徽省委排除各种干扰,放手发动群众,坚定而有步骤地紧密联系安徽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7 月 3 日至 8 日,省委召开地委、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会议强调指出:当前要排除一切干扰和阻力,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在池州地委召开的全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改组安徽省委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同“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做斗争。6 月 30 日,江声在地区暨贵池县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指出:安徽问题的解决,是对“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的沉重打击,我们要遵照党中央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使运动沿着重要指示的正确轨道胜利前进。8 月

10日,地委制发了《关于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意见》。此后,全区迅速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高潮。1978年2月之前,地委先后召开了4次地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其中规模较大的第二次是1977年12月17日下午在城北灯光球场召开的,参加大会的有地委和地区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地直机关全体干部,厂矿、企事业单位代表,贵池县直单位部分干部和其他各县的代表共4000多人。会议密切联系池州实际,集中揭批“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三箭齐发,放火烧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会上,有8人发言进行了揭发批判。最后,地委书记江声在讲话中强调:第一,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锋芒集中指向“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深入进行思想发动;第三,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坚决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第五,要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第六,要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在1978年2月1日下午召开的地直机关第四次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上,宣布对1967年抢劫殷家汇银行和石台县银行的为首分子依法拘留审查,对打砸抢分子予以坚决打击,给盼望社会安定的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①

为把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斗争进一步推向深入,在1977年8月15日召开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地委书记江声带头联系实际进行了揭批:受“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影响,我们也跟着讲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蠢事、贯彻执行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当前,放手发动群众的重要问题,就是带头联系池州的实际进行揭批,只有这样,才能把运动引向深入,才能肃清流毒和影响。九十月间,《池州通讯》还连续刊登了多篇揭批“四人帮”和安徽省委前主要领导人的文章。

10月24日,省委印发《关于传达贯彻中央37号文件的通知》。11月11日至16日,池州地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37号文

①引自1977年12月20日、1978年2月5日《池州通讯》。

件,动员和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常委和地区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地直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共300多人。地委书记江声做了动员报告和小结。这次会议是以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指导,抓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个纲,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揭露“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揭露“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的罪行。桩桩件件,证据确凿,对与会人员和地直机关单位广大干部群众震动很大。江声在讲话中指出:只有学得好,领会深,才能认清“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才能避免一般化、走过场,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①

继后,地直各单位结合贯彻中央37号文件,再次掀起了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新高潮。地、县公安干警举行座谈会、批判会,向“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猛烈开火,愤怒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黑干将破坏公安工作的滔天罪行;地直计口把斗争锋芒对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领导带头,抓住要害深揭狠批。地直财贸系统联系实际,重点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不顾党在农村中的现行政策,把社队发展多种经济和社员正当家庭副业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大肆批判,在全省范围内强令关闭农村集市贸易,造成一些地方土副产品生产下降,社队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社员收入得不到提高的罪行。揭露他们大搞弄虚作假,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完成任务就是政策”,粮食产量要报多少就得报多少,否则,就被扣上“破坏大好形势”、“思想右倾”等帽子的丑恶行径,在强压下,不少社队卖了过头粮,严重影响了社员群众生活。地直文化局联系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揭批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大搞阴谋文艺的罪行。地区暨贵池县教育系统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炮制“两个估计”大会,干部职工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池州教育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迅速发展,教育战

①引自1977年11月20日《池州通讯》。

线欣欣向荣的大量事实,痛斥了他们散布的所谓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的无耻谰言。

根据省委“各地、市、县委要抓好培训骨干,有计划地派到基层单位,帮助搞好文件的传达和宣讲工作”的要求,池州地委党校于1977年12月举办了县区、社和县直科局领导骨干训练班。认真研究第三战役中的理论问题,把“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制造的混乱纠正过来。训练班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了剖析:(一)从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动”看“四人帮”怎样颠倒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关系;(二)从所谓“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看“四人帮”是怎样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的;(三)从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看“四人帮”是怎样攻击和诬蔑革命老干部的;(四)从“四人帮”所谓识别走资派的标准看其是怎样制造思想混乱另搞一套的。①

这次培训班为澄清多年来存在的理论混乱所做的努力,进一步鼓舞了参加培训的学员,促使他们运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器比较直接地去批判“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带动了县以下揭批运动的开展。各县为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这一仗,首先着重解决对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如太平县委成立办公室,专门负责“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的宣讲工作;青阳县委举办骨干培训班,参加人员有各公社(镇)、大队、城镇街道和县直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及理论骨干260多人。并把揭批“四人帮”材料之一、之二与之三结合起来宣讲、辅导,列出专题进行批判等。各县在12月以后逐步扩大规模,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基础”,把发展生产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把经营管理说成是“管、卡、压”等谬论。充分揭露了他们宁要社会混乱、经济停滞,而无视人民群众渴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丑恶本质。各地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还进一步批判了林彪的罪行。

①引自1977年12月5日《池州通讯》。

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第三战役中,池州地区还通过学习大庆和安徽宣城经验,开展了“三大讲”和“说清楚会”,进一步将运动推向纵深。为对一些同“四人帮”虽然有牵连、做过错事,但没有参加篡党夺权活动的人予以批评教育,创造条件让他们说清楚自己的问题,及时解脱。在说清楚会上,首先让犯错误的人把话讲完,而后由干部群众给其评论,大多数人都能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积极上阵、踊跃发言,对犯错误的人立足于拉,深入地揭发,严肃地批评,热情地帮助。抓住政治上的主要问题展开思想交锋,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帮助犯错误的人端正态度、转变立场,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各单位的“说清楚会”开得严肃、认真、热烈,很有战斗性,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对犯错误的人触动很大,也使参加会议的人一并受到教育。

1978 年 8 月 20 日至 25 日,地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前期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一批双打”[①]斗争的任务。总的部署是:8 月底前做好准备,9 月初进行动员,首先把地、县机关和直属城镇运动开展起来。在“三秋”大忙之后腾出力量再抓农村的“一批双打”,争取年内基本结束。会议认为“一批双打”斗争是彻底清算“四人帮”罪行、肃清“四人帮”流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和清查工作的继续深入,是实现安定团结的重要条件,是摧毁“四人帮”反动社会基础的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务必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必然性和艰巨性,提高认识、下定决心、坚定立场,旗帜鲜明地带领群众搞好这场斗争。斗争中要坚持既坚定又稳妥的方针,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热揭发、冷处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揭批和“双打”结合起来,以揭批促“双打”,以“双打”促揭批,组织重点突破,以夺取全胜。

9 月 1 日下午,地委召开了地直机关“一批双打”动员大会。9 月

①“一批双打”:即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的势力。

20日上午,再次召开地直干部职工大会,部署“一批双打”斗争第二阶段战斗任务。通过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一些情节恶劣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逐渐浮出水面。如地区肉联厂揭露出贪污1300多元、1900多元的贪污犯;地区医药公司仓库两个外包工盗窃贵重药材转手倒卖牟利2800多元;迎江旅社小卖部营业员胡丰年贪污公款8000余元、粮票1000多斤;贵池县梅街税务所12名干部有9人贪污。这些人为数不多,影响很大,不揭露和打击他们的犯罪行为,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要受到挫伤。正如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所述:实践证明,认真开展这样一场打击“四人帮”社会基础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

一、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为大批无辜遭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落实政策,也是粉碎“四人帮”后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安徽省开展复查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从1977年6月即已开始,当时虽然也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为一些干部落实了政策,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致使所属地、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1977年10月7日和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主持撰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表达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978年3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对全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行部署。27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对相关政策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8月20日至25日,地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了抓紧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决定先从对池州影响较大的

案件入手,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地委原委员、地委宣传部原部长周殿荣,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9年7月17日不幸逝世,终年42岁。1978年8月28日,地委、地区革委会在地委礼堂为周殿荣举行了有500多人参加的骨灰安放仪式。宣布推倒过去强加给周殿荣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恢复名誉。地委、地区革委会、池州军分区、地直各部、委、办、局、室、党校、地直机关党委、群众团体以及贵池、东至、石台、太平、青阳县的县委、县革委会、县委宣传部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坦和周殿荣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负责人、生前好友及亲属。仪式由地委常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学祖主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吴栋平致悼词。仪式结束后,其骨灰由地委、地区革委会领导人和其亲属护送到红旗山公墓安放。时隔不久,贵池县委于10月20日在县委礼堂为同样遭受迫害的贵池县委原委员、县委宣传部原部长朱大藩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朱大藩平反、恢复名誉。上述做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1月下旬,地委传达贯彻省委决定:要求对凡是因天安门事件受牵连,因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鸣不平,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尚未释放、平反的,立即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当月,地区对上述在押人员全部予以释放,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其中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予以撤销;对正在立案审查的予以销案,解除审查。

11月25日至28日,地委在东至县召开政法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县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负责人,地、县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和政法部门有关人员。会议学习了省委(1978)92号文件(批转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关于全省冤假错案平反情况和今后的意见的报告》)和《人民日报》发表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借鉴》两篇文章。贵池县和东至县分别介绍了冤假错案复查平反和清理四类分子底数工作的做法。会议围绕抓紧进行冤假错案复查平反这个政法工作中心,讨论和部署了当时政法工作任务。12月6日,地委批转了这次会议的纪要。纪要指出:现在,实事求

是地纠正冤错案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做好这一工作是清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镇压人民的血腥罪行;是拨乱反正的必要步骤;是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们一定要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原则,认真地抓紧抓好这一工作。在复查平反假冤错案过程中,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工作责任范围,凡是公安、法院办理的案件,由公安、法院负责复查;凡是各级民兵指挥部、“群专”和“一打三反”、路线教育中批斗、关押、处理的案件,由同级党委组织力量复查处理;凡是各基层单位所办的案件,原是哪一级办的,仍由哪一级复查处理。做到条条有着落、件件有交代。

1979 年 2 月,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认为:为了实现全区工作重点转移,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历史遗留和现实存在问题。会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中对原来地级干部的专案审查报告,推倒给胡坦等地委领异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结论,同时对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迫害干部的案件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办法。此次会议后,3 月至 4 月,各县县委均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文件,讨论如何采取得力措施加速搞好甄别平反、复查改正和经济建设工作。

10 月 19 日至 20 日,地委召开了全区案件复查工作会议,并于 10 月 25 日印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纪要指出:今年六七月间,地委先后召开了全区政法会议和各县组织部长、审干办公室主任会议,并多次召开统战部长会议,通过这些会议,解放思想,明确任务,讨论加快步伐的措施。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领导和指导,大大加快了进度。据 1979 年 10 月 23 日全区案件复查工作会议纪要载,截至 1979 年 9 月,全区“文化大革命”期间需要复查的案件共 6098 件(组织部门 2419 件,公安部门 1348 件,法院 2341 件),已经复查处理 5752 件(组织部门 2308 件,公安部门 1297 件,法院 2147 件),占 94. 3%。在已经复查处理的案件中,全错全平的 667 件,部分错部分平的 1124 件。“文化大革命”

前反右派、“反右倾”和“四清”运动的案件中,右派案件需要复查的1290件,已经复查改正1281件,占99.3%;应安置849人,已安置789人,占92.9%;公安、法院部门受理“反右倾”案件147件、“四清”案件70件,已经复查处理分别为84件、17件。组织部门共受理“文化大革命”前老案1360件,已经复查处理124件。纪要还阐述了会议就贯彻落实省委82号文件,进一步搞好复查工作的几个问题统一了认识。会议要求大规模复查任务要在年底前完成,县委和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具体指导,讲究方法,保证质量。善始善终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指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这一指示为各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2月5日,地委发出《关于尽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通知》。要求对尚未做出结论的,要尽快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不能久拖不决;对那些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要尽快安排工作,不能拖延。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干部政策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二把手要亲自抓,并指定专人负责。

1978年4月5日,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当月,地委及各县委分别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10月8日至10日,地委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召开了各县摘帽办主任工作会议。东至、太平对部分摘帽人员初步安置了22人,多数分配了工作,评定了工资级别。

1978年9月4日至8日,地委组织部召开全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座谈会,分析了地区前一阶段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形势。认为:全区落实干部政策的形势总体是好的。据初步统计:全区“文化大革命”以来立案审查的案件2560件,到8月底已复查了824件,占立案总数的82%;清理积案220件,占未结案件260件的80%;通过复查纠正冤错案件150件,占复查总数的19%;推倒不实之词、修改结论的64件,占复查总数的7.7%;材料不实、无限上纲给予消案的92件,占复查总数的11%。会议就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党的干部政策提出了6点要求:

(一)要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二)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三)要进一步明确落实干部政策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四)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提高办案质量;(五)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六)要加强党的领导。9 月 18 日,地委印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

9 月 20 日,地委组织部发出《关于干部审查结论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干部审查结论的审批权限,提出了报批案件必须报送材料的规范要求。

11 月 25 日,地委对太平县委《关于乌石等几个公社 1968 年发生大批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党团员被无辜打成反革命,有的致残、致死问题的专题报告》予以批复,要求有关部门按政策妥善处理,有关致伤致残的社员群众平反后,生活困难的应予适当救济。

1979 年 1 月起,地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着手对全区 1290 件右派案件进行了复查。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甄别平反和复查改正 1281 人,占 99.3%,右派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同时,对 1507 件“反右倾”等历史老案也予以复查改正。

另外,全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5 号文件,还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了群众评审,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也一律摘掉了帽子。

第二十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终于得到解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生产再度成为人们理直气壮的行动。池州地区在部署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稳定全区局势的同时,着手工农业生产的整顿和恢复,并重新发出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做出新的贡献的号召。但是,面对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和干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在这个过程中,池州地区各项社会事业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农村改革初起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一、农村改革初起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四人帮”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池州地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农村工作中许多“左”的政策仍在延续着。比如继续以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名义,限制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继续推广大寨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做法等。不少基层干部对此深感忧

虑,强烈希望能够改变现行的农村政策,以推动生产发展。

1977 年 11 月 15 日至 22 日,省委召开各地、市、县委和省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和研究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在之前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会议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特点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

"六条规定"像是及时雨,在池州地区一公布,立即受到热烈拥护。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条就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 年 2 月 5 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向新华社记者谈道: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质上是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和发扬民主的大问题。"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是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许多错误的根源。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①"六条规定"的制定,对农村"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错误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对调动生产队和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促进作用。成为扭转安徽农村严重形势新的起点。随着"六条规定"的贯彻落实,池州农村的拨乱反正加快了步伐。

从传达"六条规定"开始,地区各级党组织就把贯彻省委"六条规定"作为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来抓。各县把"六条规定"印发到大队、生产队,组织群众学习讨论,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此前,一些干部思想不解放,对多种经营生产存在的问题不敢揭露、不敢解决,片面认为"粮食不上纲,书记不好当"。在地委、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和山区生产会议上,地委、县委负责人带头批判极左、揭露矛盾,分析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自然特点大讲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①万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 年 2 月 5 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4、105 页。

和可能性,以加深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并列举典型事例加以印证:一是太平县潭家桥公社罗村大队,过去产漆产土纸,后来单一经营搞粮食,漆园荒了、纸槽垮了、社员穷了,人均收入只有 43 元。1977 年后恢复纸槽生产,栽漆树 8 万棵,又开始由穷变富;二是青阳县酉华公社金陵生产队,过去单一经营也比较穷,后发展蚕桑,蚕茧突破万斤关,粮食平均亩产 1200 斤,出现了增产、增收、增积累、增贡献的可喜景象,由穷队跃为全县有名的富队。1978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地区革委会召开多种经营座谈会,提出了全区多种经营主要项目的规划指标。为使农业结构趋于合理,在调查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了初步农业区划,按自然条件不同,全区划分为 6 个农业区,即东部山区、南部山区、沿河丘陵区、沿江棉区、商品粮区和渔区。各区域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农业建设方针和主攻方向,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趋利避害,有主有从,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这一调整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78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粮食总产增长 7.5%,粮食购销结余超过历史平均水平;油料增长 62%,油菜籽产量超历史,蚕茧产量突破万担,茶叶质量、产值都好于上年,果、蔬、药材等也都有不同程度增长。财政收入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年,城乡储蓄大幅度增长,人均收入突破百元。到 1979 年,全区集体储备粮比 1978 年增加约 4000 万斤,仅棉、麻、茶、茧 4 项收入就比 1978 年增收 1100 万元以上。

1978 年 6 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下发后,8 月 14 日,地委专题召开贯彻中央 37 号和 42 号文件大会。地直和贵池县直机关干部、公社党委书记共千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地委书记江声逐条宣讲了文件,并对学习、宣传、贯彻中央文件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各级党委和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宣讲,带头贯彻执行;(二)要加深对文件精神、意义的理解,提高认识,消除顾虑;(三)以整风精神对照检查;(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好试点,取得经验。会后,地委和贵池县委共抽调 100 多名干部、东至县抽调 30 多名干部到基层进行调查。结合宣讲文件,认真搞好整改、退赔,把搞好年终分配,特别是减轻农民负担、归还超支款和欠款问题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明确

提出超支、欠款多的要作为“三大讲”的内容,态度不好的要上“说清楚会”,通过揭批推动还超支,通过抓还超支把揭批斗争引向深入。这样,很快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了还款工作。两个月内,地直各单位归还超支和公款 13.5 万元。全区共归还超支款 651 万元,不仅把上年超支填平,历年超支也下降 8.3%。

为进一步认真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和省委“六条规定”,地委又于 8 月 20 日至 25 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前一段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37 号、42 号文件和省委“六条规定”的情况,传达贯彻了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与会人员对照中央两个文件和省委“六条规定”,以整风精神揭露矛盾,初步研究了整改措施。如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搞改土,按水系流域有计划地建好“三渠”、排出“三害”达到“三保”;广开肥源,大搞农家肥,采取养种积制的方针抓好花草、增加饼肥,开展积肥运动,逐步做到春积秋用、冬积春用;选育和推广良种,对三系杂交稻制种的技术辅导及时跟进,对重点制种社队逐片逐田检查,反复拔除杂株、异株,搞好花期隔离,提高种子质量等。会议还初步确定了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本着续建、配套、挖潜的原则和当年受益的要求,兴利与除害相结合,在降得下、保得住上下功夫,把“三跑田”改成为“三保田”,做到肥水不出田,洪水不漫田,遇涝能排,遇旱能灌。会议认为,农田基本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措施。要求全区干群树立雄心壮志,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坚持不懈地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当年冬和次年春,贵池县动员 5 万民工投入江堤岁修战斗,完成土方 210 万方,比上年增加一倍多,超计划完成任务;东至县开工 481 处,上工人数达 7.1 万人,完成土石方 450 万方。全区开工 2156 处,增加蓄水能力 2000 万方,扩大旱涝保收面积 10 万亩。408 座中小型水库 1979 年实际蓄水 2.4 亿立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1.4 倍,有的水库通过配套、挖潜,效益倍增。另外还兴建了丘陵区抗旱站 55 个,配备 55 千瓦电机 141 台套,其中已建成出水的抗旱站 26 个、66 台套。另有社队自力更生兴建小型抗旱站 105 处,装机 1.5 万马力,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1979 年,21 个水利基建项目均已完工,其中 12 项水库工程当

年发挥效益。

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已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分。地委、地区革委会在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注重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社队企业的整顿和发展。虽说1976年行署设立了社队企业局,但在指导思想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还在起作用。限制私人务工经商,企业管理也畏首畏尾,致社队企业发展缓慢。地委、地区革委会通过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界限,着力整顿企业秩序,把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等制度健全起来,下决心把生产搞上去。1978年以后,社队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到1979年,全区社队企业发展到2146个(不含村以下企业),比1978年增加2.8%,总产值4754万元,比1978年增长14.6%。

1978年夏秋之际,池州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绝大部分塘库干涸,河床见底,全区有1163个生产队人畜用水发生困难,秋种难以进行。面对严重灾情,地委、地区革委会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抗旱斗争为中心,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发扬大寨精神,千军万马齐上阵,千方百计挖水源;千担百里一亩苗,全面抗,重点保。地、县两级机关派出1180多名干部深入抗旱第一线,与群众共同战斗。全区动用电动机2450台、柴油机4867台、水车近万部,打井1103眼、打坝4766道。3个月大旱,百余天大干,这一年,全区不但平稳地度过灾荒,而且还获得了早稻丰收。在这次救灾中,各级党组织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则更让地委、县委动容。之所以能够这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源于省委对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省委基于对全省抗旱斗争和农业生产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大旱所带来的严重困难的估计,果断做出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这一决定立即激发起农民的抗灾积极性,从而使全区抢收了84万亩早稻、抢插了65.8万亩双季晚稻,还保住了近10万亩棉花。实践中发现,省委这个决定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救灾的初衷,进而引发了一些地区开始进行改变生产管理方式的尝试。在实行“借地度荒”过程中,肥西县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队干部和

农民联想起60年代初实行的“责任田”,索性再度搞起包产到户。省委知道后,没有像过去那样对包产到户马上禁止,也没有匆忙做出结论,而是决定先派人去实地调查。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会议上鼓励大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① 随后,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悄悄地把耕地全部分到农户。消息传到池州后,东至县委立即组织干部到官港生产大队坦岭生产队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短期内,全区农村各地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像树木开花一样竞相争艳。为消除一些干部的顾虑和鼓励支持农民的积极性,地委在多次会议上对这一改革予以肯定。11月6日,地委书记江声在县委负责人会议上指出:湖区可以搞“五定一奖”,分散的山区可以因地制宜试行“一组四定”,午季作物下种后,可以成立作业组,搞田间管理责任制。只要不触动社会主义所有制,不会出什么问题。1979年以后,各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不仅多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速度加快,而且还逐步推行到农村中的其他各业。

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中,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党中央强调要大抓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生产力。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至5月,中央先后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7年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几次会议,对于调整经济关系、整顿经济秩序、发动广大群众努力搞好生产,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了动员

①万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1978年10月11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作用。

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　面对大抓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池州地委和地区革委会深深懂得由于池州工业基础差、底子薄，要想加速池州整个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池州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经历动荡之后的恢复性质，由于速度畸高畸低、起伏过大，发展是不稳定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缓慢的。加之受“四人帮”鼓吹的“不为修正主义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判唯生产力论”等观点的影响，人们的生产热情低落，经济效益普遍下降。据地、县21个企业1976年统计，产品质量、原材料燃料消耗、劳动生产率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没有达到当时先进水平的有59项，达到的只有22项，企业亏损面大，盈利的单位、上交的利润不多。拿煤炭来说，有的矿原煤生产全员劳动生产率，1975年达到每人日产0.487吨，现在只有0.362吨。因此，加快池州地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缩小与其他地市的差距，成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刻不容缓的任务。

1977年6月1日，地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学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文件的通知》。号召工业战线的干部职工要像大庆工人那样革命加拼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到9月，全区工业生产完成产值8800多万元，占年计划的63%，比去年同期增长18%。尤其是1978年夺得了首季开门红，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32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刷新了历史最好纪录。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对企业管理提出了具体标准。以学习贯彻“工业三十条”为契机，全区各企业、特别是一些重点企业加快了领导班子和生产秩序的整顿，普遍按“工业三十条”恢复健全了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共性中有个性，如省大庆式企业——东至县水上运输公司采取边学边查边改，加强企业管理；地区农机厂、青阳水泥厂等实行了“三包”制度；地区工业局，东至县化肥厂、东至齿轮厂等实行了奖金制度；地区建筑公司则从核算这个关节动“手术”，改公

司一级核算为公司、队(车间)两级核算等。期间,不仅开展了“岗位练兵”、“质量月”活动,还开展了厂与厂之间的对口赛、县与县之间的挑应战。通过上述工作,工业战线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大有改观。到5月底,全区完成全年工业总产值的36%,比上年同期增长16%。地区工业局麾下的冶金、化工、电子工业生产增长幅度较大,所属6家厂矿提前47天完成上半年产值计划,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4.4%;12种主要产品已有硫酸锌、粗铝、硫酸、生铁、苏化203农药和铝金属等6种完成全年任务的一半以上;4月底,累计上缴利润占全年计划的75.9%。全区财政收入6月份完成年计划的53.8%,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超额完成了上半年收入计划,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为组织工业生产新跃进,6月12日至16日,地委召开全区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8)17号文件和国务院、省委召开的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精神,讨论研究如何加快全区工业学大庆的步伐,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新高潮。要求各企业对照大庆式企业的6条标准,广泛开展大整顿、大竞赛、大检查、大评比、大总结,以一种在任何困难面前坚韧不拔的毅力争先创优,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步伐。地委、地区革委会分析认为,全区工业企业通过恢复性整顿虽有效果,但与农业实行责任制取得显著成效相比统得过死,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于是,会议号召各企业要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盈亏包干的同时,改进奖金发放办法,恢复计件工资,试行超定额计件和浮动工资等,注重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经济责任制。借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在企业建立各种包干责任制,在企业内部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改变过去单纯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的现象。在这次会议的号召下,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奋斗,工业生产有了较快回升。11月底,有池州化肥厂、地区农机厂、贵池铅锌矿、矿管局、马衙锰矿、大通钢铁厂、东至化肥厂、塑料厂、青阳铅锌矿、石台化工厂10个单位提前完成全年计划,地区工业局系统提前43天完成全年生产计划,提前半年超额完成利润计划。

由于地委、地区革委会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强调狠抓

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使企业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走上正轨,面貌很快改变,形成趋势向好的新景象。总体上,全区工业总产值,1977 年比 1976 年增长 14.3%,1978 年又比 1977 年增长 6%。

科技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粉碎"四人帮"后,为尽快恢复科技工作秩序,针对科技落后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科技战线拨乱反正的指导方针。1977 年 9 月 18 日,关于 1978 年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出,全国上下兴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

为贯彻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池州地委根据 1977 年 7 月 15 日省委向科学进军大会和做出抓紧搞好科技战线的整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学发展规划、恢复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等 6 条决定。[①] 9 月下旬,全区科技工作会议召开,揭批"四人帮"干扰科学发展的罪行,宣传表彰各行业科技人员科技活动事迹。10 月 4 日,地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和省委有关决定的意见》。《意见》指出:(一)立即掀起学习、宣传的热潮;(二)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落实《通知》提出的各项任务;(三)要根据工农业生产的需要,积极总结推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四)要切实加强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随后,地区革委会召开了 3 次关于科技方面的会议。其中两次是在 10 月召开的,一是在贵池县召开的全区四级农科网经验交流会,鼓励和推广应用促进农业生产的科研成果。当时,地、县都办起了农科所,92%的公社建立了农科站,82%的大队成立了农科队,72%的生产队有了农科组,参加科学实验的约 34100 人,有实验基地 40400 亩。办网 3 年中,全区共办农技短训班 835 期,受训达 127500 人次。农民科技骨干发展到 16125 人,全区开展科研项目 692 个,其中 120 项已出了成果,得到了应用和

①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安徽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1 页。

推广,对农业生产起了显著作用。[①] 会后,地委还印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二是地区暨贵池县科技局、教育局在人民影剧院联合举办的中学生科学爱好者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中专、中学科学爱好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以及石台、东至、青阳、太平县科技局、教育局的代表共千余人。地委副书记许步信代表地委、地区革委会表示祝贺。地区负责人和省、地区及贵池县的科学、教育工作者及劳动模范代表的讲话,使到会的中专、中学科学爱好者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三是1978 年 3 月 20 日地区科技局在东至县召开的水稻无土育秧会议,总结交流试验温室无土育秧经验,要求加快推广这项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多快好省地发展水稻生产。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意味着科技事业开始重新展现出春天的景象。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扉。在这次科学大会上,池州有两个项目荣获“先进科技成果”奖。一是地区农药厂试制成功的新农药“达净松”,一是大渡口农科所培育出来的优良棉种“渡幅一号”。[②] 这使池州广大科技工作者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信心和决心。这以后,池州地委、地区革委会围绕科技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很快,地区恢复了科协,与地区科委合署办公,各专门学会是科协的组成部分。这一年,对全区自然科技人员进行了普查,将地区科委编写的《地震常识》4 万册发到全区乡村。为普及科技知识,地委还新辟了一个活跃的阵地,于 5 月 5 日举办了首次科技讲座,地委、地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地直机关干部 400 余人听取了地区农林局技术员周为所做的题为《植物与环境》的讲课。继后形成制度。在 6 月 20 日举办第六讲后,对后 10 讲的时间、授课内容、授课人又一一做了计划安排。这一活动激起了人们对科技的浓烈兴趣。从地区新华书店科技书籍发行量对比来看,1976 年 1 月至 5 月,各类科技图书售出 3257 册;而 1978 年 1 月至 5 月,则达到 85849

①引自 1977 年 10 月 25 日《池州通讯》。

②引自 1978 年 5 月 10 日《池州通讯》。

册,是1976年的25.4倍。说明全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已经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并正在逐步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5月29日至6月1日召开全区农业科研会议,旨在分析和总结全区农业的历史和现状,着眼长远,狠抓当前,明确农业科研的主攻方向,提出农业科研课题,研究如何加强农业科研工作以及本区农业生产关键性技术措施,以推动农作物品种向优质、高产、高效迈进。这以后,杂交水稻的推广成为全区粮食大幅度增产的主要原因之一;贵池县部分社队引进留兰香、席草,城关蔬菜队引进四川榨菜均试种成功;地区农科所对棉花枯黄萎病摸索出以抗病育种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把科技工作的重点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在地区工业战线上也显现出来。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全区各企业对科技工作的探讨变得更加深入,技术革新成果也不断涌现。如东至皮革厂采用酸脱毛新工艺,县东流轧花厂制成棉绒清杂机;太平县木材综合厂革新电木粉磁选工艺,县石灰厂提钒试验成功,县茶叶公司茶篓压盖锁口机试制成功;池口冶炼厂制成蓄电池铅极板,马衙农机厂制成乘坐式机耕犁并配套成功手扶拖拉机双铧犁悬挂装置;池州水泥厂改原180袋扁袋式吸尘器为120袋圆筒式吸尘器获得成功;青阳县化肥厂试制电感电炉获得成功,县棉织厂应用自动换棱调格器,这些产品均获县级科研成果奖。

池州地区科技领域取得的上述进展,表明池州的科技事业在"科学的春天"的滋润下,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普遍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展。能否突破"两个估计"的禁区、恢复高考制度,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1977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从当年起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意见》公布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这年,安徽在高等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中,采取省属重点高校以老带新,在各地增设教学点、专科班等办法,扩大人才培养。遵此规定,池州师范增设了两个师范专科班,学制两年,名为"安徽劳动大学池州地区专科班"(1979年改为"安徽师

范大学池州专科班”),当年招收新生 90 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大学之门,提供了通过考试、靠自己努力和公平竞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青年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1978 年,全区报考大学考生 5343 人,录取 328 人,录取率为 6.1%,而上年录取率只有 3.8%。中专考生 17761 人,录取 898 人,录取率为 5.6%,录取数比上年增加 228 人。1979 年,全区大学初选人数占考生的 10%,比 1978 年提高 3%,在初选人数中,应届毕业生由 1978 年的 33%上升为 1979 的 80%。

在 1978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16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教育领域面临的现状,着重讲了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学校的秩序和纪律、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等问题。池州地区由于 1969 年后农村初小扩充为完全小学,不少完小又附设初中班,致教师严重缺额,遂大量使用回乡、下放知识青年,致中小学民办教师逐年增加,至 1977 年,民师增至 1548 人,占教师总数 40%。在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池州地区着力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老教师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工作;二是对民办教师进行考核,通过“招、转、退、辞”的办法,逐步进行培养培训,同时将不合格的民师调离学校;三是发展师范教育;四是通过函授、电视教育、专业合格证书考试与自学考试相结合的初中教师全员培训等形式,对在职公、民办教师进行学历补偿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教学水平。同时,恢复公办小学由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体制,民办小学也纳入教育部门管理。各地对小学布局普遍做了调整,开始恢复秋季招生制度。1979 年,本着“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原则,各县实验小学开始六年制试点。同时,根据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中学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整和整顿,压缩高中规模,分期分批裁并小学附设初中班,合理安排学校布局。同年,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在池州成立分校,之后青阳、石台县相继建立了教学点。

1978 年 7 月 15 日,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的规定,地区革委会批准确定地区首批重点中、小学 7 所,

它们是:贵池中学、贵池殷汇中学、青阳中学、太平中学、石台中学、东至第二中学、贵池东方红小学。其中贵池中学还恢复为省重点中学。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是尽快提高教育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对于带动全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提高教学质量,8 月中旬以来,各县利用暑期举办了中、小学教师学习班,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贯彻新的教学大纲,研究全国统一的新编教材,按《条例》的规定修订和完善新学年的教学计划。

10 月 15 日,地区还专题召开各县科技局、教育局、团县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参加全省中学生学科竞赛事宜,成立学科竞赛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学科竞赛小组。

11 月上旬,地区教育局召开地、县两级重点中、小学负责人座谈会,进一步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研究如何办好重点学校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两个估计”的被否定,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地委、地区革委会乘势加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至 1979 年,全区教育战线需要复查的案件 772 件,已复查结案 505 件,占 65.4%,已安置 247 人,并将一批一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老年教师充实到各级学校领导班子,发挥了他们在教学中的作用。

对全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地委在 1979 年 10 月 19 日《关于印发张英杰同志在全区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 3 年来,全区教育战线变化是大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文化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全区对文化事业的拨乱反正,突出地表现在彻底打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池州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重新繁荣起来。1977 年 3 月 6 日至 11 日,地委宣传部召开全区文化工作会议。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文化局负责人在会上做了学习辅导报告。在学习基础上,联系文

艺战线的实际,愤怒揭批“四人帮”利用文艺进行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地委宣传部在这次会议纪要中指出:在地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区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日夜奋战,创作和演出了一批欢呼“两个决议”、配合当时斗争的小戏以及曲艺、漫画、宣传画等。1977 年春节前后,青阳、东至、太平等县都举办了业余文艺调演,民歌之乡的贵池县墩上、马衙公社开展了群众性的赛歌活动,《人民日报》为此还做了专门报道。地区文工团,青阳、东至、贵池县黄梅戏剧团在春节期间演出《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10 多场,场场座无虚席,景况空前。3 月 18 日,地区文化局提出《关于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5 周年和全省山区学大寨会议文艺活动安排的报告》,地委宣传部于 3 月 28 日批转了《报告》。整个活动内容包括 5 台晚会(专业 3 台,业余 2 台)、美术摄影展(美术作品 100 幅,摄影作品 150 幅)和电影幻灯专场等。1978 年 1 月 21 日,地直文化系统召开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大会。有 6 人在大会上发言,他们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题词为武器,联系戏剧、电影、文学创作和群众文化工作的实际,以切身经历控诉、批判了“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各地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敦促了一大批被禁锢的中外优秀剧目、影片和文艺作品陆续重新上演或出版。池州地区的主要剧种黄梅戏重新回到了她应有的位置。《天仙配》等优秀传统剧目的恢复上演,再次使黄梅戏走出国门,蜚声海外。

破除了种种精神枷锁,许多文艺工作者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1978 年 8 月,青阳县委宣传部举办了一期戏剧、音乐、美术创作学习班,狠批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形而上学的创作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批戏剧、音乐和美术作品。其中,戏剧作品中有讴歌落实周恩来重要指示的《红梅报喜》,也有突破“禁区”、反映青年正确恋爱观的《有急事》和《婚事》。

10 月 16 日至 26 日,地区举行了首次专业剧团文艺会演,参加会演的有太平、东至、贵池、青阳、石台 5 个县的专业剧团和地区文工团,

共6个代表队283人。会演期间,代表队先后演出了新近创作排练的18个小戏。地区革委会负责人向获得创作、音乐、导演、演员、舞美和演出奖的25个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奖品。①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使经受了严重摧残的池州文艺事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与此相联系,文化系统其他各业在此期间也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8年,池州将电影站、院分开,站成立发行组,各站影片库存量在16毫米180余部、8.75毫米170余部上下,按时按单位排片,电影发行工作走上正轨。1978年以后,各县广播站自办节目更加充实完善播出内容,大部分县广播站自办节目时间由过去的2小时左右增加到4—5小时,并在形式上做了一些改革和创新,努力办出各自的风格与特色。1976年4月,省广播事业局给池州中波转播台下达10千瓦发射机基建任务,池州中波发射台于1978年正式投入使用。

20世纪70年代初,地区第一座电视转播台建立后,东至、石台、青阳和九华山管理处均相继建立电视转播台。电视转播时间一般在每天5—10小时,节假日期间或特殊情况则全天转播,以满足群众收看需要。1978年以后,地、县开始筹建电视台,各电视台节目较电视转播台更加丰富。

1978年以后,地区新华书店加强管理,内设发行科、业务科、计财科和城关图书门市部。业务科负责对一般图书的购进和对订单的管理。下设的仓库和机关发行处,仓库负责图书的分发和查询;机关发行处负责单位、个人的图书征订,大中专教材的分发和政治学习材料的发放。据地区新华书店统计,1976年销售1339035册、码洋26.4万元,1978年则上升到销售1474033册、码洋36.3万元。

体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77年6月12日,地委印发《关于批转地区体委〈1977年体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当年,在石台县丁香公社召开全区农村体育现场会,同时举行了第二届全区农民篮球赛,参加比赛

①引自1978年11月5日《池州通讯》。

的有贵池、东至、青阳、太平、石台5个代表队,东至男篮、丁香公社女篮分别夺魁。9月25日,地区体委举办地直暨贵池县直单位职工棋类比赛,63名运动员经过一周283场紧张比赛,于10月1日胜利结束。1978年5月,在贵池县举办了全区第二次少年田径运动会。12月2日,举办地区第二届体育运动会,参加这届运动会的有各县、地直和上海小三线厂等7个代表队、1118人。比赛项目共为7个大项: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射击、棋类。在参加省级以上运动会中,池州选手也连连取得好成绩。

1978年,省教育局、省体委、省卫生局联合转发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和《生理卫生教学大纲》有计划地进行教学。嗣后,全区小学的"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两操"(早操、课间操)、"两活动"(每周两节课外活动)进一步走向正规化,同时,一些城镇小学根据省体委《关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选测项目的规定》,选测项目,加强训练,力争达标。1978年,青阳县九华中学491名学生在达标测验中,有260人达标,达标率为52.1%,居全省被测验的完中之首,先后受到国家体委、团中央和省体委、省教育厅的表彰和奖励。

随着党和政府对体育重视程度的提高,体育设施渐有发展。1978年8月,50×25米游泳池、更衣室及3000座位的看台相继落成,使城北人民广场体育设施初具规模。

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地委、地区革委会在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对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也采取了行动。1976年,将地区卫生局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合署,设政秘科、业务科,编制增至18人。1978年,开始实行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院长、所长、站长分工负责制。10月和11月,先后成立地区卫生防疫站和地区药检所。随着地、县工业的发展,这一年,绝大部分厂矿企业自办医务室、诊所,有的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门诊部乃至小型医院,离市区偏远的并配有救护车。其科室设置及专业人员配备也趋于规范化、系统化。同时,各县医院、基层区社卫生院诊疗手段也不断提高。1978年,全区(除东至外)共接种卡介苗101350人;派出的计

划生育手术小分队 118 人共做计划生育手术 24720 例。这年起,城镇、工矿企业普遍建立妇女卫生室和哺乳室,宣传妇女“五期”劳动保护。当年,地、县还恢复和健全了爱委会组织及办事机构,使爱国卫生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

第二节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 年 5 月 10 日,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11 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 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做正面阐述,但实际上是从思想路线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触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个人崇拜现象。由于文章思想观点的鲜明和尖锐,以及文章发表的形式和声势,因而被某些人视为“大逆不道”。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和争论必然要进一步展开,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8 月 12 日至 16 日,池州地委宣传部派代表参加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扩大会议,认真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此次会后,全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即从领导层和宣传理论界扩大深入到基层。

9 月 1 日、3 日、6 日,地委连续召开了 3 天的常委会议(扩大到副专员),认真进行了学习讨论。围绕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从而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带头参加这场学习和讨论的自觉性。

9 月上旬,地委宣传部召开宣传、理论干部座谈会,专题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通过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马列主义认识论最基本的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区别于其他旧的哲学最基本的标志,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用理论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用思想来检验思想,用认识来检验认识,任何排斥实践的观点结果必然导致二元论、唯心论。这次座谈会,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向前发展。

10 月 13 日,地委党校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使大家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产生的基础是实践,又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革命的理论愈经过实践检验,就愈加丰富、正确、完善,从而也就愈能发挥它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在次年召开的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各县县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理论工作者以及地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上,与会人员通过回顾总结 30 年来亲身经历,加深理解了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表示一定要在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下功夫。有的在发言中说,1957 年反右扩大化我们参加了,1958 年瞎指挥我们也干了,1959 年反瞒产我们也做了,这些事,蠢就蠢在不实事求是、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有的说,真理标准的讨论,目的是促进思想解放,如果思想不解放,就会妨碍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经过讨论,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指导实践,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新情况,使自己的工作跟上新长征的步伐。

池州地区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而且对“两个凡是”的禁区形成冲击,促使各级党组织对池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进行思考,进而把池州现代化建设放在更为重要的地位。

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以生产为中心”的提出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申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后，党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都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经济建设。尽管在整个工作部署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仍被置于第一位，但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在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推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开始根据自己面临的具体实际来确定中心工作。1977年11月，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农村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①] 在1978年2月25日召开的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万里重申“农村在农业生产大忙季节，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他说：“现在春季到来，要紧急动员起来，不失时机，抓好农业，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他指出：“‘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把思想搞乱了，有些同志指导思想不明确，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农村不以生产为中心，没有粮食，或者粮食不够，没有棉花，或者棉花不够，大家吃什么？穿什么？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就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他强调说：“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把生产搞上去。”

正是这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使得池州地区在旱灾之年渡过了难关。1978年年底，地区组织了全区农业生产大检查，各县和公社都召开了抗旱评功表模大会，认真总结以生产为中心、抗旱夺丰收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一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全区广大干群不仅拥护且纷纷表示，在3年调整的头一年（1979年），紧紧抓住生产为中心，从思想上明确中心、从工作上突出中心、从各方面坚持中心，把主要精力真正转到抓农业生产上来。1979年年初，地区从农业、财贸、工业、计划、宣传、政法、党务等7个方面拟定了26个调查提纲，要求“农业上出题目，各行各业做文章”，在财力、物力上优先农业，支援农业，保证

---

①万里：《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1977年11月15日），《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农业。当年,省投放支农资金 1395.8 万元,比上年增加 11.1%。到 9 月底,地、县财政已安排支农资金 15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5%。全区发放农业贷款 144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0 万元。

正如 1978 年 3 月 3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题为《农村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春耕生产的领导》一文所说:"安徽省委在农村及时地重提这个口号,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果断的行动,对搞好春耕生产和加速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作用。"

"以生产为中心"口号的提出,不仅在安徽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为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历史性转变创造了条件。

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开始考虑如何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在 1977 年 8 月至 1978 年 10 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以及与沈阳军区党委、天津市党政军负责人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强调了这一主张。①

在 1978 年 1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当前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这篇纲领性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版,第 1052、1053 页。

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议公报指出:“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全会公报一公布,池州地委和各县委就带头学习,并及时组织地直党组织及各县党组织进行了学习讨论。

1979 年 1 月 3 日至 18 日,地委主要领导人出席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听取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着重研究如何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随后,全区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短期轮训班和小集中等形式,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四项基本原则,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从这时起,不少基层党组织建立起“三会一课”、党员联系群众等制度,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2 月,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制订把全区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当月,各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中出现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 年 6 月 22 日,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地委副书记张成钧在会上做了题为《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民经济的方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的讲话。主要内容为:(一)认清形势,统一认识,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二)落实经济调整的方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三)加强党的领导,努力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

由于池州各级党组织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的热潮中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全区上下形成了人心思治、人心思干、人心思上的良好氛围。显示出池州各级党组织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光辉起点,中共池州地委从严重挫折中重新奋起,团结带领全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征程。

结束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个历史时期,池州人民在中共安徽省委和池州地委的领导下,以高昂的气概,坚强的信心,从容地走过了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转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既艰难又曲折的29年辉煌历程,并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使得池州以崭新面貌屹立于长江中下游南岸。

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人们似可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1949年,当解放池州的党政负责人跳下战马接管战争重创后的池州时,面临的是一片废墟,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百业待举。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成为新政权的应时之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随即在池州广泛掀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与一个旧时代的退隐。

在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项斗争中,池州人民怒火与热血一齐喷涌。社会变革的恢宏,彰显出池州民族精神的高扬。

池州所进行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池州境内的党组织领导人民完成三大改造任务的全部艰辛,为足下这片广袤的土地注入了勃勃生机。

党的八大所指引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由地委率领广大干部群众以大无畏的精神付诸实践。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所进行的经济建设的耕耘,只为收获理想,去追赶明天的希望。

党在1956年到1966年,连续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发动"大跃进"、组建人民公社等严重失误。池州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虽然承受了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却没有动摇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

念,仍在逆境中拼搏、在困难中奋进,朝着社会主义航向续扬风帆。

可是,由于党和人民没有能够阻止“左”倾错误的发展,池州人民确确实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又苦挨了漫长的10个年头。在经历狂热、痴迷、困惑、磨难、痛苦、抵制、斗争之后的池州人民终于大彻大悟——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究其缘由,完全是极左思潮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然。正是由于他们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持续不断的动荡之中。池州在这个动乱中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更多的是机遇和时间。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继后开展的一场波及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中我们感悟到成长和崛起。这种成长,这种崛起,当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承续,但更多的是邓小平讲话的熏陶。这种成长,这种崛起,当然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而迸发,但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结果。在这场讨论中,池州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强、坚定了前行。

1978年12月18日,党的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此带来的农村政策的拨乱反正,引发了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那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就这样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于是,联系产量和不联系产量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很快在池州农村传播实施起来。

综观池州29年的历史,池州地委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池州人民的前途命运,为池州今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29年里,池州党组织和人民,风风雨雨,备尝艰辛。其间,池州专署作为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曾有过断续,撤销、重建,这无

非使池州的建设困难加大了,但逆境也造就强者,更能彰显池州精神。为了池州的发展,我们必须奋起于忧患,我们无怨无悔。

有时,一组枯燥的数字更有诗的韵味。1978 年与 1949 年相比,池州的粮食总产量增长 3. 14 倍,棉花增长 7. 47 倍,油料增长 1. 9 倍,油菜籽增长 1. 84 倍,茶叶增长 5. 69 倍,蚕茧增长 25. 9 倍,水果增长 1. 89 倍,水产品产量增长 1091 倍。1978 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4. 3 亿元,比 1957 年 2. 2 亿元增长 95%。除国营、集体企业外,1978 年,全区社队企业发展到 2088 个,总产值达 4147 万元。这些数字的背后,浸透的是雨水、泪水、汗水和血水,这是池州人开足马力争分夺秒的结果。干群的坚强,构成了池州的脊梁。

池州人的聪明才智,一再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随着 1979 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的改革开放踏进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历史,将中国经济推至起飞的临界点!池州党组织和人民正以勇于担当的气魄和充满自信的雄健身姿,开始昂首阔步地走向未来!

大事索引

1949 年

1 月 1 日　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指出：1949 年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共和国。

2 月　中共沿江工委部署策应解放军渡江　中共沿江工委根据皖南地委决定，在太平焦村石门坑召开工委会议，做出《为紧急完成迎接大军渡江任务的决议》，确定陈洪、陈作霖负责沿江情报工作并同江北联系。决议号召沿江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团结一致，为做好一切有利于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而奋斗。决议还就区域划分及领导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3 月 25 日　石埭县自卫队起义　在中共黄西工委的策动下，国民党石埭县自卫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方培芝在城安乡（今属祁门县）发动起义，史称“城安起义”。

3 月 29 日　国民党青阳常备队起义　在中共沿江工委和青阳县委的策应下，常备队地下党支部率领青阳常备第二大队第四、第六两个中队起义。

3 月中下旬　5 日至 13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　会后，江淮区委和下属各级党组织认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为支援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

3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挥师北上，堵击南逃之敌　根据上级命令，支队由江西婺源复回黄西、贵池一带堵击国民党军队退路，配合刘邓大军南北夹击。支队兵分两路，其中一路为黄西独立团，

由查富德率领,经黟、休、祁,配合苏帅仁领导的黟休祁游击队,向祁石贵边区挺进。途经横船渡时,与溃逃之敌相遇,取得阻击战胜利。

同月 国民党第八专员公署下令封锁池州沿江渡口 大小船只限期驶进内河集中炸毁,沿江船民奋起抵制。

4月3日 华东局决定安徽以长江为界成立中共皖北区委员会和中共皖南区委员会。

4月11日 中共皖浙赣工委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在江北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前夕,各地区应立即做到:一、武装集结于机动位置。二、截击撤退的敌人,消灭动摇的敌人(最好做到里应外合)。三、开展广泛的对敌政治攻势,号召他们立功起义。

4月中旬 国民党军黄俊芳部、贵池县府要员分别向青阳、贵池山区溃逃 国民党五十五军第一四七师黄俊芳部向青阳溃逃,国民党贵池县府随即通过所谓"应变计划",携电台、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南逃贵池山区。

4月21日 贵池县城解放 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七、第九兵团在贵池东部江面至芜湖间首先渡江,把国民党长江防线拦腰斩断。午夜,突破天堑渡江南下的二野三兵团所属杨福民部抵达贵池县城,贵池解放。

4月21日至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横渡长江 二野三、四、五兵团在渡江战役中取得伟大胜利后,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以徽州、上饶、贵溪为目标,继续多路向南纵深突破,投入千里追穷寇的新战斗。

4月22日 东流解放 拂晓,二野五兵团十六军300多条船、4万多人全部渡江,伤亡不到40人,未翻一条船。先头部队解放东流。当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著名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电讯稿。

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宣告国民党在全国的反动统治覆灭。

同日 国民党石埭县长冯启元投诚 自卫队及机关党政人员240余人集结于舒溪河南古芒阡等候接收。

同日 青阳县解放 人民解放军从贵池、大通、南陵三路进入青阳县城,至此,国民党在青阳的反动统治宣告覆灭,青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投入接收国民党政权的工作。

同日 至德县解放 当日,陈赓过江到香口。至德县城解放。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在香隅贩、至德县城集结待命。

同日 青阳县人民政府成立 青阳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23日成立,县长尹彬,副县长陈法周。

4月24日 石埭县解放 当日清晨,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某部兵临城下,石埭县城和平解放。至此,池州全境解放。

4月26日 陈赓在至德县城与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会合。

同日 中共皖浙赣工委、沿江工委与南下干部大队第四支队在贵池会师 年初,在河北省正定县组成的南下干部大队第四支队的一批干部进入池州,与在皖南坚持斗争的中共皖浙赣工委、沿江工委的杨明、陈爱曦、许章法等领导干部在贵池会师。

4月27日 牛树才率领南下干部到皖南 由党中央从华北抽调的南下干部3000余人,在牛树才等率领下,于26日渡江,27日抵达贵池。然后分赴池州、芜当、宣城、徽州以及屯溪,接管城市,建立政权,开展工作。

4月 国民党在池州部署军队 解放前夕,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所辖第八兵团刘汝明部3个军8个师4万余兵力防御湖口至铜陵段。

5月1日 贵池、石埭、东流、至德县人民政府和县委成立 贵池县委书记为石克一,县长为李绍基;东流县委书记、县长为范振国;至德县委书记为刘宝恩,县长为齐志远;石埭县委代理书记、县长为甄尚义。

5月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成立 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1万余名苏、浙、皖、赣游击部队合编组成皖南军区,司令员刘飞,副司令员熊兆仁,政委牛树才,副政委胡明,政治部主任罗白桦,副参谋长刘奎。下辖芜当、宣城、池州、徽州4个军分区。1952年1月,皖南

军区与皖北军区合并组成安徽省军区。

5月7日 皖南行政公署成立 皖南行署[①]为皖南地区统一的最高行政机构,下辖芜当、宣城、池州、徽州4个专署及屯溪市。皖南区所辖24个县一律恢复旧县制。行署主任魏明。

5月上旬 中共皖南区委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成立中共皖南区委,统一领导长江以南安徽境内各地委的工作。谢富治为区委书记,牛树才、胡明、马天水任副书记。下辖芜当、宣城、池州、徽州4个地委及屯溪市委。7月,皖南区委由屯溪迁往芜湖。

5月13日 中共池州地委、专署、军分区在贵池成立 地委书记杨明,副书记张斌;专署专员齐维礼,副专员许章法;军分区司令员金行生,副司令员柴书林,杨明兼政委。池州地委下辖贵池、东流、至德、铜陵、青阳、石台、太平7个县委和大通市委(大通市委于1949年7月增设,9月撤销,改为属铜陵县委下辖的大通区委)。同时,黄西独立团改为池州军分区独立团,团长查富德,政委钱秋育。贵池等7个县大队亦同时成立。

5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池州军分区独立团和青阳县大队在青阳县杜村西馆平息大刀会暴乱。

5月 中国人民银行池州办事处成立 贵池、青阳等县也相继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支行,开展金融业务。

同月 新华书店池州中心支店在贵池成立。

同月 池州境内全面剿匪 池州专区境内土匪活动猖獗,股匪约有数千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五军、华东军区警备部队和九江军分区、池州军分区在池州各县的协同下全面剿匪。至10月底,击毙贵池县境内的匪首洪国顺(其为害主要区域今属石台县),活捉至德县匪首吴天赐、东流县匪首吴文彪,并处以死刑。

6月 中共池州地委和贵池县委在贵池县城西郊的西庙举办首届干部培训班。

---

①1951年12月19日与皖北行署合并办公。1952年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时撤销行署。

同月　池州境内连降暴雨,人民群众奋力抗洪救灾　至七八月,长江上游洪峰来势凶猛,超过前数十年最高水位。刚成立不久的中共池州地委领导境内各县人民,不分昼夜抗洪救灾,护圩保堤,确保10余万亩良田和数万人民群众生命的安全。

同月　池州军分区军政委员会成立　书记杨明,副书记金行生。隶属皖南军区军政委员会。

上半年　各地相继建立人民政权　全区(指现辖区)建起23个区、78个乡、502个村人民政权,下设闾,彻底废除保甲制。

夏　中共池州地委党校建立　8月,党校在贵池县城举办第一期干部训练班。截至1952年,共举办各类训练班、短训班10余期,培训党员、干部1000余人。

9月5日　池州各地贯彻中共皖南区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全党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农村,放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有步骤地进行各种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当前要广泛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生产救灾。随后,池州各地结合农村各项工作,逐步开展反霸斗争。

9月8日　地委召开全区妇女工作会议　讨论发动妇女参加反霸斗争。

9月26日　池州各地开展减租工作　池州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按照中共皖南区委发出的《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减租暂行条例的指示》,随即在池州各地开展减租工作。

同日　皖南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成立　洪琪任主任。

9月　池州各县分别召开首届农民代表大会　此后,全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实行减租。

同月　全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池州地区初建时,基层党组织有18个区委(不含铜陵、太平两县和大通市)、75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在河北正定县组成的南下干部第四支队的一批干部和在池州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员。根据皖南区委的指示,地委采取严肃慎重的方针,有重点地建设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基层党支部发展到107个,其中农村党支部47个、机关总支部59个、街道支部1个,党员发展到

1515 人,其中农村党员 692 人。

同月 全区清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遗留物资 据池州专署编印的《工作通讯》第七期载: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9 年 9 月 18 日,清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遗留下来的粮食分别为:贵池县 115 万多斤、青阳县 62.6 万斤、至德县 13 万余斤、石埭县 15 万斤。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消息传到安徽,皖南大地万众欢腾。

同日 中共池州地委、池州专署暨各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庆祝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强盛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

10 月底 全区剿匪斗争与反霸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池州地区结束千百年来匪患不断的历史。

10 月 池州专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同月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池州专区工作委员会成立。

同月 池州专区农民协会成立。

12 月 全区普遍建立基层民主政权 14 日,皖南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发动群众改造和废除伪保甲政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的几点意见》。自此,各地加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到 1951 年 9 月,池州 8 县共建立 54 个区、1057 个村民主政权。

年底 池州专区工会办事处成立。

年底 全区各县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池州专区所辖贵池、东流、石埭、青阳等县相继召开首届人民代表会议。至德县于 1950 年 2 月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会议。

年底 地委部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开展整党整风工作。

1950 年

2 月 16 日 东流、至德两县颁布严禁种食鸦片的具体办法。

3 月 7 日至 17 日 中共池州地委主要领导人和池州专区的党员代表,赴芜湖出席中共皖南区首次代表会议 会后,池州地委根据皖南区党代表会议的精神,确定 1950 年全区以生产建设、巩固后方、支

援前线为首要任务;上半年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下半年以土地改革为中心。

3月 全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各县群众踊跃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示威游行,开展捐献飞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寄慰问信等活动。

春 全区基层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县辖区委发展到32个,党支部发展到113个。

春 池州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4月 池州军分区军政委员会改设为池州军分区党委 按照华东军区和皖南军区党委的指示,池州军分区军政委员会改设为池州军分区党委,接受皖南军区党委和中共池州地委的双重领导。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下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 杨明兼任书记。

同月 地委书记杨明兼任地委党校校长。

同月 全区各县开始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5月 繁昌县委划归池州地委领导。

夏 中共皖南区委和皖南军区发出《关于秋冬两季剿匪肃特保卫土改的联合指示》 从9月份以后,池州各地结合土地改革,开展剿匪肃特运动。

7月1日 零时,东流、至德两县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 两县户籍人口总数253547人。

8月20日至29日 池州代表出席皖南区在芜湖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听取马天水所做的《为完成皖南区土地改革而奋斗》的报告。确定1950年秋冬在全区进行土地改革,并切实做好财政经济工作。

8月 皖南开展肃清残匪斗争。

9月8日 贵池县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推选罗光明出席全国英模大会。

9月 池州专署专员齐维礼在《皖南日报》上发表题为《谁说江南无封建》的文章 批评土改工作中的右倾思想。

同月　池州专区各县分别成立冬学委员会,开展扫盲工作。

10 月　皖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1 月 4 日　皖南区人民开展为抗美援朝捐款运动。

11 月　池州开展土改运动　中共池州地委贯彻皖南区委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全区 8 县先后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至 1951 年 3 月,池州专区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全区依法没收征收的土地 115247 亩,有 223551 户、880977 人的无地少地农民分到土地。

同月　池州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共池州地委贯彻皖南区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本年　省立池州师范学校由青阳县陵阳迁至贵池。

本年　贵池县成立县人民政府广播收音站。

本年　皖南区撤销大通区委,改设铜陵县大通镇。

本年　全区各县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委员会　1951 年 3 月先后改为抗美援朝分会,各区、乡、村也成立相应机构。

1951 年

1 月　池州掀起抗美援朝报名参军热潮　贵池中学、池州师范学校先后有两批学生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同月　皖南血吸虫病流行区开展血防工作。

2 月　贵池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枫岭村罗光明互助组成立。

3 月　全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　东流、至德两县各捐献飞机一架。石埭县各阶层人民捐款 1.7 亿元(旧币),青阳县认捐 1.18 亿元(旧币)。贵池人民一次捐献人民币 19.2 亿元(旧币),于本年秋捐款购买战斗机一架,命名为“贵池人民号”。

同月　青阳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木镇伍明树互助组成立。

4月 各县人民武装部相继编入池州军分区建制序列。

同月 至德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一区樟树村王大元互助组成立。

5月 东流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枞村区胜利乡袁善择互助组、石埭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龙岩新里村查鸿安互助组成立。

同月 全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达到高潮 参加游行活动、和平签名者达数十万人。

7月下旬 东流县、至德县发生蝗灾 东流县蝗虫危害农作物达3978亩。

7月 池州全城4000多人参加建党30周年庆祝活动。

同月 华东区皖南血吸虫病防治所(驻歙县)派员到贵池调查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翌年5月,继贵池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站后,青阳、石埭、东流、至德等县血防站先后建立。

8月4日 地委拟定《八月份宣传要点》 进一步号召全区各级党委、政府把"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帝国主义与当前的中心工作,如整理地籍、发土地证、防汛排涝、防治病虫害等任务结合起来宣传"。

8月 池州专区境内公路修复通车 贵池至岩寺、芜湖至青阳等7条公路经过10个月的修复,全部竣工通车,总长达934公里。

9月底 黄时鸿赴京观礼 至德县老红军战士黄时鸿(高山人)作为老区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9月 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贵池 闽浙赣分团第六分队由副分队长许道珍率领访问贵池留田,皖南区委副书记、皖南军区副政委胡明和军区副司令员熊兆仁陪同访问。

10月12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池州发行。

10月29日 大通设码头 长江航运管理局在铜陵大通和悦洲设大轮趸船码头,重开沪汉航班。

10月 池州专区各县先后召开劳动模范会议。

同月 池州划乡建镇 全区8县划乡建镇,取消村的建制,乡以

下设选区。

11月 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

12月1日 增产节约运动在池州各条战线蓬勃开展 工农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发展,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

12月6日 皖北和皖南两区党委和行署联合召开扩大会议 决定在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先行合署办公。20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从芜湖迁往合肥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合署办公。

12月24日 池州直属机关和各县“三反”运动开始 自皖南、皖北区直属机关在合肥联合举行动员大会,号召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三反”运动)之后,池州直属机关和各县“三反”运动开始。

年底 全区广大干部开展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增产节约指示活动 中共池州地委通过召开县委书记会、县委扩大干部会、党员会、代表会以及举办训练班等形式,引导广大干部参与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增产节约指示的活动。据统计,全区受到增产节约教育的干部达8800余人。

年底 全区共建立基层工会组织151个 所属职工9928人,会员7437人。

本年 外国传教士先后离境 贵池、青阳、至德等县天主堂传教士等先后离境回国。

本年 组建大众剧团 黄梅戏艺人李桂兰(怀宁人)在至德县尧渡镇组建大众剧团。

本年 至德县黄梅戏艺人胡玉庭口述《天仙配》脚本 胡玉庭被省文化主管部门誉为“活戏篓子”。

本年 各县人民政府分别组成老区访问团到苏区村和红军活动村进行访问。

1952年

1月2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安徽省委员会 中共安徽省委

隶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1954年4月华东局撤销后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辖合肥、蚌埠、芜湖、安庆4个市委和宿县、阜阳、滁县、六安、巢湖、宣城、池州、安庆、徽州9个地委以及淮南矿区党委。

1月25日 中共池州地方委员会与中共安庆地方委员会合并,成立新的中共安庆地方委员会 政务院批准原池州专区与安庆专区合并,所领属的贵池、青阳、铜陵、东流、至德5县划属安庆专区,石埭、太平2县划属徽州专区,繁昌县划属芜湖专区。随行政区划变动,中共池州地委与中共安庆地委合并成立中共安庆地委,属中共安徽省委直接领导。

1月26日 全区开展"五反"斗争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自此开始,全区各县在工商界开展"五反"斗争,极少数违法经营、牟取暴利的工商户受到处理。

1月 爱国卫生运动在池州展开 各县分别成立防疫委员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贵池县观前区12岁少年吴成珠因灭鼠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

2月4日 中共池州地委机关和池州专署由贵池迁往安庆,与安庆地委、安庆专署机关正式合署办公。

2月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贵池县境内空投反动传单。

3月 青阳县流行麻疹 皖南医疗队、安庆卫生院医疗队协同青阳县医务人员分赴流行地区治疗抢救,控制疫情蔓延。

5月 地处贵池县万宝圩的原皖南行署农场使用机械抽水 配有12匹马力"武松"牌柴油机和水泵一台(套),是为贵池县农业生产使用机械抽水之始。

同月 至德县水稻地区发现蝗虫 全县发动13万人灭蝗,至6月下旬蝗虫基本消灭。

7月 贵池县农业劳模罗光明赴苏 罗光明参加贺龙率领的中

国农民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并参加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红场观礼。

8月7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会 同时撤销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和皖南人民行政公署。省政府委员会机关驻合肥市。

8月25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宣布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

9月8日 青阳县举办首次物资交流大会 上海、南京、芜湖、安庆及毗邻县均有代表参加,历时5天,成交总额83.2万余元。

9月30日 华东局统战部批复同意重点修复九华山寺庙 所需款项由有关部门造预算、经安徽财委审核同意后,再报华东财委核批。

10月 地质部311地质队在贵池县进行首次矿产普查。

12月31日 安徽省召开第一次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转业军人及拥军优属模范会议 评选出省级一、二、三等模范98人,王彩连、张正发、龙冬花等被评为一等模范。

12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分赴贵池、青阳、至德等县巡回报告。

本年 贵池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 贵池县罗光明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今冬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创办贵池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本年 安庆专区中心文化馆在贵池县城成立。

本年 贵池茶厂在池口建成投产 这个茶厂专门加工红茶出口外销。

本年 东流县被列入全省水产重点县。

本年 青阳县苎麻获国务院奖励,被命名为“青阳白麻” 与新疆棉花、广西黄麻同誉为“全国棉麻三大代表”,陈列于北京农业展览馆。

本年 各级党委、政府按照“有计划有领导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方针,指导各地开始试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

1月 中共贵池县委发出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的紧急通知 随

后,常出没于大通段江面骚扰的水上土匪“中国人民自救军水上支队”即被贵池县公安保卫部门摧毁。

2月3日 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执行和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草案)》后,自3月起在各县级领导机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至8月底基本结束。

2月10日 至德县平原乡试办郑根强农业生产合作社。

2月 东流县群力剧团成立。

同月 各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3月 东流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站。

同月 青阳县伍明树互助组改建成青阳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同月 安庆军分区在青阳县进行普通民兵制试点 编民兵分队499个、基干民兵团1个,全县民兵总数达16586人。

4月 安徽省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各地成立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普查登记和选民登记同步进行,普查标准时间为1953年6月30日24时。

6月 各县积极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各级党委按照中共安徽省委批转省农委《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精神和中共安庆地委的部署,领导农民积极而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8月中旬 青阳县发生蝗害 县成立治蝗指挥部,发动群众治蝗。

9月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考察贵池等县。

同月 贵池县罗光明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中朝战士。

11月初 对管制反革命分子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11月26日 各县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安徽省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实施办法》、《安徽省农村和集镇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安徽省城市及工矿区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自即日起,各县粮食开始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

供应。

12 月　开展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活动　贵池、青阳、石埭、东流、至德等县，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派出大批宣传骨干，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 10 年至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月　各县农业社进入发展时期　按照中共安徽省委贯彻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和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各县农业社从试办时期进入发展时期。

本年　至德县进行水稻小株密植试验成功　农户王龙相丰产田亩产 502 公斤，创至德县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纪录。

本年　至德县农场首次试种双季稻 1 亩　获总产 453. 5 公斤（早稻亩产 300. 5 公斤，晚稻亩产 153 公斤）。

本年　贵池县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全县总人口为 289489 人。

本年　青阳县开始推广施用化肥　硫酸铵、硝酸铵用量 2. 5 吨。

1954 年

3 月 3 日　贵池县进行基层普选　有 139 个乡（镇）、157177 人参加选举。

4 月　各县根据中央的决定精神，相继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

5 月 7 日　贵池县遭受大风暴雨袭击　山洪暴发，山河洪水猛涨，全县 31 个大小圩口全部溃破，29 万多亩田地受淹，死亡 263 人，倒塌房屋 6. 2 万间。

5 月 17 日　中共安庆地委向全区推广贵池县建国乡增产竞赛活动的经验。

5 月　县级以上党委贯彻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精神　提出“高价征求批评”、“有话说完”，并对各级党组织的团结问题和集体领导问题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6 月　各县在城乡人民群众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宣传讨论活动　历时 2 个月。

7月 发生特大洪灾 5月至7月,各县降雨量大于常年同期1—2倍。长江最高水位:8月1日东流达到18.74米,贵池池口达到17.22米,比1949年最高水位超出1.58米。警戒水位持续115天。长江主要干堤和内河堤防全部溃破,贵池、东流、至德县城街市行舟数月。全区成灾面积48.87万亩,受灾人口25.52万,倒塌房屋7.66万间,死亡467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动员人民群众奋力进行抗洪斗争。

同月 开展生产救灾 县、区、乡政府开始向灾区发放粮、款,同时组织灾民向山区转移,进行开荒生产。青阳县接收安置湖东县(今枞阳县)灾民2075人,至德县接收安置来自外县的灾民6000余人。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中央防疫大队从北京抵达贵池,参加救灾工作。

秋 建造航空标志 由两名苏联专家协助,在石埭县雷湖乡大洪岭(今属祁门县)建造航空标志。

冬 遭受特大雪灾 是区境内雪日最多、雪量最大的年份,平地积雪达一尺余。升金湖、秋浦河封冻;区境内房屋倒塌严重,大牲畜大量死亡。面对灾情,各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大批干部冒雪深入灾区农村,发放救济粮款。

冬 各地开展大规模堵口复圩和水利兴修活动。

冬 安庆军分区在青阳县进行义务兵役制试点 征集新兵311名。

本年 民政部灾区慰问团来池州慰问受灾人民以及在灾区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和医务工作者。

本年 贵池县获国务院油桐生产奖旗 全县全年桐籽产量为1.8万担。

本年 各县实行棉布、棉絮凭票限额供应。

1955年

3月1日 各县人民银行支行发行新版人民币 旧版币1万元折合新版币1元。4月1日起,旧版币停止流通。

3月24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 要求徽州、安庆、芜湖3个专区的32个县(市),把血防工作当

作长期的经常任务来抓;确定宣城、歙县、贵池为血防重点县。

3月 东流县东流港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成立 是为安徽省长江水系第一个木帆船运输合作社。

同月 各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贵(池)、青(阳)、铜(陵)、东(流)、至(德)5县的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春 石埭县建成全区第一座水库——凤凰山水库。

7月 开展肃反运动 中共安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的指示,布置肃反工作。随后,各县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先后分5批开展肃反运动。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2%,同时查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

9月 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共安庆地委和徽州地委分别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贯彻省委召开的地委、市委书记,地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精神,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右倾思想,到10月底,贵池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1229个,入社农户6.3万户,占全县农户的81%。至此,区境内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形成高潮。

同月 血防科研工作在贵池进行 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汪民视教授一行85人到达贵池县,在城郊的东南湖进行血防科研工作。

同月 区境内各县先后实行粮食"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政策。

10月 九华山管理处成立 青阳县划出庙前区九华村,成立九华山管理处,属区级单位,归青阳县管辖。

12月10日至19日 各县、乡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 听取传达《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要求1956年完成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冬 全区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 各县开始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冬 开展扫除文盲运动 各县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把农民的政治、文化学习作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标准之一。

本年 试种双季稻 贵池县试种双季稻1.5万亩,青阳县试种双季稻3868亩。

本年 区境内各县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6年

1月19日 石埭县改属芜湖专区 徽州专区、芜湖专区合并,称芜湖专区,原属徽州专区的石埭县改属芜湖专区。

1月 龙冬花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贵池县全国劳动模范龙冬花,以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身份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同月 安庆专区中心文化馆自贵池迁出 同时成立贵池县文化馆。

2月7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接见龙冬花 龙冬花是安徽贵池农村妇女,50年代历任互助组长、合作社社长、高级农业社社长,1953年出席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5年出席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6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二届二次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①

2月起至年底 贵池、青阳、铜陵、东流、至德等县先后完成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春 至德县、东流县发动万余民工修复大(渡口)石(门街)公路。

4月24日至30日 各县党代表大会召开 中共贵池县、青阳县、东流县、至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分别在各县城所在地召开,选举产生中共贵池县、青阳县、东流县、至德县第一届委员会。

4月 本月起,各县委机关报相继创刊 22日,中共至德县委机关报《至德报》创刊;同月,中共青阳县委机关报《青阳报》创刊;随后

①1957年,龙冬花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以后当选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九大、十大代表。她一共13次见到毛泽东。

至10月,中共贵池县委机关报《贵池报》、中共东流县委机关报《东流报》分别创刊。

5月 贵池县新华米厂高明启赴北京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

6月5日 中共石埭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阳镇召开 选举产生中共石埭县第一届委员会。

6月 石埭县修筑石河公路 这条公路自广阳至河口,翌年秋竣工通车。

同月 各县分别成立工资改革委员会进行职工工资改革 此次改革,小学教师工资一般增长40%左右。

9月 各县私营和个体水上运输企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或组织合作社 30吨以上大型帆船实行公私合营,30吨以下组成木帆船合作社。

11月 青阳县木镇农民汪全梅(女)出席全国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2月 整社开始 各县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今冬明春整顿农业社的指示(草案)》,总结经验,制定1957年全面发展生产的计划。

本年 粮食部授予至德县"粮食'四无'(无鼠、无雀、无虫、无霉)县"称号。

本年 石埭县实现乡乡通电话、通邮路。

1957年

年初 贵池县池口长江码头建成第一个候船室。

2月 全面开展整社工作 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先后发出《关于整社中若干具体问题处理办法》和《迅速做好整社工作的指示》,区境内各县整社工作全面展开。

4月20日 贵池县响应周恩来总理指示,掀起防治血吸虫病高潮 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安徽省贵池县棠溪乡碾子下村,百余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雨金1户4口人,其中有3人仍患血吸虫病"。贵池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棠

溪乡委员会认真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带领群众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并全力帮助曹雨金一家治疗疾病、修盖房屋,在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5月3日至20日 各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赴合肥参加省委宣传工作会议 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讨论和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准备整风问题。

5月 开展整风运动 各县、区、乡党组织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安徽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初步计划(草案)》,要求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内容,教育各级干部学会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建立起机关中和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随后,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的部署,各县直属机关、学校、团体的党组织分别召开座谈会,许多党外人士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很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6月中旬 开展反右派运动 各级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调查工作。7月初,贵池、青阳、东流、至德、石埭5县分别在中共安庆地委和芜湖地委的领导下,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从暑假开始,东流、至德、青阳、贵池4县的中学教职员工全部集中到安庆,由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反右派运动。9月,各县贯彻执行安徽省委印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8条标准,把"丑化党团员、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工农关系"等都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到1958年夏,反右派运动基本结束。

8月中旬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精神,在文教界、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大鸣大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8月 各县停止粮油自由市场。

10月 撤销东流县大渡口区委会、区公所 所属乡镇除庆丰乡的裕丰农业社划属贵池县以外,均划属东流县的临湖乡管辖。

本年　石埭县在广阳建机器碾米厂　同时,用一台 15 千瓦发电机发电照明,是为石埭县用电灯照明之始。

本年　青阳县城东乡五星村生产的苎麻被选送到“全国苎麻展览会”展览,并获国务院嘉奖。

本年　石埭县苏阿芒被吸收为国际世界语协会驻华代表。

1958 年

2 月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境内各县先后召开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麻雀改为臭虫)誓师大会,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同月　各县贯彻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主义。

3 月 1 日　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活动的指示》,由此揭开了各县“大跃进”的序幕。

3 月　本月起,区境内各中等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　9 月上旬,各校派代表去蚌埠参加安徽省委召开的中学勤工俭学现场会,总结学校办工厂和农场的经验。

5 月　各县掀起学习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热潮。

6 月下旬　各县贯彻安徽省手工业管理局关于手工业转厂的意见　要求在一两年内将合作社的主要行业分期分批转为合作工厂,个别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手工业合作社直接转为地方国营工厂。

6 月　贵池县直属机关干部、学生、居民实行义务劳动　奋战 7 昼夜筑成城内第一条大道,全长 1036 米,命名为“跃进路”(今秋浦路)。

7 月至 9 月　各县先后召开县级党员代表大会　着重学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对 1956 年的反冒进予以错误的批评。

7 月　各县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传达中共八届二中会议精神,要求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8 月 4 日　贵池县茅坦乡发现国民党空投的反动传单,随即由当

地民兵搜查清除干净。

8月20日 农业部在东流县召开全国水牛繁殖现场会 会上,东流县被评为“水牛繁殖红旗县”。

8月 全民大炼钢铁 贵池、青阳、东流、至德、铜陵等县先后成立冶金指挥部。

8月至10月 各县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部实行公社化 这一时期,各地同时宣传“三面红旗万岁”(“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

9月5日 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铜陵县,将其所辖区域并入铜官山市,并改名铜陵市

9月 各县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10月 各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 中共安徽省委转发《关于无为县响山农业社三年来实行供给制情况的考察报告》,要求各人民公社逐步扩大免费供给范围,推行供给制。贵池县在马衙公社进行“吃饭不要钱”的试点。各县许多农村公共食堂一度提出“敞开肚皮吃饭”。

11月下旬 各县大炼钢铁“下马”。

11月 东流、至德两县合并 10月下旬起,东流、至德两县开始筹办合并事宜,成立撤并工作领导小组,中共至德县委书记宋毓秀任组长,中共东流县委书记常棣和任副组长。11月,经省委、地委决定,东流、至德两县合并。并县后,县委领导机构暂时沿用中共至德县委名称,宋毓秀为书记,贾学千为副书记。

12月 各县开始整顿农村公共食堂。

本月 各县开展整顿、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工作。

本年 东流县被评为全国畜牧工作先进集体 东流县派代表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本年 贵池县牌楼乡大山大队茶叶生产受到国务院奖励。

本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视察贵池县小三线建设。

本年 石埭县接收100名上海知识青年插队落户。

本年 粮食减收 山区、丘陵区因干旱歉收;沿江洲圩区庄稼成熟后因男女劳力在炼铁前线,无法及时收割造成粮食减产。

本年 池州铅锌冶炼厂开工建设 次年建成土鼓风炉等设备,即简易投产,生产金属锌 4 吨。第三年生产粗铅 44 吨。安徽省首次有铅、锌冶炼工业。

1959 年

1 月 1 日 石埭县与太平县合署办公。

1 月 10 日 撤销各县冶金工业指挥部。

1 月 青阳县农民伍明树赴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同月 本月起,由于低糖、低蛋白诱发的水肿病在区境内蔓延。

3 月 22 日 东流、至德两县行政区域合并 国务院第八十六次会议批准:“撤销东流、至德二县,将原二县的行政区域合并为东至县。”县名确定后,5 月 15 日,县委正式用名中共东至县委。

同日 撤销石埭县,辖区分别并入太平县、祁门县 因建设陈村水库(今称太平湖),石埭县城广阳镇及该镇的耕地成为淹没区,国务院第八十六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石埭县,原辖区分别并入太平县、祁门县。

4 月 3 日 恢复铜陵县建制。

4 月 人民公社开始实行三级核算、自负盈亏 区境内各县根据安徽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自此,大多数公社实行三级核算、自负盈亏。

同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派员来贵池,了解农村中饿病及非正常死亡问题 此后,贵池县委派出大批干部下乡调查水肿病,并在各公社设治疗点,调拨一定数量的红糖、黄豆,为患者补充营养。

5 月 9 日 中共安庆地委决定成立贵池、青阳中心县委 李干任中心县委书记。

6 月 13 日 青阳铅锌厂迁贵池 与贵池铅锌厂合并,定名为安庆地区铅锌冶炼厂。

6月20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来九华山视察佛教工作。

6月23日 经省委批准,省属重点中学调整为22所 新增合肥师院附中、皖南大学附中、淮南一中、怀远中学、砀山中学、滁县中学、嘉山中学、贵池中学、宣城中学、歙县中学等10校为省属重点中学。

7月 各县开展野生植物资源普查 贵池县境内查出有价值的野生植物613种。

8月至9月 "反右倾"斗争展开 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通过省委《关于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定的决议》。随后,各县在"反右倾"斗争中错误地打击一批党内干部。贵池县县长徐世达因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些干部因写信或向上级反映农村中的严重困难,受到批判斗争。

10月 贵池县工业劳动模范高明启出席全国工交、运输、财贸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本年 区境内由于经济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

本年 区境内各县精简压缩企事业单位职工。

1960年

1月 中共安徽省委在贵池县曹村召开血防现场会议 推行水田改旱地的灭螺措施。同时,贵池县水改旱办公室成立。

3月21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来青阳县视察 接见中共青阳县委负责人及青阳县团县委委员,并合影留念。

3月 总结农村公共食堂的"经验" 各县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错误地强调"食堂是我们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贵池县委曾向中共安庆地委写报告总结农村公共食堂"二十四大好处"。

7月 贵池县农民歌手姜秀珍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

8月 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强调加强农业 各县开始精简机构,继续下放职工,充实农业

第一线。

12月下旬 各地开始纠正“五风” 11月28日至12月12日,各县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指示的具体规定》的传达。会后,在安庆地委的领导下,贵池、青阳、东至等县根据“十二条”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本年 自然灾害和“五风”给各县农村带来严重影响 各地出现饿、病(水肿病)、逃(人口外流)、荒(田地荒芜)、死(非正常死亡)现象。

本年 各县一批团员青年主动赴新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61年

1月 各县按照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开放水面,发动群众捕鱼 东至县人民委员会决定推广张溪公社捕捞成鱼实行“三包”(包产量、包完成任务时间、包工分)、“三定”(定点、定任务、定措施)、“一奖”(超额奖励)办法,推动渔业生产。

同月 各县派出工作队,发动群众“揭盖子”,退赔“一平二调”的财产。

3月中旬 各县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的决定,在农村全面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 这个办法又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实行“责任田”、落实“四固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当时农村中存在的严重困难有所缓解。

3月 加强学校管理 全日制农村初级中学,社办农业中学和其他技校一律改为业余学校;县办初级农业学校一律改为半耕半读;区境内全日制普通中学作适当调整,并控制发展。

同月 本月起,贵池、青阳、东至县对棉区、茶区以及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地区实行奖励 保证社员吃到与附近余粮队同等数量的口粮,按收购棉、茶等经济作物的数量供应一部分粮食。

6月25日至7月19日 各县党政主要领导人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在岳西县石关招待所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地、县三级干部,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

9月 开始对几年来在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 重点是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至1962年春,区境内各县县委都设立甄别平反办公室。1962年3月,安庆地委宣布为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贵池县县长高燮民、1959年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共贵池县委副书记徐世达平反。9月,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出通知: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律暂停甄别处理。由此,各县甄别平反工作停止。

本年 贵池县建成库容128万立方米的马衙水库 这座水库是于1957年开始动工兴建的。

本年 贵池、东至两县共精减下放12024人 其中贵池5212人、东至6812人。

1962年

1月 各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和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安徽省地、市、县负责人,揭发中共安徽省委,首先是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安徽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2月 各县县委分别召开全委扩大会、三级干部会 进一步强调执行生产计划统一、分配统一、用水统一、抗灾统一、不便分散的农活统一。

4月 贵池县首次用飞机撒药防治松毛虫 飞防175架次,飞防地区在县境珍溪(高坦)、牌楼、大路、枫岭4个公社,面积达15万亩。

5月下旬 各县传达贯彻中共安徽省委一届十二次会议精神 主要内容是:经济调整和发展农业生产,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会议提出,要坚决缩短工业、基本建设战线,大力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

6月 贵池县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 因贵池县东南湖涨水,县城居民和县直机关干部下水收割小麦,发生血吸虫病急性感染。全县772人感染急性血吸虫病,死亡23人。

10月 青阳、贵池、东至等县先后成立人民防空指挥部。

冬 停止推行"责任田" 各县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并错误地把"责任田"当作"单干风"来批判。至此,"责任田"停止推行,已推行的要求全部改正过来。

本年 一些厂(场)矿企业继续实行关、停、并、转,精减人员 其中贵池县又精减职工1970人,占全县职工总数的22%。

1963年

3月5日 学雷锋活动在各县展开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各县机关、团体、学校开展学习雷锋活动。

3月20日 全省血防工作会议在贵池县召开 省委书记桂林栖做总结讲话。

5月27日至6月1日 各县主要领导人参加省委召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会议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布置工作。随后,按照"前十条"精神,各县开展以阶级斗争、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和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5月 安庆市大渡口区(共6社1镇)划归东至县管辖 从5月27日起,大渡口区工作由东至县领导,各业务部门工作从6月1日起由东至县有关部门接管。

同月 本月起,县以上机关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10月下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由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陪同视察青阳县。

10月 各县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后十条")。

本年 贵池县建成耕地面积为1万亩的双丰圩。

本年 各县将一部分公办小学转为民办 贵池县公办转民办的小学达26所。

1964年

2月 全区各县分别以多种形式组织广大社员和农村干部学习大寨精神。

5月1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来青阳县视察 并书赠毛泽东诗作《和郭沫若同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5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组织的苏、豫、皖三省民兵工作学习组来青阳县视察民兵工作。

8月23日 中共安徽省委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草案)》 不久,全省组织3.7万人的农村社教工作队,集中在寿县、全椒、歙县、青阳、砀山、界首、繁昌7个重点县的140个公社进行社教。

8月 贵池县境内的黄湓通江闸口黄湓闸工程竣工。

9月12日至15日 青阳县被确定为全省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县之一 在这期间,省委召开的地委、市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确定青阳县为全省7个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县之一。会后,由中共安庆地委副书记钱俊瑞(文化部原副部长,化名"赵老师")率领的工作队到达青阳县。这一期社教采取"扎根串联"、"首先解决干部问题"的做法,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造成混淆敌我界限的"左"倾错误。

本年 安徽省地质局在贵池县殷家汇建立324地质队。

本年 东至县森工局陈昌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本年　东至县派代表出席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棉花县工作会议全县种植棉花近10万亩,被列为全国集中产棉县。

1965年

2月　全区开展“四清”运动　各县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自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城乡展开。

5月2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途经青阳县陵阳镇　胡志明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省委书记李世农等陪同去黄山休养途经青阳县陵阳镇。董必武有“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的诗句纪行。

5月　国务院批准设立池州专区　辖贵池、青阳、铜陵、东至4县,池州专署机关设在贵池县。7月,中共池州地委成立,直属中共安徽省委领导。

6月16日　方振华任池州专署专员　丁仁一、谢光辉、郭鉴、武建周任副专员。

7月16日　中共池州地方委员会和池州专员公署正式组建　并在贵池县池州镇开始办公,同时启用省委颁发的“中国共产党池州地方委员会”印章。

7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来贵池视察　由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任之等陪同,次日前往七里视察。

7月19日　国务院第一百五十七次会议批准设立安徽省石台县,归属池州专区　以太平县陈村水库以西原石埭县的行政区域和祁门、黟县、贵池3个县的各一部分行政区域为石台县的行政辖区。在此次区划变动中,划贵池县的坷田、占坡、大演、七里、矶滩、丁香、莘田、小河等8个公社归石台县管辖,100多名机关干部随调石台县任职。

7月　中共池州地委成立　直属中共安徽省委领导。

同月　中共安徽省委监察委员会驻池州监察组成立　行使纪律

检查委员会职能。

同月 池州专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池州分院相继成立。

同月 青阳县铅锌矿、黄沙厂等24个企业单位试行“亦工亦农”用工制度 共招收农民工476人。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落实中央“二十三条”精神 以“四清”运动和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展工作,地委监察组着重查处危害中心任务的重大违纪案件。至1966年8月,全区共受理控诉、申诉案件1448件,处分558人,其中开除党籍96人、留党察看134人、撤销党内职务41人、严重警告120人。

8月15日 中共池州地委决定成立中共石台县工作委员会。

8月27日 根据安徽省军区(1965)第105号文批准,重新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池州军分区 机关驻贵池县城。军分区司令员林少武,第一政委胡坦(兼),第二政委谢永胜。

8月 胡坦任中共池州地委代理书记 11月任地委书记,康兆郁、方振华任副书记。

同月 中共安徽省委对第二批“四清”运动重点县做出部署 第二批重点县是:颍上、凤台、宿县、六安、霍邱、凤阳、定远、长丰、无为、桐城、贵池、宣城、旌德,加上第一批未结束的歙县共14个县。

同月 中共安徽省委、池州地委确定贵池县为开展“四清”运动重点县。

9月8日 贵池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继续帮助县委检查“五风”错误,部署并开展系统“四清”运动。地委代理书记胡坦出席会议并讲话。

11月 贵池县东南湖围垦灭螺工程破土动工。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批准成立中共石台县委员会、石台县人民委员会。

年底 全区开始进行党员登记 地委按照省委12月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的文件要求,分批分期地对全区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登记,基层党支部1620个,中共党

员 23662 人。

本年 池州专区各县剧团根据省文化主管部门的通知,停止上演传统剧目 同时,组织学习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本年 上海市开始在池州南部山区进行小三线建设。

1966 年

2 月 中共池州地委向地直和各县传达贯彻安徽省委《关于进一步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指示》。

同月 全区掀起学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热潮。

3 月 1 日 长航池州港在贵池池口建成 7 月 1 日,汉—申客轮首泊池州港。

3 月 14 日至 17 日 池州军分区在贵池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经大会选举并经省军区党委批准,成立池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胡坦,第二书记谢永胜,副书记林少武。

4 月 中共池州地委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 着重研究县以下干部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领导好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同月 《毛主席语录》在全区首次发行 中共池州地委和贵池县委在贵池县城举行隆重的首发式。

5 月 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池州青阳视察工作。

5 月 18 日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通知》下发到池州县团级以上单位。

5 月 23 日至 6 月 12 日 中共池州地委书记胡坦参加省委召开的省直厅局党委书记、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 6 月 6 日起,池州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对照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进行检查。这次会议确定,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放在县以上机关、学术、新闻、出版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会议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6月1日 池州地直机关及各县县直机关、团体、学校迅速掀起贴大字报的热潮 随后,池州地区直属单位和各县机关团体停止办公、学校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6月7日 地委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正式成立地委文化革命小组贯彻通知精神,研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6月 全区掀起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 区内九华山一大批寺庵和佛像,齐山、万罗山、陶公祠等处的文物古迹和民间的古典戏剧服装、文物字画著作等均遭到破坏、毁损、焚烧。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向各县中等学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工作组 8月,地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宣布各中学工作组全部撤出。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求领导干部“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

9月1日 中共池州地委和贵池县委联合召开万人大会 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9月8日 贵池县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改动部分地名、山名、街道名称,开展立“四新” 将专区所在地的池州镇原九华街改名为“东风街”、牌坊街改名为“解放街”、市心街改名为“四新街”、翠微街改名为“红光街”、郭西街改名为“红星街”、楼山街改名为“红旗街”、包公井改名为“四新井”,齐山改名为“红旗山”,池州师范的状元桥改名为“立新桥”,杏花村酒厂改名为“贵池酒厂”。

9月中旬 各县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对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和小学招生做出具体规定 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制度;初级中学招生仍然实行考试制度,考试科目只限语文、算术;小学招生不实行考试。

9月底 许步信、龙冬花赴京参加国庆17周年观礼。

9月 红卫兵开始“大串联” 16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

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发出《关于组织我省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赴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池州地区中等学校学生开始向全省、全国“大串联”。东至县组织200余名红卫兵代表赴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贵池、石台、青阳县也有一批红卫兵到北京。

同月 本月起,地区所在地贵池城内部分学校和一些部门的红卫兵、青少年走上街头破“四旧” 他们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人和事进行大批判、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部分中学先后建立红卫兵组织,学校停止招生,学生“停课闹革命”。

10月1日 影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贵池举行隆重的首映式 随后,相继在全区各县城乡连续放映。

10月3日至6日 池州地委书记胡坦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委、市委书记会议 会后,迅速传达贯彻会议主要精神:号召到学生当中去,欢迎“炮打司令部”,团结一切革命的左派,团结大多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务。

10月5日 全区各地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11月8日 地委机关门口贴出批判地委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此后,贵池中学红卫兵和池州地直机关、贵池县直机关群众造反组织,纷纷批判地委书记胡坦、县委书记张成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9日 全区各县红卫兵开始纷纷自发赴北京串联。

11月上、中旬 安徽“八二七”造反组织成员到池州地委驻地贵池县城串联 贵池县城街头有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机关干部和居民为之震惊。

11月18日 红卫兵大字报开始由机关大院内陆续张贴到街头

11月19日 中共池州地委第四十四次会议研究增设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和办公室负责人 同时,成立接待站,负责对造反派和外

地串联学生的接待工作。根据地委指示,贵池县招待所停止对外营业,全力接待外地来贵池县串联的红卫兵。

11月 造反派多次冲击党政机关,以致机关无法正常工作 中共池州地委、池州专署和区内县级党政机关同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一批领导干部被围攻、批斗,无法工作、休息。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967年

1月15日 “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捣毁“人民赤卫队”群众组织。

1月21日 青阳县杨田、朱备农民造反组织与蓉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发生冲突 “安徽大学八二七造反队”部分来青阳的学生电邀附近市县大批群众到蓉城“支援”,砸抄机关,打伤、扣押百余名干部和农民,粮食业、商业、饮食服务业损失最大。时称“一·二一”事件。

2月19日 “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举行夺权大会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举行夺权大会,夺中共池州地委和池州专署的领导权。地委书记胡坦、专员方振华以及地区一批领导人第一次被押解上街游行。

2月 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池州军分区传达毛泽东对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转报安徽省军区请示的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自此,池州和各县驻军先后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逐步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3月下旬 池州各地刮起“抓叛徒”的恶风 到1969年年初,仅专区机关干部中被打成“走资派”、“特务”、“叛徒”、“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等有69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19.6%,其中中层干部28人。

3月 “罢官”之风席卷全区 企事业单位乃至农村社队、城镇街道干部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罢官”。

同月 池州地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成立 由部队干部、

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至月底,各县也先后成立“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4月 贵池黄山岭铅锌矿兴建 1973年7月投入生产,1984年采选矿石能力超过设计能力,达8.25万吨/年,成为安徽省当时最大的铅锌矿。

5月 一批部队指战员分别到贵池、石台进行“支左”和实行军管 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属总参谋部121部队30名指战员到贵池,支持所谓“左派群众组织”。同时,一批331部队指战员进驻石台,并对电信、广播、气象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7月27日 夜,“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与“池州八二七造反司令部”发生大规模武斗,打、砸、抢、抄、抓通宵达旦。随后,武斗向全区各县以及农村蔓延。

8月1日 青阳县发生武斗 拥护与反对青阳“三二一”夺权的两支造反派队伍在“文攻武卫”的蛊惑下,发生数次武斗,造成伤亡。

8月19日 “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头头率众冲进池州军分区独立连驻地,抢走一批枪支弹药。

8月20日至24日 池州两派造反组织在贵池县城西杏村大桥发生枪战 致数人重伤。随后,造反派在贵池县铜山、灌口、高坦、唐田、牌楼等地抢夺民兵武器。

8月23日 “池州地区联合造反总指挥部”抢银行 数十人持枪在殷家汇银行强行索取人民币5万元。

8月 全区武斗蔓延 各县城内干部、居民纷纷“跑反”。

9月1日 贵池县造反派之间在白洋等地发生数次枪战 先后在白洋、里山、高岭、梅龙、杨桥、马衙、观前、棠溪等地发生大小不等的武斗事件数起,造成程度不同的伤亡。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121、331、395部队先后到池州“支左” 13日,121部队先遣连到池州“支左”。本月下旬至10月中旬,121部队分批撤离池州,南京军区331、395部队进驻贵池、铜陵、东至等县“支左”。

同月 池州地委、专署机关和贵池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机关被造

反派多次查抄　少数造反组织的头头还进入贵池县百货公司仓库,劫走价值1万余元的物资。

12月26日　池州地区造反司令部头头率众抢银行　由广阳到达石台县城七里,劫走石台县人民银行人民币现金9万余元(后被驻军追回8万余元),长短枪各1支、子弹70发。

本年　池州地区大部分工业企业因武斗而停产。

本年　横跨贵池县城西河道的杏花村大桥建成。

1968年

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通讯总站青阳分站战士申屠龙德被错判　申屠龙德在蓉城十字街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跳上宣传车高呼"打倒林彪!""打倒文化大革命!"等口号,当场被逮捕。9月,申屠龙德被判处死刑。1980年4月,南京军区为其彻底平反昭雪。

3月12日　池州及贵池县两派造反组织达成联合协议　组成池州地区暨贵池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3月　池州地区两大派头头赴合肥参加"万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同月　池州地区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　在"砸烂公检法"的错误口号下,各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先后成立,由军队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

4月28日　东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来池州考察。

同月　贵池县革命委员会、青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7月21日　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池州地区革命委员会　军代表高英任地区革委会主任。

8月　石台县革命委员会、铜陵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同月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区各中小学和文化事业单位。

9月　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　全区机关、团体、学校和农村社队,都以一定的仪式实行在毛泽东的标准画像前向毛主席"早请

示、晚汇报”、“天天读”(登载毛泽东著作语录等“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小册子)制度,规定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时候要跳“忠”字舞,唱《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歌。

同月 池州地区革委会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搞好斗、批、改,彻底揭开旧地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 斗争矛头指向中共池州地委主要领导人。

同月 地直单位和各县普遍建立群众专政队 非法关押刑审干部、群众。

10月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在全区展开 地委、专署领导人和大部分中层干部被集中到东至县大渡口池州地区“五七”干校搞“清队”运动。

同月 全区首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同时接受来自合肥市、上海市的知青到各县农村插队落户 仅石台县就接收上海知识青年2387人。

11月 全区各县基层整党工作展开 至翌年秋,池州专区大部分基层党支部进行了初步整顿,并重新建立党支部,90%以上的党员恢复组织生活。但有一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因当时尚在被审查中,未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甚至被“清除”出党。

本年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省长黄岩被省“大批判小分队”押至贵池进行“巡回批斗”。

本年 贵池县建成横跨秋浦河的殷汇大桥。

本年 上海三线化工总厂所属的卫星、金星、红星等厂迁入东至县境的香隅 同时修筑三线专用公路9条,建305码头和龙江水厂。

本年 各县建立“三代会”(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

1969年

1月 全区各县进行撤区并社、精简机构工作。

3月23日 池州专区“三代会”成立。

4月 贵池县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赴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月 专区直属机关和全区各县下放大批干部到农村“插队”劳动。

5月 军代表吕玉堂任池州专区革委会主任。

6月8日 池州专区革委会在贵池县殷汇镇召开上山下乡和集镇“斗、批、改”现场会

6月 地、县两级中层干部赴合肥参加全省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7月 医务人员下放农村 一批省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下放到池州,各县医院也相应地将医务骨干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同月 池州军民抗洪抢险 13日,贵池齐山埂新挑防洪堤和白沙湖堤先后溃破,东南湖垦区成为一片汪洋,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同月 由南京军区总医院各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来池州巡诊 这支医疗队共27人,在青阳县陵阳、沙济等地开展巡回诊疗。

12月 石台县东方红水力发电站建成发电。

本年 全区副县以上干部大部分被解放 在已解放的干部中,有80%安排工作——重新任命并履行职务。

本年 全区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生产大队,由贫下中农直接管理。

本年 上海市国防工办在贵池梅街成立507指挥部 同时着手筹建八五、永红、火炬、胜利、前进等三线工厂和三二五发电厂。

本年 全区各中、小学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

本年 铜陵县至贵池县无线定时会晤人工电报线路开通。

本年至次年春 池州专区各县革委会先后建立中国共产党核心小组。

1970年

1月27日 由省和专区投资兴建的池州水泥厂在贵池齐山南麓建成投产。

1月 中共池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 军代表吕玉堂任组长,江声任副组长。

2月 九华水电站在青阳大桥庵建成 供九华山及九华公社6个大队照明用电。

同月 池州化肥厂建成投产。

同月 全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4月25日 全区进行政治大清查 按照省统一部署,从零时开始,连续3天在全区进行政治大清查,并对各地一些“有问题”的人进行抄家、搜查。

4月26日 八五钢厂正式投产,炼出第一炉钢。

7月 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考察东至县。

同月 专区革委会号召“大打矿山之战” 贵池县兴办黄山岭铁矿、六峰山铁矿。

9月10日 池州专区学大寨参观团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10月27日 中共石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恢复石台县委组织。

10月 废除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开始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新生入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11月25日至29日 中共东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恢复东至县委组织。

11月 全区贯彻省革委会《关于全面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 要求各县“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此后,连续6年,每年地、县两级都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

12月29日 中共贵池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 恢复贵池县委组织。

12月 贵池县境内的三二五电厂建成 至此,梅街地区小三线电网形成。

1971 年

2 月 21 日至 24 日　中共青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恢复中共青阳县委组织。

3 月 7 日至 11 日　中共池州专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中共池州地区委员会,书记为吕玉堂(军代表),副书记为荣超(军代表)、江声、韩德忠(军代表)。

3 月 29 日　池州专区改称池州地区。

3 月　青阳县治理七星河第一期工程竣工　一期工程历时 4 个月,民工劳动日达 19 万余个,拓宽加深河道 2500 米,完成土石方 17.7 万方。

4 月 9 日　池州地区“五七”干校成立　经池州地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将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地区“五七”干校合并,成立安徽省池州地区“五七”干校。

4 月 20 日　由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管理的贵池东南湖农场移交贵池县管理　定名为“地方国营贵池县红旗农场”(1984 年恢复东南湖农场场名)。

6 月　根据省革委会部署,池州地区各地的群众专政指挥部撤销。

上半年　全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到 1974 年年底结束。

7 月　池州农药厂建成投产。

8 月至 9 月　全区各地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在《纪要》的影响下,全盘否定池州 17 年来教育工作成就。

10 月 15 日至 17 日　开展“批林整风”　中共池州地委召开行政 18 级以上党员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外逃的文件。随后,全区逐级进行传达,开展“批林整风”。

本年　全区各县均建立公社一级广播放大站。

本年　东至县农机研究所研制成功“五丰—71 型”人力手动小苗带土插秧机。

本年　贵池县邮电局开通池州地区至所属各县无线电联络。

1972 年

2 月　全区商业系统贯彻省革委会批转省商业局《关于明确公私合营企业已改为国营企业性质的问题的报告》　规定:凡资本家定息已经取消,资方代表已经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已另做安排的公私合营企业,其性质属国营企业。

4 月　全区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印发的《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针对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情况,强调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5 月　江声任池州地区革委会主任。

同月　荣超(军代表)任中共池州地委书记。

10 月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考察东至县。

12 月　中共中央血防办公室副主任郑岗来贵池考察血防工作。

同月　700 名上海知识青年来贵池县插队落户。

下半年　在地方党委、革委会任职的军队干部开始分批回部队。

本年　东至县金寺山林场用微生物白僵菌防治松毛虫获得成功　并将有关资料送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

1973 年

2 月　地区及各县先后撤销县革委会人保组,相继恢复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建制。

同月　共青团池州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3 月　江声任中共池州地委书记。

4 月　地区直属机关和各县开展对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进行批判。

10 月　池州地区举办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

同月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大文件的决定》　强调全区城乡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本年　进行学制改革　按照安徽省革委会的部署,全区实行学制

改革,小学为五年制,初中为三年制,高中为二年制。

本年 位于贵池县境内的池州地区黄山岭铅锌矿建成投产。

1974 年

2 月 传达江青一伙抛出的河南省“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随后,池州地区中小学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复辟”进行批判,致使学校教学秩序一度混乱。

同月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中共池州地委根据省委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在全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少单位还建立所谓“评法批儒”理论小组,全区教育系统开展批判“克己复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等。

3 月 1 日 部分行政区划变更 铜陵县由池州地区划出,归属铜陵市管辖;太平县由徽州地区划出,归属池州地区管辖。

3 月 中共池州地委贯彻中共中央 7 月 1 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各地混乱局面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形势逐步好转。

8 月 贵池县国营读山煤矿建成投产。

12 月 4 日 东至县改造尧渡河、根治七里湖的防洪灭螺工程开始动工。

1975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 中共池州地委主要领导人参加省委三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听取省委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精神,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为在本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 月 全区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中普遍铲除社员超过规定的自留地上种的植物,并取消自由市场。

4 月 全区大办四级农科网 石台县 85% 的生产大队成立农科队。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召开工作会议 传达邓小平关于各条战线

进行整顿的指示,着重讨论如何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从4月份起,池州地区工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

8月 地委、地区革委会工作机构进行较大调整 突击提拔了一批新干部。

10月 贵池县境内的上海三二五发电厂、铜陵市110千伏高压线路投入运行 至此,贵池小三线电网将江南江北电网和华东电网全部沟通。

同月 贵池县清溪河改道和东南湖围垦灭螺工程竣工 此项工程历时10年,共完成28项施工项目。国家和地方共投资503.4万元,群众自筹243.5万元,动员民工10万人,完成土石方544.06万立方米,保护耕地面积3.5万亩,受益人口6.7万人。

同月 池州地区党政机构做相应调整 撤销地区革委会所属的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地委除保留办公室(与地区革委会办公室同一机构)外,设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等工作机构。

11月起 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在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着重在各级领导班子中以整风的形式解决"真学假学"的问题,在全区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本年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宋佩璋来青阳县考察。

1976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京逝世,全区人民沉痛哀悼 地区和各县直属机关、学校、团体的干部职工,自发佩戴黑纱,进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2月16日 池州地区工宣队领导小组成立。

3月8日至15日 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 中共池州地委主要领导人参加省委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会后,省委《关于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意见》印发到池州。随之,全区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地委拟定召开理论讨论会的计划,在全区县级以上党委中参照省委"理论讨论会"的方式,解决领导班子中所谓

“民主派”、“走资派”的问题。

4月 在通过池州港的客轮上出现“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的标语。

同月 地区革委会设立视察室。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各县相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谣言”。

5月7日至13日 全区首次理论讨论会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专业理论工作者、业余理论骨干,各县、区、社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和地、县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代表270人。

7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池州人民沉痛哀悼。

7月 全国水牛协作会议确定东至县东流水牛为全国13个地方水牛良种之一。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 下午4时,池州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收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18日,地区及贵池县在城北体育广场举行万人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

9月 张建民任池州地区革委会主任。

10月4日 中共安徽省委做出《关于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

10月6日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篡党夺权阴谋 从此结束10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迎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0月15日 中共池州地委机关和各县县委机关同时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宣布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十年动乱宣告结束。

10月20日 贵池县城上万人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12月10日至17日 东至县齿轮厂派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农业

学大寨会议。

12月15日 中共池州地委主要领导人参加省委召开的地委、市委书记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并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2月 池州地区各级民兵指挥部撤销。

1977年

1月11日 省委书记宋佩璋来青阳县检查工作。

1月17日 省委书记宋佩璋再次来池州察看青阳童埠圩工程。

2月 中共安徽省委批准石台县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

3月 参加五省江洲湖滩灭螺科研协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到贵池参观东南湖、大白湖、谷潭湖围垦灭螺工程。

4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池州开始发行 各县集会庆祝,青阳县至5月底共发行12000册。

4月 全省山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东至县召开 省委书记宋佩璋到会讲话。会议期间举办了东至县农业学大寨展览。

同月 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改组安徽省委的决定 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同“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做斗争。随后,全区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高潮。

5月 江声任中共池州地委第一书记,张建民任中共池州地委书记。

8月 本月起,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 地委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公报,在党内掀起一个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十一大、十一届一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以十一大的强劲东风推动各项工作。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坚决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

9月 地委召开大会,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 揭批“四人帮”干扰科学发展的罪行,宣传表彰各行业科技人员科技活动的事迹。

10月 各县组织干部赴湖南、江苏等地考察学习 青阳县组织全县公社书记赴湖南源江县、华容县、桃源县、邵东县及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地,考察学习社队企业、杂交水稻、苎麻生产等多项经验。东至县委组织干部赴湖南的桃源、浏阳等地参观学习,实地考察杂交稻、林业生产。

同月 中共池州地委党校重建。

11月16日 池州地委决定对一些靠"造反"起家并犯有严重错误而进入地区领导班子的人进行停职检查。

11月 地委贯彻《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项规定》(简称"六条规定") 强调重视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

12月 全区贯彻安徽省1977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技工)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恢复升学考试制度 至此,在"文革"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贵池县本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8000余人。

同月 省委书记赵守一来池州检查指导工作。

本年 贵池县被评为全国水产先进单位 县革委会副主任高燮民代表贵池县参加农林部召开的表彰大会。

本年 石台县茶叶公司代表出席全国财贸系统"双学"(学大庆、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

本年 贵池县出口苎麻1711担,被列为全国苎麻生产基地。

本年 东至县齿轮厂、池州地区汽运公司第一车队(驻东至县)分别派代表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1978年

3月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省委书记王光宇考察东至县。

4月25日 池州地区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的核心小组改称党组,同时撤销企业、事业单位的革命委员会。

4月 各县分别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

7月　全区发生历史罕见大旱　进入8月份以后,缺雨高温天气持续数月。各地塘坝和水库干涸,山区和丘陵地区生活用水都发生困难。仅贵池县农作物受旱面积就达155万亩。全区投入劳力25万和各种抗旱机械近万台进行抗旱。

8月12日至16日　中共池州地委宣传部派代表参加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此次会后,全区开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与拨乱反正同步进行。

9月　全区各级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工作宣告结束。

秋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青阳县考察。

11月13日至15日　池州军分区在贵池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池州军分区第四届委员会。

11月下旬　释放因天安门事件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池州地委传达贯彻省委决定:凡是因天安门事件牵连、悼念周恩来、为邓小平鸣不平、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尚未释放、平反的,立即释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2月　学习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广播后,地委常委会和各县委带头学习,并组织广大干群学习讨论。

同月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安徽省九华山管理处　定为县级单位,直属省、地双重领导。

本年　中共东至县委组织干部到官港生产大队坦岭生产队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工作。

后　记

《中国共产党池州历史》第二卷(1949—1978)是在中共池州市委的领导下,由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编撰出版的一部地方史。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要求,2012 年 9 月,市委党史研究室即在多年征集、整理、研究党史资料的基础上,着手拟制编写提纲,后经反复征求各方意见,不断修订完善,确定了编写纲目。2015 年 8 月,经市委领导同意,《中国共产党池州历史》第二卷(1949—1978)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时间紧、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2016 年 5 月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几经增删修改,于 2017 年 7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为了确保该书所用资料准确、详实,再现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将征求意见稿分别呈送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有关领导审阅,并广泛征求离退休老干部、党史专家学者以及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区)委党史研究室的意见。许多同志认真负责地审阅书稿,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根据所征集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逐条认真梳理,作出进一步修改、充实。2017 年 10 月印出送审稿,分别呈送市委主要领导及各位常委、省委党史研究室审读。之后,按照审读意见,对文稿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2017 年 12 月报请市委审批同意出版。

全书编写和出版工作一直得到历届市委的关心和支持,市委书记王宏同志审定了送审稿并亲自为本书作序。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大力支持,有力地保证了本书的编写、修改、送审、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书是市委党史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全书共分四编,执笔人员是:周峤(第一编及第二编的 8-13 章)、李运动(第二编 14、15 章)、

张思建(第三编、第四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市直有关部门、县(区)党史部门和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对本书编写和出版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帮助的部门、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及掌握的资料所限,书中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7 年 12 月